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学者奥塔韦夫妇研究非洲问题的专著。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已研究非洲问题达十八年之久，其间有八年时间是在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度过的，因此得以对非洲的历史和现状、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作者提出了“非洲共产主义”这一术语，把非洲自称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家称为“非洲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有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书中分述了这三个国家的思想、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外来影响（苏联、古巴等）问题，也综述了非洲的全面情况及发展趋势。

本书在国外政治理论学术界获得好评，现予翻译出版，供我国国际共运及国际问题教学研究人员参考。

目 录

第一章	激进主义新浪潮·····	1
第二章	从非洲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21
第三章	非洲社会主义重探·····	58
第四章	莫桑比克·····	107
第五章	安哥拉·····	152
第六章	埃塞俄比亚·····	195
第七章	民族主义与世界革命·····	240
第八章	非洲共产主义论辩·····	291

第一章

激进主义新浪潮

大约十六年前，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在首次出访非洲大陆的时候曾说过，看来非洲革命的前景“很好”。这话曾使西方感到震惊。但是，六十年代的事态发展证明，他的这一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站不住脚，或者至少是不成熟的。因为，那些第一代激进的非洲领导人一个接一个被赶下了台。西方从中国人和苏联人一连串的挫败中感到安慰，胜利地克服了第一次巨大的“红色恐惧症”。此后，美国想出了一种政策，轻易地把非洲的命运交给了前殖民大国，差不多十来年，黑非洲简直被丢到了脑后。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西方的政策制订者、学者和政治家们又开始关注非洲的命运，并且在寻思：非洲革命的条件是否真的已经最后成熟，“就要变成共产主义的了”。因为，尽管非洲共产主义困难重重，挫折频仍，而且有种不利的预测，但是，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在非洲大陆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且看来非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苏联、东德和古巴的大规模援助下，正在迅速得势。西方再次陷入惊恐之中，美国也变得紧张起来，力图阻止这一新的红色浪潮。

在六十年代，当时在熟悉非洲大陆的中国人、苏联人和美

国人中间对非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有一个可能是最普通的口头禅，“没有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黑非洲似乎已成为世界上一些最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许是最后一批真正的信徒的滋生地了。因此，此中的讽刺意味就更大了。越来越多的非洲领导人正试图证明，马克思和列宁所主张的社会发展有其普遍规律，既适合于欧洲和亚洲，也适合于非洲，这种看法是绝对正确的。有时，他们的追求近于荒谬，好象是根据一种理论在黑暗中寻找某种现实，而这种现实在非洲大陆并不存在。因为，非洲最重要的特点是绝对的贫困、工人阶级还处于婴儿时期、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极端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与它在现实中作为争取经济迅速增长或争取政治稳定发展的模式所取得的具体成功事例相比，似乎极不相称。但是，对这一学说的信仰不仅仍然坚持不舍，而且还有不断增强之势，非洲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掌权的机会也已经大大增加。

1980年，非洲五十个独立的黑人和阿拉伯国家中，有七个是在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统治下的国家。它们是安哥拉、贝宁、刚果、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索马里。至少另外还有九个国家信奉某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它们是阿尔及利亚、佛得角群岛、利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群岛、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这十六个国家的人口占非洲四亿二千五百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有不少国家，象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比绍十分贫穷。这就使得那些对非洲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认定，这种理论只不过是给这些国家提供一种均分贫困的理由，而不

是均分什么财富。但是，有几个国家拥有很重要的自然资源，使它们成为非洲大陆当今或未来最富有的国家。这类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安哥拉、赞比亚和几内亚。不管这些国家是穷还是富，很多国家所处的位置，不论从东、西方地缘政治斗争的角度，或是从潜在的非洲内部冲突的角度来看，都有战略重要性。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是所谓非洲之角国家，它们濒临红海和曼德海峡这些重要的国际水道。莫桑比克临印度洋绵亘一千七百英里，正处在南非的北方，而南非又是非洲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最后争夺的目标和战场。安哥拉掌握着决定邻国扎伊尔未来命运的一把钥匙，而扎伊尔是依附西方的拥有大量矿藏而政治上又非常动荡的重要国家。阿尔及利亚凭其地大物博，控制着马格里布的东北部。它与另一个素来亲西方的摩洛哥为邻。摩洛哥因吞并西属撒哈拉触发战争而于七十年代末深陷困境。马达加斯加，这个东非海岸附近最大的岛国，濒临莫桑比克海峡，开往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油船定期地经过这里。最后是刚果，它的狭长的国土从大西洋一直伸向非洲心脏，在安哥拉内战时期曾充当苏联和古巴人进行军事活动的集结待运地而显出它的作用。看来，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国家，或因其资源丰富，或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在决定整个非洲大陆的命运方面，它们各自或者一起都注定要起到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其他黑非洲国家传播的可能性看来也很大。纳米比亚战斗的民族主义团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和新独立的津巴布韦的领导人罗伯特·穆加贝并不掩饰他们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决心。虽然南非同西方关于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实行选举的谈判被南非拖延下来,但是,看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执掌政权只是个时间问题。在津巴布韦,穆加贝小心谨慎,生怕引起白人发动或支持的反对他的政变,在掌权初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出人意外的稳健。但是,他依然宣称,他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想在向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社会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慢一些。在整个南部非洲出现一批战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性看来是很现实的。在印度洋的岛国毛里求斯,到七十年代末,最大的一个政党就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毛里求斯战斗运动。这一组织不断壮大,它在当地城市政治生活中的优势日益增长,这使它有可能在1981年下届大选中获胜。^①在中非,扎伊尔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很糟糕,继续使这个国家经常遭到反对蒙博托总统的激进派的攻击。在马格里布,波利萨里奥运动的游击队,背后有阿尔及利亚的支持,又受到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的鼓舞,看来越来越有机会在争取西撒独立的斗争中取胜。这对哈桑国王及其亲西方的谢里夫君主制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非洲的事态发展常常难以预料。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加上政治形势长期不稳,看来这就为更加激进的非洲领导人上台提供了理想的条件。非洲四十五个非产油国的年经济增长率,1978年几乎等于零,1979年差不多也是如此。八十年代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善的希望。甚至,照联合国机构和美国政府的看法,大部分非洲国家总的经

^① 大选于1982年6月举行,毛里求斯战斗运动与社会党结盟,获胜上台执政。1983年,毛里求斯战斗运动发生分裂。——译注

济发展前景简直令人恐慌。

在美国，多年来通常把非洲共产主义的发展看作是外部共产党大国利用当地的冲突和内部政治动乱扶植“它们的代理人”上台的结果。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纽瑟姆1979年末在国会作证时说，“在我们谈论非洲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几乎只是讲苏联、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古巴，甚至还有中国的作用”。象是屡屡出现的恶梦，这个或那个共产党国家不断地卷土重来，插手一些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至少，这是美国历届政府精心制造的非洲共产主义的形象。其实，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一样，只是当他们突然觉察到西方盟国或西方在非洲大陆的利益受到共产党国家的威胁，或是深刻感到共产党国家要打破东、西方在那里的力量均势的时候，黑非洲才真正引起他们政治上的严重关注。六十年代在刚果问题上，七十年代在安哥拉问题和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发出的惊呼，就是这种态度的主要例证。尽管美国对于共产主义在非洲的发展有过这种紧张的、只是一时的关注重视，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制订出一种“遏制”共产主义在非洲发展的长期政策和战略。美国甚至也没有设法了解一下在非洲内部是否有某些力量有利于共产主义的传播，至少是那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政权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对付它们。美国在对付那些招来共产主义幽灵的连续出现的危机中，采取临时应付的办法已成为美国对黑非洲的外交政策的特征。卡特总统一上台就想克服这种临时应付的局面，并根据对非洲的新的长远看法制订了政策。卡特开始曾声称，美国已经克服了它“对共产主义的过分恐惧”，并且接受了安德鲁·扬的估计，认为在南部

非洲对西方的主要威胁是种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但是，还不到两年，他对于非洲共产主义的态度，就又返回到了美国传统的立场，指责古巴人对非洲内部事务进行“无理的干涉”，并把他刚开始促进同卡斯特罗和解的努力停了下来。显然，美国还远没有克服它“对共产主义的过分恐惧”。

对于非洲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学者和国会迄今已经历过两个近乎狂乱的时期，中间隔着一个时期，整整十年沾沾自喜地认为害怕是毫无意义的。在六十年代初期，他们曾一度陷入真正的极度狂乱状态，那是因为当时出现了被看作突如其来的共产主义的大攻势，要把一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从它们前殖民地宗主国那里争取过去。象沃尔特·拉克这样一位不同一般的作者，1961年他为美国制订外交政策的显要人物的杂志《外交》季刊撰写了一篇文章，用了这样的评论开头：“几乎一夜之间，非洲共产主义便成了头等重大的国际问题”。他说，获得解放的非洲大陆已经成了“世界的主要的麻烦中心”。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或者亲苏和亲华的国家，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整个黑非洲和阿拉伯非洲建立起来。先是加纳，它在富于幻想的泛非主义者克瓦米·恩克鲁玛的领导之下。恩克鲁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他的国家1957年独立后，一年一年地变得越来越明显。然后，是塞古·杜尔领导下的几内亚。1958年几内亚与法国突然决裂并转向苏联求援。这比卡斯特罗上台还要早三个月。在马里，莫迪博·凯塔领导他的国家于1960年获得独立。两年之内，他大力推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表示赞赏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1962年阿尔及利亚在经历了长达八年之久的

民族解放战争之后，终于取得了独立。一个战斗的社会主义反西方的斗士，艾哈迈德·本·贝拉领导了这个国家。不久，他便跑到纽约联合国，又从联合国直接跑到哈瓦那，表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卡斯特罗，从而把阿尔及利亚带进了东西方冷战之中。非洲战斗的社会主义者们把他们激进的同情心公诸于全世界，他们还联合起来支援帕特里斯·卢蒙巴和卢蒙巴以后的左翼分子在战祸频仍的比属刚果（后改名为扎伊尔）掌权。苏联利用它在非洲新发现的盟友，运武器给左翼叛乱分子反对西方支持的利奥波德维尔的领袖们。这就在觉醒的非洲大陆制造了严重对立的冷战气氛。

但是，到六十年代中期，这种“红色威胁”看来开始消退。苏联人和中国人在一些国家做得太过火了，另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非洲激进领导人的俱乐部在开始萎缩。1961年共产党人第一次遭到厄运，苏联驻几内亚大使因为支持反对杜尔总统的颠覆活动而被驱逐出境。1965年初中国驻布隆迪大使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中国大使被指责干涉布隆迪与其邻国前比属刚果的内政。当时，刚果的内战和分裂活动还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主要心病。华盛顿要求联合国“拯救”刚果，使其免于混乱、崩溃和很可能沦为卢蒙巴分子领导下的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权。真没想到，美国这一着奏效了。卢蒙巴神秘而轻易地被杀害了，一个亲西方的陆军军官蒙博托最后上了台。依仗比利时和美国的军事援助和联合国的支持，蒙博托最后战胜了卢蒙巴分子的叛乱和加丹加分裂分子的首领莫瓦泽·冲伯。

当西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刚果事态发展的时候，在其他

地方，共产党国家的许多盟友也开始不见了。1965年6月本·贝拉，非洲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第一个被军方推翻。领导政变的是胡阿里·布迈丁上校。他先是激烈地谴责“外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这种意识形态是由本·贝拉在欧洲托洛茨基分子的帮助下引进穆斯林国家阿尔及利亚的。没过几个月，1966年2月恩克鲁玛也被他自己的军队一举赶下了台，他的人民连一点儿反对的表示都没有。后来，1968年11月，这次轮到了凯塔，也是被军人赶下台的。看来，事态发展的确对西方有利。这种趋势一直继续到七十年代初期。1971年7月，苏丹总统加法尔·尼迈里险些被共产党发动的政变干掉。此后，他的政权就改变了方向，断然不再与苏丹共产党人和苏联合作了。又只过一年，安瓦尔·萨达特勒令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立即离开埃及，并断绝了埃及同莫斯科的军事联系。此举使东、西方都感到震惊。其实，萨达特早就不声不响地动手破除已故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和亲苏政策。共产党大国1965—1974年间在非洲遭到了这一系列挫折，仅有的例外是法属刚果和索马里，而后者最为重要。1969年刚果成了第一个自称为“人民共和国”，并正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非洲国家。同年，由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领导的一个激进的军人集团在索马里夺取了政权，此后，便使索马里不断地摆脱西方而向苏联靠拢，终于在1974年7月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莫斯科同撒哈拉以南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合作条约。

西方学者和政策制订者们看到许多激进的非洲国家政权

在政治和经济上不断遭到失败，苏联人和中国人在他们初步开展的对非洲的外交活动中也不断遭到挫折，因而得出结论，在非洲大陆要提倡社会主义，时机和条件都不成熟，更不用说进行革命了。著名的法国农学家勒内·杜蒙，在他的1969年世界社会主义政权研究的报告中认为，在非洲推行社会主义的整个做法需要作“必要的修正”。他指出，从当前非洲各国的情况看，在非洲搞“严格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在美国，许多学者也持同样的怀疑态度。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被贬斥为伪装的“民粹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认为它只不过是政府参与经济发展进程进行辩护的“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论”。有趣的是，苏联人对非洲社会主义的判断也同样持怀疑态度。莫斯科的非洲问题专家，在如何看待象几内亚、马里、加纳和阿尔及利亚这类国家的问题上，经过曲折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之后，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术语来表述非洲人想实行社会主义的企图，并且小心翼翼地称之为“民族民主主义”。苏联领导人在给这些国家领导人颁发列宁和平奖章或授予其他荣誉时，也谨慎地避免把他们称作“社会主义者”。苏联领导人也和杜蒙一样，得出结论，认为眼下在非洲实行科学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非洲的社会主义者们却不那么气馁。他们没有放弃希望和信念，而只是抛开温和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分析本大陆的问题和研究严格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必要性时，他们变得更加遵从正统了。那时，正当激进分子似乎极为倒霉的时候，他们的吉星高照了。

1974年4月，一个激进的军人集团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夺取了政权，为葡萄牙摇摇欲坠的非洲帝国敲响了丧钟。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影响所及，在一年半之内先后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建立了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府；在几内亚比绍建立了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政权；1974年6月，埃塞俄比亚一批下级军官发动了后来称之为“爬行政变”的反对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政变，到9月废黜了塞拉西皇帝。不到三年，埃塞俄比亚的领导人变成了可能是非洲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达荷美（今贝宁），1972年上台的马蒂厄·克雷库中校1974年11月发动了一场“革命内部的革命”，宣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最后，1975年6月，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海军司令迪迪埃·拉齐拉卡被他的军中同僚推为新掌权的最高革命委员会的领袖，马达加斯加对内对外政策随即激烈地向左转，成为又一个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抱的非洲国家。

当美国人怀着某种兴趣和对埃塞俄比亚的前途担忧的心情注视着埃塞俄比亚的事态发展的时候，1975年初在安哥拉爆发了内战和权力之争。正是这场内战和权力之争才把美国从十年对非洲几乎全然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唤醒过来。1975年10月和11月大批古巴战斗部队开抵安哥拉，救援陷入困境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抵抗由南非指挥，由安人运的对手发动的进攻。这一事件激起了福特政府，更确切地说，激起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出自内心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应。基辛格实际上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事务一无所知，他以前在制订美国对外政策时，心目中也并没有非洲。他之所以对安哥拉突然感兴趣，完全是因为他一心一意强烈地认为，越南战争之后，

苏联及其盟国古巴正乘美国意志软弱之机，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正如拉克早在十四年前就写过的那样，几乎一夜之间，非洲共产主义又一次成了头等重大的国际问题。

1974到1975年这一时期是苏、美为了非洲重开冷战的转折时期，同时也是非洲内部社会主义曲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那些终于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作为他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分别在安哥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埃塞俄比亚掌了权。同时，贝宁先是在一些事件中向左转，最后也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没有丝毫证据说明，上述这些情况的发生是出自莫斯科、哈瓦那或北京制订的关于黑非洲的“共产主义宏伟战略”。其实，有种种迹象表明，对于这一形势，特别是苏联人也和西方任何人同样感到震惊。他们甚至由于安人运内部破坏性的派系斗争而懊丧至极，于1973年末完全断绝了对这一组织的援助。苏联、古巴和东德，他们都没有在安哥拉内战爆发之后，通过1975年中期开始到达非洲大陆的大批顾问、技术援助人员和战斗部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出”到非洲去。在每个国家，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在于多年来的政治变化，时机逐渐成熟，激进分子得以掌权。比如，许多民族主义游击队在非洲殖民地同葡萄牙人已经打了十多年仗。他们缓慢地、但坚定地、向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些国家的首都前进。多年的斗争使他们在很多方面变得很激进，他们的民族主义终于加上了更加明确的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战斗期间，他们在解放区多年的组织工作经验使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相信，解决问题还是要靠集体的而不

是个人主义的观点。另外，西方表示支持民族自决原则的声明不冷不热，抵销不了这样的事实，西方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葡萄牙，而东方却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外交支持。虽然没有哪一个前葡属殖民地在取得独立之后马上就在首都上空升起了红旗，但是，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行动的信号并不是来自苏联和古巴，而是来自民族主义领导人，在独立斗争之后他们注意观察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可能的外国盟友。

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这也不能由苏联人或古巴人负责。在这两个国家掌权的甚至不是当地的共产党人，而是那些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激进的军官们。他们之所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处于内部经济政治困境。埃塞俄比亚也许是黑非洲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的分析第一次很自然地同这个国家的客观情况相符合。早在苏联人和古巴人插手之前，埃塞俄比亚的军官和一伙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文职顾问人员就已经计划、宣布、并实行了许多最激进的措施。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对那里的革命，苏联人和古巴人丝毫没有责任。马达加斯加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激进的改革是岛内军界上层人员之间权力斗争所造成的，正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远在这以后的事。此外，即使马达加斯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也并不表示它同苏联和古巴建立了特别密切的关系。贝宁和刚果也有同样曲折的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最后是最激进的军界人士掌了权。到1980年为止，从各种情况看来，无论如何不能说，莫斯科或哈瓦那曾在哪一个黑非洲或阿拉

伯非洲国家扶植了“他们的人”。

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即古巴人和苏联人在七十年代中期，在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信仰方面同他们一致、会对他们友好的那些非洲领导人维持政权方面，是在决定的时刻起了关键作用的。他们以苏联人在执行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中前所未有的果敢精神，抓住时机进入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从而在巩固他们未来盟友的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无论是苏联人还是古巴人，迄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本国领导人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受内战摧残的安哥拉，情况也是如此。在古巴战斗部队卷入之前，安人运就已经在同两个亲西方的对手争夺首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甚至还控制了安哥拉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城市。这一点经常被人遗忘或者有意忽视。安哥拉的三个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哪一个组织能力和战斗力较强，在安哥拉采访内战的西方记者是早就清楚的。苏联人和古巴人只是把既成事实加以巩固罢了。

非洲事态发展向左转的趋势，不仅可以从非洲赞成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府越来越多这一点清楚地看出来，也可以从非洲早期的倾向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色彩逐渐减弱这点看出来。二十年前，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东方社会主义，通常称为“非洲社会主义”的单独的、非洲式第三条发展道路，曾经颇为行时。当时，这种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以及不偏不倚反对东、西方一切大国的不结盟运动携手并进，并坚持非洲和第三世界有共同的特别属性。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非洲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失去了信誉，

其早期倡导者在重新考虑他们的选择。有些人，如塞内加尔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已经公开向西方靠拢，甚至比美国还要强烈地发出警告，说共产主义对于非洲是危险的。在塞内加尔内部，社会主义已经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别的人，如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仍然维持着社会主义的姿态，但是已经不承认单独的、第三条发展道路的存在。尼雷尔在接见本书作者时曾说，坦桑尼亚的“非洲”社会主义和莫桑比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唯一区别是“用词”的区别。

在西方观察家，尤其是在美国看来，这远不仅仅是用词的问题。在尼雷尔还坚持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的时候，七十年代的（非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袖们却不讲中立，而鼓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们把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看作他们继续同“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共产党人对西方三大祸害的简称——进行斗争中的“天然盟友”。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甚至同苏联正式结盟，缔结了为期二十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并且在联合国就东、西方关键问题投票时与苏联为伍。

但是，即使在执行强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最坚决的一些非洲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活跃的力量也还远没有消失，或者作为一种指导原则也还远没有完全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代替。民族主义，它产生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之中，仍受到口头上和实际上各方面的维护。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的一位高级政治顾问曾说，“我们不想变成另一个保加利亚”。在安哥拉，已故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在1978年前经常公开警告他的人民必须“保卫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党”的独立性，反对外来干涉。这几乎不加掩饰地指向安哥拉的两个主要盟友苏联和古巴。在埃塞俄比亚，它早先曾向美国提供过大量的军事和通讯设施，而苏联却没有得到这么多的好处，虽然苏联向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中校政府提供了价值二十多亿美元的武器。另外，据说苏联曾要求莫桑比克提供一个基地，莫桑比克也没有答应，尽管莫桑比克和莫斯科关系密切，订有友好条约。苏联在同几内亚的杜尔的关系上，也遇到了麻烦。杜尔1978年终止了苏联人从科纳克里起飞对南大西洋的侦察飞行。但是，民族主义同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主义大团结相对抗，显示其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最明显的事例，发生在非洲之角。1977年甚至卡斯特罗亲自直接干预也未能使索马里相信：要解决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问题上的冲突，正确的方法就是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联邦。索马里人和厄立特里亚人发动的反对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的分离主义战争能证明什么呢，那就是证明他们的民族主义信念远比他们所共同赞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念要深厚牢固得多。

民族主义倾向在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因而一些人，突出的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得出结论，认为它们还不是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而基本上仍然是非洲民族主义政权。这一结论不仅没有看到它们外交政策中的国际主义因素，而且也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它们努力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明显地不同于早期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所创立的那种政治经济制度。它们的理想不是昔日那种田园诗般的非洲村社，而是现代化工厂、机械化国营

农场,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中国式的公社。它们没有非洲社会主义者那种认为冲突可以避免的幻想,而是接受,甚至欢迎阶级冲突,把它看作是促成激进变革的手段。这种接受阶级斗争的思想表现在它们反对成立群众党,亦即全民族的党,而努力建设一个列宁式的先锋党,只吸收那些忠心耿耿的人入党。总之,它们对革命远不是那么罗曼蒂克,而是更加懂得需要流血、流汗和流泪,尤其需要有一套统筹全局的系统的作法。

尽管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和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权之间在主张、组织机构和政策等各方面有许多不同,但是,很多学者都首先注意到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不发达状况所造成的这些政权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因而得出结论,这些新政权只不过是老调的变奏。这些学者们还注意到了这些国家在建党、计划经济、解决军政或者党政之间冲突等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根据这样一些以及类似的观察材料,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严格说来,它们还不能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权。可是,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组织和巩固程度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将把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比较,来说明这一点。而且,我们还愿进一步说明一点,即这些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恰恰是由于它们在建立政治经济制度时力求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办事造成的。事实上,它们遇到的一系列棘手的矛盾的难题,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所固有的矛盾,而且可以作不同的理解所造成的。一个中心难题是自从苏联革命以来就已存在

的老矛盾。一方面列宁主义对革命进程作中央集权的理解，另一方面是所谓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强调直接民主和工人参与革命的决策。另外一些难题是由于它们力图把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条文同每个国家革命的特殊经验和条件相结合而造成的。

当然，非洲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不会是绝对一样的。事实上，有一些国家，其思想方法比较正统，改革的步伐比其他一些国家快些。这些国家中最正统和最激进的是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三个国家是仅有的通过革命掌握政权的国家，不管是民族革命，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还是社会革命，如埃塞俄比亚。它们是改革搞得最深入的国家，因为它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深，而且在它们那里存在着势力真空。它们也是三个与苏联集团建立了最密切的组织联系的国家。所以，要想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非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三个国家可以提供最好的例子。有些人会说，这些是特殊的例子，没有代表性。无疑，它们当前是特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的经验在别的地方不能仿效。因为，非洲积累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非常可能会爆发更多的社会革命。另外，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可能也会碰到非殖民地化产生权力真空的危机。类似的情况曾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出现过。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非洲的传播并不一定意味着在那里产生一连串的苏联卫星国。在内政方面坚持正统教义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标志。但是，它们也力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它们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此

外，看来它们有决心维护自己主权的完整和奉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它们力图使自己在对苏关系上不要成为保加利亚或古巴那样的国家。它们这种对内对外的姿态，总合起来便是我们所说的“非洲共产主义”。象“欧洲共产主义”那些欧洲倡导者一样，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现在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要盲目仿效苏联和为苏联所奴役，而是独立国家自由进行的一种选择，要适合当地情况，实行中不必屈从任何外国大国。现在，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没有联合起来向世界阐述和提出一个名为非洲共产主义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战略。但是，他们是在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地干。

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非洲取得进展，这更多的是由于内部发展而不是外部干涉造成的。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它显然是值得比美国学者、政策制订者和政治家们以前那种态度，更为认真加以考虑的一种趋势。今后，美国同这些数目越来越多的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如何保持关系？目前，我们同它们的关系处理得怎样？今后，美国是要积极地设法阻止它的发展呢，还是对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不予理睬呢？抑或找出一种同它们积极打交道的办法呢？看来，八十年代初，美国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混乱和矛盾。我们仍然没有承认安哥拉的人运政府，虽然非洲统一组织的全体成员国、东欧集团和大部分西欧国家都已经承认了。国会曾一度通过立法，断绝美国对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以至亲西方的赞比亚的经济发展援助。我们同安哥拉仍然没有外交关系，但同莫桑比克有外交关系，同埃塞俄比亚继续保持外交关系，尽管埃塞俄比亚驱逐了美国的大使并拒绝赔偿美国公司

因埃塞俄比亚实行国有化而损失的财产。同刚果断交多年之后，1977年美国使馆在那里又重新开放。华盛顿同几内亚的关系经过多年的起伏之后，看来正不断改善。

总之，美国对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政策，有如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同这些政权对美国的态度摇摆多变差不多同样混乱。在美国，制订政策的班子中间，试图草拟并积极推行一项对待这些政权的长远政策的，只有过两个小组。一个是在卡特执政的头两年由安德鲁·扬和唐纳德·麦克亨利大使领导的非洲问题专家小组；另一个是由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穆斯领导的国务院非洲局的一帮人。他们曾呼吁实行一项“不畏风险耐心坚持”的政策，认为非洲的民族主义终归要抛开东方的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给它们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援助来源。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听这种意见。美国的注意力一直在盯着别的地方——中东、阿富汗、苏美关系恶化、古巴和1980年的总统选举。八十年代初，一种保守情绪弥漫欧洲和美国。美国的非洲问题专家们深深地躲在他们的散兵坑里，有时出来为他们比较激进的关于非洲问题的观点打打防卫战。

我们编著这本书的主旨，不仅要说明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非洲到底有什么意义，还要说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非洲大陆的演变。因此，我们首先对非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变化提出一个概括的看法，然后，我们“重新考察”四个早期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确立某些标志，以便同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从而突出说明它们的不同点和可能的相似点。最后，我们较详细地研究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

桑比克，试图从它们的经验中概括出它们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在这基础上，最后我们写了“非洲共产主义论辩”一章，也就是提出论据，说明至少有一些新的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权，它们不仅仅有自己的用语，而且的确是在认真地试图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

第二章

从非洲社会主义到 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非洲独立后的头二十年，关于什么是非洲大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看法，经历了重大变化。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是早就深深扎根于传统非洲方式中的经济社会制度，非洲人需要做的只是“返本归源”，恢复他们公有社会工作和思想的老习惯。十五年以后，这种看法被认为毫无价值。大多数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认为，过去和现在只有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就是在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提出的，首先在苏联实施的一个完整的制度。本章将探讨上述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关于非洲社会主义的含义，非洲和欧、美许多学者著述已经不少，我们不愿详细重谈旧题。我们对非洲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和非洲社会的某些重要观念的演变情况却感兴趣，因而想把早期的赞成“非洲”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那种论点的某些方面回顾一下。我们还想把这两种对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说法，同它们产生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因为，历史环境很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非洲内部关于社

会主义含义的想法会有这种根本的变化。

到了七十年代,关于非洲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提法,被当时的非洲马克思主义者断然否定或严加修正。其中的一个提法,认为非洲社会在欧洲殖民主义列强到达之前,基本上是无阶级的和公社制的。因为,当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而社会远较个人为重要。这种观点推论说,既然在部族内部确实不存在阶级或剥削与被剥削集团,因而也就确实没有部族内的冲突。非洲部族社会确实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为集体的福利出力,在需要的时候,也受到社会的照顾。事实上,在欧洲殖民者到达非洲之前,非洲存在着一个以公社制原则为基础的福利之国。

这种“天然的”非洲福利之国的最雄辩的倡导者,就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他在六十年代就非常详细地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非洲人的原始国家。这位讲英语的哲学家写道:“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目标,就是扩大了的家庭。”他给社会主义下定义,说社会主义就是“家庭关系”,就是坦桑尼亚民族语言斯瓦希里语所谓“乌贾玛”村。尼雷尔想复活的这种“天然的”非洲部族当时的生活,基本上是兄弟同胞之间和谐相处,社会上没有社会冲突。照尼雷尔的看法,“‘阶级’和‘等级’概念在非洲社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只有西欧的土地革命和工业革命才引起这种社会分化,从而导致社会冲突^①。所以,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的任务就是要恢复非洲社会原始的无阶级的本来面貌。为此,要结束土地和其他

^① 尼雷尔《乌贾玛:社会主义论文集》1968年英文版第11页。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一切人类活动要重新恢复公社的做法。这实际上是要时针倒转,让非洲退回到殖民统治之前的时代去。虽然促进坦桑尼亚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乌贾玛”的一项基本目标,但是,怎样把这种经济发展同尼雷尔的原始公社制的观念调和起来,还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

关于非洲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这种基本观点,是几乎所有早期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的共同观点,其中包括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和几内亚的塞古·杜尔这两个讲法语的主要理论家,和赞比亚的卡翁达,某种程度上还有加纳的恩克鲁玛这两个讲英语的主要理论家。桑戈尔企图使这种理论具有更强的文化基础,说其根源在于他所说的“黑人思想”。这就是“非洲黑人的、人道主义的”观察和体验现实的方式。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人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是,他的论据实际上同尼雷尔的论据是一样的。桑戈尔写道,传统的非洲社会是“无阶级的”和“以公社为基础的”,当代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传统非洲)政治经济民主制度回到生活中来”,^①并重新建立“公社社会”。桑戈尔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为“非洲社会主义”,而卡翁达把这一套思想名为“人道主义”或“非洲民主社会主义”。他强调个人,个人又必须象基督教教义说的那样为人善良,以便培育社会主义之花^②。至于塞古·杜尔,他虽然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阐述几内亚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他把整个概念都非洲化了。他解释说,几内亚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以非洲社会的“公社”性质为基础的。

① 桑戈尔《论非洲社会主义》1964年英文版第26页。

② 卡翁达《赞比亚的人道主义》第1部分(卢萨卡1976年英文版)。

他认为殖民统治并没有使这种性质发生本质的改变。^①

早期非洲社会主义这种浪漫的或乌托邦式的观点，可以从文化和政治的原因得到解释。当一些国家刚开始获得独立的时候，整个非洲有一股强大冲击力，就是要确立这个大陆的“非洲属性”，以对抗和压倒以前的殖民地文化和势力。这一运动以种种文化和政治的形式出现。桑戈尔，如上所述，以“黑人—柏柏尔人人道主义”为基础，创立了所谓“黑人思想”这一完整的非洲哲学。卡翁达提出了他称之为“非洲人道主义”的政治思想，虽然这种思想还无法掩饰地带有殖民主义和基督教的印记。恩克鲁玛，他可能是早期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中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竭力强调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非洲人格和特性”。他写道，“非洲人格”一定要成为“非洲革命的强大推动力”。^②这种非洲人自我肯定的信念还有另一种表现，即非洲社会主义者普遍拒绝这样的观念，认为世界上只有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主义”，而非洲人对它不可能有任何的补充。尼雷尔说，“我认为只有一种‘纯粹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照我看，社会主义是一种含混的概念，有多少人倡导它，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含义，有多少不同的种类。”^③杜尔开初用不同的话也大致表达过实质上同样的论点。他谈过通往社会主义的“非洲道路”，并警告说，“企图使非洲‘西方化或东方化’都会

① 杜尔《几内亚民主党的理论和方法》第2部分（科纳克里英文版）第26页。

② 恩克鲁玛《革命的道路》纽约1973年英文版第205页。

③ 前引书第77、78页。

导致否定非洲人格”。^①

在对外政策方面，最能体现这种非洲自我肯定的信念的，大概就是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了。泛非主义是争取非洲团结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战略，目的是要打破西方对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使非洲摆脱一切形式的外国统治而完全独立。泛非主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在六十年代气势磅礴，因而在1963年建立了非洲统一组织，后来又成立了联合国非洲集团。这种树立非洲政治力量的运动合乎逻辑的延伸就是不结盟运动。不结盟运动原来企图动员第三世界国家反对东方和西方的霸权统治，并反对把苏美冷战扩展到欧洲以外。恩克鲁玛1964年曾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作了解释，“我们（不结盟运动）的诞生，就是对世界被分裂成东、西方两个对立集团所造成的国际关系现状的抗议和造反”。^②同样，杜尔也清楚地表明，非洲不希望陷入东、西方的斗争之中，而应该利用不结盟运动维护非洲自己团结的力量，迫使这两个集团为非洲的解放而努力。与东、西两方相对抗的第三世界集团所提出的泛非主义和不结盟主张，是被人们看作独特的非洲意识形态即非洲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天然组成部分。

非洲社会主义的内容和组织形式也可以从取得独立之后非洲领导人立即面临的国内政治问题得到解释。当时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组成各个非洲国家的许多部族集团联合起来，并加以巩固，培养民族意识以代替狭隘的部族意识，使

^① 前引书第24页。

^② 前引书第436页。

它们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整体。为此目的，主要的工具就是“群众”党。这是早期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最有特色的组织形式之一。开初，他们所关切的是要建立或者巩固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所培养起来的民族团结意识。这种心情使所有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六十年代初期非常强调国内各部分人民的团结和利益的共同性。他们在政治上丝毫不愿突出现存的或者潜在的新的分裂，比如传统的部族世仇或者正在出现的阶级差别。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要强调传统非洲社会的性质是没有阶级，强调公有的价值观念，这是独立之后在民族意识和民族团结方面面临危机的一种表现。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迫切需要给他们的人民提出一个新的民族社会的模式，这个模式是“和解”的面不是“冲突”的。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普遍喜欢群众党，也是这种担心的自然结果。因为群众党能够包罗尽量多的公民，可以向他们灌输共同目标、共同行动的意识。另外，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取得独立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已经是那种在民族独立斗争中不分部族出身和经济地位、把一切社会集团都团结起来的群众组织。没有哪一个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急于要用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那种假设的、成分纯正的先锋党的名义，把这种业已存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的联合体解散掉。把一个群众党改变成小的先锋党还会冒很大的政治风险。这一点，连一些早期的非洲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因为，为了建立一个先锋队组织而开除大量独立前的党员，政府最后只会给自己制造更大的反对派，并且还会象一位非洲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使潜在的暗流变成公开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

“又会影响武装部队，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因此，早期的非洲社会主义者赞成成立群众党而不是先锋党，是完全有道理的。几内亚民主党一位政治局委员对《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的记者解释了为什么几内亚早期曾试图把“全国一切居民”都吸收到几内亚民主党内，他说：“是党建立了我们的国家并且把各个部族团结成单一的几内亚民族”。桑给巴尔非洲一设拉子党的一位领导人在向这个刊物的记者为这个国家的群众党作解释时也说，“我们认为，根据我们的情况，一个先锋党并非我们实施有效政治活动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为了实行革命的变革，我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必须能够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我们认为，这种机会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最后，非洲社会主义还有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点，那就是“自愿的”性质。这种自愿主义表现于早期这种意识形态所共有的、紧密相连的两种假设：第一，社会主义可以通过不使用武力或强迫的方式来实现；第二，在社会结构变革之前，可以先对个人进行新的思想方法的教育。实际上，这就是说，改造个人是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非洲社会主义者起初力图通过说服和教育的方法来贯彻他们的纲领，使人民相信，动员起来互相帮助，并帮助整个国家，这是非洲人传统的办事方法。卡翁达总统在他的人道主义理论中就竭力强调这么一种思想——新的国家象旧的部落一样，是一个“互助的社会”，大家都应为社会整体的利益参加进去。卡翁达在他的论著《赞比亚的人道主义》中写道：“这就意味着，目标必须基本一致，并且大家必须共同行动”。根据卡翁达思想的本质与其个人偏爱，他完全依靠说服来使赞比亚人“共同行动”起来，更确切地说

是依靠不断地对全国人民说教，说明好的赞比亚人应该如何对待邻居、他的村庄和国家。他总是强调个人的行为，把这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奋斗成败的关键，而不强调社会结构，不强调首先要改变社会结构以促使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现。尼雷尔，官方把他称作导师，也同样是主张以自愿为原则的。他经常说，社会主义主要是人们的“内心态度”，一旦正确的态度被灌输到坦桑尼亚人民心中，他们就会自发自愿地加入乌贾玛村这样的公社组织。他说，“不能把社会主义强加给人民，可以指导人民，引导人民。最终他们是一定要参加的。”在1976年，他曾解释说，政府的任务“不是强迫人民参加乌贾玛村的共同活动，而是要向人民解释，鼓励他们参加。”尼雷尔主要是靠模范乌贾玛村的成功榜样，让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的好处。这种办法失败之后，为了贯彻他的村庄化计划，他最终也使用了一些强迫的办法。但那只是一种暂时的措施。杜尔也许是非洲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战斗性最强的一个。他首先公开声明，几内亚可能是第一个使用“强制劳动”成功实施其“人力投资”计划即地方自助工程的非洲政府。但是，事实证明，强制劳动效果很坏。没有多久，他就强调，“几内亚革命是以人民的自愿支持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少数人对人民实行强制为基础的”。尽管非常不愿意使用强制的办法，但是，在早期非洲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不时地诉诸强力。往往是为了镇压某些反对派集团，但有时是为了让人民参加各种集体计划。然而，这种做法从来也没有成为非洲社会主义的一条原则。

“过渡的”社会主义

同早期非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流派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次要的流派，当非洲社会主义事业的困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次要的流派便逐渐显出其重要性并被人们所接受。这种“过渡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杂交的混合物。它是连接六十年代非洲社会主义者和七十年代非洲共产主义者的中间环节，是向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中途站。这些“过渡人物”，我们将这样称呼他们，对他们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努力中所遇到的问题要不断作出反应。这些问题包括，他们的政策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最明显的是商人、实业家等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还往往有那些本应去进行各项改革的十分官僚化的阶级。他们还逐渐认识到，另一个重大弱点在于“群众”党的性质。群众党包罗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反对派，因此，它不能作为政权的可靠基础，也不能成为动员人民的有效工具。同时，非洲一些较认真的思想家已清楚地看到，一些非洲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比如桑戈尔，并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的路线切实地做些事情去改造他们的国家。相反，他们让他们的国家变成了“新殖民主义的”非洲国家样板。这些国家依然与旧的殖民主义大国紧密相连并赖以生存。

过渡社会主义者最典型的两个代表人物也许是杜尔和恩克鲁玛，虽然象阿尔及利亚的艾哈迈德·本·贝拉和马里的莫迪博·凯塔等其他一些人也可归入这一类。他们之中，恩

克鲁玛在思想上比较一贯，但杜尔更令人感兴趣。因为，他的思想变化密切反映他二十二年来努力使几内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遇到的政治问题。从教养和意识形态信仰的角度看，杜尔和恩克鲁玛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作了修改以适应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杜尔曾是工会组织者，独立前，他曾领导受法共支持的工会总联合会几内亚分会，然后又领导过法属西非洲的工会。恩克鲁玛，先是在美国呆了十年，后来去伦敦，同乔治·帕德莫尔成了密友。乔治·帕德莫尔是西印度群岛共产党人，曾在苏联居留一段时间，后来因不满苏联对非洲解放运动的政策而同莫斯科断绝关系，成为泛非主义的忠诚的倡导者。

恩克鲁玛当初作为一个较灵活的社会主义者和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泛非主义发言人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最后他流亡在科纳克里，成了一个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主张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使整个非洲实现社会主义，并同共产党世界结成紧密的联盟。无疑，1966年2月推翻他的军事政变，使他的观点变得大大激进了。但是，他思想激进的过程，在他被赶下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早先，恩克鲁玛曾表示他想在加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他整个执政期间，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他始终回避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他对加纳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个人独特的解释，称之为“恩克鲁玛主义”。他发展了他的“良知主义”哲学，把伊斯兰和欧洲基督教的传统同“传统非洲社会固有的各种人道主义原则”混合起来。在执政五年之后，他宣布了一个以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原则为基础的党纲，题为“工作和幸福纲领”。总的说来，恩克

鲁玛作为总统，他关心的远不是去完善他的社会主义观点，而是设法制订和推行泛非主义的战略和谋划一个由加纳和他自己领导的非洲国家联盟。在他被赶下台之后，他主要从事理论著述。

恩克鲁玛在被赶下台那年写了一篇文章，猛烈攻击“非洲社会主义”的整个概念，说这一概念基本上“毫无意义和不着边际”。他不仅要求当时已经名声不佳的桑戈尔，甚至还要求尼雷尔这位倍受尊敬的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说，“看来”非洲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还不如与人类学的关系那么紧密”。他还说，由于非洲社会主义的含义和具体政策含混多变，“使得我们有些人放弃了这一名称。因为，它不能表达它原来的含义，而且往往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弄得模糊不清。”然后他直截了当地对那种认为传统非洲社会没有阶级或充满自然人道主义精神的观点提出异议：“这样的社会主义概念使非洲公社社会成为崇拜的偶像。可是，一种田园诗般的充满令人陶醉的安谧的无阶级非洲社会（没有贫富之分）只能是草率的简单化的产物。在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学上，都找不出来任何存在过这种社会的证据。恐怕过去非洲社会的真实情景比现在更悲惨吧。”^①

恩克鲁玛争辩说，即使很多非洲社会有过“某种公社制”，而且具有某种人道主义思想，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与当代非洲社会没有“联接点”。他说，再回到古代非洲公社制社会去，也许是一种“迷人的想法”，但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① 恩克鲁玛《革命的道路》第440页。

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当代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政治上被征服、经济上受剥削、教育和社会落后、人口增加、工业化方法和产品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普及”。他的结论是，“社会进化从来没有回到理想化的传统非洲社会的这种先例”。他还对自愿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说，“社会主义不是自发的，它不会自己产生。实现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要制订出实现社会主义总目标的政策。”这些政策必须根据科学社会主义普遍规律与“某一特定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相适应”。^①

恩克鲁玛还大大修正了他对非洲阶级冲突性质的看法，至少是修正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言论。在刚独立的前后，他主要注意作为被剥削者的非洲国家和作为剥削者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斗争，把双方当作对抗的“阶级”。但是，他自己被赶下台，加上六十年代中期发生了一系列影响黑非洲的军事政变，使他把注意力转向非洲社会内部状况。他同非洲社会主义者关于非洲社会不存在阶级的观点进行论争。他说，“这再荒谬不过了，在非洲一直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证据就在我们身边。实际上，象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非洲的斗争也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在当代非洲社会，阶级区别在独立前一直被模糊了。因为，那时所有集团都为反抗殖民主义国家而共同战斗。他说，这使得非洲社会主义者认为，就在当代非洲社会的表层底下，仍然存在着传统非洲社会的公社制和平等主义。他指出，这种论点的谬误在独立后不

^① 恩克鲁玛《革命的道路》第446页。

久就暴露出来了。“那时,那种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暂时被掩盖起来的阶级冲突重新出现了,常常是更加激烈,特别是在那些新独立的、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更是如此。”恩克鲁玛接着列举并分析了他看到在非洲社会内部出现的各种阶级。他的社会问题的论述出现在他最近写的名为《非洲的阶级斗争》这本书里,这表明他的思想有了深刻的变化。不用说,这些观点同尼雷尔、卡翁达和桑戈尔论述他们本国社会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恩克鲁玛对非洲阶级斗争的理论阐述,反映了他在执政期间处理过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用群众党这样一个包罗所有集团、其中也有反对社会主义的集团的代表所组成的党,如何进行革命?在这方面遇到问题的不只他一个。本·贝拉和凯塔等其他领导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曾试图用建立先锋党的办法来摆脱这问题,但没有成功。象所有在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参加独立斗争的非洲政党一样,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实际上向一切支持其民族主义目标,以及如党章所说,不“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成年人开放。它象其他政党一样,实际上几乎把加纳所有的成年人都吸收到党内。加纳当时共有四百七十万人,该党党员就有二百万。独立后,恩克鲁玛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人民大会党的纯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反对社会主义、因而也反对他的政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清除出党。

恩克鲁玛处理这一微妙的政治任务的方法,就是努力建立了一个小的“积极分子先锋队”去领导和教育其余的党员。

但是，这项工作他开始得比较晚了，独立之后11年，他很惋惜地承认了这一点。“十二年，从1949到1960整整十二年，没有有意识地、一贯地努力对党员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教育。”恩克鲁玛选作“党的意识形态保卫者”的队伍是全国非洲社会主义学生组织，它早在独立之前就是人民大会党的一翼。它的作用是要造就传播恩克鲁玛主义的“火炬手”，并象“大树”的“树皮”那样，发挥加强人民大会党组织上团结的作用。后来，在1961年他还在温内巴建立了“意识形态学院”，对党的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主席出席了这所学院的奠基仪式，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历史注释。因为，此后苏联人大力推动他们所有的非洲共产主义盟友在取得独立之后尽可能马上建立类似的党的意识形态学校，作为争取建立共产党那样的党组织的斗争策略。但是，恩克鲁玛从来也没有接受整个党应该是由受过考验、可以信任和充分受过党的学说教育的、敢于战斗的分子组成的精干的先锋队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实际上，他所要的先锋队，是群众党组织内的先锋队。所以，人民大会党终于大体上依然是个群众党。

恩克鲁玛对不结盟以及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有变化的。从这种变化看，他也是一个“过渡人物”。起初，他的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着眼于泛非主义和为整个非洲大陆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并建立一个非洲国家联盟而斗争。他的这种执着的追求，加上他的亲密朋友、师长乔治·帕德莫尔的影响，使他的整个对外政策明显地突出非洲和第三世界。但是，推翻他的政变和他对非洲统一组织的巨大失望，使得他

后来的思想更加激进。事实上，他最后完全拒绝了单独的第三世界和独特的“非洲式”第三种发展道路的看法。他在1968年为《劳动月刊》写的一篇文章中断然声言，“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中间道路”。他把世界分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对立集团。他说，不结盟是一个“时代错误”。他所希望的是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同共产党国家彻底结成联盟，共同向“资本主义及其产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宣战”。他再三声称，非洲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整体的组成部分”，是“世界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这种把非洲社会主义政权同共产党集团“重新组合”的想法，后来成了非洲共产党人明确声明的政策目标。

杜尔的思想也表现出同样的变化。他的思想在他执政的二十二年间，在他企图解决他的国家没完没了的问题的过程中，几经变化。他开始是一个典型的非洲社会主义者，强调非洲社会的“公社制”性质，坚决否认阶级和阶级冲突同几内亚革命有联系，强调象几内亚民主党这样一个实际上包括所有成年人的党所体现的民族团结的绝对重要性。后来，他又宣布阶级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现实”，甚至曲解《古兰经》，援引其中著名的开端篇（法谛海）来证明，甚至伊斯兰教也“宣布有阶级斗争”。他也曾一度要求成立一个先锋党，建立一所意识形态学校来为党培养干部。但他终于又倒退了回去，重新主张“不分宗教和思想”的“全民的”群众党。其主要目的就是在村庄、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灌输“集体良心”。他的思想发展的高峰是他的“党—国家”一体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在六十年代末第一次公开发表，后来体现在名为“地方革命政权”这种地

方机构的设置上。看来，甚至在几内亚到达社会主义之前，杜尔就似乎已经决定驱迫历史，促使“国家逐渐消亡”。1976年在他同来访的共同市场代表团谈话时，自豪地宣称，“我们很快就要在历史上跨进党—国家一体的阶段。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到达这一阶段。这是一项别开生面的事业”。其实，他在其他地方解释说，“这就意味着把党和国家的机构合并为单一的革命政权机构，赋予它政治和行政职能，并逐步扩大地方当局的职责”。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党和国家的概念只能被认为是背离马克思观点的异端。因此，杜尔玩弄了一阵子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回到了一种完全独具一格的社会主义模式。

象恩克鲁玛一样，这位几内亚领导人也终于放弃了所谓偏爱非洲社会主义的独特的非洲个性这种概念。因此，他最后也放弃了他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在六十年代初期所宣扬的泛非主义。1974年6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第六届泛非大会上，杜尔猛烈攻击原先的概念是所谓“狭隘地域”观念，他特别反对桑戈尔的“黑人思想”的概念，轻蔑地把“黑人思想”说成是“一种在本质上与‘泛非主义’对立的非常有害的形式”。他还说，“‘黑人思想’事实上已经成为比勒陀利亚政府对非洲人实行的土著保留地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和字面上的表现形式”。“南非种族主义者和‘黑人思想’的歌颂者都是喝同一股种族偏见的泉水，为同一事业——帝国主义、人剥削人和蒙昧主义事业效劳的。”他又说，桑戈尔的黑人非洲主义哲学“是泛非主义的致命祸害，应该摧毁，把它的枝芽也暴露在非洲灼热的阳光下晒焦”。杜尔为他之所谓“革命泛非主义”提出了新

的定义，非洲人“不要以我们的肤色，而要以我们的目标”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说，非洲也应这样去分辨自己的朋友和敌人。他同时还提出一个非洲共产党人会毫不犹豫地给以肯定回答的问题：“难道智利的阿连德不比某些美国黑人或非洲领导人更接近被剥削的黑人吗？”他又问：“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种族隔离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对我们的朋友、古巴伟大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不是比对黑人领导人更加痛恨吗？这些领导人已经成为剥削他们同胞、藐视非洲人民权利的人们的帮凶和忠实驯服的代理人。”象恩克鲁玛和后来出现的非洲共产主义者一样，杜尔也逐渐认识到世界本质上是按照东、西方，而不是按照南、北方来划线的。

值得一提的非洲最后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实例，是阿尔及利亚牌的社会主义。它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在本·贝拉时期，它是过渡社会主义的一个例子。它同恩克鲁玛和杜尔提倡的差不多，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非洲的情况结合起来。1965年6月政变，布迈丁上台之后，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就独具特色了。尽管在国家组织和经济活动中遵循苏联的原则，但是，他断然拒绝马克思主义。本·贝拉与恩克鲁玛一样，拒绝非洲社会无阶级的看法。他曾努力把战时的民族解放阵线，从一个民族主义的，但在意识形态上五花八门的集团的联合体，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锋党。象杜尔一样，他重申，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因此，阿尔及利亚并没有因为转向社会主义而放弃其阿拉伯和非洲的特性。

阿尔及利亚向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演变曾被一场权力之争

所打断。这场斗争是本·贝拉的军事对手拒绝在阿尔及利亚传播他们认为外来的思想而引起的。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是由本·贝拉的外国“托派”顾问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传播的。但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不意味着要回到非洲公社制的浪漫观念上去。布迈丁的社会主义是更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建设一个以工业化经济为基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布迈丁看来，马克思主义过于教条化，而没有考虑非洲的具体情况。布迈丁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文件，1976年的国民宪章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任何“唯一的、强制的模式”，似乎只有遵循它才算得上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必须从各自的具体经验中产生自己“民族的社会主义”。这一文件，明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它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不可改变的教条。不能把它变成僵死的陈词滥调和可以变来变去的口号。它需要从理论上不断完善，根据实际经验不断加以丰富”。宪章继续按独立的思路指出，新独立的国家很不发达，所以，几乎没有工人阶级来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这一任务就落在“所有革命的爱国者先锋队”，亦即“革命的国家干部”身上。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工人、军人、知识分子和“政治积极分子”。宪章没有把工人阶级誉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动力，反而认为，只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才能最终产生工人阶级。宪章不仅拒绝颂扬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而且把“工人”的定义，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定得非常宽。宪章说，工人，“就是任何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在自己的

职业活动中不雇用工人谋取利润的人”。这样，知识分子、小农、工厂工人，就统统算作“工人”了。

国民宪章中唯一多少有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容的，就是关于设想为先锋队组织的党的那一部分。这也是宪章中最脱离现实的部分。布迈丁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起的作用很小，更不用说做革命的先锋队了。这个党几次试图改组，但在布迈丁执政的十三年期间，连一次代表大会也没有开过。从一开始，布迈丁最关心的就是建立“稳定和有效的国家”。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质上走向了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工业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技术官员和政府官僚比党的官员权力大得多。

在对外政策方面，布迈丁领导下的阿尔及利亚的新思想同早期非洲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却很相似（但和后来的非洲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不同）。布迈丁认为，第三世界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它有与北方工业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自己的利益和事业。世界与其分成东方和西方，不如分成北方和南方。宪章说，“第三世界国家争取解放的巨大运动，引起了不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重大矛盾。因为，工业化国家一心想通过各种方式维持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宪章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来消除这种冲突，并建立发展中世界同工业化世界之间更好的平衡。布迈丁在联合国也曾经提出过这种呼吁。宪章还拒绝建立由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政治秩序的想法。“当今国际问题的解决，不能再让少数几个国家包办的、向全世界发号施令的俱乐部独揽大权了。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国际关系上民主的组织，也包括要求把

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得更加平等的真诚的意愿。”

基于对世界关系的这种根本观点，阿尔及利亚关于不结盟的定义就是：“我们对一切外国大国保持完全独立的意志的表现”。至于阿尔及利亚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的性质，在宪章中只是在详细论述了阿尔及利亚同其他北非、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历史联系之后，最后才概略地谈了一下。宪章说，阿尔及利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政策，“将在一切领域里继续发展扩大”，而且是建立在“利益对等”的基础之上的。很有意义的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和东方集团之间意识形态上的任何特殊的亲密关系，宪章中只字未提。最后，这一文件在断言阿尔及利亚必须致力于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同时，却又赞许一些西方国家想同阿尔及利亚建立“一种新关系”的愿望，这就有可能扩大同这些国家的合作。

非洲共产主义的理论

至少在理论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他们一致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此外不存在与之不同的“非洲的”、“亚洲的”或者“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对于有人把莫桑比克说成是非洲第一个“非洲共产主义”国家作出反应的时候，他出人意外地极度强调了这一点，也许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完全拒绝这一标签，认为这贬低了他的政

府在非洲具体条件下，进行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努力。“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是工人的科学，是进行社会分析的基本工具，是理解阶级斗争的最伟大的工具。一些观点分歧是次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科学，它能运用于各种情况。没有什么非洲的马克思主义、亚洲的马克思主义或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①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也同样强调这一点。卢西奥·拉腊，这位被广泛承认的党的主要理论家，象萨莫拉一样严厉痛斥他之所谓“这些独出心裁的社会主义货色”。“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很清楚，向来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的表达方式，确切地说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经验已经表明，一切（关于非洲社会主义的）言词，都没有向真正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具体步骤……，在它们那里却可以明显地看到，殖民主义还存在，新殖民主义还存在。它们的资本主义倾向是明显的。……这种种‘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是殖民剥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

几乎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内心深处对信仰抱怀疑态度的军人，都争先恐后竞相表明自己的正统性。索马里的军事领导人西亚德也不例外，虽然他从1977年和苏联关系破裂之后就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先前，在解释索马里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时，他说：“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叫做索马里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或伊斯兰社会主义……我们的

^① 萨莫拉1977年8月11日同伦敦《观察家报》记者戴维·马丁的一次谈话。

社会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缔造的科学社会主义。”非洲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只有用阶级分析和承认阶级冲突是社会的推动力才能了解社会。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领袖都是用阶级的观点谈论他们的政治问题和国家历史的。他们经常把“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看作他们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他们认为，独立之后时期的特点，就是这些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会象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党的一份文件中所说的那样，出现“阶级斗争加剧”的现象。这种斗争的关键，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作用。在马克思心目中，时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时而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残余的骑墙派，在这些国家成了中心力量。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已被殖民主义所窒息，而工人阶级由于国家不发达而软弱无力。职员、商人、小企业主、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中级军官和退学学生，一般都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人们对这个阶级毁誉参半，特别是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人们公认，解放斗争初期的动力和领导人是来自这一阶级。但是，按照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卢西奥·拉腊的话说，独立之后，“小资产阶级容易走入歧途。”“这个阶级有很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和个人野心”，“缺乏分析问题始终一贯的成熟性。”安哥拉人运政府内部和外部的反对派，总是被指责为迷失方向的小资产阶级。同样，在莫桑比克反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埃塞俄比亚反对门格斯图政权的个人和集团，也经常被谴责为“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必须严厉对待。而另一方面，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则被认为对革命会起重要的作用。

非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把革命的领导权从小资产阶级手中转到工人阶级的手中呢？这一直是大量著作的主题。几内亚比绍民族主义武装斗争的创始领导人阿米卡尔·卡布拉尔，象弗朗兹·法农一样，认为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必须能够自杀，以便转生为革命的工人”。^①这真是一种颇有点唯意志论的想法，不过，六十年代末没有哪个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他们的态度显然不是那么单凭主观愿望。他们一般都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加强，直到它的代表能够从容掌权，并逐渐使小资产阶级分子“中立化”。这种分析还没有回答在无产阶级准备好担负历史领导任务之前，暂时的空缺如何填补。很多著述强调，在工人阶级掌权之前，需要包括一切进步人士的广泛的联合。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曾经这样解释这一进程：“莫桑比克的无产阶级、农民、特别是合作社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普通工人，正逐渐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历史命运。他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逐渐把自己组织起来，根据莫桑比克无产阶级的利益去改造社会。”

他们认为，革命进程在刚独立之后的阶段，就是要努力奋斗，“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创造适宜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对这一阶段的提法各有不同，有的称为“人民民主革命”，也有的称为“民族民主革命”。“人民民主革命是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劳动群众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巩固他们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实施大多数人

^① 卡布拉尔《论文选：几内亚革命》（纽约1969年）第110页。

的权力。”^①

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通常起的作用不大，这一事实显然是使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感到头痛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深信，没有这一阶级来领导，就不会发生真正的革命。卢西奥·拉腊在一次同南非共产党机关刊物《非洲共产主义者》的记者讨论这一问题时说，“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到真正的政治觉悟，并能以必需的可靠性和坚定性掌握革命的进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在他看来，他所承认存在的安哥拉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但是在“第二次解放战争”中开始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这就是1975至1976年，安哥拉人运进行的反对两个亲西方的安哥拉民族主义集团和反对南非的斗争。1977年底安人运改变成“劳动党”，安哥拉的工人阶级开始承担它在革命中应有的作用。拉腊说，“我们已经处在我们的工人阶级开始掌握革命进程的阶段”。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早期的非洲社会主义者有很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革命以及党的社会基础，必须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广泛的联盟，既不是全民的，象几内亚那样，也不是包括一切社会阶层的，象阿尔及利亚那样。他们有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来说明为什么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此重要，即使在非洲国家也是如此。虽然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而工人只是极少数相对说来较有特权的人。他们说，只有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靠国家的

^①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向莫解阵第三次代表大会（1977年）作的报告。

“集体财产为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向农民和各种社会集团的人进行“集体精神、组织精神和集体财产精神”的教育。进步的小资产阶级、职员、知识分子、护士和教师也受到资产阶级的思想、习惯和趣味的影晌，因而不能让他们担负领导革命的责任。莫解阵解释说，他们必须首先“进行自我斗争”，学习工人阶级的品质，树立新的世界观，“从而背弃资产阶级而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致认为，革命必须由一个小的先锋党来领导。党的社会基础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要是苦于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因而，不可能有一个包括全体成年人的群众党。他们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代表社会上一切集团的主观利益。某些阶级必然会反对它。因此，他们必须被排除在党之外。安人运和莫解阵在独立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战时的阵线和运动改变成适当的先锋党。办法是严格党员标准，严格把党员人数限制在几千人，而不是几百万人，并建立党校，对人数不多的精选的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甚至于，埃塞俄比亚虽然到1980年还一直没有党，但也接受了先锋党的理论，并建立了初步的骨架，其中包括一所培训干部的意识形态学校。很清楚，这些国家所遵循的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模式。事实上，苏联人、古巴人和东德人一直在给予帮助和鼓励，甚至逼着他们尽快建立一个象样的先锋队组织。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除了相信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阶级冲突、无产阶级专政和由一个小的先锋党领导革命之外，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强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

使他们明显地区别于早期的非洲社会主义者。的确，早期非洲社会主义者和“过渡的”领导人常常使用强制手段以实施他们的改革，或镇压反对派。比如，杜尔就有非洲的“斯大林”之称。甚至尼雷尔也宽容他的党在七十年代中期用武力使数百万农民到村庄里定居。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他们谁也没有在理论上把使用强制手段作为革命的合法组成部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动辄为使用强制，甚至“恐怖”手段进行辩护，认为这是推动革命进程的合法手段。最惊人的例子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在那里，门格斯图上校曾经公开使用他所说的“红色恐怖”去消灭各种各样的他个人的和革命的许多政敌，指责他们使用“白色恐怖”反对他的军政府。门格斯图在1977年11月处决了他的副主席阿特纳夫·阿巴特之后说，“警惕地用革命的剑去清除，这是历史的任务”。他还说，“你们的斗争应该表现在把红色恐怖扩大到反动营垒，把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变成红色恐怖”。在革命遭到分裂分子和各种反对运动破坏的时候，出现主张恐怖的理论是不奇怪的。几乎从一开始，埃塞俄比亚革命就流行使用暴力。革命派和反对派都随时准备使用武力战胜对方。1975年公布实行的土地改革就鼓动农民和农场工人同地主斗争。在厄立特里亚省和欧加登地区发生的战争，使这个古老帝国的心脏地区同边缘地区对抗。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历史的环境相结合，导致颂扬以暴力斗争去取得胜利。1978年9月，门格斯图曾告诉当时访问埃塞俄比亚的卡斯特罗，“胜利总是斗争的果实。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告诫我们的。这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告诫我们的”。

也许更令人奇怪的是，在一些远为安宁的非洲国家，那里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也接受并且鼓吹暴力，尽管革命并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就是这样的例子。拉齐拉卡是一名军官，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这个印度洋岛国的官方理论。早在1978年他就说过，“为了防止反动派重新夺回革命的政权，使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和打败反革命的暴力是完全必要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早期非洲社会主义者专心致力的泛非主义和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也相去甚远，泛非主义在他们的谈话和著作中简直没有提到过。不结盟思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响下，也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象恩克鲁玛晚年那样认为，世界主要是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国际力量组合中的基本矛盾，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被宣布为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天然盟友”。这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使用的名词。这些国家是非洲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该与之建立最密切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的国家。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都与莫斯科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在前葡萄牙殖民地，苏联集团和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之间的“天然”联盟关系，被看作早在他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上就扎下了根，是独立前就已存在的联盟的延伸。马谢尔在回顾不结盟运动的历史时，按莫解阵的看法解释说，“社会主义国家站在我们一边，对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给予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我们的安

全的后盾”。这种观点深深影响了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不结盟运动的态度，他们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运动。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不结盟运动主要的意思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把这些祸害统统归咎于西方。因此，不结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认为可以携手并进，宗旨和目的都是不矛盾的。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关于不结盟运动的理论认为，不结盟意味着同东方和西方保持等距离。为了说服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这一理论，铁托总统曾大费周折。七十年代后期，在不结盟集团的历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为了把不结盟运动原来的原则写进文件中去，进行了非常困难的斗争。七十年代末，不结盟运动简直成了亲东方和亲西方的国家之间激烈斗争的场所。1979年不结盟运动的最高级会议竟然在古巴召开，象征的意义似乎太明显了。古巴这个国家既是苏联非常亲密的盟友，同时又大肆鼓吹第三世界应同东方集团联合起来，在全世界进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

非洲共产主义的起源

十分明显，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起源于非洲的土壤。它起源于欧洲，那里的社会经济条件与非洲完全不同。那么，如何解释在六十年代初期还被认为是一种“外来”意识形态而遭到普遍拒绝，而今天在非洲却越来越具有号召力呢？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传遍这一大陆的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非洲的传播，实在

很少是得力于非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据苏联人自己计算，整个非洲大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正式同莫斯科结盟的共产党党员的人数，1939年只五千人，到1971年只增加到“六万多人”。据说，其中在塞内加尔二万人，尼日利亚二万二千人。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在独立后二十年间，影响一直很小。据苏联人说，最大的党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独立大会党，据说到七十年代初有党员“三万多人”。马达加斯加是1980年以来官方允许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政党活动的两个非洲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塞内加尔。在拉奇拉卡上台后，马达加斯加的共产党人一直以党员的身份参加政府，并在联合执政的全国保卫革命阵线中保有两个代表。这在非洲国家中还是绝无仅有的。到今天，独立的民族主义或军事领导人都毫无例外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非洲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苏联人对这一点是心中有数。这也是他们对新的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盟友的坚定性抱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数目不断增加。这虽不能由非洲共产党人直接负责，但是，西欧共产党对这一发展趋势确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都是共产党很活跃的法国、意大利或葡萄牙的前殖民地（葡萄牙共产党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在英国，费边主义传统比马克思主义传统深，所以至今它所培植的政权都倾向非洲社会主义，而不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的学生到宗主国去学习，比英国殖民地的学生到英国去学习受到更系统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在葡萄牙殖民地，有很大一部分这种学生不是白人就是混血儿。这

种混血儿人数虽少，在安哥拉或莫桑比克还不到十万人，但在民族主义斗争中和后来在建立意识形态和管理政府的工作中，他们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时，分别选择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国籍的葡萄牙白人，他们大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人数很少，但相对说来，起的作用却是相当重要的。虽然这批人的数目很难弄清，但是，凡是访问过这两个国家的人，看到很多这种人身居要职，都无不为之震惊。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些白人和混血儿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一般说来，他们总是支持这两个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在任何前法属或英属殖民地，类似的集团是不存在的。

在试图估价欧洲共产党对在非洲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时，一定要把他们在六十年代的影响和七十年代的影响区分开来。这些党在五十年代非洲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所做所为十分复杂，好坏兼有，有时完全起消极作用。在这方面，法共的表现特别突出。它反对法属各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这使得许多西非民族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同它闹翻了。在阿尔及利亚，法共很晚才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直到独立之后，阿尔及利亚人对此还耿耿于怀，不予原谅。这也使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人企图卷土重来大费周折。帕德莫尔，恩克鲁玛的一位莫逆之交，非常气愤而详尽地描述了欧洲和美国共产党人在处理他们同非洲解放运动的关系中的错误，并驳斥了他们开初对泛非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的攻击。帕德莫尔的《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一书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实际上所有早期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都怀有强烈的反共情绪，也有助

于说明为什么非洲共产党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解放运动的政治和思想都缺乏影响。

但是，在七十年代，西欧共产党对后期的非洲解放运动，甚至对一些执政的激进的军人就有了大得多的影响。比如，意大利共产党对西亚德领导下的索马里革命就有相当大的影响。西亚德的很多索马里文职顾问，例如穆罕默德·阿丹，由于他们曾在意大利学习或居住过，因此非常接近意共。西亚德上台之后，他们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索马里的主要传播者。同样，法共也间接地影响了埃塞俄比亚的革命。门格斯图的一些高级文职顾问，最值得注意的是内格德·戈贝齐和海尔·费达，他们是留学法国的知识分子，在留学期间和后来都与法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欧洲共产党与晚期的非洲解放运动有着最密切关系的，也许是葡共与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关系了。这不仅因为这些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在里斯本留学，并在那里同葡萄牙共产党人有联系，而且，与其他非洲殖民地的宗主国不同，葡共在葡萄牙是非法的。葡共同非洲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样，同样进行着反对萨拉查政府的秘密斗争。因此，这两种斗争携手并进。在安哥拉的葡萄牙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安哥拉发动的解放战争，而阿戈什蒂纽·内图和安哥拉其他民族主义者在学生时代和早期的政治活动中同葡共地下党就保持着联系。

虽然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缔造者同安哥拉和葡萄牙共产党人之间有时发生分歧，但是，对于争取安哥拉独立的必要性，大家都毫无异议。此外，很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

领导人，特别是那些非洲人和葡萄牙人的混血儿，从他们的思想信仰上看，甚至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长期斗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安人运的大部分领导人和葡萄牙共产党人有着共同的思想传统。这一点很能说明为什么在里斯本1974年4月政变之后，葡共竭力帮助这一民族主义派别。葡共的援助在1975年初爆发的三方内战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安人运打赢了这场战争，尽管它在军事上初期很不利。一些葡萄牙共产党人个人在这一时期积极地参加到了安人运一边。此外，为准备安哥拉独立，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建立的过渡政府，有一段时间曾由一位名叫罗萨·科蒂尼奥的葡萄牙共产党人总督领导。这位有“红色将军”之称的总督，对于运武器给安人运有意置之不问。几内亚比绍的，其次还有莫桑比克的民族主义运动也都与葡萄牙共产党人有联系，虽然葡萄牙共产党人在这两个国家的卷入程度不深。

不只是欧洲共产党对七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和策略有了变化，苏联和古巴也是如此。这两个共产党国家，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才开始采取亲近非洲民族主义者，并给他们外交、道义、军事各种援助的政策。那时，除了葡萄牙殖民地和南部非洲白人统治的国家以外，其他非洲国家都随着第一次独立的浪潮摆脱了殖民统治。苏联人利用讨论会、访问和由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发起召开会议等方式同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加强了联系。苏联人在他们精心编造的辞汇里，把这些民族主义领导人称为“革命民主派”。到了六十年代末，苏联人从葡萄牙殖民地和白人统治的南部非洲各国内部互相争斗的民族主义派别中间，挑选出他们认为最合法或者同他们

的意识形态最接近的一些派别。这些派别包括安哥拉的人运、几内亚比绍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莫桑比克的莫解阵、乔舒亚·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纳米比亚的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凡是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召开的会议都邀请这些派别参加，这些派别的很多代表还帮助这个组织做工作。苏联人还向很多这类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一些军援，虽然不是对所有的运动都给以援助，通常也不完全满足他们的希望。安人运是主要的受惠者。但是，莫解阵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却很少。到七十年代后期，苏联成了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津巴布韦人民联盟的主要武器供应者。其供应量之大，比安人运或莫解阵在进行民族主义斗争时期所得到的都多得多。这可能多少是因为苏联人过去给民族主义运动援助太少而受到批评的缘故。但是，毫无疑问，这也是出于冷静的政治打算，考虑到如何最有效地在南部非洲仍在进行独立斗争的派别中扩大政治影响。七十年代，苏联人通过他们不断加强同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联系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难以估计。七十年代后期，象津巴布韦人民联盟、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等派别，还通过其他许多渠道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熏陶。特别是通过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前线国家，在这里它们设有总部或基地。

在非洲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巴也起了作用，虽然还难以确定古巴的影响同欧洲共产党或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自己的影响相比究竟有多大。古巴同非洲民族主义派别接触最早、联系最密切的是安人运。到六十年代末，古巴的军事

顾问还一直帮助安人运训练游击队，甚至在安哥拉直接进行一些战斗。比较起来，古巴同莫解阵的联系，在其整个独立斗争过程中是很少的。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人也没有给它帮助。因为它同中国有联系，并从中国得到军事援助。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古巴对非洲大陆当时还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援助所起的作用就大得多了。古巴人派人到安哥拉的游击队训练营地为西南非人民组织和津人盟训练游击队，甚至还通过埃塞俄比亚搭桥，给穆加贝的津民盟以帮助。津民盟在1978年就开始派人到埃塞俄比亚去受军训。

七十年代，苏、古势力在非洲不断增长的时候，中国的影响却下降了。六十年代，西方把中国人看作是对非洲大陆的最大的共产主义“威胁”，因为，他们的政策非常积极，他们的经验对于莫解阵和津民盟这样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吸引力。但是，到七十年代末，中国人几乎从非洲全部撤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动乱，另一方面也因为一系列的外交错误，支持了一些失败的事业。由于他们一心反对苏联人，他们在安哥拉内战期间支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在扎伊尔，他们支持了蒙博托总统的政权，而蒙博托在激进的非洲人士中是名声很坏的。在安哥拉，中国人象美国一样，拒绝承认安人运政府。他们偏偏援助在1977年间苏联断绝关系并入侵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外交上处于孤立的索马里。中国人从非洲撤退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当津民盟看来在它既反对白人也反对苏联人支持的津人盟的战争中要取得胜利的时候，北京却没能够满足津民盟的武器要求。中国人影响下降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

在莫桑比克。中国本来已经成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主要的共产党支持者，但是在莫桑比克独立之后，中国却被苏联挤了出去，而苏联却成了莫桑比克的最重要的盟友。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黑非洲的传播，外国共产党的影响虽然起了作用，但这种影响多半是间接的，而且是通过非洲本地的马克思主义者渗透进去的。不管是古巴人，还是苏联人，他们都没有把一个政权或一种意识形态强加给哪一个非洲国家。即使是在安哥拉，他们也没有这样做。这一点，后面将加以说明。葡属殖民地在独立的时候，它们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已经有了一大批忠诚的本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纯粹的民族主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在安人运、莫解阵，甚至在几内亚比绍较温和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内部，就已经发生了。确确实实，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这些运动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虽然在独立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字眼还从未使用过。另外，当时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这三个葡属殖民地的解放区还建立了人民商店、集体村和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所有这些组织形式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独立之后它们的政府就正式采用了这些原则。这种独立前民族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情况，正是它们同早期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的差别。早期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是先实现独立，然后才在有巨大争议的情况下从上面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最能说明这种危机的例子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刚独立，民族解放阵线分裂为许多相互对立的集团。这种分裂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无疑是这个阵线在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葡萄牙殖民地

的上述三个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都常去阿尔及利亚，因而目睹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纯粹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的危机。这一教训肯定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

前面说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非洲化”的进程，在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到各自的国家，并且迫使军政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别的国家，如马达加斯加、贝宁和刚果，是军事领导人和一个小集团的军政官员的个人信仰，造成了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变。所有这些情况表明，苏联、古巴或其他外国顾问所起的作用，开初似乎都是很小的。他们的好时光，是在后来，他们帮助那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军事领导人巩固其政权和实施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到来的。同苏联、东德和古巴长期直接的联系，对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去，可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当代的两个例证就是津巴布韦人民联盟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这两个团体把越来越多的游击队战士和干部派到东欧、古巴和有古巴教官的安哥拉营地去，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明显地变得更马克思主义化，尽管恩科莫在同西方人谈话时小心谨慎地回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由于它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们的外国共产党盟友对它们的思想激进化究竟确切要负多大责任，几乎无法作出判断。但是很明显，在七十年代中期葡萄牙非洲帝国崩溃之后，在整个南部非洲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中这两个方面起了互相促进的作用。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发生影响的另一重要来源是早期非洲社会主

义国家的具体经验。这些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和失败，非洲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不加以注意。说实在的，他们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成长，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吸取了这些国家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教训。所以，接下去就让我们看看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经验吧。

第三章

非洲社会主义重探

前一章已经谈到,在过去的十五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怎样经历了重大的演变,从人道主义的“非洲社会主义”转向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并不是在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唯一的变化。它们的政策,事实上它们的政治,在这期间也发生了质变。六十年代初期或中期以极其相似的意识形态观点建立起来的国家,七十年代末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出现了显著的差别。这一过程之所以需要加以研究,是因为它揭示了在非洲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种种困难,表明了影响这一结果的某些关键因素。没有理由可以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不会发生同样的困难。虽然我们相信,对意识形态作不同的选择可能是极其重要的,然而这仅仅是决定最终结果的若干因素之一。这里我们就四个自命为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进行讨论:赞比亚、坦桑尼亚、几内亚、阿尔及利亚。总的来说,这几个国家是迄今仍在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的、在非洲来说时间最长的国家。其中一些国家的政权,在非洲大陆上由同一领导人执政的年代最长。因为有这种连续性,这些国家成为我们研究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的绝好典型。更有兴趣的是,这四个国家今天各自具有截

然不同的特点。坦桑尼亚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相对来说仍然比较忠实于非洲社会主义原来的概念。相反，赞比亚则偏离比较远，在我们看来，它基本上变成了上层阶级的福利国家。阿尔及利亚变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官僚制度的国家，它一心一意实行工业化政策，它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颂扬伊斯兰教，它在所有早期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视国家集权。几内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马克思主义，并且继续奉行旨在动员全民的政策。杜尔创造了“党—国家”，可是，他却因此开辟了国家终于战胜党的道路，而党正是他曾经试图建设成为政权支柱的组织机构。

仅仅以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它们所走过的不同道路，那是不可能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非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榜样：尼雷尔的乌贾玛村和卡翁达的人道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这两个国家却形成了非常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几内亚是我们所谓“过渡性”意识形态的完备的典型，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却没有反映出这种社会主义概念。阿尔及利亚已经走向另一个方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它仍然效法苏联的经济发展方针。无论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有异有同，这四个国家构成了今天非洲四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赞比亚变成了背离社会主义发展，走向“上层阶级福利国家”的例子；坦桑尼亚成了“发展而没有增长”的典型；阿尔及利亚典型地体现了“经济挂帅”的方针；而几内亚恰恰相反，是“政治挂帅”的典型。

赞比亚：“上层阶级福利国家”

1978年10月，卡翁达总统决定重新开放赞比亚与罗得西亚的边界，恢复铁路交通，以利于出口赞比亚的铜和进口基本日用品。边境是从1973年起关闭的。这给内陆国家赞比亚造成的困难局面，到1978年进一步恶化，因为达累斯萨拉姆港长期拥挤，当时唯一可以通向海口的坦赞铁路效率不高。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全国干旱，即将收获的主要农作物玉米，预计比五百万人口所需要的数量短少三十万吨。此外，赞比亚的广大人民还苦于严重缺乏日用品，如食盐、食油、肥皂、牛奶，有时甚至缺少玉米。商店外面排长队，已经是普通的景象。赞比亚人，特别是比较贫困的人，仅仅为了得到仅能糊口的食物，每日要花几个小时去排队。然而，在重新开放边境之后，首先出现在商店货架上的消费品却有许多每瓶售价分别为八美元和三十三美元的葡萄酒和威士忌酒。政府关心的是首先满足赞比亚生活富裕的上层少数人的需要，这还不是唯一的证明。几个月之后，在1979年5月，政府宣布大幅度提高高级雇员购买小汽车贷款的最高限额，以便在严重的危机中“改善公务人员的生活”。政府将提供贷款的数额由原来的三千六百克瓦查（四千七百四十美元）增加到六千克瓦查（七千九百美元），相当于接受贷款者年薪的百分之七十五。不仅如此，贷款偿还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虽然这在当时一般的条件下似乎已经相当慷慨了，但是一经宣布，公务人员却大叫不满，他们争论说贷款提高得不够。几天以后，政府便顺从

地把贷款的最高限额再略为提高。

这些为小汽车贷款大肆争吵的政府雇员和准国营机构的雇员早住进舒适的欧洲式住宅和别墅，只付一点儿象征性的房租。这只是他们所享受的各种各样许多福利中的一种。他们这种令人羡慕的命运同赞比亚大多数人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人口的半数，包括大多数最低级的政府雇员在内，住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大院”里，住的是用土坯盖的一两间房的小棚屋，没有水电设备。光景好一点的住在水泥板盖的同样大小的屋子里，有时有水电供应，但不是经常有。这些下层居民主要关心的是交通问题、大家庭吃饱饭和孩子上学的问题。许多人开始在房前屋后种一小块地的玉米或蔬菜，勉强维持生活。尽管城市人民的生活那么艰难，缺这缺那，这个大院里的居民还是比他们乡村同胞的生活好得多。在整个七十年代有不计其数的调查研究材料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贫富悬殊、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经济停滞，至今还象1964年独立时那样依赖铜矿生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而食品生产的增长不足以养活他们；有一个群众性的党，但只懂得控制群众，听任群众涣散，而不去动员群众，对那些忠诚分子施以最优越的恩惠；意识形态无人认真对待；还有享受优越待遇的城市的上层权贵。这就是独立十五年以后的赞比亚——一个“倒行逆施的”非洲社会主义的绝妙的研究对象。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不平等，赞比亚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名为赞比亚工矿公司的巨大的、象章鱼那样的控股公司所属的113个准国营企业，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经济活动。卡翁达定期发表长篇演说痛斥资本主义和私人企业的罪恶，同时

又在恳求外国私人投资。为领导层制定了法典，禁止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从事商业活动和出租房屋，并且制定了高额累进的所得税，规定收入在一万二千克瓦查（相当于一万五千八百美元）以上的，要征百分之七十的税。然而，赞比亚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一个生活富裕而且很有保障的上层集团，他们有可靠的高薪；有得到补贴的住房，能得到买小汽车、房屋、家具，甚至买收音机的贷款；享受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最重要的还有职位任期的保障。全国人口中的其他人，所能得到的利益比他们要少得多。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进小学读书，但是农村和城市贫民窟的儿童，几乎没有升学的机会。虽然全国人口都实行免费医疗，但是农村的诊所同“棚户大院”的诊所一样，医务人员、医疗设施都很差。毫无疑问，赞比亚已经成了一个福利国家，但是主要受益者是上层阶级。

对赞比亚式的非洲社会主义提出了最客气、然而又最坚定的批评的是1977年由国际劳工局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它恰当地使用了这样的标题：“缩小差别”。文章的数字和事实描绘了一幅极不公平的社会图画。例如，它发现，仅占赞比亚全国户数百分之二的家庭占有了全国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大体相当于占总户数百分之五十的最贫穷家庭的收入。据估计，从1972年到1973年，全国有半数的家庭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独立以后工资虽然很快增长，但贫富悬殊依旧存在，甚至更为严重。产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与经理和管理人员的最高薪金之间的比例是一比十八至二十，在文职人员中这一比例是一比二十五。农场工人的最低工资大约相当于工业非技术工人最低工资的一半。独立小农的生活也很穷苦，

因为他们的产品售价被限制得很低。按国际劳工局的调查，事实上他们产品的实际价格已经下降了。“据估计，在1964年至1973年间，按典型单位计算，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的购买力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换言之，一个农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增加农产品销售量百分之二十，他在1973年的生活并不比1964年好。”这篇文章的结论认为，“在赞比亚迫切地需要缩小差别，政策和政策实施之间的差别，言论和行动之间的差别，贫富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上层集团（政府和党的）与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村群众之间的差别。”

在赞比亚，越来越不平等，即使以经济蓬勃增长为理由也是说不通的。赞比亚刚独立时曾有过急剧的发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随后，全国的形势却迅速恶化。据国际开发署的研究报告计算，1965年至1975年赞比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已经低于人口增长率。在这十年的末期，比率成了负数。农业生产尤其使人失望。农民自给性生产这一部分，1970年至1977年每年增长约百分之一，赶不上农村人口每年百分之一一点五的小小的增长率。甚至到七十年代后期，城市地区的食物大部分还得靠白人经营的商业农场生产。到七十年代末，这个国家经济的困窘集中表现为：沉重的债务，超过十五亿美元；进口欠款四至五亿美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四亿美元以维持这个国家。

问题出在哪里？1967年，卡翁达总统发动了一场他和赞比亚其他领导人认为是模范的非洲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表面上，卡翁达的人道主义

似乎是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典范。早在1967年，卡翁达在解释“把人道主义变为行动”这句话的含义时宣称，政府的一切努力，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非洲人过去熟悉的那种社会。他对他的同胞们说：“我们既然有能力维持和发展以互助社会原则为基础的传统村社，这就要求我们承认村庄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文化单位。”^①赞比亚的“普通人”在其“自然的”农村环境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点成了人道主义的核心。在详细阐述将来全国经济发展战略时，卡翁达说：“赞比亚的人道主义是有益于农村的决策。”^②这个战略的核心是以促进农村发展为宗旨的“土地革命”。农村的四十五万个小型和中型的家庭农场，将成为国家全面发展的基本单位。

至于赞比亚过去是怎样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社会，这是一个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问题，不必在这里论述。但是，六十年代中期赞比亚的情况，肯定与过去那种被理想化了的、以农村为基础的赞比亚社会大不相同。这个国家几十年来采矿业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因而也就是城市占统治地位。仅铜矿一项就历来占全部出口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矿山象强大的磁石一样，把赞比亚人吸引到城市。自独立以来，城市人口每年大约增长百分之九。到七十年代末，已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赞比亚人住在城市，这个比例在黑非洲是最高的。不仅如此，采矿业还使人们习惯

^① 卡翁达《赞比亚的人道主义和对实行人道主义的指导》第1部分（卢萨卡赞比亚新闻处）第27页。

^② 卡翁达《赞比亚的经济革命》（卢萨卡赞比亚新闻处1968）第14页。

于挣工资的职业，甚至于工资与工作成为同义词。例如，1979年，在卢萨卡的“棚户大院”接受采访的手工业工人和商贩，声称他们是“失业者”，因为他们不挣工资。这种社会心理对于以传统农村价值标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好处。

卡翁达本人对于人道主义在赞比亚这样的社会在实践中是什么含义，并无明确概念，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他最初在1967年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的穆龙古希声明，政府接着制定的政策，并不是他本人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完整全盘计划的一部分，而只有对眼前问题临时应付的性质。这些政策大部受到赞比亚社会面向城市的影响。在这方面，把穆龙古希声明以前制订的1967—1970年第一个全国发展计划同设想为推行卡翁达人道主义革命的1972—1976年第二个计划进行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个计划是毫不掩饰地面向城市的。它企图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减少对铜矿的依赖，办法是把重点放在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而不是农业。对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的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工业和矿业占百分之二十一，社会服务占百分之十八，而农业仅占百分之十二。第二个发展计划也没有改变多少这种资财分配比例。尽管全国被认为正在进行激进的人道主义革命，农业仍旧约占百分之十一。诚然，基础建设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投资有些是有利于农村地区的，但是，农业和农村方面没有得到优先照顾。甚至在工业方面，投资的格局也不符合卡翁达的人道主义目标。的确，国际劳工局的报告指责赞比亚政府鼓励发展消费品工业，目的在于供应“奢侈品市场”，而不是为赞比

亚人生产基本生活必需品。“我们发现，赞比亚在组装菲亚特（考虑用菲亚特—130，以代替梅赛德斯，其实价格更昂贵）和兰德罗威尔汽车，但是却没有制造自行车和锄头的工厂。”到七十年代末，赞比亚已经进而生产菲亚特—132和菲亚特—131，而它的第一个自行车装配厂才刚刚开始建设。

在卡翁达号召进行“土地革命”以提高农村和小农家庭的地位之后，当然制订了一大批新的纲领，建立了或者计划建立许多机构。其中包括行政管理的权力分散；成立农村生产委员会；组织合作社；建立农业推广服务站；成立农村服务中心；提出了拖拉机机械化计划；重组村庄，建立集约经营发展地带和农村建设中心。秩序都打乱了，每一项都证明是无效的，甚至完全是祸害。使乡村到处都是残破的、不起作用的设备（和拖拉机），它们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形成了使人头昏脑胀的混乱景象。对于所有这些计划和机构要作全面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对其中几项简要考察一下，就足可对这种作法及其引起的问题，得出一个总的概念。

首先，有许多规划只是宣布了却未加实施。例如，农村服务中心就是如此。而农村服务中心却是卡翁达在1968年关于“赞比亚今后十年指导方针”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他曾说过，到1980年，赞比亚每个农民都可以“很方便利用”“具有一定规模的服务中心”，离住家不超过十英里。“我们计划到1980年，按我的估计，平均每个基层中心服务的人口约一万人，每个中心都有一个卫生保健站，一个货物丰富的商店，一个农业工具仓库，一个推广办公室，以及某些设施以改善当地的文化娱乐条件，一个足球场，一个庆祝传统节日或放映电影

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政府机关……”^①。

1980年，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服务中心，甚至连计划也没有。村生产委员会倒是有的。这个委员会本来设想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提倡农民参加农村建设的，但是它们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取得收入。不仅如此，它们的职权也不明确，往往同那些官方仍然承认为主要地方政府当局的传统头人发生冲突。毫不奇怪，这些委员会不是不起作用，就是被村庄的长老接管，纳入他们打算利用的经济社会结构。计划建立的两万五千个村委员会，到1977年10月，真正成立的不到二分之一。

合作化运动，也是在穆龙古希声明之后发动的。最初是比较成功的，事实上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果。但这些成就是短命的。1964年，登记的合作社有二百二十个。到1969年，合作社的数量猛增到一千一百一十四个，有五万多社员。然而，后来不久就有很多合作社垮台了，留下的是一堆堆无法使用的，大多还是未付价款的卡车、拖拉机，以及巨额的债务，并且使赞比亚人对合作社长期抱怀疑心理。当问及合作化运动在1979年的状况时，分管合作社的部门一位官员拒绝提供任何数字，他解释说，在他登记册上的合作社，起作用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1975年年中，发起了建立农村建设中心的运动，对那些中途退学而又无职业的学生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技术以后再回到农村去。这件事等于间接承认赞比亚农民并没有自发

^① 卡翁达《下一个十年中赞比亚的指导方针》（卢萨卡赞比亚新闻处1968）第32页。

地响应卡翁达关于土地革命的号召。农村建设中心是由军队组织和管理的，全国五十三个区各有一个。结果造成全国困难局面。“许多招募参加的人，把农村建设中心看成兵营而逃跑了，有少数人把它们比作集中营。”不仅被招募的人有这种看法，赞比亚的官员在1978年国家举办的电视节目讨论农村建设中心时，也把它们指责为集中营。这些中心的情况显然是很差的，因为从来不允许外国记者参观。

在政治领域中，要确定一种体现人道主义原则的制度，同在经济领域差不多同样困难。到1972年为止，赞比亚一直是多党制的国家。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它变成了“一党参与民主制”。这个制度，在理论上说来，既要保证较高程度的人民参政，又要保证国家的统一。统一民族独立党原来设想成为群众的党，因为卡翁达说过，“人民是革命的先锋。”^①在实际上，统一民族独立党却成了控制人民的工具，而不动员人民，或保证他们参加各种活动，不仅仅是参加全国选举。这种倾向在城市地区最为明显，在那里，统一民族独立党代替城镇或城市当局实际管理棚户大院。例如，在每个城镇中，由党的官员决定谁可以在那里居住，谁可以盖一间小房；在城镇经济中心即当地市场上，他们负责分配货摊；他们维持法律和秩序，并负责确保没有任何别的组织起来向统一民族独立党挑战。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他们要确保居民们按通知购买党票和参加投票。然而，统一民族独立党在高收入的市郊就不担负这种任务，事实上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大多数

^① 卡翁达《分水岭讲话》（卢萨卡赞比亚新闻处1975）第4页。

党的高级官员居住的地方。在农村地区，党的官员与传统的当局往往是同班人马，这就确保永久维持现状，而不是动员农民进行变革。

党没有能够发挥政治和经济动员的催化剂的作用，显然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早在七十年代初，一些学者就注意到，党在从“政治解放的工具”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机构”方面做得并不成功，他们还指出党完全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来完成这方面的任务。这种评语在七十年代末似乎同七十年代初一样依然有效。笔者住在赞比亚的两年期间，党没有发动全国的运动来动员农民或市民完成什么任务。唯一紧张的活动，就是1978年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当时统一民族独立党做了极大的努力，成功地使选民再次选举卡翁达为总统，并用同样的努力清除了党内反对派的最后残余。首先，党修改了章程，使得其他人都不可能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继而在议会选举中，中央委员会取消了二十八名在地方党的初选中当选，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的资格。很明显，在赞比亚，甚至按照一党制关于民主这名词的定义来说，“民主”也是极少的。

统一民族独立党没有动员全民，这一事实加强了赞比亚内部国家集权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许由于赞比亚的经济特点而成为不可避免的。赞比亚几乎成了一个以铜矿为主的“公司国家”，必须由专家治理和以官僚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从独立之日起，就流行着这样的观点，经济必须在大规模的准国营单位控制下组织起来，任何改变都应以中央政府为主要动力。卡翁达一再反对这种倾向，并告诫人民不应等待国家来做每一件事情。1970年，他在讨论农村发展问题会议上讲

话时说：“国家为什么要越来越多地包揽那些个人或合作社能够办，至少办得同样好，也许比国家办得更好的那些活动呢？目前的情况，国家不得不去承担那些理应发挥私人积极性的那些活动。”^①但是，尽管除了选举之外，统一民族独立党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为任何其他目的对人民进行组织和动员工作，国家却继续几乎什么都干。赞比亚的一党参政的民主制实际是高度的国家集权的体制。

直到七十年代末，赞比亚还没有一点象卡翁达所设想的理想人道主义社会的样子，而且他自己对此也很清楚。他把失败归咎于“外部力量”，例如国际上铜价下跌，同罗得西亚的边境被关闭。他还把这归咎于赞比亚人的道德缺点，有各种各样的指责，懒惰，酗酒，不道德，以及浸透了资本主义精神。他在1975年发表的著名的“分水岭讲话”中大声疾呼：“我们在做的不是人道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我们迷失了道路，有些地方我们出了错误。物欲在我身上、你身上、他和她身上已经发展起来了——现在几乎控制不住了。”^②

卡翁达的解释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外部力量”确实加重了赞比亚的经济问题，但不是症结所在。他所列举的缺点当然存在，但这不是赞比亚人所特有的。赞比亚患病的核心在于，人道主义的学说从来没有影响到政府的实际政策，这也许根本不可能，因为这学说同这个国家的现状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卡翁达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相反，集中注意个人行

^① 卡翁达1970年3月在关于农村发展的卢萨卡讨论会前的讲话，根据作者的记录。

^② 《分水岭讲话》第31页。

为，作为治病的唯一良方。从他的许多声明来看，似乎他把人道主义更多地看成一种道德观，一种个人行为的方式，而不是把社会改组为社会主义结构的指导方针。他好象有点指望一旦赞比亚人信仰人道主义原则，这种改组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这种指望自发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观点，最初在所有的非洲国家普遍存在。期望全都变成了失望。通常在独立之后的几年内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因而往往也就不得不重新改变政策。赞比亚也出现了危机，但却没有随之改变政策。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赞比亚要将人道主义变为具体行动是不可能的；这种意识形态根本不适合这个社会，因而不可能用来改造社会向人道主义的方向发展。古老非洲社会的理想，距离现实的确太远了。很难想象赞比亚怎么能够从根本上改造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除非首先解决它经济上最重要的中心部分，即与占统治地位的采矿业相联系的城市经济问题。同样难以设想，传统的非洲村社的理想怎么能够作为改造城市和采矿部门的模式。我们并不是说，赞比亚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可能发生激进的变革。我们认为，卡翁达给社会主义所作的特殊解释，远远脱离了按照社会主义路线促进变革和改造的那些条件。由于犯错误，最终的结果使得赞比亚变成了倒退的、只为上层集团少数人服务的、上层阶级福利社会。当政的总统却无情地规劝他的同胞必须遵照他们已不再习惯的、被动地去模仿也得不到好处的那种个人行为准则。

坦桑尼亚：“发展而没有增长”

在自由的社会科学家中间有一种流行的倾向，即悲叹第三世界国家“增长而没有发展”这种现象。这一术语指这样一种情况：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善，尤其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因此，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这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发展”。这一说法还有这样的含义，一个国家的经济虽然已经在扩展，但仍然高度依赖外来的财源和外国经济利益，因而也就仍然不能够依靠自力或自己保持增长。这种增长而没有发展的危险，成为西方和非洲的激进分子主张第三世界国家需要社会主义通常使用的论据之一。坦桑尼亚也许是最接近于遵循正确的“发展”战略的非洲国家。它强调平等地分配财富，为最贫穷者供给基本必需品，并以民族自力更生为目标。然而，到七十年代末，坦桑尼亚的实践开始提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尼雷尔的方针是否能维持下去，坦桑尼亚的战略会不会适得其反而导致“发展而没有增长”的局面。由于政府重视提供服务 and 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坦桑尼亚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多少有所提高，然而它的经济的生产基础依然薄弱，增长是不稳定的，自力更生只是一种想象。尼雷尔极为强调发展，已经造成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国家主要农产品出口收入与其进口需要之间严重不平衡。不仅如此，坦桑尼亚变得极度依赖外来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经济财政援助，以继续追求社会主义目标。

离达累斯萨拉姆三十英里有一个叫作姆万达波莱的村子，到坦桑尼亚访问的人往往被带到那里参观。这是个比较繁荣的乌贾玛村，交通条件好，坐落在一条主要公路旁，约有八千农民。从整个外表看，这是一个舒适、清洁的村庄，有一个供应较为充足的合作商店、一所学校、一座腰果仓库和一个养鸡场。村庄的周围是掩在腰果树下的小块家庭土地。在村庄土地的尽头，越过所有的家庭土地，是公共的乌贾玛农场，这是一片四十七英亩的桔树。在我们参观的时候，许多树底下的草已经有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没有割除了。回到村子后，在坦桑尼亚当权的革命党的地方负责人向我们解释了这个村庄是怎样积蓄资金的，到首都卖鸡，以及为国家向个体村民收集腰果，从中得到少量的佣金。他说，用这些钱，他们将买第一辆从农场到市场的运输卡车，扩大桔子园，还要建立一座小型的桔汁罐头工厂。所有这些听起来是够令人羡慕的。但是这个村庄已经成立了十五年了，它的经济仍然大体处于起跑前的阶段。至于公社农场，十年仅扩大了十三英亩，就其生产来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但是这个村有它自己的商店、学校，有通向村子各处公共水龙头的自来水系统和一个诊疗所。同坦桑尼亚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村子的发展显然已经超出了增长。

坦桑尼亚独立时，是东非英国殖民地的穷亲戚。肯尼亚和乌干达有财富和基本设施，在高地上和湖泊周围有发达的殖民者农场，还有大的咖啡种植园。而坦桑尼亚，由于气候条件和资源方面都很少吸引力，几乎没有现代农业或英国创办的发展项目。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集中

在首都、主要港口达累斯萨拉姆。九百五十万坦桑尼亚人，大多数分散在各地的孤立的农场里。大约二百五十万个农场中，有百分之八十三占地少于五英亩，百分之九十七不到十二英亩，欧洲移民仅占有百分之一的土地。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占百分之四十七，而幼小的工业仅占百分之七。必须考虑到这些具体条件去理解尼雷尔在1967年阿鲁沙宣言发表之后随即发动的乌贾玛农村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对乌托邦式的过去的怀念，而是考虑到现实的条件解决国家某些迫切问题的尝试。采取别的方针当然也是可能的，但这不是我们要谈的重点。过去重要，至今仍然重要的是，乌贾玛村与现实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尼雷尔曾在《阿鲁沙宣言》中宣称，认为要发展就得从工业开始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这样说，实际上是认识到他当时有哪些条件和没有哪些条件。尼雷尔的乌贾玛是适合坦桑尼亚这种农民国家的条件的，其适应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卡翁达人道主义对于赞比亚以铜矿和城市为主的社会适应性。

乌贾玛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系列的政策：银行和主要工业国有化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不鼓励私人企业，后来又通过“领导人法”，直接禁止党和政府官员经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大大推广初等教育；最主要的则是乌贾玛村政策。这最后一项政策有几个目的，最低限度是要使分散的农民组成村庄，以便为他们提供学校、诊疗所和干净的用水。更高的目的是要防止过分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农民中扩散，使发展不至于造成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后果。最后，它还要鼓励农民共同耕作以提高生产效率。尼雷尔宣布，所有这些都

要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的办法去完成。

到1973年下半年,说服工作未能使农民大规模地自愿移到村庄定居,到那时,仅有百分之十八的农村人口住在村里。政府初步建立了二十二个有良好服务的模范乌贾玛村,企图以此吸引农民。但是,这样做却只给人们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看看国家能给些什么帮助。尼雷尔猝然提出把1976年作为完成村庄化的最后期限,放弃了不强迫的想法,反而为强迫的作法辩护。党的官员急于表现自己的工作成果,在各地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强迫手段。有的地方,人民很容易搬进了村子,有的地方军队或地方民兵烧掉他们的茅屋,把他们的东西装上卡车之后搬到村里去。移居大都是近距离的,因为目的仅在于将农民组织到村里,而不是在全国领土上重新调整人口的分布。仅1974年一年,就有四百万至六百万人移居,尽管当年正遇上一场旱灾,粮食严重短缺。第二年降雨量正常,村庄化的计划实施完成对粮食生产没有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大约八千二百个村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任务完成之后,尼雷尔再次恢复少用强迫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方针。对这些村庄并不急于推行集体化,允许这些村子按各自的进度向共同耕种的方向发展。政府集中力量为农村人口提供服务。坦桑尼亚总统1979年与本书作者谈话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方针。他说,问题不在于集体耕种木薯之类的传统的自给的作物,而在于经济作物,以便防止产生“富农阶级”和资本主义。结果,集体化的进度极慢。1978年政府开始对所有村庄进行人口普查,只有全部经济活动集体化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村子才能正式登记为乌贾玛村。当时八千二

百个村子只有两个达到这个要求。

乌贾玛政策的效果并不那么显著。尼雷尔在1977年出版的《〈阿鲁沙宣言〉以来的十年》一书中做了坦率的分析，也承认了这一点。一开头他就指出，他原来以为用三十年时间，坦桑尼亚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错了，我肯定这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他说，“《阿鲁沙宣言》发表已经十年，坦桑尼亚肯定还不是社会主义，也不能自力更生。”他接着列举了这个国家的各种经济和政治失误，承认还是依赖外国，依赖“别人在没有我们参加或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经济、政治决定。”然而他又认为，坦桑尼亚已经成功地防止了向阶级社会的演变，建立了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所需要的某些机构和某种办法，并在为全体人民提供服务设施方面取得了“合理的良好进展。”“我们正在学会为扩大我们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设施而感到自豪，而不去追求堂皇宏伟的公共建筑或少数人个人富裕的现象。”

尼雷尔一方面为扩大农村基本服务事业的进展而感到极大的自豪，另一方面他坦率承认经济增长的情况令人失望，并告诫说，如果政府要继续贯彻面向农村的政策，那么国家就必须“生产出更多的财富来”。“小牛要吃奶还得靠母牛有奶。这个道理，在今天同1967年一样都是正确的。”他指出，在实施他的乌贾玛计划之后，经济的增长实际上不如实施之前，“按人口平均的生活水平真正的提高是微不足道的。坦桑尼亚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因为我们对产品进行了较好的分配，而不是由于增加了生产总量。”

尼雷尔自己对形势的坦率估计，已经为许多经济研究报

告所充分证实。应当记住,坦桑尼亚是非洲、而且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在仅仅十年之内做出惊人的改变。但是经济增长率还是低得令人失望。按尼雷尔自己所说,在1967年至1975年之间,按人口平均数的增长率实际上只有百分之一点四,这里需要考虑到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八的因素。按1970年至1977年时期的研究,国内总产值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略有提高,达百分之一点九。农业方面的情形也许是最令人不安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数字表明,1970年至1977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三点五,稍稍高于人口的增长率。尤其使人焦虑的是,国家外汇收入的基本来源、供出口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减少。从1970年至1977年,坦桑尼亚的农业出口值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七,但这只是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提高的结果。四种主要商品,棉花、腰果、剑麻、除虫菊的出口量在这期间实际上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不仅如此,出口值的增长不足以抵偿进口值的增长,使国家贸易收支不平衡更加恶化。

农业的情况不佳,特别是乌贾玛村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促使坦桑尼亚寻求别的办法,开始建立国营农场和牧场。农业部的官员认为国营农业可基本上满足城市食粮,而村庄则自给自足。靠世界银行和加拿大的捐赠,坦桑尼亚在1979年投资数千万元在全国各地建立国营农场,生产小麦、玉米、水稻,养奶牛,养鸡。农民办不成的事,国家可以办成,这是大多数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设想。至于这种设想是否有根据,那是另一回事。在坦桑尼亚,国家已经掌握了工业部门,三百一十六个准国营企业的情况也很平常。在1964年至1975

年期间,工业生产似乎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八的增长率健康发展,这是事实。但是,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成果相对说来还是很差,因为这一时期,政府的投资大都超过国内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准国营企业管理工作之差已是有名的了,甚至帐簿都理不清,到处都是人浮于事。尼雷尔本人就批评准国营企业未能生产出足够的利润——1967年至1974年总销量的百分之六点五——为新投资筹措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资金。他指出,“事实上,在我们的工厂和车间,效率一直很低,至今仍然如此。”他还提到,尽管基本投资在不断增加,然而每个工人平均生产量实际上在下降。

在坦桑尼亚,如果说“增长”是令人失望的,那末它的“发展”却是相当成功的,虽然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复杂的。政府的确成功地防止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并且实际上在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减少了不平等的现象。例如,政府部门最高薪与最低薪之间的比例,1967年是二十比一,1976年征税之后下降到九比一。另一个比较成功的是政府能够保持农村与城市收入的差别不再扩大。这对一个发展中的非洲国家来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另一方面,研究材料表明,贫苦农户的实际收入很少提高。坦桑尼亚关于各种收入水平的数字表明,坦桑尼亚政府在防止富裕特权阶层的增长和缩小收入差别方面,是非洲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然而,扩大全面的社会公正和平等,同坦桑尼亚最贫穷的农民收入不能提高,两者之间的得失是否相当,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坦桑尼亚发展战略的最积极的方面是在村庄一级改善政府的服务事业,以满足人民对教育、保健以及清洁用水的基本

需要。这些努力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到七十年代末，坦桑尼亚实际上普及了初等教育，比计划提前了几年。此外，吸收了五百万成人参加识字班。然而这个急剧发起的运动造成一个不良的后果，就是教育质量下降，因为教师是仓促培训的，临时设立的学校又没有足够的书籍和教材。为农村穷人扩大保健服务的运动，也造成了十分相似的结果。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成功地将保健工作从为少数特权者服务的城市医院转到农村诊疗所。据尼雷尔说，农村保健中心由1967年的四十二个增加到1976年的一百五十二个（一年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八十一一个）。1976年，妇幼护理卫生所比十年前增加了六百一十个，农村医士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卫生员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但在七十年代末，政府维持农村诊疗所正常工作的能力还是十分有限。例如，牛痘疫苗还没有使用就变坏的事并不少见，因为农村地区缺乏冷藏库。还有一件事使人们对农村保健服务事业产生疑问。1977年坦桑尼亚大范围流行霍乱，直到1978年，这期间有几个月不得不禁止人们离开首都去外地旅行。尽管采取了种种严格措施，政府对这场霍乱控制得极其缓慢，死了好几千人。

为村民提供清洁用水的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和机械设备的问题。据尼雷尔说，到1976年，生活在农村的一千三百万坦桑尼亚人当中，有三百万人用上了清洁的水。政府正在努力以1991年为期限，实现为全体农村人口提供清洁用水。但是这一方案费用浩大，维护工作也是一个严重问题。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整个工程费用达四亿美元（以1976年的价格计算），这个数字几乎等于第三个五年计划

基本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此外,还有一大批(在某些地区达百分之七十五)现有的供水系统不起作用,有的由于技术故障,有的由于村民对维护这些设备漠不关心。尼雷尔自己就列举了为保持村庄水泵能使用所遇到的大量问题,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原来的水井在保证卫生的名义下被填死了,农民的生活还不如以前。

坦桑尼亚一直集中力量从事“发展”,总的效果如何呢?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在重新分配上,产生了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偏见。但是,坦桑尼亚发展的“大跃进”已经产生了新的问题,并对这条方针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有两个主要的问题:强调社会服务事业对政治制度有什么影响;这种事业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如何。在坦桑尼亚,发展的意义已经变成由国家给人民提供服务,村庄化只是进一步给国家增加了这方面的压力。由国家为诊疗所和学校配备了医务人员和教师,提供医药和书籍。水泵的安装和维修也是由国家负责,也许不可能有别的办法。然而,只有这些服务才使农村生活发生重大改善。因此,国家成了产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力量,而不是“乌贾玛”理论所预想的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因而毫不奇怪,人民参加的程度很低,坦桑尼亚激进的批评者早就提出这种评论。关于乌贾玛村的最近的研究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与流行的印象相反,在坦桑尼亚,国家集权的趋势,比群众参与的趋势强得多,这一趋势使党的地位同政府官僚机构相比,大大地削弱了。以上列举的研究材料表明,虽然党仍旧是一个“群众”党,有三百万党员,占1970年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它正在逐步被政府官员所渗透和统治,决定权集

中于官僚机构高级人员手中。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坦桑尼亚在经济生产基础落后的情况下，是否有财政力量继续维持不断扩大的公共服务事业。到1975年，公共管理和服务费用的增长率比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率高三倍，分别为百分之十五点三和百分之四点六。政府用于经常费用和发展费用的预算赤字，从1970年至1971年的八亿先令(约一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至1977年的二十五亿先令(三亿六千万美元)。

坦桑尼亚怎么能这样长久应付这种不断增长的不平衡，而没有早就遇到危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一个提倡自力更生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既麻烦，但也很简单，这就是：靠外国的援助。由于尼雷尔个人的魅力和他对于满足同胞基本生活需要这一任务的明显的严肃态度，坦桑尼亚一直能够吸引巨大的外国赠款和低息贷款。这种援助稳定地增长，从1967年到1968年间的约二千五百万美元增加到七十年代后期每年四亿五千万美元以上。在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期间，外国援助占基本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到1976年至1977年，国外贷款和赠款占政府开支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七，而到了七十年代末，外国捐赠者们开始认真讨论是否应当把援助新建设项目的款项一部分转用于资助旧项目的经常费用。换句话说，坦桑尼亚已经承受不起它所接受的礼物了。

早已酝酿多年的危机终于因1978年和1979年同乌干达的战争而爆发了。1979年4月，坦桑尼亚部队四万人被动员起来进入邻国去推翻伊迪·阿明的血腥独裁政权。战争发

生之后，坦桑尼亚请求外国捐赠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帮助它支付同乌干达对抗所需的开支。瑞典、荷兰等几个国家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满足不了需要。坦桑尼亚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一大笔贷款。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提出条件，要求坦桑尼亚降低它的某些发展规划，放慢一些项目的进度，并且干脆放弃正在计划兴建的钢铁联合企业等几个规模宏大的项目，在它的财政恢复正常之后，才能提供新的援助。在尼雷尔看来，这些条件是对坦桑尼亚国内政策的粗暴干涉，是要迫使他放弃以农村服务为重点的政策，而这正是他的“乌贾玛”战略的中心。他拒绝了这些条件。到本书写作时为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场冲突的结果如何还不清楚^①，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坦桑尼亚的整个“发展”战略正面临着全面的危机。

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至今还没有实现原来的设想。原来所设想的高度地方分权的、以村为基础的、群众参加的、自力更生的体制，已经变成以群众很少参加和初步的国家集权为标志的，依赖性极大的体制。经过十年的努力，只建成了两个正式的乌贾玛村。农民对于集体化和组织动员显然没有热情。谈到赞比亚时，我们认为那里的国家集权倾向的产生基本上是由于现有的条件同意识形态和政策之间不“适合”。在坦桑尼亚不是这种情况。在那里，乌贾玛意识形态同现有条件之间很适合，所推行的政策同前二者也大都适应。问题是国家在独立时的条件还不能在农民中激起实行广泛的激进改

^① 双方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坦桑尼亚政府至1984年底仍未取得贷款。
——译注

革的要求。他们既没有因白人移民的到来而失去大部分土地，也没有受到坦桑尼亚地主的残酷剥削。结果，一个号召人们发挥积极性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没有得到多少响应。这样就必然导致国家自己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因而造成我们所谈到的那些后果。

几内亚——“政治挂帅”

“在有些人看来，政治是一种表演的艺术，欺骗的艺术，利用他人的艺术。我们不这样看。对于我们，政治的定义就是：政治是科学，所有其他的科学由此产生，其本质是把人民必需的东西变为可能的一种能力。”^①

没有任何语言能象塞古·杜尔自己的这种声明那样雄辩地概括了几内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从1958年几内亚成为法国非洲殖民地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起直到现在，杜尔一直指靠政治来使他认为“需要”的东西变为“可能”。全部依靠政治，使国家遭受了几乎全面的经济灾难，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二百万几内亚人逃往邻国。最表同情的分析家认为杜尔的功绩在于建立了在黑非洲国家中也许是最有效率的一个党，尽管这是以损害这个国家经济为代价的。最尖锐的批评家攻击他的统治不过是“香蕉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是“去掉

^① 转引自克劳德·里维埃《几内亚的社会主义变革》(巴黎马赛尔·里维埃公司1971)第394页。

了经济发展的斯大林主义”。在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二十二年期间，几内亚成了有名的为了推翻自己的领导而“永久有阴谋活动”的国家，又是“过度政治化”的国家，因为杜尔无休止地按毛主义努力动员群众。与此同时，它又成了管理得极为糟糕的非洲经济的典型：经济的增长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农业已经后退到仅可维生的水平；这个国家的主要财富资源，世界上储藏量最大的铝土矿，竟然主要由外国多国公司来开采。虽然与外国的资本主义魔鬼进行贸易，杜尔还是运用他的权力在国内用各种办法限制、甚至消灭资本主义，竟然全面禁止零售贸易将近十年之久，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杜尔宣讲自力更生的学说，但是到1977年，几内亚的外债竟然可以达到非常巨大的比例，几乎等于国内总产值一百一十亿美元。

几内亚是拥有巨大农业生产潜力的法属西非洲拥有最丰富矿产资源的国家。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把以下几个因素考虑进去：杜尔本人；几内亚获得独立时状况；杜尔二十年来加以阐述的意识形态；最主要的，他在把那种意识形态变成实际施行的政策时遇到的困难。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几内亚的悲剧是由于杜尔企图解决、而又不能解决的一个许多非洲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即社会缺乏内在的紧张关系，而没有这种紧张关系就很难产生激进的变革。

1958年独立之前，杜尔就一直是国家政治的唯一轴心，甚至超过了比如说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比后者早几个月取得政权。如果用老一套的政治术语，那么杜尔是典型的具有政治魅力的领导人。杜尔不仅是国家，而且是几内亚

民族。在正式场合下，人们把他称为几内亚的“大象”，甚至称为“救世主”。他以近乎宗教的狂热，把他个人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无情地强加给几内亚人，在他的一卷卷演讲集和著作中，作为不朽的东西记录下来。名为“自由报”的几内亚民主党机关报，除了刊登杜尔的讲话以外，很少有别的内容。实质上，每一项决定，甚至是很不重要的，都是由杜尔亲自做出的，从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具体变化，到细小的行政事务，诸如批准人事变动和给要求出国的人发签证等等。虽然杜尔热中于把一切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但他却做出了比任何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更艰苦、更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在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机构，即比国家更有实效、行使日常权力的政党。最后的结果是党基本上成了杜尔个人的直接延伸，而不是本身单独存在的、使革命制度化的机构。

杜尔最初曾是法共控制的“劳动总同盟”的一名组织者，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950年，他负责领导“总同盟”在法属西非洲的所有支部。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共产党组织才能的训练，他一开始就倾向于从全球解决问题和社会结构变革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零星的改良。然而，他并没有整个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取其所需，将那些适合于几内亚的政治、社会现实，或能够为他的目的服务的原则加以应用。有如我们所看到的，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他还怀疑阶级斗争的概念是否适用于非洲社会，甚至在他最激进的毛主义时期，他也从不拒绝伊斯兰教。象非洲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还进而注意发现和保存真正的非洲文化和个性。然而，他的意识形态观点一再表明，他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

非洲和几内亚的现实，而不追求对原始非洲公社制度的浪漫主义想象。

几内亚取得独立的历史条件，也助长了激进的倾向。虽然几内亚没有发生武装的解放斗争，但它在1958年突然主张脱离法国而立即独立，不接受戴高乐提出的成立法属西非洲殖民地联邦的建议，依照这个建议，该联邦在共同体范围内同这个殖民主义强国仍保持密切关系。戴高乐对于杜尔的狂妄大为震怒，他断绝了法国同几内亚的一切联系，撤退全部三千名技术人员，取消财政援助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援助，企图借此迫使几内亚崩溃。法国人员在撤离的时候连墙上的电话机也拆走了。因此，几内亚是在遭到大破坏的情况下实现独立的，由为数很少的干部从撤离的法国人手中接管国家。正是这场求生存的斗争，引起了激进的政策，并使杜尔从一开始就能够把群众动员起来支持他。

尽管独立时的这些情况，尽管杜尔有他自然的激进倾向，他最初的具体的国内政策并没有明显的独特创见，这些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也算不上是异乎寻常的激进。这些政策的特征，是把属于现代经济的法国公司收归国有或强迫关闭；银行、保险、出口、进口以及交通运输由国家垄断；巩固党在整个国家的统治；最重要的则是以自力更生和发展农村的名义把所有的几内亚人动员起来。这个最初战略的核心名为“人力投资”计划，即在村一级，依靠集体实施改进农民日常生活的建设项目。最初，这种社会主义方针是极为成功的。在党的指导下，在独立后的头两年，农民大批参加数千个村社自助建设项目。他们修建了道路、学校和卫生所，盖起了新的

清真寺和公共建筑，种上了许多英亩的新稻田和树木。问题于是开始出现。学校和诊所没有教师和医生，设备缺乏，因为政府没有人员和资金。匆忙修成的道路在第一个雨季就被冲毁了。集体耕地没有人管理和收割，因为农民们都把力量首先集中在私有的小块土地上，这样至少可以在全国危机的情况下保证自己有足够的粮食。最后，党和政府官员开始使用强制劳动的方法来使建设计划继续进行，并且主要为他们自己兴建建筑物，有时甚至兴建他们的住宅，而不是兴建那些参加者直接受益的项目。到六十年代初，这种人力投资战略已经没有劲头了，杜尔重新考虑他的政策。由于他的政策越来越遭到国内贸易商和企业家的反对，更惊人的甚至于还有政府行政机构官员的反对，这就促使他重新修订政策。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能详细叙述杜尔为把党建成一个有效的统治工具，为把人民持久地动员起来所做的努力。在艰难寻求体现他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全面体制的过程中，杜尔对多种机构进行了试验。他多次改变自己关于几内亚民主党的概念，最初设想为一个群众组织，后来设想为先锋队组织，以后，又变成“全民党”，最后设想为“党一国家”。拥有约三百万人口的几内亚，1961年有党员一百八十万。这是一个没有固定形式，包罗万象的组织，同整个民族无从区别。从1967年起，杜尔开始谈论有必要把几内亚民主党改变成一个“先锋队”党，或者至少在党内建立一个先锋队。他非常注重在大力扩充的学校系统中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希望由此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几内亚人，他还开办了一所党校以培训干部并对他们灌输教条。与此同时，他把自愿动员的方式改为采

用带有军事性质的方式，建立了许多团体和附属机构，以确保几内亚人参加到革命中来。其中包括：党的青年组织“革命民主非洲青年运动”，“先锋队”，“公民服务”，生产大队和民兵。他让军队去筑路，经营农场和工厂，还通过妇女组织动员妇女参加类似的建设国家的工作。至于工人，有“管理委员会”和“改进委员会”，他们通过这些组织来参加国营公司的管理。他曾试验过所谓“革命工作计划”，建立了“农村指导学院”和“革命教育中心”，以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创建了合作社和公共农场以提高产量，并且在中国的影响下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实际上，中国和苏联所使用的动员群众的方法和机构都被他改头换面在几内亚试验过，但一经失败就被抛弃了。

杜尔通过这许多庞杂的机构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几内亚的社会中创造一些动力，以唤起农民，使他们接受并寻求变革。最初，紧张局面的出现是为了从法国人统治下获得独立而斗争；同以前的殖民主义强国突然决裂之后，是为了求生存而奋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危机的缓和，紧张的气氛消失了。要不是这种情况，在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本来很少自然产生动力的。和坦桑尼亚一样，几内亚基本上是一个小自耕农和牧民的国家，这些人虽然很穷，但没有受剥削压迫。没有迹象表明人们广泛地感到有进行革命的必要，杜尔的目的就是要人为地制造这种必要性，他所试验的各种方案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他一再宣布有某种企图推翻革命和他本人的“策划”和外国人支持的“阴谋”。他这样做至少一部分是为了这一目的。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全国发动阶级斗

争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杜尔煽动革命,起核心作用的是党。然而,他对党的概念总是随着他所遇到的问题和他对社会的认识的不同而一再改变。当他认为社会是无阶级的时候,他就选择群众党。当反对的活动普遍存在,使他确信在几内亚毕竟还有阶级存在的时候,他又转向先锋党。当政府官员对他的统治坚持表示不满的时候,他断定这是人民和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的斗争,因而发明了“党—国家”。他经常严厉谴责国家官员在地方党的机构“夺取了实际领导权”,并“使党的活动从属于行政权力”。他对他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国家官员甚至党的官员进行了广泛的、反复的清洗,因而获得了“非洲斯大林”的名声。例如,国际人权联盟曾在1977年要求联合国调查几内亚的“恐怖统治”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并且在一份三百页的文件中提到有大约一千多几内亚人死亡、失踪或被监禁,其中包括两名几内亚以前驻这个国际机构的大使,非洲统一组织的第一任秘书长,还有二十多名政府部长。其他国际组织指责这个国家有三千到一万五千名政治犯。杜尔对国家进行无情斗争的最后结果竟是计划把国家同党完全合并起来。

被杜尔吹嘘为崭新概念的“党—国家”,实际上只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行消亡这一旧梦的翻版。他有一次下过这样的定义,“党—国家”的含义如下:“最初,人民指挥党,党控制国家。现在,党变成同国家一体,或者说党就是国家。”这种“党—国家”的思想,最初是在1968年8月宣布进行文化革命的时候表露出来的。新制度的主要权力部门是名为“地方革命政权”的村或街道一级的机构。这实质上是全体人民的地

方大会，由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是从党所挑选的候选人当中选举出来的。这些地方革命政权实际上行使所有行政职责和某些司法职责，还要通过志愿劳动来动员群众，保证地方治安，以及推动各方面的发展。每一个地方革命政权都有一支一百人的民兵，还有一个生产大队，负责耕种本村的集体耕地。这些新的革命机构的组织工作进行得很慢，到七十年代中期才着力发展。据报道，到1978年为止，地方革命政权的数目约二千五百个，各控制人口一千五百到二千人。地方革命政权的成立很明显是企图使地方民主制度化，允许村民们决定和管理一切地方事务，甚至一部分国防事务。地方革命政权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成立民兵、生产大队等涉及群众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团体，使基层群众最大限度地参加活动。至于这些机构同杜尔所试验的无数其他机构比较起来，是否效果更好，在缺乏详细研究的情况下还不清楚。从长远来看，新的“党—国家”的最后结果，是党战胜国家，还是党的死亡，这同样难以肯定。根据一种研究材料，几内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大都是“脱离”了国家职务的文职人员；在中级和地区一级，百分之二十的党的官员都是文职人员。这些人个人究竟首先把自己看作“党”的官员还是“国家”的官员，没有人知道。

尽管我们很难对“党—国家”作出评价，但似乎可以说，这个党已经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有效的组织机构的个人统治的工具。党获得成功的最明显的标志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党已经维持杜尔当权二十二年之久，尽管总有人多次试图推翻他。一位前美国驻几内亚大使，多少为他在哪里见到的情况所威吓，他把杜尔比作处在巨大蜘蛛网中心的一个蜘蛛，这个

蜘蛛网就是遍布全国的几内亚民主党,从这个中心,他可以牵动某根蛛丝而马上触到最遥远的村庄。这个蜘蛛网使杜尔一旦下达通知就可以调动群众欢迎来访的贵宾,以及动员拥护他的人起来保卫国家和他自己。但是,甚至在今天,党能否持久地把群众动员起来,以实现“发展”或经济“增长”,这一点就更不清楚。杜尔甚至拒绝那种把经济情况作为评价革命的一个标准的观点。相反,他强调团结、民族感、政治觉悟,甚至清洁等价值标准。从六十年代后期到1977年8月女商贩骚乱为止,杜尔充分表示他对经济的蔑视,他禁止国内市场体系发挥作用,以致于在首都科纳克里实际上什么也买不到。杜尔对经济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他经常重复的那句话,“几内亚必须按政治的需要建立经济,而不是要政治去适应经济。”^①在实践中,他两方面都没有做。政治和经济两者变得几乎互相脱离,驾驭政治以达到任何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企图都失败了。虽然几内亚拥有农业资源,最初还有数量可观的咖啡、香蕉、棕榈油和菠萝等出口作物,但几内亚现在几乎已经完全退回到了仅可维生的水平,为生产足够的口粮和达到少量的出口而奋斗。某些作物,如香蕉和咖啡,产量已经下降到独立前水平的四分之一或更少。独立以前几内亚还是非洲的主要香蕉出口国,根据少有的政府统计数字,人均食品生产指数从1964年的一百一十下降到1972年的八十六,尽管杜尔在政治上极力强调农村的重要性。他所有的计划,包括在村庄一级建立的生产大队和后来建立的国营农场,都没有能成功地

^① 几内亚《自由报》第2228期,1976年7月4—10日。

克服农业生产的危机。

因此，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完全依赖于它的大量铝矾土矿和由外国公司开采这些矿藏。几内亚的对内政策虽然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但它却毫不羞愧地求助于世界上巨大的多国公司，其中许多是美国的公司，来发展它的采矿业，并且往往以次要伙伴的身份同那些公司办合营企业。到七十年代早期，几内亚对这些企业的经营实际上没有控制权，并且在政府收入和外汇收入方面都所得甚少。在获得几内亚铝矾土矿公司和弗里亚公司这两大矿业合营公司百分之四十九的利息，并完全拥有另一家公司——金迪亚铝矾土公司以后，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几内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铝矾土出口国，每年出口量一千多万吨，但由于协定的条款对它不利，在1979年仅获得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收入。几内亚同西方财团达成的协议，恰恰证明了激进派所论述的关于国际资本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最悲惨的情况。然而，杜尔同苏联达成的关于金迪亚矿的协议也很难说是对它更有利。按理说，几内亚在铝矾土矿公司和弗里亚公司都有权取得全部利润的三分之二，但是由于帐目被窜改，使这两个公司都没有什么利润。而且几内亚政府对于出产的矿产只有百分之十的所有权。在金迪亚矿与苏联的合作，几内亚必须保证在三十年内，把这个矿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提供给苏联，1978年，其价格只有世界市场价格的百分之六十。

七十年代末，几内亚经济的前途越来越同它的矿产资源的开发联系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有三个铝矾土矿开采计划，一个投资八亿美元的大型铁矿计划，预计每年采矿一千五百

万吨,还有若干开采钻石和铀矿的企业(几内亚的铁矿储藏量已查明是极其丰富的,估计至少有六亿吨)。然而还没有迹象表明,杜尔已经认识这种依赖矿业的影响。他照样干下去,似乎这些出现在国内的巨大的矿业联合体,可以同经济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可以完全避免。他既没有努力运用矿产财富去发展工业,也没有想办法把所得的股息用于农业部门。工业仍然象十年前那样,仅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之四至五。至于农业,在1960年到1978年的三个发展计划中,投资的数量从占总投资的百分之十一减少到百分之五。看来有点奇怪,用于农业的资金之少和越来越依赖矿业,同样都是与杜尔的哲学相矛盾的。由于促进农村发展的种种计划都不断失败,几内亚正在全国建立二百个国营农场。

几内亚最近的种种趋向——党同国家合并,越来越依赖矿业,以及国营农场的建立——都表示一个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的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国家集权主义。然而,没有任何一位非洲领导人比杜尔更加努力强调政治挂帅以防止这种趋势。他确实建立了地方机构,使群众能够直接参加活动。但是,这并没有在经济领域造成任何重大变化。同坦桑尼亚的情形一样,如果让农民自行其事,他们不会热心于靠集体化发展经济,绝大部分会继续象以前那样耕种——只是有些不如过去,因为杜尔的反资本主义措施破坏了人们为市场生产的积极性。“政治挂帅”摧残了经济。杜尔尽管具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但他从来没有学会这一点,任何政治制度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生存,而且经济不能完全脱离政治。杜尔认为社会主义对他的人民来说是“必需的”,并完

全依靠政治来使之成为可能。几内亚的经济所得到的教训就是，这样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似乎更有可能通向灾难。

阿尔及利亚——“经济挂帅”

“在阿尔及利亚，中央计划的公共投资水平很高，而且正在迅速增长，这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1974年石油价格的急剧增长，1975年，计划中的公共投资陡然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六，在随后的三年，每年继续增长百分之三十六·五。作为这种变化的反映，在固定资本构成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从1974年的百分之四十三·一增为1977年的百分之四十八·一。”^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以上报告中所提供的技术语言和无情的数字，也许是对七十年代末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性质的最好说明。事实上，谈论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首先要谈的是它为实现经济增长和获得经济独立的战略，其次才谈得到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

要理解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必须、至少部分地以这个国家的财富作为背景来考虑。阿尔及利亚毫无疑问是不发达国家，但作为产油国，阿尔及利亚享有极高的收入，特别是自1974年以来，因而它能够将数十亿而不仅是数百万美元用于

^① 转引自《青年非洲》周刊第942期（1979年1月24日）。

投资。有一千七百万人口的阿尔及利亚，1978年的国内总产值为二百四十六亿美元，按人口平均收入为一千三百七十四美元。相比之下，人口数目差不多（一千六百万）的坦桑尼亚1977年的国内总产值只有三亿美元，按人口平均收入一百九十八美元。阿尔及利亚经济战略的中心，在于发展能推动次要工业发展的“促进工业化的工业”，即重工业。用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为自立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一基本概念很好地概括成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口号：“栽种石油，收获工业”。最终目的是使阿尔及利亚摆脱对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性。为此目的，领导当局不惜付出经济不平衡和冒险的巨大代价。为这种政策所付出的社会政治代价是很高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形成，技术官员权贵的出现，收入不平等和地区间不平衡的加剧，工业化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超过了农村地区。激进派一直指责阿尔及利亚由于无视其经济政策的政治意义而背离了社会主义。温和的批评者指责它为了实现独立性而不依赖工业化国家，无视其经济后果，有造成灾祸的危险。阿尔及利亚领导当局对这两方面其实都没有忽视，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这场宏伟的赌博中，做出了这样的抉择，从长远看，他们的战略将得到收获，因为可以为社会主义发展成功的典范创造基础。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原来并没有目前的国家集权的性质。这是在1965年6月政变之后才有的。1965年的政变结束了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的让群众参与管理和依靠自愿的方针。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时面临的混乱局势，比1958年几内亚以及后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所经历的混乱局

面还要严重。几个月之内，一百万法国移民纷纷离开了这个国家，留下几千个因缺乏合格的人员、也因直接的破坏而陷于瘫痪的农场和工厂。在这种混乱局面中，社会主义以自己管理的形式出现。最初，工人们自发地起来管理被抛弃的企业，为的是保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资料。虽然最初实行这种自己管理的方式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反映出对于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的概念。几个月之内，本·贝拉就抓住这个方式，把工人自我管理写进1963年3月法令，并且给了它以意识形态的根据。到这一年年底，五百万英亩最好的农场耕地和大约四百五十个工业企业就建立了工人管理的新制度。

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成为群众广泛参加的制度，更多的是由于客观需要，而不是出于主观的选择。参加企业管理的不仅仅是在本企业工作的工人，而且包括全体人民，他们在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号召下参加各种事业的自愿劳动，从识字运动到植树造林。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洲国家，大多数最初都是有广泛的群众性和自发性，由于组织和指导得不好，虽经长期努力，成就甚少。在阿尔及利亚，主要的问题就是党薄弱。民族解放阵线在独立之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重新组织自己，并重新规定自己的任务。民族解放阵线本是战争中各种不同集团组成的脆弱的联盟，在1962年之后不得不在纷争中对社会主义作出政治的抉择。各个集团竞相争夺领导地位，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不仅社会成分复杂，意识形态各异，而且在独立前后又大量吸收了认为赶紧入党有利可图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本·贝拉企图将民族解放阵线重新组织成执行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先锋队政党，但却没有成果，并终

于在1965年6月被军队推翻了。胡阿里·布迈丁上校取代本·贝拉担任总统。于是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在早期就形成了我们前面谈论过的其他国家的那种格式：由政府的法令、人民自发的努力和良好愿望所推动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由于自发方式失败，作为一种反作用，国家集权主义倾向隐蔽地发展起来，阿尔及利亚的六月政变就是这种倾向公开的先兆。

布迈丁并不掩饰他要改变其前任的社会主义方式，他把党摆在次要地位，而主要依靠国家权力来实现革命。在非洲，没有任何国家象布迈丁领导下的阿尔及利亚那样颂扬国家。在一开始他就宣布，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严格的、民主的国家，实行法制并以道德为基础的国家，有能力克服人祸天灾而生存的国家。”^①布迈丁上校把复兴由于1830年法国入侵而被毁灭了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国家”，作为他的政府的“首要目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国家来实现计划周密、完整一贯的社会主义政策，而政治上的广泛参与和群众的动员是很次要的。结果，在布迈丁统治下，党让位给国家，政治一般服从于经济。

布迈丁政权的经济政策是不难加以概括的，因为这些政策是长久一贯的：继续本·贝拉当权时开始实行的将所有重要的外国产业国有化；依靠在工业部门建立的三百六十多个准国营公司，逐步放弃工人自我管理的体制；重视工业化，特别是发展石油、天然气、钢铁和石油化工工业；但在1976年以前却极少注意农业问题。国家发展计划的结构清楚地表明了

^① 1965年6月19日的宣言。

这样的安排。在三年发展规划中(1967—1969),工业投资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基本建设的投资占百分之十点一,对农业的投资仅占百分之十六点九。第一个和第二个四年计划(1970—1973和1974—1977)投资的格局和这差不多。同样有意义的是对工业部门内部投资的分配。在第一个四年计划中,石油和天然气获得工业总投资的将近百分之三十七,这是最大的份额。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部门是决定其他方面发展的关键。更能说明问题的的事实是,其他重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一共占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十,只剩下约百分之二十一给消费品工业。第二个四年发展规划中各工业部门的投资比例基本相同,虽然总投资额等于过去的四倍,达到二百七十亿美元。

发展“促进工业化的工业”这种政策的效果是两个方面兼而有之。积极方面,阿尔及利亚经济获得了明显的真正的增长率,据估计1976年为百分之十点四,1977年为百分之七点八,1978年为百分之九。最后的增长率可望保持到八十年代初。消极方面,阿尔及利亚大多数新工厂的生产低于生产能力,主要原因有三种:技术上和管理上有问题;国内需求水平低,未能打入欧洲市场;计划制定人原来指望在国内市场需求增长之前,多余的产品能进入欧洲市场。结果,许多工厂一直亏损,基本上靠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来补贴。阿尔及利亚官员对这问题采取的反应是,承认这些问题是实行这个战略的不可避免的和暂时的阶段,这个战略终归将使国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政府拒绝接受对工业化政策的批评和不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建议,认为这是西方使第三世界国家永远处于依赖状

态这种意图的组成部分。从布迈丁本人的声明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工业化政策的基本目标不仅仅表现于创造更多的职业。它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还包括通过发展我们民族的生产力来促进我国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内部积累过程，这对于我们进入技术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布迈丁还从同样的角度说明国有化的意义：“国有化本身是走向发展的一个步骤。它迫使我们正视现实，正视复杂的工业经营的责任，并使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管理经验。”^②

从这一观点出发，新建的许多工业生产一直亏损这一事实，看起来确实成了次要的问题，阿尔及利亚政府推行的工业化政策是有正当理由的。

但忽视农业部门却使人难以理解，更难以认为合理。因为这已经使得阿尔及利亚需要的主要食品大约半数依赖进口。农业势必成为一个困难的部门。与人口的数量相比，可耕地是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没有灌溉的条件，因而容易受到降雨量变化无常的损害。由于人口以每年百分之三点二的比例迅速增长，问题就更加严重。所有这些似乎都说明对农业理应给予特殊的注意，而不应该忽视。官方的解释是，农业的重大发展只有通过机械化和大量使用化肥才能实现。因此，工业的增长是农村发展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不论是农村的人民还是整个国家都为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1973年—

^① 布迈丁1977年3月31日对国民议会的讲话，引自《亚非》双周刊第178期（1979年1月8日）。

^② 布迈丁1974年4月10日在联合国关于原料问题的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1977年，仅小麦一项，阿尔及利亚每年就进口一百万吨以上。在这期间，平均每年用七亿美元进口粮食。农业的就业人数仅增长百分之一，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率。相比之下，城市地区新就业机会每年增长百分之九。

无论阿尔及利亚官方如何解释，农业发展的停滞多少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在1971年《土地革命宪章》颁布以前，对农村战略甚至没有进行过公开讨论。《宪章》导致了一场温和的土地改革，以及最缓和的、通过组织“社会主义村庄”推动集体化的企图。国有土地以及没收的在外地主的土地和过大的庄园，都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家庭。对于其他的和有土地的面积按土地的质量、灌溉条件和所处位置规定了最高限额。到1978年底，在土地改革中创立的“国家土地基金会”获得四百六十万英亩的土地，并把其中的三百一十万英亩分给了十万多需要土地的农民。已经登记的各种合作社约六千五百个。然而，组成“社会主义村庄”的工作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实际建立起来的不足二百个，而且都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退出。国家的干涉和控制，产生了“一大批农村官僚”，他们除了分配土地以外，还试图管理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村庄。对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改革作出最后的判断，目前虽然还为时过早，但是似乎已经很清楚，土地改革并不意味与全面的国家集权的发展方针决裂，而是把这种方针扩大到农业部门。“土地革命”是由中央政府布置的，在官僚机构控制下实行的。不仅如此，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同时把投资从工业部门转向农业部门。事实上，在进行土地改革的第二个四年计划期间，农业投资所占的份额并没有增加。

整整十年中，布迈丁政权全力从事发展经济，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及行政改革。群众的参与政治，表现为建立新的国家机构——村或镇、地区以及全国一级的人民议会——和偶尔进行的关于重要政府政策文件的讨论。党处于从属地位，这也许可以从以下事例得到最好的说明，一是拖延到1976年才制订出意识形态纲领；二是在1978年12月布迈丁去世之前没有召开过一次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大会。在布迈丁时期，群众参与政治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名为“国家宪章”的官方意识形态文件。然而这场讨论并没有导致对《宪章》作有意义的改动，《宪章》实际上等于批准政府自从1965年以来实行的政策。《宪章》坦率承认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存在许多问题，但又为此进行辩护，说成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宪章》拒绝接受“任何僵硬的教条”，其含意是指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个宪章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概念，比较起来，接近于苏联的模式，而不近似于早期非洲社会主义模式，强调有必要实行“以科学为根据、以民主方式制定和作为指令加以实施的计划为基础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宪章》的中心思想就是，阿尔及利亚只有达到完全控制本国的资源，不依赖外国开发资源或提供技术，并且有了无须外援而能自力更生的、坚实的工业基础的时候，民族解放的过程才算完成。因而，经济发展就成了独立的同义语，而工业化又成了发展的同义语。《宪章》承认，高速度的、中央计划的经济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官僚主义的生长。《宪章》虽然对这种倾向有所指责，但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防止官僚主义现象最有效的方法是让公众参加，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国家机构和管

理机构本身改进的趋向。“但是丝毫没有迹象表明阿尔及利亚国家官僚机构有任何这样的趋向，布迈丁政权也没有作什么努力让公众参加进来。

直到1978年下半年布迈丁去世的时候为止，阿尔及利亚好象是被它所选择的一套互相强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束缚住了，由于十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纠正。这位上校的去世和软弱得多的沙德利当选为总统，为阿尔及利亚提供了机会，重新慎重考虑发展的优先顺序，分析国家工业战略的后果。在巨大的社会主义部门中“缺乏横向和纵向的结合”，大量的工业投资“缺乏协调”，对于这些现象出现了感到不安的迹象，对于大量外债（1978年为一百二十三亿美元）“威胁民族经济独立的意志”的议论也开始出现。有些报道表明，新政府打算更加注意农业的可悲状况，以及某些长期被忽视的公众需要，其中最紧要的是城市住宅问题。还有报道说，一些宏大的工业项目将被压缩，有的将被取消。这些报道要等到第三个四年计划公布以后才能得到证实。这个计划的公布已经推迟了。看起来可能会有某些改变，疯狂的投资速度很可能会放慢，以便有机会进行整顿巩固，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马上会改变政策。例如，官方的《非洲革命》周刊在整个1979年几乎没有提到过农业。它确实发表了大量关于城市住房问题的文章，但却表示，政府打算按解决其他问题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制订全国每年兴建十万套住房的大规模计划，建立专门生产预制件等建筑材料的工业部门。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似乎已经被永久刻在这个国家的面孔上。可能要有一场革命才能摧毁在布

迈丁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国家集权制度，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

到1980年为止，我们以上作了简略分析的四个国家，用大体上十三年到二十二年的时间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这种努力在非洲大陆特定条件下产生什么后果，提供了有意义的教训。所有这四个国家都是沿着它们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背离了它们最初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有时还从根本上破坏了它们打算实现的目标。我们前面谈论过的已经出现的几种类型，都在这个或那个方面“歪曲”了非洲社会主义关于群众参与、平等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理想。杜尔也许制止了资本主义，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党，但他对经济的极端忽视却疏远了一大部分人，并使几内亚终于成为在跨国公司掌握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尼雷尔使他的社会变得比较平等化，也稍许比较集体化，但这个过程实际成为对他们自力更生原则的讽刺。在卡翁达的领导下，赞比亚发展成为一个既不平等，又没有群众参加，而且也不是自力更生的社会。最后，布迈丁的阿尔及利亚中途背弃了群众自我管理和群众参与的做法，忽视农村，容许官僚和专家官员权贵的生长，从而牺牲了平等主义的原则，但是，它的确通过迅速的工业化为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这四个国家，对当初社会主义概念最明显的歪曲或许就是向国家集权的转变了。当初对于建立一种有广泛群

众参与的民主制度的向往，体现在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几内亚的地方革命政权、赞比亚的村庄合作社以及阿尔及利亚的群众自我管理这一类的机构和制度中。但是在对这条革命道路和这些机构、制度进行了几年试验之后，所有这四个国家都由于缺乏热情、管理不善或完全失败而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并转而求助于国家。这种转向国家集权的倾向的出现，每个国家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但是集中表现了向往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某些难题，因而值得人们思考。

在阿尔及利亚，国家集权是有意识的选择：庞大的官僚阶级的生长和缺乏群众参与政治，都是由于把迅速实现工业化作为克服经济依赖性的手段而摆在优先地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才造成了中央集权的计划，技术官员权贵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逐渐增长。激进分子一直对阿尔及利亚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它的国家集权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这种批评来源于对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激进观点，认为这个制度——事实上认为只有这个制度——能够同时既制止社会阶级的产生，从而克服收入的不平等，能够保证高度的群众参与政治，又能使发展中国家克服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向人们显示，这些目标可能是彼此不相容的。考虑到那些注重阻止阶级形成的国家，如坦桑尼亚，和注意扶植群众参与政治的国家，如几内亚，实际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它们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依赖，这个结论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早期的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哪一个能够成功地做到，一方面为独立的经济建立坚实的基础，同时又促进平等和群众参与政治。这显示出，

前者需要的条件同后者是相冲突的。如果不是在理论上，那末，至少在实践中是如此。在理论上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可以在发展工业基础的同时，缩小城乡差别；可以在建立强大政党的同时，改善国家制定计划和行政管理的能力；可以为发展经济的需要训练技术官员和官僚，同时制止权贵阶层的产生。在实践中，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在财力和人力资源奇缺的、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是极难做到的。阿尔及利亚不一定是背叛了社会主义，而只是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中仅仅抓住了矛盾的一方。

国家集权在其他三个国家的出现，并不是有意选择的结果，因而不能作同样的解释。赞比亚是一个铜矿占统治地位、面向城市的国家，因而具有中央集权的性质，人道主义和这些条件之间完全不相“适合”，国家集权的出现同这些因素有关。坦桑尼亚和几内亚的情况更为有趣，因为它们的情况对激进分子通常关于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假设提出了挑战，这个假设就是，群众的政治参与会自动地保证实现广泛的社会变革。然而在这两个国家，国家集权的出现，都是群众参与的方案未能促进持久的变革的直接后果。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和几内亚的地方革命政权，目的都是要把权力交给人民，让他们担负起农村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责任。但是，由他们自己负责的结果，农民没有发挥主动性，最后还是由国家插手来填补这个真空。问题还在于农民为什么没有被动员起来发挥主动性。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的农民社会，内在的社会冲突程度很低。这些社会当然不是早期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典型。但这些社会也还没有明显

的阶级区分。这里不存在实行剥削的地主和急于打破奴役枷锁的被剥削的佃农，充其量只有少数富农。因而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并没有任何引起革命变革的因素。另一方面，杜尔和尼雷尔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有意识地取消或限制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刺激变革的因素，即个人获利和致富的可能性。杜尔实际上取缔了自由市场，尼雷尔多年来把生产者出售产品的价格压得很低，他们两人实行的政策都是限制富农和有利于合作社和公有农业的。既没有阶级冲突，又没有个人获利的可能性来推动农民，那么在农村就不存在刺激群众参与活动、变革和发展的天然的能动因素。给社会带来动力这一任务就落在这两个国家的群众政党身上，而这些政党同它们所联系的社会一样患乏力症。这样一来，就只有靠国家了。

早期非洲社会主义的经验说明了在这个大陆从事于社会主义，有一系列非常关键的问题，影响其努力的结果，这就是：由于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同国内现存条件之间缺乏一致性而产生的畸形现象；由于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而造成的弱点；由于不可能同时实现全部目标所造成的困难；以及在社会中没有任何内在的，或者人为的动力，因而难以保持群众的积极性。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不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缺陷，譬如：资金、人员和管理经验奇缺，强烈的追求特权的倾向，因为在这种地方，任何一个具有中学毕业证书，或者甚至任何具有固定工资收入的人，都被认为属于少数特权者的范围。所有这些问题都势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非洲国家。还有待于检验的问题是，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更正统的方针是否会导致实质上不同的结果。

第四章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在 1975 年才取得独立，但很快就成为南部非洲第一个“人民共和国”。这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因而时至今日莫桑比克的社会主义面目仍然模糊不清。对于独立时从这国家慌忙外逃的十五万葡萄牙人来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①是死心塌地的共产党，决心要对一切都实行国有化。据某些难民说，国有化甚至包括孩子在内，这些做法使得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都难以忍受那里的生活。对于某些表示赞美的外国人来说，莫桑比克则是个难得的榜样，一个国家通过没有压迫的、均等的、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以乡村为基础的制度，竟然成功地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了起来。莫桑比克自己也一直忙于表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它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并在保加利亚和东德农艺师的帮助下，建起了巨大的国营农场。很明显，莫桑比克目前有着许多重大的矛盾。某些趋势已初露端倪。如果考虑到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片赤诚和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① 1977 年莫解阵召开三大，宣布将名称改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简称“莫解阵党”）。著者在本书中没有考虑这一事实，对该党无论在 1977 年以前或以后一律简称为“莫解阵”。——译注

这些趋势的出现是不难理解的。既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党内关于如何把马列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的观点又在变化，加上极为困难的具体情况要求采取实用主义，这一切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形态。尽管莫桑比克在意识形态方面坚持正统观念，但它不是，也不大可能变成苏联的翻版。尽管同样有某些具体问题和种种困难，莫桑比克和我们所描述过的任何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迥然不同。莫桑比克不是非洲社会主义的一个例子，而是我们称之为非洲共产主义的一种新现象。

战争的遗产

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战争正式开始是在1964年，那时由三个民族主义小团体组成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成立才两年。从一开始，独立斗争的进行就受到了地理因素的重大影响，而地理因素反过来又对政治发生了反作用。莫桑比克濒临印度洋，绵延一千多英里，是一个地形狭长的国家，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与白人控制的南非和罗得西亚接壤。战争只能从北部开始，在那里，游击队比较容易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渗透进来。此外，葡萄牙人在北部地区的地位也最薄弱，因为白人移民集中于南部，特别是首都洛伦宗马贵斯（现为马普托）和周围的地区以及土地肥沃的赞比西河谷和林波波河谷。北部省份只有稀疏的葡萄牙人定居点，行政管理也薄弱，道路等基础设施很差。事实上，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结成一体。其结果是，北部的战事进展很快，但其影响受到

遏制。武装斗争开始四年后，北部的尼亚萨和德尔加杜角省大部分成了“解放区”，莫解阵建立了自己的行政体系，甚至在那里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直到战争结束，莫解阵在继续向南渗透或进入城市方面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困难。

北部省份很早就获得解放，这对于莫解阵有着深远的影响，迫使它在斗争的初期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除了独立之外，什么是最终目标。同所有非洲解放运动一样，莫解阵一开始也是一个与其名称相符的阵线，由各种政治方向不相同的、庞杂的团体聚集而成，唯一的共同目标就是争取独立。莫解阵最初的领导人在种族、文化水平和政治方向等方面差别很大。文化程度较高的往往是所谓“混血人”、果阿裔莫桑比克人和所谓“同化人”。在莫桑比克人中，他们属于曾在国外学习或居住过的、见识较广、读书较多并接触过各种不同思想的人。莫解阵的第一任主席爱德华多·蒙德拉纳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同化人”，他在受命领导莫解阵之前曾在美国纽约州的西勒丘斯大学执教。其他领导人是在葡萄牙和法国受教育的“混血人”和果阿裔莫桑比克人，其中最有名的是马斯利诺·多斯桑托斯、塞尔吉奥·维埃拉、若热·雷贝洛和奥斯卡·蒙特罗。多斯桑托斯很快就成了阵线的第二把手并一直保持着这个地位。这四个人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影响莫解阵方面发挥的作用可能最大，虽然萨莫拉·马谢尔和游击队最高指挥官中的其他黑人是根据自己在国内的经历而得出同样的意识形态信念的。不管这两部分人之间有过什么相互作用，当如何组织解放区这一问题在1968年第一次出现时，莫解阵还不是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运动。根据莫解阵文件的

正式说法，当时在阵线内部存在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派别，企图由莫桑比克新贵来填补葡萄牙官员和商人撤离所造成的真空，从而为非洲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开辟道路。莫解阵内部多数人反对这一方针。在1969年4月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被彻底击败。从此以后，阵线既为独立、也为社会主义而战斗。

莫解阵最初的社会主义概念一方面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解放区非常特殊的情况所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阵线已经非常接近于明确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得不加以修改过的，以适应这些地区的现实，即没有工业，没有城市，具有政治觉悟的人很少，事实上除了勉强糊口的农民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阵线在战争期间的主要意识形态文件是激进派获胜后写成的，并于1971年初以《莫桑比克人民民主革命的进程》为题第一次公开发表。在这一文件中，战争第一次被看作革命，而革命又被看作必然由团结时期和冲突或“批评”时期互相交替出现的辩证过程。这一文件宣称，阵线已经经历了两次批评时期。第一次是决定是否为争取独立而发动武装斗争。第二次批评时期对后来莫解阵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时处理的是一些十分重要的、长远的问题：“应该如何组织生产，应该如何管理全体人民，解放区应该有哪一类型的生产关系，人民和莫解阵的领导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十分紧迫的问题，必须立即、明确和具体地加以解决。”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莫解阵有意识地决定建立一整套新

的社会经济制度。它不去模仿葡萄牙人的制度，仅仅用莫桑比克新贵代替殖民者。它也不会象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在理论上试图去做的那样，恢复殖民地化以前那样的社会。传统主义，同新殖民主义一样，被断然拒绝。传统被看成是封建主义、老人统治、男子支配、而且并非全体公民都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同义语，而不是象卡翁达和尼雷尔所宣扬的那样，以合作、互助和集体观念为特征的社会。正如莫解阵所说的：“解放区这一名称的真正意义，就是从殖民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和封建传统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区。换句话说，在行政管理上，权力既不是由殖民行政官员行使，也不是根据传统习惯来行使。”

为了建立一个消除殖民主义和传统束缚的新社会，莫解阵主张建立“人民政权的结构”，即解放区在村和村以上各级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为基础建立农村民主制度。这势必要发展以公共生产为主的新经济。教育方面，要向所有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向每一个人灌输先进的、科学的目标，以及集体主义的思想，使革命进程向前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莫解阵的政治路线要求医疗卫生为群众服务”，以普遍预防措施为主。当然，在莫解阵的声明当中，肯定有许多超过其实际成就的革命言辞。但是仅有言辞是不够的，因为莫解阵的确面临着大量“紧迫的问题，必须立即、明确和具体地加以解决”。莫解阵要进行战争，同时还要在解放区进行行政管理，要生产足够的粮食，要为伤员提供医疗，要建立小型车间以支持不断扩大的游击武装。莫解阵以鲜明的社会主义方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建立公社村和合作社，鼓励人

民广泛参加政治活动。但是由于所有这些任务都要在战时条件下以权力不集中即非常分散的方式在小村社中实行，最后的结果是一种与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相似的农村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尽管莫解阵关于意识形态的文件已经表现出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并明确拒绝作为乌贾玛的基础的非洲村社主义思想，莫解阵在乡村中采取的实际步骤倒象是出自尼雷尔的建议。

撰写战时解放区的详细历史还有待于将来进行，现有的记述不是出自莫解阵自己的手笔，就是战争期间访问者的报道，而这些人抱着同情的偏见的。对莫解阵当时的成就究竟有多大虽然仍有疑问，但其努力的基本方向是无可怀疑的。莫解阵没有企图自上而下地管理解放区，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人。这样做有多少是出于信念，又有多少是因为人力不足，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看来莫解阵当时的确鼓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一般是靠说服而不是靠强迫来促进集体事业。几乎不可能有别的作法。1968年，当组织解放区的任务第一次出现时，据莫解阵自己承认，它只有八千名干部，莫解阵要靠这些人保卫和组织已经占领的地区，并向南方，在太特省和莫桑比克省开辟新的战线。当时解放区占整个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可能有八十万。莫解阵不可避免地主要依靠农民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倾向于采取某种直接民主的形式。

战争期间建立的关键性的机构是公社村，原先它是莫桑比克社会主义的象征，后来却成了莫解阵内部不公开争论的焦点。根据战争期间原来的概念，公社村与坦桑尼亚的乌贾

玛村很相象。事实上有报道说，莫解阵的第一任主席爱德华多·蒙德拉纳曾宣布，莫桑比克独立之后将与坦桑尼亚相类似。政治上，公社村由村民选举的代表管理；经济上，这些村子把个体耕作和集体耕作结合起来，开始在小块的公有土地上实行，随后逐步扩大，最后成为主要的经济单位。战争期间，游击队员自己也需要粮食，他们参加了公有土地的耕种，这一因素有助于扩大公有地。不过，公共耕种的规模恐怕是被夸大了的，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在解放区内公共耕种已经成为主要的耕作制度，已经超出了每个村子有一块公共田地的程度。但是粮食的产量看来是足够的，而且还有剩余，从北部省份出口。妇女们把包裹顶在头上，夜里通过林间小路徒步把花生、腰果和芝麻运到坦桑尼亚。莫解阵还力图在它控制的村子里建立某些社会服务设施。凡是可以做到的地方都建立了学校。到1968年，莫解阵宣称，在德尔加杜角省建立了一百所学校，共有一万二千名学生。当然莫解阵承认，那里进行的教学是最起码的，由于缺少铅笔和书本，老师往往教学生用木薯根在本板上学写字母。到1970年，解放区内共有三万多学生在学校学习。还实行了某些医疗卫生措施，特别是预防接种。从绝对规模来说，这些服务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对那些被葡萄牙人严重忽视的地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战争期间莫解阵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保持了领导层内部的团结。这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只是在后来看到莫桑比克避免了安哥拉取得独立时宗派主义和权力之争造成分裂的那种局面，才为人们所认识。莫解阵通过组织制度这个渠道成功地解决了两次重大的内部危机。清除以乌里阿·西曼戈和拉

扎罗·卡万达为首的“资产阶级”派别，是在中央委员会召开一系列长时间的会议之后决定的。蒙德拉纳主席1969年2月被一个大概是葡萄牙秘密警察投寄的包裹炸弹炸死，对他的职位的接替也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顺利解决的，没有引起重大分裂。1970年5月，莫解阵游击武装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当选为主席，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被选为副主席，他们继续保持最高职位直到独立之后。马谢尔当选为主席还有助于避免了不利于许多其他解放运动的问题，即军事领导人和文职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莫解阵认为，“鉴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严格的军事部门和严格的政治部门之间的明确区分。”莫解阵的战士既是游击队员，又是党员。一份党的文件解释说，“在我们中间没有‘政治家’和‘军人’，没有‘政治家’和‘技术人员’”。两者之间很少或者没有区分，同其他非洲解放运动比较起来可能更突出。

莫解阵的战争遗产中也有巨大的弱点。尽管它在解放区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这些地区只占整个国土面积的一小部分。在其他地区，它的根基很浅。原先的计划是逐步扩大游击队控制的地区，直到遍及全国，但是这并没有实现。1968年在太特省开辟了第三条战线，但是这一地区从未全部解放，当地建筑巨大的卡布拉巴萨水力发电站大坝的工程没有中断，一直进行到战争结束。在国家的南半部和城市里，莫解阵几乎不存在。当然，作为反对葡萄牙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到处都有同情者，但没有真正的组织。大多数莫桑比克人是否知道莫解阵把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看作一回事，也是值得怀疑的。

独立时的状况

独立可以说是在莫解阵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就到来了。原来设想的逐步扩大解放区直到牢固控制全国人民并确立坚强政治机构的缓慢进程，由于葡萄牙国内政治事件的发生，突然变成了急转直下实现独立的局面。1974年4月，葡萄牙的卡埃塔诺政权被武装部队集团所推翻。1974年9月，莫桑比克建立了过渡的临时政府。1975年6月，莫解阵执掌了全国政权。初期的问题是尖锐的。最明显的问题是葡萄牙人纷纷离开，莫解阵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劝阻。独立以前在莫桑比克的十七万葡萄牙人只有二万到三万人留下。从长远看，对于决心实现激烈变革的国家来说，他们的出走可能是好事。从短期看，这引起了严重的混乱和各部门的生产急剧下降。由于葡萄牙人以前占据了几乎所有经营管理和技术的岗位，他们的外逃留下了巨大的真空。此外，必然还有故意的破坏和无法控制的机器、车辆外流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经济从1974年开始下降，并持续了好几年。尽管精确的统计数字极少，但有足够的材料表明那种普遍混乱的程度。例如，七十年代初期，工业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到1975年，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本身下降了，工业的比重仍下降到百分之十，而且还在持续下降。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从1973年的十二万人下降到1976年的七万三千人。由于葡萄牙人的农场和种植园大多数被抛弃，现代化农业的生产也同样受到严重影响。这类农场约有三千

到四千个，占有四百万英亩土地，其中种植面积约八十万英亩。葡萄牙人耕种的土地约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十，提供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城市食品和出口作物。此外，由于外逃的葡萄牙人破坏或带走了二万五千辆汽车，运输陷于停顿，结果，农产品的出口急剧下降。重要出口作物之一的腰果也受到影响，这主要由于销售系统瓦解，而不是由于生产下降，因为腰果树是野生的。收集腰果的中间环节以前一直是在农村开商店的葡萄牙人，他们向农民收购腰果，通常是用提高价格的消费品和农民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小店主跑了，腰果无人收购，腰果出口从最高年份1973年的十八万五千吨下降为1976年的七万五千吨左右。棉花按价值计算原是最重要的出口作物，下降幅度更大，从1973年的四万三千吨下降到1976年的一万三千吨，1977年又下降到三千八百吨。莫桑比克的出口总值从1974年的二亿美元下降到1977年的一亿五千万美元。

在恢复经济方面，莫解阵可以利用的条件不多。各种分析研究大都认为，莫桑比克长远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可观的，但它并没有能够迅速积累发展资金的容易开发的资源。土地和水源是丰富的，但农业绝大部分仍处于勉强糊口的水平。葡萄牙人并没有发展特别大型的现代农业，而是依靠强迫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来支持他们的出口。特别是棉花就是这样种植的。结果，葡萄牙人留下的开发好的土地极少，留下的现代农业技术知识就更少。莫桑比克的矿产资源也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发。莫桑比克开采并出口煤炭，但是葡萄牙人并没有利用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莫桑比克的主要有利条件，即“铁矿石、

高质炼焦煤和铝矾土等工业基本矿产的蕴藏地区附近就有天然气田、广袤的森林、廉价的电力（卡布拉巴萨）、铁路起点（莫阿蒂泽）、可通航的河流（赞比西河）和东非最好的深水港（纳卡拉）”。这一中部地区成为“非洲的鲁尔区”的潜力，在短期内并不能帮助一个没有资金进行开发的国家。

刚独立之后的一段时期，政治问题也很严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除了北部省份之外，莫解阵在所有其他地区基础都不牢固，在城市中力量更是特别薄弱，而主要问题恰恰出在城市。正是在城市里，莫桑比克人最有机会接替外逃的葡萄牙人的位置，因此，最初这里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可能最强大。此外，葡萄牙人在独立就要到来的时候，特别是在过渡阶段所推行的政策，提高了城市工人的期望，这颇有导致对莫解阵不满或反对莫解阵的危险。过渡政府对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曾作出让步，命令给月薪在二百美元以下的人普遍加薪二十美元，并对劳资纠纷实行强制仲裁。经过仲裁的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百。莫解阵的一份文件认为，这种与公司生产水平无关的“蛊惑人心的加薪”，是想在工人中制造混乱的一种手腕，并得出结论说，“不守纪律、自由主义和贪污腐化的现象，造成了工人阶级的不团结，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的下降，追其根源是殖民统治崩溃时期资产阶级所采用的一种战略手段”。^①

因此，生产和政治组织是莫桑比克在取得独立时面临的两个最为紧迫的问题。开始时，莫解阵象过去在解放区所做

^① 引自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报告。

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动员群众来解决这两个问题。某些观察家正是根据这一初期阶段的情况得出结论，说莫解阵基本上是非洲“民粹党人”，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莫解阵在这一阶段运用的主要组织机构是“促进小组”。这些小组最初是1974年过渡时期由莫解阵的同情者（不一定是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莫解阵利用它们来组织某一居民区或企业的群众。促进小组的成员不是由莫解阵而是由参加活动的人自己挑选的。党的干部参加活动的程度也很有限，只是在开头给以鼓励，以推进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活动，并保证这些小组是亲莫解阵的而不是反莫解阵的组织。在开始时，莫解阵并不总能达到这个目的，有些小组事实上成了秘密的反对派的中心。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小组起到了联系党和人民的作用，并完成了一系列的实际工作任务，从建立城市消费合作社到组织公社村。促进小组的活动并不是国家实行变革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而只是对于问题成堆急需解决这种状况的反应。

在经济领域，莫解阵在刚独立之后所作的努力，首先也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最紧要的问题是恢复生产，重新组织运输，商店重新营业。当时所采取的办法也各不相同。被抛弃的农场合并成国营农场，规模往往很大。在农民耕种地区，莫解阵继续鼓励农民组成公社村。总的说来，那些葡萄牙人开办的工厂，如果厂主没有逃走，一般都没有接管，因为仅接管那些被抛弃的工厂，政府就已经忙得难以应付了。很难精确地表述莫解阵这一阶段经济政策的特征，它既不鼓励私人企业，但也没有企图摧毁仅存的私人企业。社会主义部门内容繁杂，包括国营企业，国营农场，合作社，公社村。总之，普

遍的都是权宜之计。

回顾莫桑比克独立之后最初几年的情况，印象深刻的是它与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独立初期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在那两个国家，独立也曾引起白人殖民者大批出走，结果使社会和经济陷于严重混乱。在那里新政权也是组织得不够好，不能控制全局，系统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采取的解决办法全都是实行非中央集权的极度分散的办法，努力通过动员群众和发挥群众热情来解决依靠系统的组织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可以肯定，原则在莫解阵制订方针的过程中起初也起过一定的作用。选择社会主义是明确的，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不是保存原有的制度，仅仅用莫桑比克人代替葡萄牙人，这一意向也是明确的。但是，当时采取的许多具体的解决办法都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在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有过这种我们称之为“自愿社会主义”的时期，后来引起了失望和混乱，在阿尔及利亚终于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在莫桑比克并没有真正的混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莫解阵是团结的，而且没有严重的反对派。但是就是在莫桑比克，莫解阵内部也很快出现了一批人，他们认为自发参加的方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决心要使莫桑比克的社会主义更接近于科学的形态，即便不那么民主。在莫桑比克，社会主义的含义发生变化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于莫解阵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当时，在高度显示全党一致和革命热情高涨的气氛下，莫解阵宣布自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阐述意识形态和各项政策的各种文件。

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莫解阵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977 年 2 月在马普托举行，当时莫桑比克在经历了独立初期的混乱之后，开始趋于稳定。在开会之前用了很大力气使人民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概念，解释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对莫桑比克有什么意义。大会的准备工作无疑表明莫解阵对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是认真的。大会之前广为散发进行讨论的一套七点“纲要”，长处是清晰、简明，这和其他非洲国家，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意识形态文件比较起来特别明显。这些纲要，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党纲党章以及大会通过的《经济和社会指导方针》等文件最清楚地表明莫桑比克是如何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下面的论述就是以这些文件为依据的。

莫解阵以大量篇幅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由少数象牙之塔中的知识分子人为地灌输到莫桑比克的外国意识形态，而是在火热的长期斗争中对莫桑比克面临的具体问题作出的回答。按正式宣布的提法，党的意识形态是“莫桑比克人民的革命经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则”的结合。根据马谢尔主席的解释，这就是说，“我们运动的革命思想是在每一场必须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每一次必须作出的抉择中形成的。”马谢尔对那些害怕离开教条、使马列主义的含义与莫桑比克的特殊条件相适应的莫桑比克人曾多次表示强烈的批评态度。尽管莫解阵强调灵活性以至创造性，但仍坚持认为它的意识形态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非洲社会主义的变种。

“我们需要经常对‘特殊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偏向保持警惕。我们拒绝那种认为有所谓‘非洲社会主义’或‘莫桑比克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清醒地断言，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还有别的社会主义。”^①

既坚持创造性又坚持正统性，既坚持必须阐明一种能反映莫桑比克实际的意识形态，又要防止“沙文主义偏向”，这种作法会引起十分紧张的局面，因为两者并不象党纲和萨莫拉的声明所说的那样容易调和起来。莫解阵的战时传统曾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而要恪守普遍原则，那就是说，正确的政治抉择必然是事先作出的，而不是有意识地按实际情况演变的结果。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莫解阵也毫不怀疑地遵从这一点。可是，在莫桑比克人口当中，无产阶级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莫解阵的根基，从历史上看，也是扎在农村而不在城市。

在莫解阵看来，社会主义革命不会立刻就在莫桑比克爆发，而要先经过两个阶段，“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和“人民民主革命”阶段。第一个阶段随着独立的实现已经完成，莫解阵目前正进行人民民主革命，致力于“加强阶级斗争”，创造“新人”和发展国家控制的经济。阶级斗争的思想在大会的文件中占有中心的地位，也是文件中最引起争论的概念。这一概念更多的是从纯粹的理论，而不是从对社会的分析或对莫解阵经验的总结中得出来的。在莫桑比克，很有意义地应用阶级分析法所遇到的这种困难，在莫解阵文件中已有所反映。文件

① 引自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三届四中全会常设政治委员会报告。

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各种定义是含糊不清的。代表大会之前散发的七点“纲要”中的一条所描述的阶级斗争，不是反对一个定义明确的、大多数莫桑比克人很容易识别其为敌人的、已经存在的“阶级”，而是努力防止新的剥削阶层的产生。当时列举了三类剥削分子，给以特别的注意。第一类是殖民者资产阶级，这是终归要对战争负责任的前葡萄牙政权的主要支柱。随着独立时葡萄牙人的外逃，这一类资产阶级基本已不复存在。第二类是野心勃勃的民族小资产阶级，或者“某些个人，这批人尽管财产不多，但拼命企图取代殖民资产阶级，占据他们留下的真空。”这一阶层被认为是战争期间在解放区已被击败、但仍然是潜在的威胁。第三类是一批颇为可怜的阶级敌人，是由那些“出身是人民，但却已腐化，背叛了人民的人”组成的，例如战时与殖民当局勾结的人，以及“所有破坏法纪分子、职业罪犯、小偷、杀人犯、吸毒犯、妓女、赌徒等等”。莫解阵承认，所有这些阶级敌人都是孱弱的，但马谢尔警告说，尽管如此，仍然必须严密注视他们，因为这些人会成为与外部敌人“联系的环节”。他宣称：“我们必须经常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并考虑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办法。”因此，阶级斗争有两个方面，对外与帝国主义斗争，对内防止剥削阶层的形成。

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受到过分的强调，还有第二个原因，即阶级斗争被看作是不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使之终于能够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整个过程的关键。莫解阵接受了工人阶级必然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这一观点，在这方面，它完全是正统的。但是莫解阵也透彻地认识到，在莫桑比克，工人阶级还不能进行领导，因为他们人数很少，政治觉悟不高。阶

级斗争被看作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办法。莫解阵宣称，通过阶级斗争，“将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

莫解阵也知道，在一个主要以农村和农民为基础的社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念必须提出合理的说明。它提出的论据是煞费苦心的。“纲要”第四点宣称，工人必须成为领导阶级，因为他们本身具有“集体”意识。在莫解阵看来，这是由于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特别是由于他们懂得只有集体行动才能使工厂运转起来。而农民本质上和这不同：“农民阶级，从其人数和创造的财富来说，根本上属于劳动阶级。它也要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事实的真相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农民阶级必须向工人阶级学习集体精神、组织观念和财产集体所有的精神。”

这种认为农民充其量只是革命的学徒的观点，同莫桑比克当代的历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战争期间向莫解阵提供主要支持的是农民，事实证明城市无产阶级同斗争无关。在我们看来，要把莫解阵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上的结论同莫桑比克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在杂志、报刊、教科书和墙报上到处出现的代表阶级敌人的漫画人物希科尼奥卡，成为这种困难的很好的象征。希科尼奥卡的罪状非常多而广泛。他是玩忽职守的工人，他是穿着喇叭裤、架着墨镜、担心弄脏自己衣服的城市浪荡子，他是滥批文件使人受害的官僚，他是大男子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同谋者。但是希科尼奥卡并不很清楚地属于某个定义明确的阶级。他的罪过看起来是主观的，是恶劣的态度所造成的。归根结底，这个阶级敌人是一个没有固定形态的人物，虽然为人十分可鄙。

关心培养“新人”这一点，倒是比较容易同莫解阵的经验联系起来。在实际活动中，培养新人意味着宣扬保持莫桑比克人的本色和献身于社会主义，而不怀念过去。这是莫解阵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在解放区，它曾发现传统势力把葡萄牙人的离去当作恢复他们失去的权威的好机会。这在莫解阵干部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不认为沦为殖民地以前的社会是以某种形式的原始公社为特征的社会。“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保守的、停滞的、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社会，一个压制青年、压制革新、压制妇女的社会。正确的名字应该是老人统治。”新人既要抛弃殖民地的心理，也要抛弃传统的心理。新人是为了未来的人，只能从改造过的社会中产生，因为人的态度取决于社会结构。“新人的培养，首先不是主观的因素，而是要改变客观条件。如果与此相反，我们就会陷入唯心主义。为了培养新人，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和社会基础，我们必须改变社会的基础结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象传教士，就会陷入关于人的内心改造的说教，就需要有圣人。”^①

所有莫解阵的文件都强调，创造新人和新社会必须大大地改变男人和妇女之间的传统关系才能实现。妇女解放并不是被看成一种“慈善行为”，而是“革命的根本需要，革命得以持续进行的保证，取得胜利的条件。”^②

莫解阵第三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新的党纲党章和《经济和社会指导方针》，就其遵从马列主义来说，也是十分正统的。

^① 引自塞尔吉奥·维埃拉在1977年12月教育部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② 萨莫拉《莫桑比克人民民主革命的进程》。

莫解阵本身要从一个解放“阵线”变成一个“工农联盟的先锋党”，赞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指导其活动。^①《经济和社会指导方针》提出了下列目标：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必须：

(一) 促进农业中社会主义的发展，为其工业化奠定基础；

(二) 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促进重工业的建立；

(三) 扩大和巩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四) 以全面的经济计划指导发展的进程；

(五) 形成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在先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担负对社会的领导。

要达到这些目标就要建立一套“计划和指导经济的国家机器”，巩固“决定和支配经济进程的国有部门”。在农村地区，“我们的发展战略主要依靠公社村执行”。有意思的是，在它的纲领中，莫解阵对生产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迫切需要改善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提高“物质生产和生产效率”被看成是“改善生活条件、对社会实行革命变革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的基本资源和努力应主要用于经济部门。”至少在理论上，莫解阵完全抛弃了坦桑尼亚把社会主义同福利国家等同起来的那种看法。

研究一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具体影响到政策目标的那种深度。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受到十分认真的对待，政策目标是

^①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章程》。

按照合乎逻辑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无产阶级在莫桑比克是微不足道的力量，就必须将其建立起来，直到可以承担其应负的责任。这就是说所有的政策都要以创立无产阶级为目标，从而要给工业和社会主义农业以优先地位。同样，由于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使社会发生结构变革的结果，那末所有的力量都要集中于经济，哪怕这意味着延迟当前生活条件的改善。

莫解阵尽管明确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的道路，它仍然认为这种从意识形态说来是正确的解决办法，与解放战争期间“莫桑比克人民的经验”是可以一致的，就是说可以依靠公社村促进群众参与政治和集体化。这一设想不仅明确地载入党纲党章，而且包含在大会通过的《经济和社会指导方针》之中。重视公社村当然和莫解阵以前的政策是一致的，但并不一定是推进集体化或提高无产阶级意识的最好办法，因为实际上，公社村中真正的集体经济活动是很有限的。代表大会之后，越来越明显，莫解阵所遵从的新的意识形态与战时经验之间存在着潜在冲突。事实上，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莫桑比克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苏联模式对马列主义的解释得出来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倾向与按照莫解阵战时经验得出来的加强地方分权、让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的传统之间相互冲突的历史。在执行大会文件规定的方针的过程中，莫解阵立场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明显。

政 策

我们将从三个主要领域考察莫桑比克所执行的政策。试图表明在每一领域都出现了两种社会主义观之间的矛盾。我们将把这两种观点称为马列主义正统的社会主义和莫桑比克历史经验的社会主义。我们要讨论的三个领域是政治组织、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

1. 政治组织

莫桑比克的整个政治体制包括党、“促进小组”、群众组织、国家官僚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和公社村。关键的基石当然是莫解阵。莫解阵开始是领导全国实现独立的解放运动，后来是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先锋党。莫解阵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实践非常接近于它的理论要求的那种政党，一个实际管理着国家的、结构严密和等级分明的组织。和其他非洲政党比较起来，这一特点更为明显。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靠集体领导的传统，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纪律性以及独立之前和之后都保持着的高度的团结。这意味着各种决定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马谢尔一个人作出的，在政策方面无疑存在不同的观点，这被限制在组织内部，通过组织加以解决。这并不是说莫解阵没有问题。它有问题，在基层组织工作中是明显的。但是这些问题可以在基本上统一的组织机构内部加以解决。

莫桑比克政治体制当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在早期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促进小组”。这些机构，和公社村一起，曾一度成为民主的和群众高度参加活动的莫桑比克式社会主义的象征。但是，这些半自治小组的存在和它们的作用，后来似乎产生了一些问题。独立以后，上千的促进小组在莫解阵的鼓励下成立起来，莫解阵把这些小组看作传播它的意识形态并争取支持的有用工具。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总如人愿，党并没有能够完全防止反莫解阵分子或者为自己谋取权力的机会主义分子混进这些组织。相对而言，这还是比较次要的问题。促进小组肯定从未象安哥拉的“人民权力委员会”那样成为整个反对派运动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并非始终清楚促进小组是否忠于党，而它的活动也并不都是得到批准的，党对促进小组总抱有一定的戒心。这种戒心在政府机关里表现得最明显。1977年后期，一个莫解阵高级官员公开声称，他那里的促进小组几乎蜕变成职员发泄不满的机构。他解释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莫解阵官员对所有政府雇员都怀疑，认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并且由于在独立前曾为葡萄牙人工作而往往具有妥协性。结果，莫解阵有意识地阻止政府机构中的小组进行政治方面的辩论。

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莫解阵的新党章，宣布莫解阵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对于促进小组的命运只字未提。但是，根据先锋党的逻辑，看来这些小组注定要消失，或者至少是完全改变性质。从根本上说，这些小组的非中央集权和半自治的性质意味着直接民主和群众参与政治，这种概念与先锋党的概念是矛盾的。根据莫解阵的新党章，党员的主要义务之一，是“向群众解释党的政治路线，把他们团结在党的

周围，动员和组织他们承担党规定的任务”。在那以前，这些任务都是由促进小组执行的，现在很明显，促进小组要被迫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到1979年，似乎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农村地区，只要莫解阵小组一建立，促进小组就消失，但在城市中将作为居民委员会继续存在，主要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

随着促进小组重要性的下降，群众组织就成了党外绝大多数群众参与政治的主要渠道。同所有的共产党的制度一样，群众团体从属于党并受党的控制。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是1972年建立，基础较好的“莫桑比克妇女组织”。妇女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男女平等，办法是组织妇女完成经济任务，借此具体证明妇女与男人一样，另外是直接谴责仍然抱有传统观念的男子，特别是党和政府的官员。其他的组织不如妇女组织这么重要。青年运动是第三次大会以后才开展的。工会需要彻底改组，以清除过去法西斯主义工团的偏见。总的说来，这些组织都把动员其成员协助执行党的政策作为自己的任务，从而对教育莫桑比克人民和全面发挥莫解阵的作用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方面开始了转变党的方针的进程，从长远来看，预示着党将严密节制政治活动的广泛参与，同时也开始对原有的葡萄牙人的行政机构进行重大改组，使新的国家机构变得民主得多。1977年9月到12月，所有莫桑比克成年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本地方、县、市、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894个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基层实行民主的特别突出的例证。候选人名单由促进小组提出，

然后在公开会议上提交公众讨论。会上，请村民们发言，就候选人的资格进行评论。在这种会议上，有百分之十的候选人被否决，其中许多是传统酋长，其他的人有的曾与殖民当局合作，有的则被认为品行不端。更高级的代表大会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代表大会的成员开会，从他们中间选出参加县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大城镇的市级选举是分阶段进行的。先由居民小组提名选出代表，再由他们选出市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每一个省，由县和市的代表选出省代表大会。在所有这些选举中，都有相当数量的人落选，这表明提名人选不仅仅是橡皮图章式的手续。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226名成员只是由莫解阵中央委员会挑选的，候选人名单提交给省级代表大会履行批准的手续。在莫解阵组成先锋党并在各级取得控制之后，由地方直接控制挑选候选人的作法是否会继续下去，还需要观察。在马列主义国家，正常的程序都是由党支配整个选择过程，人民只是被召来批准党的选择。

除了建立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之外，对原有殖民行政机构的改革则进展缓慢。主要障碍之一是缺少干部。尽管可以取消旧的机关，建立新的机关，但其组成人员大多还是原来那些人。莫解阵认为：“旧的官僚在政治上、专业水平上、道德水准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无法胜任建立人民民主所规定的任务。”但是由于全面清洗将使现有文职人员队伍严重减员，莫解阵决定不那么做，而是“把他们（文职人员）争取到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面来，使他们重新同广大群众同心同德，改造成能为人民服务的公共行政机关中的真正的工人。”^① 这在实践中有两个

^① 引自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三大《中央委员会报告》。

含义，第一，在政府机关举行无休止的讨论和自我批评会；第二，公开批判那些被认为由于过去与葡萄牙人的关系而成为“妥协分子”的人。这些人的照片挂在政府各部和其他机关的入口处让大家看，还要他们和同事们一起讨论自己的活动和行为。设想经过一年这样的公开审查和再教育，妥协分子将被改造过来。

在撰写本书时，改造国家机器方面存在的其他问题还没有着手处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府官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享有特权的权要。莫解阵正式声明要同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但实践上并没有采取多少措施削减它的特权。政府官员的薪金，象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一样，比其他的人优厚得多。连各级文职人员之间的薪金差别也仍然很大。在国营工业中，最低薪金是每月不到二千埃斯库多（一美元相当于三十三埃斯库多），政府文职人员的月薪为三千到四千埃斯库多。而在等级的另一头，部长每月四万到四万五千埃斯库多，高薪与低薪之比约为二十比一，比坦桑尼亚大一倍。1977年底，对改革公共部门工资等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辩论的中心似乎是关于把工业企业的工资和生产效率联系起来的必要性，而对文职人员相对的高薪金却几乎没有谈到。

在分析莫桑比克新的政治组织时，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党和国家的关系。在独立以前和刚独立之后的时期，两者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就象由于存在促进小组，党员同其他人的界限也不那么清晰一样。在解放区，莫解阵的干部代表党和政府，他们的工作得到当地人民中同情者的辅助。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和国家应该明确分开的看法流行起来。马谢尔

解释说：“……对党和政府的职能，一定不能混淆，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的确，过去有些党组织自己负责解决社会问题、司法问题、婚姻问题。……有一个阶段这些职能是由党和促进小组来完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机构，国家机器还没有建成。当时还是殖民主义的国家机器，人民马上抛开它而转向莫解阵。今天这两种职能是截然不同的。党的职能是为我们的发展制订总的路线。党为社会指明总的方向，规定轻重缓急，对主要任务发表声明。国家则行使主权和权威。……政府首先要行使政治和行政权力。……”^①

在实践中，把党和国家分开的努力，由于两种组织都有弱点而受到阻碍。关于国家机器的弱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事实还证明，把莫解阵改造成先锋党也是一个进展缓慢的、艰巨的任务。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将近一年，莫解阵的一名官员抱怨说，接纳新党员“很不够，很少，只在少数地区进行。”1978年几乎全年，所谓“全国建党运动”一直在进行，结束期限从9月推到11月。在写这本书时，仍然没有公布新的党员总数。马谢尔和其他莫解阵官员只说有“成千上万”的党员，党员占人口的百分比将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高的。^②为了保证新党员能够为莫解阵和他的同事或左邻右舍所接受，对申请人采取了各种审查手续。每个要求入党的人先被提交莫解阵委员会审查，然后再由本居民区的居民或工人在会上提出

^① 马谢尔《我们在1979年的任务》。

^② 据1983年4月召开的莫解阵党四大宣布，该党共有党员11万人，约占全国人口（1,260万）的0.87%。——译注

意见。通过这些审查的人还要经过党的省委员会的批准。党章还规定,除了已证明为战时莫解阵战斗员的人以外,申请人至少要等一年,证明他具有献身精神,品质端正,思想纯洁,才能成为正式党员。为了这些人,还在东德人的协助下在首都附近的马托拉建立了一所党校。

作者在1979年中访问莫桑比克期间,觉得党和国家要分清职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两者都打好基础之后才有可能。地方官员往往包揽一切,不管他的正式头衔是代表党还是政府。例如,作者在加扎省发现莫解阵干部批准当地农民合作社详细的生产计划,包括西红柿和洋葱的种植面积。这种工作并不符合关于党的职能的定义,即“发展制订总的方针。”尽管尚无迹象表明,莫解阵企图象几内亚民主党那样成为一个“党一国”,但莫解阵显然遇到了非洲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缺乏足够的合格人员来使党政分家,特别是在基层。1980年3月,为了使两者的区分更加明显,又采取了新的措施,使党成为唯一的制订政策的机构。莫解阵两名最显赫的成员和主要理论家马斯利诺·多斯桑托斯和若热·雷贝洛被解除了政府内阁的职务,专职担任党书记处的工作,分别主管经济战略和意识形态。他们原来的部长职务由技术专家接替。这种人选进一步突出了莫解阵的理论,国家应该只是党的执行工具。莫解阵强调党比国家重要得多,以此表明,这一人事变动并不意味着多斯桑托斯和雷贝洛被降职。他们的调职当时是削减政府官僚机构的权限、重申党的地位至高无上这种全面行动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使上述解释更为可信。

2. 关于公社村的争论

公社村在莫桑比克人当中唤起了极大的热情，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莫解阵反对葡萄牙人的斗争及其战时在解放区的经验。莫解阵认为公社村是它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贡献和革命源泉的最好象征，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相比。1976年2月，在独立之后不到一年，莫解阵中央有一份关于公社村的长篇决议，全面阐述了它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公社村是……农村……发展的支柱。我们组织农民群众进行集体生产的努力集中于公社村。由于集体生活，组织起来的人民发挥出巨大的集体力量。”公社村将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促进集体的生活方式，改善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并通过集体化促进生产，以便提供大量剩余产品供给城市。公社村还将创造条件，使农民有可能享受教育和卫生保健等社会服务。这些是葡萄牙统治时期完全没有的。莫解阵对公社村的重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完全的肯定。但是到1980年，一直没有订出法律来明确规定公社村的合法地位和在整个制度中的政治、经济作用。政府给公社村的支持微乎其微，和新出现的国营农场相比，公社村普遍都被忽视了。公社村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地位，与莫解阵所宣布过的完全不相称。

对于这种言行不符的现象主要有两种解释：莫解阵信奉马列主义，因此奉行中央计划经济，这和独立时莫桑比克的具体经济条件脱节。计划经济的概念和公社村的概念直接冲突。村子规模小，权力分散于地方，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大部分耕作仍由个人进行。这些村子几乎都不愿纳入全面的计划经济来满足科学地规定的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政府

所面临的紧迫的经济问题也对公社村不利。葡萄牙农场主外逃造成农业部门的崩溃，北部干旱和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流域洪水成灾，这些因素使按人口平均的粮食生产指数从1960年—1971年的100，下降到1977年的85。稀少的外汇被用来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1978年和1979年达到三十五万吨。因此，增加生产是国家必须解决的要害问题。尽管莫解阵多次宣布要全力支持公社村，但实际上力量却集中于把葡萄牙人抛弃的农场改建成国营农场，这看起来可以更快解决食品短缺的问题。这一决定在经济上似乎有合理的根据。葡萄牙人的农场位于最肥沃、开发最好的土地上，与城市之间有公路相通，而且政府可以控制农产品的销售。与此相反，公社村大多是自给性生产，地方往往比较偏僻。不管什么理由，这种政策有它长远的经济、政治影响。国营农场将不断要求国家提供资金、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措施，使得本来就很少的给公社村的支持越来越少，必然结果是把经济和财政力量用于国营农场，使中央集权的趋势逐渐加强。

现有的很少一点关于政府农业费用的数字可以证明国营农场被当作重点。例如，在1978/79年，政府用于发展农业的预算为三千八百五十万美元，其中整整二千五百万美元计划用于进口农业设备，而这些设备几乎全部都是给国营农场的。但是，政府事实上已经把绝大部分资金和力量用于国营农场，最清楚的迹象，是1978年8月农业部长若阿金·德·卡尔瓦略突然被撤职。列举他的过失的单子很长，内容很多。他被指责为表现出反党的态度，在农业部内部超出正当渠道讨论问题，助长了“自由主义和无纪律行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表

现出错误的思想。但是最重要的指责是他忽视了鼓励组织公社村的“群众路线”。根据宣布他撤职的公告：“特别严重的是他(卡尔瓦略)力图阻止建立公社村的进程，从而破坏了我们关于发展方针的决定性的抉择。他系统地给技术以优先的地位，蔑视人民的主动性和贡献。我们国家主要的农产品来源——家庭生产这一部门遭到了忽视。”

很自然，卡尔瓦略的撤职在当时被理解为支持比较民主的、地方分权的公社村思想的人们战胜了主张采用比较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国营农场的那些人。或者象有些人所说的，是“独立的”莫桑比克马克思主义者对信奉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

然而，这种理解过于匆忙了，因为在卡尔瓦略被撤职之后，政策并无任何重大变化。没有关于资金从国营农场转向公社村的报道。全国公社村委员会没有自己的预算，我在1979年年中访问这个委员会总部时看到的空荡荡的办公室和光秃秃的办公桌强烈表明，那里没有什么活动。本来预定在1979年下半年进行关于公社村前途的全国性辩论，然后颁布一个章程。这场辩论后来被推迟到1980年3月。尽管向合作社发放了临时的贷款，但却没有农村银行向公社村系统发放贷款，也没有建立农业技术服务系统来支持公社村。外援的结构也进一步证明，政府和党对国营农场的偏爱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在莫桑比克、古巴、保加利亚、东德和其他东方集团国家的农业专家绝大多数仍在国营农场担任顾问和经理。向农业部门提供外援最多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北欧国际援助财团驻马普托的代表1979年报告说，他们正在讨论的

1980—1983年三十三个新项目中,只有两个是援助公社村的。

国营农场这一部门本身也变成高度中央集权的。莫桑比克政府喜欢把许多葡萄牙人的农场合并,建成大规模的机械化单位。缺少管理人员固然是造成这种倾向的部分原因,但看来并不是全部原因。一般说来,规模大与集中管理被看作等同于现代化和高效率。因此,农业部在1979年下半年设立了一个机构来控制全国农业机械的分配和修理。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必须形成讲效率的心理,克服手工业方式的心理。”对于莫桑比克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些新建国营农场的规模是十分巨大的。林波波农工联合企业以前是只有一千五百户葡萄牙人参加的小的股份公司,已经被扩大成一个有二千五百名固定工人、八千到二万名季节工人、种植一万五千公顷水稻和一些蔬菜、拥有二百四十台拖拉机和一百五十台联合收割机的大型生产单位。国家任命的经理告诉本书作者,最后目标是要把农场分阶段扩大,以至包括种植九万公顷稻田。另一个国营企业,莫桑比克中部城市贝拉附近的一个牧场,占地十四万公顷,养牛二万二千头。这些可能是巨型国营企业最极端的例子,但在所有二百个国营农场都明显地存在着集中管理的倾向。

莫桑比克如何能够使这种强调国营农场的作法和它所宣布的支持公社村的说法终于协调起来,现在还不清楚。某些莫解阵官员常用的办法,是改变公社村及其目的的根本概念,明确说这一问题并不存在。全国公社村委员会主任若布·尚巴尔在一次接见客人的谈话中说,把公社村和国营农场看成相互冲突或矛盾的组织形式是错误的。公社村是政治和社会

单位,而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是经济单位,发达的公社村需要有一个合作社或者一个国营农场作为它的经济基础。国营农场是更高级的经济组织形式,因此终归是更为可取的形式。当时,这个委员会的立场是,国营农场应该也需要得到比公社村更多的经济支持,公社村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公社村的利益,连这个委员会都这样考虑问题,可见直到1979年年中,主张国家管理的看法在莫桑比克已变得多么普遍。

目前,公社村既不是国营农场的延伸,也不真正是集体化组织。事实上公社村分成各种不同的范畴。最大多数的是私人种植仍占优势。尽管莫桑比克官员断定说,公社村同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很不一样,实际上,大多数公社村,至少到1979年年中,和乌贾玛村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按官方所说,大约有一千个公社村,共有一百六十万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这些公社村在成立的起因和集体化的程度上都很不相同。一种是战争期间在解放区建立的,主要在北部地区。很有趣的是,尽管这些公社村历史最长,却不一定是合作化程度最高的。看起来好象是独立使这方面受到了挫折,因为这些地区的党的官员抱怨,非常难于说服农民进行集体耕种,或者至少在“大块田地”上并排耕种个人的田地以利于将来实行集体耕种。另外一些村子是葡萄牙人建起来的,类似在越南的“战略村”。战争期间,为了清除支持游击队的基础,老百姓被赶进这类村子。第三类村子是1977和1978年为了安置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流域的难民建起来的。连政府官员也直截了当地承认,这种匆忙建立起来的村子往往不过是一大堆茅

棚，并没有真正的集体经济组织，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最后，是一些最好的公社村，这些公社村是经过充分政治准备后建立的，进行高度集体化的生产。但是这类村子的数目极少。

只有少数公社村有合作社作为主要生产单位，与国营农场联系在一起的则更少。林波波农工联合企业为这两类公社村提供了最为有趣的例证。这个巨型国营农场按官方的看法，是一个由许多村子组成的生产单位，居住着二千五百名专职工人。把这些村子称为公社村，就完全背离了战时对这一名称的定义。尽管工人被组成生产队，每个队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但是这个巨型联合企业的管理机构却是非常复杂的，掌握在一个由国家任命的经理和从东方集团国家派来的农艺师和工程师手中。此外，农场里有许多村子，而农场本身却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单位经营的，各村对自己的所谓生产单位毫无管理之权。

这一联合企业还包括几个组成合作社的村子。一小部分水浇地交给了邻近的一些公社村，而不完全纳入国营农场。这些村子的生产单位是一些合作社，而合作社可以不限于在本村吸收社员。这些合作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们的规模，往往有好几百名社员和几百公顷土地。社员定期拿薪金，作为“预支”他们应得的一份利润。薪金的数额和国营农场工人的工资大致相同。合作社规模太大，又太复杂，管理工作有些超出了村民的能力。结果，他们从住在省城里、同合作社只有定期接触的保加利亚农艺师那里接受生产计划。这些计划在交给村民执行之前还得经过党的批准。就是这些合作社也往往按照官僚式的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当然，林波波

河流域的村子并不是典型的。它们更接近于国营联合企业的附属单位。这些村子从经济角度看享有特权，但受到的控制也比其他大多数村子严密得多。这些村子虽然不典型，但似乎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村子被认为是比较先进的，是其他村子终归要照着做的典型。

3. 经济政策

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莫解阵推行的经济政策，很难简明扼要地加以归纳。首先，政府把1980年以前作为一个恢复阶段，而不是新成长的阶段，主要目标是要在1980年达到独立前的生产水平。所能得到的零星统计数字似乎表明，尽管有些部门生产有很大恢复，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公布出来的很少一些数字说明，在1979年生产季节，许多农产品以及主要出口商品如棉花、柑橘、糖、虾和煤等的生产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但是从当年预计的进口物品看来，莫桑比克粮食还远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当年计划进口十二万吨小麦，十五万五千吨玉米，六万五千吨大米。第二，政府未能提出一份恰当的发展计划，甚至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套法律体制的工作进展也很缓慢。结果是政策混乱，有的明显是根据意识形态提出的，有的则是完全实用主义的。但是没有任何经济措施真正违反了信奉马列主义的诺言，大多数政策都是为了使国家做好准备，有朝一日技术上有可能采取全面、综合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

到1980年为止，已公布的主要经济立法是关于在这个国家进行私人投资和土地占有形式的。18/77号法令宣布，允许

私人投资，如果这些投资对国家建设有所贡献和有助于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法令规定保障汇出利润和在实行国有化时给予赔偿，但也明确指出，所有私人投资者必须同政府密切合作，并确定双方都可接受的目标。法令宣称，“国家要对私人部门加以约束。”政府越来越表现出对吸引外资的兴趣。马谢尔总统 1978 年秋天访问联合国时曾亲自会见了几家美国公司的经理。1980 年 3 月，《国际商业》杂志在马普托为感兴趣的西方投资者举行了讨论会。在撰写本书时，要判定莫桑比克是否能成功地同西方投资者建立起联系，推动它的工业化政策，还为时太早。到目前为止，独立后在莫桑比克新开办的仅有的的一家工厂，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已兴办的通用轮胎厂。政府尽管表示很有兴趣同外国公司办合营企业，但它却缓慢然而坚定地推行这样的政策，就是要把现有主要的私营工业排挤掉，特别是那些属于葡萄牙人的企业，或者被认为没有正当原因未能保持生产水平的企业。结果，把工厂和农业企业国有化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国家目前控制着绝大部分工业部门。

1979 年 9 月，政府对所有的土地实行国有。到那个时候，这一步骤已经几乎算不上革命的行动了。大多数葡萄牙人的庄园国有化已是既成事实，农民尽管有权耕种，却从未按现代意义拥有过土地。新的法令继续承认农民有权使用土地，而且规定凡没有从外面雇工的农民无需交地租，并可以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子。集体农场和合作社也不交纳地租。只有那些使用雇佣工人的农场要交纳地租，哪怕只雇一个工人。这一立法清楚表明，政府偏爱各种形式的集体农业，不提倡私有

的从事商品生产的农业，哪怕是小规模。

政府关于工业部门内部组织的政策，是要促进工人参加管理，虽然参加的条件限制越来越严，规定越来越细。开始，在私营和国营企业中，工人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结果发生了自发性罢工，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立即改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的要求。这种劳工骚动有时差不多成了一片混乱，使经济几乎瘫痪。1976年10月，政府力图更严密地规定工业部门工人参加管理的办法和管理制度：政府承认了促进小组及其基本政治职能，建立了“生产委员会”来保证工人“积极、自觉和集体地参与对问题的讨论和解决，计划并控制生产”；政府还正式批准已经存在的，在国营企业中由政府任命的经理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在私人企业中由厂主或经理和工人代表组成的行政管理委员会，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在纸面上，这三个机构的职能是截然不同的，但在实践中情况却很混乱。促进小组往往在其他机构建立之前就已存在，并担负着这些任务的大部分，从防止破坏到鼓励提高生产，使工厂正常运转。在其他两个委员会成立之后，促进小组本应严格限于承担政治任务，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一般回答的问题，就是生产委员会是否能够有效抗衡政府任命的经理的权力，或者经理是否真能自主地管理企业。

在实现独立的危机中受到严重影响的两个经济领域是零售商业和运输业。由于葡萄牙人外逃，大多数商店关了门，这造成了很大问题，不仅仅涉及如何分配必需消费品，而且涉及如何收购经济作物，以前则是由葡萄牙店主收购的。当时采取了两项措施：建立合作商店和国营的“人民商店”。尽管这

些措施使情况有所改善，但消费品仍然到处短缺，原因之一是生产或进口不足。在城市里，等在商店外面的人常常排起长队。在农村，农民抱怨连食盐、肥皂和布匹这些必需品也经常缺货，而这类商品一旦运来又非常昂贵。尽管国营和合作商店的价格比私人商店低，但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很少，这种情况既引起不满情绪，又使农民不愿多生产，至少不愿意多出售。

运输部门的投资一直很高，但很难以此为依据对莫桑比克的经济政策得出什么结论。例如，1978年和1979年，政府把一亿九千二百万美元花在运输上，这相当于预算投资总额四亿六千万美元的三分之一强。但是由于独立时大多数卡车都被运往国外，全国的运输系统几乎全部崩溃。不管政治方向如何，任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很难有别的办法。

尽管莫桑比克的经济政策是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但是莫解阵也表明，它能够认识自己无法控制的形势，并讲求实际地对付这种形势。这种实用主义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它同南非的关系上。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说，南非是莫桑比克的主要敌人之一，而在实际上，南非却是莫桑比克的主要经济伙伴。同所有南部非洲地区国家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莫桑比克不仅曾经是一个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也曾经是南非的殖民地。南非作为那一地区的主要经济力量，是它的邻国取得资金、技术人员和机器设备的一个来源。同其他国家一样，莫桑比克发现很难摆脱本国经济与南非经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这一现实作了重大让步。在历史上，南非是莫桑比克外汇的一个重要来源，每年提供的外汇可能近二亿美元，相当于

莫桑比克出口值的一半以上。有两项收入特别重要：被招募到南非矿山工作的莫桑比克人的汇款和南非经过莫桑比克港口和铁路运输出口货物交纳的运费。尽管独立以后工人汇款的重要性急剧下降，但在两国之间一项新协定批准之后，南非对莫桑比克港口和铁路的使用有所增加。

殖民统治时期，在（南非）德兰士瓦矿区工作的莫桑比克工人人数最高时达十万以上。两国的协定规定，工人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将以黄金直接付给莫桑比克，并按当时一盎司三十六美元的固定价格计算出总数。由于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不断上升，远远超过这一价格，殖民当局可以转手把黄金卖出，获得丰厚的利润。工人则在回国后拿到以本国货币支付的他们工资的余额。独立之前的一年，莫桑比克以这种方式挣得近一亿五千万美元，劳务出口成了最大的外汇来源。独立以后，莫桑比克政府力图减少前往南非的工人人数，而南非为了使本国黑人在就业方面得到优先权，也急于减少外籍工人人数。到1978年，在南非的莫桑比克工人人数下降到三万五千人。同年，南非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支付黄金协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莫桑比克从这方面挣得的外汇可能减少到独立前的三分之一。但是两国间的经济联系仍然十分重要。1979年2月，两国签订关于加强贸易往来和运输联系的五年协定就表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一协定，南非承诺把经过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出口的货物增加一倍，从每年六百万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吨。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南非政府向莫桑比克提供一亿二千万美元的贷款，部分用于改善铁路和马普托的港口设施，部分用于从南非进口商品。

莫桑比克愿意签订这种协定,更加显得政治上自相矛盾。因为南非经过马普托出口的商品中包括运往以色列的煤。看看莫桑比克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就可以理解这样做的原因。贸易逆差1978年为三亿五千万美元,1979年预计为四亿一千九百万。1978年,无形贸易收入,最突出的是工人的汇款和南非过境贸易收入,使国际收支逆差下降到二亿三千九百万美元。由于莫桑比克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食品、零配件和机器设备,因此很难减少,而出口收入又增长得很慢,莫桑比克仍极其需要依赖这些收入。

尽管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莫桑比克却不愿意以同样方式向罗得西亚妥协。罗得西亚也曾以过境运输和旅游向莫桑比克提供相当数量的收入。独立以后,莫桑比克政府遵守联合国对这白人统治的国家进行制裁的决议,于1976年3月向罗得西亚关闭了国界,断绝了贸易和交通运输。据估计,这一行动使莫桑比克经济每年损失一亿一千万到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1980年初,罗得西亚的冲突结束,边界重新开放,预计这将使国际收支逆差有所缓和,但不会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是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级行政管理人员,这是葡萄牙殖民统治造成的。这些人员短缺造成的主要后果有两个:依赖各式各样外国合作者和进一步加强了意识形态中本已存在的中央集权的倾向。外国合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数是根据政府间合同派来的,也有一些是直接雇用的。合作者中最多的葡萄牙人。1979年6月在莫桑比克共有一万五千人,不过到年底合同期满的大约七千人,这些人是否全都被换掉还不清楚。另外重要的一批

来自古巴，但数量比葡萄牙人少得多，只有大约四百名文职人员。据报道，古巴人和莫桑比克人关系最为密切。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语言上的方便，另一方因为他们吃住在类似兵营的小旅馆里，只拿零用钱，生活方式比较接近于莫桑比克人自己。东德、保加利亚和苏联的技术人员以及一小批中国人也在那里工作。此外，有许多欧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也在莫桑比克工作，他们大多数在意识形态方面信奉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这样复杂的外国人在一起造成了语言交流的问题。一个医院里可能有五、六个国家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讲葡萄牙语都很困难，讲任何一种非洲语言就更难。更严重的问题是外国合作者把相互冲突的成见带到他们的工作中来。例如，对管理机械化国营农场有经验的东德人和保加利亚人在组织农业生产时只考虑那种形式，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则更偏爱小型合作社和建立服务事业来帮助公社村。许多西方激进分子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工人直接管理。但是很难知道这些不同的观点对决定政策到底有多大影响。西方人说，不让他们参加有关政策的讨论，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者，特别是古巴人有时却参加。至少在理论上，对农场实行国家管理和强调工业化的倾向可能是东方集团专家建议的结果，但也可能是莫桑比克人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政府面临的特定条件所造成的。

4. 社会服务

莫解阵第三次代表大会曾宣布国家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提高物质生产和劳动生产率，这是改善生活条件必需的先决

条件”，“因此我们的基本资源和努力将主要用于经济部门”。实际上，莫桑比克把很大一部分预算用于提供社会服务。例如，1978年，政府经常预算四亿一千五百万美元，其中一亿零九百万用于社会服务，用于经济部门的只有八千五百万美元。1979年，社会部门分得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而经济部门只有九千二百万美元。这些数字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莫桑比克是否正在走上通往类似坦桑尼亚“没有经济成长的发展”那种困境的道路。

社会服务方面的进步是显著的。独立后头三年，小学生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一百三十万人，中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六万人。当然，绝对数字仍然比较小，但增长速度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由于独立时高中毕业生人数很少，大学学生人数增长很慢。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从中学毕业，几年之内大学生总数肯定会猛增。教育的发展大都是依靠应急的办法取得的，例如使用未经训练的教师，通常露天上课，而且没有课本和其他教材。这种教育的质量大概不会很高，对任何力图迅速扩大招生人数以弥补失去的时间的国家来说，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尽管希望迅速扩大教育事业，但又把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关闭了，因为按照它的信念，教育必须由国家来办，使新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接受马列主义原则。莫桑比克之所以决定把大约二千名孩子送到古巴去接受整个初级和中级教育，原因也在于关心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培养。

在卫生方面，莫桑比克政府也已着手对原有制度进行雄心勃勃的全面的改革。莫桑比克政府设想了一个全国普遍实

行的新的一整套基本卫生保健规划，尽管目前提供的服务还是十分简陋的。独立之后立即禁止私人行医，强调预防措施，并立即向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长期规划要求在村庄和居民区一级设立兼职的辅助医务人员，全国设立二百八十个“卫生站”和一百九十个妇幼卫生所给他们以支持，形成一个体系。

还要设立九十个至少各有一名护士的保健中心和二十五个至少各有一名兼职医生的农村医院。最后，一些县级医院将为重病人提供各科医疗服务。对于人口为一千一百多万的国家来说，这些数目可能显得很小时。考虑到1975年莫桑比克只有八十名医生（大多数是外国人），甚至坦桑尼亚独立时也有四百二十五名医生，就可以看到，这一规划的实施对全国人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方面将是重大的进步。在莫桑比克卫生保健规划制定者的心目中，农民占有首要的地位，历史上第一次全国预防接种运动说明了这一点。这次运动从1976年6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三年，全国人口将近百分之九十六接种了预防天花、麻疹、结核和破伤风的疫苗。

教育和卫生问题生动地说明了象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难题。毫无疑问，政府力图提供以前完全被忽视而又迫切需要的服务。它的方针也肯定并不过分，然而即使以这种非常简陋的形式提供基本服务，也给国家预算以沉重的负担，并且损害了政府促进经济更快成长的能力。毫无疑问，莫桑比克既需要“成长”，也需要“发展”。但是有理由怀疑，它是否有能力在这两方面同时并进。

结 论

在莫桑比克，从民族解放战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变显然是顺利的。莫解阵领导人之间完全没有公开的派别斗争，也没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纷争，这使莫桑比克的经验在非洲激进国家中在某种程度上有它独特的连续性。它信奉马列主义看来是有坚定的根基，然而那些根据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设想的政策和根据“莫桑比克人民革命经验”得出的政策，两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潜在的冲突。要求两者“结合”引起的问题比莫解阵领导人所设想的严重得多。的确，莫解阵也许很快会来一个第三次“批评”危机，解决必须解决的到底如何确切实现两者结合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干脆放弃结合的企图。如果发生这种“批评”危机，将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这一正在发展的隐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围绕如何组织农业以及公社村和国营农场何者优先的论争。如何作出选择，涉及广泛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将对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公社村能否为培养集体意识创造组织条件，还是反而有助长个人主义的危险？是否可能把上千个半自治的村子纳入中央计划的经济，是否实现科学计划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国营农场？公社村的生产是否容易改造，使之反映“效率心理”而不是“手工业方式的心理”？选择以公社村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很可能导致严重的、无法控制的权力分散的倾向和农村民主，依靠国营农场可以比较自然地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以民主集中制为政治组织基本原则的体制

相适应。换句话说，国营农场比公社村更加符合正统马列主义的指示。但是，公社村作为莫桑比克战时经验的象征，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情的影响。

在公社村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由于卡尔瓦略的撤职而公开化，而围绕其他有关问题的类似的争论仍然隐蔽得多。最清楚地表示这种分歧存在的只是一个间接的证据，即莫桑比克政府在独立五年之后，还没有能够就一些关键机构制订精确的立法。我们已经指出，直到1980年初，公社村仍没有章程。也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公社村、国营农场和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同样，对国营部门工人参与管理的形式和范围，也没有清楚的规定。“促进小组”在一个由先锋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中的命运如何，也还没有确定。换句话说，许许多多根本性的决定还没有作出来。我们不相信时间不够是主要的原因。埃塞俄比亚，甚至安哥拉，面对困难得多的国内政治形势和严重的冲突，都比较快地颁布了立法，规定了它们社会、经济组织的细节。这似乎表明，莫桑比克因为担心发生根本分歧，有意避免做出某些决策。

因此，到目前为止，在莫桑比克，对于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的形式，特别是政治参与的性质，马列主义究竟有什么意义，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独立以来肯定有逐渐减少无限制参与政治活动的趋势，但是，最初的形势曾经有时近于无政府状态，因此这种减少的趋势并不奇怪，可是，这也不能明确地预示未来。最初，工人曾力图接管工厂并实行他们的意志。“促进小组”曾统治着居民区和村庄。政府机关、工厂和农场中，各式各样的委员会进行无穷无尽的讨论，涉及各种各样的事

情,从工作态度和种种牢骚不满,直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全国有时看上去好象在经受“小组会治疗法”。这种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参与政治的狂热,势必难以持久。正如所能预料到的那样,莫解阵力图引导和控制参与政治的活动,使之限于与先锋党原则相适应的范围之内。不过,整个制度还不是以高度的集中和集权主义方式,完全自上而下进行治理的。由于国家太不发达,党还只是一个骨干组织,要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还不可能。此外,还有与中央集权趋势相抗衡的力量,这就是各种地方机构,即每一个村子里的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生产委员会和居民区的促进小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但是权力过分集中和集权主义的危险仍然非常现实,象其他严肃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民主集中制为指导原则的国家那样。

第五章

安哥拉

战时遗产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安哥拉出现，其起源可以追溯到 1956 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的成立。但是，由于安哥拉民族主义斗争的历史掺杂着种族、部族、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和个人之间的怨仇这样一些问题，人运本来很清楚的意识形态方向反而变得模糊而往往被人忽视。为了理解在安哥拉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战时的斗争，特别是独立以后把马列主义引进安哥拉的政党——人运所走过的曲折的发展道路。

安哥拉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一部反复出现难以调和的分裂，最终导致内战的历史。三个相互竞争的运动参加了解放斗争。人运本身也由于宗派主义、“自治主义”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当时要在许多相互隔绝、甚至难以取得有效的统一指挥的各个战线上作战这种困难条件造成的。人运同将近十五年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情况相似，由于“国内”军事领导人和“国外”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各有其追随者的处于半自治状态的游击队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而受到损害。阿尔及利亚的

民族解放阵线和安哥拉的人运都在城市地区有秘密的地下组织，有各自的领导人。这两个组织都有一些高级领导人被捕、并被迫在监狱中渡过一部分战时岁月，只是在独立时才出头露面，他们有各自的野心。这种派别和战时领导人互相争权的普遍现象在阿尔及利亚称为“维拉耶主义”，维拉耶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国内的政治—军事组织的一个单位。安哥拉人运则把类似的现象直截了当地称为“宗派主义”。有必要弄明白，在安哥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宗派主义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因为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人运内部的宗派主义必然会对以后的事态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安人运成立于1956年，六年以后成为人运主席的阿戈什蒂纽·内图当时正在葡萄牙坐牢，他曾多次入狱。看起来，在人运成立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许多安哥拉民族主义者借以观察他们的斗争的工具。人运的直接前身之一是一年以前成立的安哥拉共产党，看来，人运成立不久，这个党就解散了。安人运的主要理论家卢西奥·拉腊曾形容这个党：“多半是个意识形态研究中心”，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党。内图本人说过，他不赞成成立共产党这一“创议”，最重要的是他拒绝共产党人的中心信条，即为了给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和为社会主义铺设道路，必须通过资本主义阶段来发展“对抗性的社会阶级”。值得注意的是，据内图本人说，在安哥拉民族主义者举行的“无数次会议上详细地”讨论过上述观点。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存在。内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所执行的路线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没有任何事

物证明，我们在殖民地之后的社会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事实上与此相反的结论才是真实的”。内图和人运其他的未来领导人在葡萄牙学习的时候，同葡萄牙的“革命者”也有联系。这些人估计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正在进行自己的反对萨拉查政权的斗争。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贫民区里秘密组织起来的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小组终于联合起来，成立了安人运。

安人运成立五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反对葡萄牙人的战斗。人运自己认为，斗争开始的标志是1961年2月4日三千名支持者对罗安达中心监狱和其他战略要点进行的十分英勇但组织得很差的一次进攻。这次进攻的目的是要救出关押在那里的一些政治犯。这次进攻并不成功，葡萄牙人因此对居住在贫民区的非洲人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几百人，甚至可能有几千人被杀害。五个星期以后，在北部的巴刚果人中间，爆发了由霍尔敦·罗伯托领导的另一个运动发动的起义，这一运动就是后来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解阵）。这次起义打死了三百个欧洲人，这在当时曾广为传扬，此外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有几十名混血人和“同化人”（被认为已为葡萄牙文化所同化，因而可以几乎平等对待的非洲人）也被杀死。在后来的几个月，人运和解阵的追随者所组织的规模较小的进攻在整个安哥拉北部屡有发生。但是，到10月，所有起义都被葡萄牙人镇压下去。根据官方的死亡人数统计，总计有二千欧洲人和五万非洲人被打死。

从一开始，发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两个民族主义组织就很不相同。人运是一个面向城市和以城市为基础的组织，其

支持者主要是在罗安达很有势力的姆本杜人，主要领导人是“同化人”和“混血人”。人运甚至感到有必要对其领导层的特殊性质作出解释，把那些只会讲葡萄牙语的人说成是“产生政治觉悟的推动力量”。人运的这些特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对其领导人有特殊的吸引力。由于马克思主义把阶级冲突置于其他冲突之上，这就使城市中的混血人和同化人有了一种超越种族并使他们有可能与贫民区里的黑人工人和游民无产者合作的意识形态。解阵则很不一样，它的据点在安哥拉北部农村，主要得到巴刚果人的支持，它的领导人不仅全是黑人，而且公开持有种族主义观点，他们不仅斥责葡萄牙殖民者，而且贬斥葡萄牙殖民者造成的混血人和同化人。解阵起事时杀害这两种人，只是造成两个组织长期争执的发端。

从1961年到1966年，人运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在这一段时间里，与葡萄牙人直接交战不多，只是在刚果河以北小小的卡宾达飞地开辟了一条战线，但是没能把斗争引入安哥拉内地。而内部，又由于发生了第一次权力之争而分裂，这种斗争以后又多次发生。1962年12月，内图获释出狱并成为人运的主席，但是，以党总书记韦里亚托·达·克鲁兹为首的极左派拒绝接受他的领导，并企图建立一个分裂派组织。在安哥拉和国外，人运从此被看作一个不可靠、不成气候的运动。一些游击队投向解阵，非洲统一组织也决定把解阵作为唯一值得支持的解放运动。扎伊尔政府以非统组织的这一决定为借口，把人运赶出金沙萨，迫使内图的追随者把总部搬到布拉柴维尔。到1963年年底，人运倒霉之至，当时它的一个

最坚定的外部支持者、英国学者巴兹尔·戴维逊甚至写道，内图作为一个领导人已经完蛋，而人运则“支离破碎，分崩离析，变得无足轻重”。然而，由于在内图领导下对该组织进行了整顿，古巴提供了援助，非统组织改变了态度，人运就象传说中的火凤凰一样，又从灰烬中腾空飞起。

1964年初，古巴领导人切·格瓦拉在布拉柴维尔会见了内图。这位人运领导人当时感到窘迫，因为有如他后来所写到的，在人运的军事活动方面，“拿不出多少东西来”给他看。但是，内图本人给格瓦拉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决定为人运提供古巴教育，答应古巴将在外交上和政治上支持人运。有了古巴的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又恢复了援助，人运在外交和游击活动方面开始时来运转。1966年是一个分水岭。这年，在多次失败之后，人运终于有办法使游击队的一支“增援支队”穿过葡萄牙人和解阵的巡逻线，到达首都以北登博斯森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孤立无援的游击队会合。同年，人运争取到赞比亚政府的许可，在其领土上活动，随后在安哥拉东部开辟了第三条战线（登博斯和卡宾达被正式称为第一和第二战线）。“东部战线”成了把斗争深入到安哥拉中南部和东北部的的主要基地。1968年，在中南部和东北部正式组成第四和第五军区。从各方面情况看，1966年至1970年，都标志着人运的游击斗争进入高潮。在这以后，葡萄牙人反复多次并且越来越成功地对东部战线发起反攻，同时人运内部个人宿怨又起，两者加在一起，给人运造成了惨重的后果。

人运尽管在力求对葡萄牙人进行有效的战争方面遇到了这些似乎无穷无尽的困难，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却形成了一

条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相当一贯的路线，甚至还在安哥拉国内的“半解放区”建立了一些机构，启发和影响到后来的政策。1956年发表的第一个纲领已经展望了取得独立以后的问题，主张实行有计划的经济的发展，建立生产合作社，由国家全部控制对外贸易，实行土地改革，“清除私人垄断”以及把土地分给最贫困的农民。到1968年，人运的领导已经决定，终归必须建立一个先锋党来领导运动内部各种小组形成的联盟。第一步，人运必须着手培养干部和形成一条明确的意识形态路线。五人政治军事协调委员会成员之一丹尼尔·希潘达强调说，这一路线应该既不亲苏，也不亲华，而只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是以安哥拉具体经验为基础的。协调委员会的另一成员斯帕尔塔库斯·莫尼芒布讲得更明白：“政治教育首先是民族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在安哥拉将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人民进行教育。我们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明天我们的国家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外没有别的道路。”

然而，极为明确地承认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只限于在同外国左派支持者的谈话中，官方的宣传则远没有那么明确。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是因为葡萄牙人和解阵在欧洲和美国大事宣传，把人运描绘成共产党，以败坏它的声誉。这些宣传甚至促使人运在1971年发表声明，否认这种“虚假的宣传”，坚持说它“不是共产主义运动”。但是这个名声直到反葡萄牙人的斗争结束还始终流传。人运公开表示同情社会主义集团，又从苏联和古巴得到援助和赞扬，这些恰好被那些诋毁它的人所利用。此外，人运还按期参加苏联发起

的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的会议，并且是设在哈瓦那的三大洲指导机构的成员。早在1966年，人运就派出它招募的第一批游击战士到古巴受训。据估计，人运还从苏联获得其武器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尽管存在这些与东方集团保持联系和明显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例证，说人运在战争期间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运动恐怕仍然是正确的。人运只是受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影响的、包含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各种派别组成的联盟。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1975年到1976年的内战中巩固了他们的领导地位。

反映人运马列主义方向的一些机构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就已开始运用的。党校在拉腊的领导下于1963年初在金沙萨开始工作，其目的是保证政治领导人对军事领导人、“意识形态斗争对武装斗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党校被迫搬到刚果，但还是很有起色，据说到1967年已经训练了二千名干部。这所党校还在人运的半解放区里建成了一些小规模“革命训练中心”。据戴维逊说，到1970年，安哥拉国内开设了十个这样的中心。训练出来的干部有些被派往各个战区担任政治委员，目的是遏制游击队司令员的权力，并保证他们执行人运的政治路线。但是，遏制军阀主义的意图基本上失败了，1968年人运不得不承认游击队司令员是本战区的首席政委。戴维逊指出，在“防止游击战争蜕变为军事冒险”这方面还有内在的困难。

人运还着手把半解放区的人民组织起来，形成颇为严密的军事政治体系，建立了人运后来视为社会主义革命支柱的一些机构。农民被组织成不超过一百人的小村庄，以避免人

数太多、容易暴露而遭受葡萄牙人突然袭击的危险。每一个村子选举自己的“行动委员会”，有自己的民兵，虽然武装很差，有自己的“人民种植场”，还有一般同时为许多单位服务的“人民商店”。村里甚至还有雏型的“劳工联合会”负责推动生产，此外还有妇女以至儿童的组织。这些萌芽机构后来成了人运的群众组织。若干村子组成分区，由一个“革命行动委员会”领导，每五、六个分区组成一个区。整个东部地区包括五个这样的区，每一个区由一名政治—军事司令员领导。在独立以前，人运管理下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还不清楚，但是肯定比莫桑比克在莫解阵控制下的人数要少得多，那里是八十万。据一名东部战线司令员说，到1968年，人运控制地区的农民约三万人，总数在最高时可能达到过十五万人。但由于葡萄牙人于1972年开始进行反攻，在安哥拉东部给人运以重大损失，人运地区的人口逐渐减少。然而，半解放区的经验对于人运关于社会主义机构的概念的演变极为重要。毫无疑问，这些机构当中最为重要的是“行动委员会”，后来成为“人民权力”运动的基础。这一运动被人运及其国外支持者视为人民参与革命进程的核心。例如，戴维逊把“人民权力”运动称赞为实现“重大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工具，“美国支持解放运动”这一组织则称之为“将使安哥拉人民和人运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本书作者来说，行动委员会在半解放区内作为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到底有多大效能还不清楚。看来，传统的农村首领往往就是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这表明社会变革的程度是很有限的。此外，不是所有的人运游击队司令员都把行动委员会看作推动基层民主的机构。例如司令员莫尼

芒布在一次访问谈话中就很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行动委员会不过是为了执行国外人运中央的指示而建立起来的整个指挥系统的最后环节。但是其他关于行动委员会活动的描述却表明，这些委员会的确是相当自主和民主的，有效地把权力交到人民手中。由于战争的困难环境，据说1970年存在的一百五十个行动委员会，在自治的程度和活动的方式上，似乎有很大的差别。看来很明显，早在初期阶段，人运领导人对于人民权力的含义，其看法也是相互冲突的。

战争期间人运在半解放区建立的大多数民政机构，比较起来，其重要性不在于它们在实践中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在于它们所表露出来的人运领导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总的说来，当时设想的制度不仅明确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是考虑周详的。其中一个例子是“人民种植园”。尽管名称颇为宏伟，这些种植园不过是补充家庭耕地的集体田地。根据精心设计的安排，农民每周有两天在种植园上劳动，两天在自己的田里干活，剩下的时间参加成人扫盲和政治教育等其他活动。但是，司令员们承认，很难说服农民接受这种制度，虽然到1970年，有些农民看来“开始懂得集体农场有好处，至少是必要的”。集体田地上的产品交给行动委员会所管理的“人民仓库”，在那里同人运能够从外面弄到的货物进行交易。这样，在内部和外部之间建立起一种小规模以物易物的交易。

从关于半解放区生活的种种记述中所能搜集到的材料来看，人运在1970年似乎已形成了相当严密的政治军事基础结构，建立了新机构的雏型。然而，在后来的几年，人运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使正在萌芽生长的社会经济革命中断了相当一

段时间。首先，葡萄牙人 1972 和 1973 年的反攻削弱了人运在半解放区的机构。第二，又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成立。最后，内部派别斗争的新浪潮几乎使人运再次分崩离析。若那斯·萨文比领导的新的民族主义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从解阵分裂出来，1966 年 3 月在安哥拉东部建立了自己的“隐蔽所”。到七十年代初期，安盟不仅在安哥拉中南部同人运争夺奥文本杜人的支持，而且象解阵历来在北部所做的那样，主动与人运游击队作战。这样，人运在内部发生空前严重的危机的时候，同时与三个外部敌人作战。造成内部危机的中心问题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关于应该如何进行斗争或者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相反，基本上是一场权力之争，在几个相互争夺的派别和个人之中，决定哪一个将成为支配的力量。这场危机是严重的，并且使人运的外国支持者深感烦恼。以下事实表明了这一点。1973 年苏联人中断了对整个人运，特别是对内图的支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敦促中国人武装解阵以使安哥拉的斗争持续下去。（苏联人后来恢复了对内图的支持，但那是 1974 年 4 月里斯本发生军事政变以后的事情）

1973 年年中，内图指责人运指导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丹尼尔·希潘达阴谋“在肉体上消灭”他，并在安人运的奥文本杜族拥护者的支持下成为主席。希潘达则反过来谴责内图具有“总统权力主义”，指责他对于东部战线造成“大批游击队员和其他领导人投敌”的种种没有解决的问题应负责任。希潘达还指责整个人运对于人民“过于傲慢”，“不考虑战斗群众的

意愿而强行执行自己的办法。”到1974年年中，人运分裂成三派，即希潘达的所谓“东部造反派”，由前人运代理主席、外交部长马雷奥·德安德拉德和司令员莫尼芒布领导的“积极造反派”和内图自己的中央派，反对者称之为“极权”派。同年8月人运在卢萨卡召开代表大会，试图把三派重新团结起来，但这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了。内图及其支持者由于处于少数而退出了会场。希潘达被留下的他的追随者选为主席。当时，忠于内图派的部队不超过二千人，很可能只有他从东部战区召回布拉柴维尔的八百人。

总的说来，1975年初内战已开始、事态十分严重时，“内图主义派”的地位是极端虚弱的。他们要和其他两派争夺对人运的控制，同时又要同解阵、安盟斗争，以争取对全国的支配。当时，解阵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各派，连希潘达的东部造反派的游击队也比内图主义派多。但是，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互相战斗的许多派别之中，内图主义派虽然数量上比较小，却有某些长处。这一派已经取得了意识形态上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暂时的政治团结，这是他们的人数众多但派别纷繁的反对派所不具备的。当时，独立后的安哥拉将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方针已经成为定论，不会成为他们在独立后引起分裂的问题。人运必须成为先锋党以领导国家，这一点，他们也已达成了基本的一致。此外，争取独立的斗争使他们对于独立之后在安哥拉应该建立那一类型的新机构获得了一些具体的经验：他们都支持“人民权力”的概念和在半解放区发展起来的地方建立行动委员会制度。只是在后来，内图派已经掌握了政权以后，人民的权力才成了人运内部又一次派别

斗争的争论中心。在内战临近时，“人民权力”却是集结力量的强有力的口号和动员支持者的工具，给内图主义派以首要的有利条件去对付那些不那么团结的民族主义派别。

内 战

本书篇幅有限，不可能详细地追述从1974年4月里斯本政变到1976年3月人运取得最后胜利这期间折磨安哥拉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这里我们只集中谈谈内战的某些方面，帮助解释后来影响到革命的一些问题。

从一开始，斗争的目标不是立刻取得对全国的控制——没有哪一个派别能抱这种奢望——而是控制主要城市，特别是首都，控制国家的主要资源，首先是卡宾达飞地的油田。从这个角度来看，人运的地位得天独厚，尽管它在军事上虚弱。首先，人运是在首都的贫民区中萌生的，在构成首都人口多数的姆本杜人中有牢固的根基。第二，人运的影响沿罗安达—马兰热走廊向东扩大，一直达到安哥拉东部的钻石产区。第三，忠于内图主义派的军事力量尽管很小，但却布署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与卡宾达接壤的刚果（布）。一旦控制了首都、其他几个城市和卡宾达，人运就有理由认为它将得到外交上的承认，能够“合法”地要求外部支援，即使不能在军事上完全打垮反对派，也至少比它们更能长期坚持下去。第一个试图夺取首都的并不是人运，而是军事实力比任何对手都强得多的解阵。但是，“争夺罗安达之战”取得胜利的却是人运。在关于苏联和古巴干涉安哥拉的吵闹声中，人们大都忘记了，在古巴

战斗部队抵达之前，在一千四百多人的扎伊尔正规军还在北部支援解阵的时候，人运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取得了首都，而且控制了卡宾达，同时对十六个省会中的十二个至少建立了初步的控制，其中包括南部的港口洛比托和本格拉。

人运取胜的关键是“人民权力”、分布各地的行动委员会，以及在里斯本改变后立即在首都和其他许多城镇的贫民区组织起来的民兵。人运在城市地区的真正领导人并不是内图本人，而是尼托·阿尔维斯，他是首都以北、孤立的登博斯森林“隐蔽所”的军事司令员，他还受内图的委托担负在罗安达组织人运支持者的任务。这样的人选是奇怪的，因为阿尔维斯是一个使人运深受其害的“自治主义”的典型，在与外界隔绝的战区建成了自己的军事政治权力基地的领导人。在建立城市行动委员会的过程中，阿尔维斯得到各种外围小组的帮助，这些组织的成员有毛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极左分子，有的是安哥拉人，但也有很多是在里斯本政变后蜂拥来到罗安达的葡萄牙白人。这些左派小组织主要是追求他们自己的关于革命的梦想。他们在贫民区、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建立起“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委员会”、“恩达委员会”和“团结委员会”，组织和促进工人阶级直接参加革命。他们出版了《人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杂志，号召城市工人动员起来夺取政权，立即建立“人民民主”。毫无疑问，这些左翼分子有着同内图主义派不同的目标，但是人运取胜符合他们的目的，因此他们在1975年春季和夏季夺取罗安达之战中全心全意地支持人运。用苏制AK-47自动步枪和掷弹筒武装起来的居民委员会的民兵，在8月初以前帮助人运游击队把解阵和安盟

赶出了首都，他们还把大多数支持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巴刚果人和奥文本杜人也赶了出去。除了控制罗安达之外，这些委员会还在人运占领南部港口洛比托和本格拉、东部的梅朗热和卢西以及中南部的里斯本（万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北部，人运还不能从解阵手里夺取主要城市。内图主义派到1974年8月才开始组建新的人运军队“争取安哥拉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各地的行动委员会又成了招募新兵的基地。到1975年年中，全国各个委员会的武装民兵总数大概超过一万人，而人民武装力量当时可以作战的部队仅略多于二千人，另外五千到六千人还在训练中。人民武装力量从民兵中挑选最好、热情最高的青年补充兵员，很快组成了一支三万多人的部队。

使人运获胜的还有其他几个因素，最重要的是优越的策略感和古巴人提供的巨大援助。内图主义派运用谋略夺取胜利，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尽管内部有人反对，人运还是参加了1975年1月由葡萄牙人建立的过渡政府。这个政府给三个对立的全国性派别以平等的地位。人运于是在这个岌岌可危的政府内部左右局势，使之有利于自己，抨击对手，利用同情自己的葡萄牙左翼军官巩固自己的地位。人运很早就夺取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城镇洛比托、本格拉和新雷东多，这些地方后来成了苏联武器和古巴军队的登陆点。由此可以再次看到人运的策略技巧。另一个事例就是人运还同曾在葡萄牙军队中服役、敌视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和解阵、原来的加丹加部队结成暂时的联盟，这为人运增添了四千到六千训练有素的部队，并帮助它控制了钻石矿所在地安哥拉的东北

部。

古巴在人运获胜中的作用——对安哥拉人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西方来说则是外来干涉——是有很多的争论。在这场各有偏见的辩论当中，某些事实变得模糊了。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人运是靠自己的力量夺取了对罗安达、安哥拉东部和南部大多数主要城镇以及卡宾达的控制的。此外，人们还往往忘记，外国对内战的干涉并不是由古巴人开始的。当古巴还只是派出顾问帮助人运的时候，扎伊尔正规作战部队就已经在安哥拉北部同解阵并肩战斗，而南非则派部队越过纳米比亚边界，进入安哥拉南部帮助安盟。但是古巴的援助归根到底还是关键性的，因为人运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击溃解阵并遏制安盟。内图后来坦率承认，苏联的武器和一万五千到二万名古巴作战部队，是阻止南非1975年10月初发动的攻势的“主要力量”。如果没有古巴的干涉，安哥拉很可能已被肢解为三部分，各为一个民族主义派别所控制。

人运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在独立时却苦于应付内部问题。人民权力委员会并不是可靠的支持基础。阿尔维斯很快就被证实有他自己的野心，并且企图利用这些委员会来促其实现。极左分子往往控制着人民权力委员会，他们的主要兴趣是要煽起一场革命，而内图主义派则希望首先巩固他们对国家的控制。更糟糕的是，在人民权力委员会未经培训的青年成员中，存在着大量目无法纪的现象，他们大肆抢劫、强奸、敲诈勒索。最后，整个人运仍旧是由各种小组和个人组成的不稳定的联盟。在1974年夏天人运一分为三之后，内图曾以他们忠

诚支持者形成小核心作为中心重建了人运组织，小核心中的主要人物有党校校长拉腊、他的主要助手卡洛斯·卡里沙·“迪洛尔瓦”、人运驻布拉柴维尔办事处主任若塞·埃杜阿多·多斯桑托斯和游击队全面的司令员恩里克·蒂莱斯·“伊克”·卡雷拉。这些人大体上代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时期人运的国外部分。登博斯森林游击队领导人阿尔维斯把“国内”游击战士和城市工人带进这个联盟。洛博·多纳斯门托代表国内地下政治组织以及大批同他一样在安哥拉国内被葡萄牙当局长期囚禁在监狱里的人运支持者。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一样，人运在独立时，领导人中有相当一批坚强有力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战时追随者，但是他们几乎都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美国一位研究人运的分析家约翰·马肯对于1974年9月选出的十人政治局和三十五人中央委员会的狭隘的种族基础印象很深。他说：“同过去一样，领导人中混血人、‘同化人’和姆本杜人占压倒优势。”

独立时的安哥拉

独立之前的一段时间，安哥拉处于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是葡萄牙人推动的，虽然为时已晚，他们企图通过发展这个国家来赢得非洲人的心，使他們不支持民族主义事业。一般说来，葡萄牙殖民地比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贫穷得多，更加不发达，因为葡萄牙本身就很贫穷。直到解放战争发动之后，里斯本才改变阻止其他西方国家在葡属殖民地投资的政策，邀请英国、比利时、美国和法国的公

司进入这些地区。安哥拉由于资源丰富，有石油、铁矿和钻石等等，吸引的投资最多，结果在独立之前的十年间，这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暂时的繁荣。与此同时，战争和葡萄牙人的反叛乱措施使得农村人口至少三分之一离乡背井。所有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种种的变动，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

稍稍看一下安哥拉的社会经济指标，就可以说明安哥拉是一个很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例如，在葡萄牙人统治的最后几年，曾大力推行公共教育，但非洲人中间识字的不到百分之十。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生活在农村，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八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订的把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等社会指标综合编成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在从一到一百的级别中，安哥拉处于第十五级（比扎伊尔还要差）。主要出口产品是原料和矿产，传统的出口产品有咖啡、棉花、香蕉、铁矿石和钻石。

六十年代中期，在卡宾达发现了重要的油田，这急剧地改变了局面。尽管与中东，甚至与尼日利亚相比，它的产量很低，1975年每天约十四万桶，但这给政府增加了每年四亿到五亿美元的收入，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陡然上升到四百七十四美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居第二位。石油很快代替咖啡成了主要的出口商品。由于有这个大财源和西方的投资，葡萄牙政府得以实施一项规模可观的工业发展规划。在1968年到1973年的第三个发展计划期间，在矿业和制造业中的投资就达五亿美元。1962年以后的十年，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九，1973年，独立之前的最后一个正常年

份，曾高达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到那时，经济中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为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这在非洲殖民地当中是很高的。同时，安哥拉的工业企业范围也很广，有五百家工厂被划为“重”工业企业。这种工业迅速增长的后果之一，是产生了一批挣工资的非洲人。七十年代初期，工业中有十万非洲工人，矿业中有三万五千，渔业有五千到一万，建筑业有二万到四万，交通运输业有五万五千，服务行业有七万以上。

农业部门也在变化。安哥拉农民的主体，仍是约一百二十万户自耕农，每户有两公顷或不到两公顷的土地，他们生产的粮食几乎全供自身消费。但是，快要独立的时候估计有十五万非洲人在为国内市场和出口而从事生产。1971年，他们的产品仅占出口农产品总值的百分之十四，其余部分由约八千葡萄牙殖民者提供。但是很明显，非洲人商业农场主阶级正在形成之中。此外，主要在北部地区的咖啡种植园，产生了绝大部分由奥文本杜族流动工人组成的小小的农村无产阶级，人数在独立前为十四万人。

在这个经济增长时期，有大批葡萄牙移民来到安哥拉，使定居者的总数从1960年的十七万二千人增加到1974年的三十三万五千人。这些新移民绝大多数是所谓“白人渣滓”，他们的特征之一——教育水平之低，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1950年到1964年新迁来的十万七岁以上的人中间，受过小学四年级以上教育的人不到百分之六。他们占据了大多数低下的工作，而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这些工作总是由非洲人担任的。出租汽车司机、卡车司机、渔业工人、旅馆服务员、报贩和

小店主,甚至在贫民区,到处都是许许多多葡萄牙白人。这种形势严重限制了非洲人取得经验的机会。因此,当葡萄牙人大批外逃时,他们不仅在管理和技术的高级岗位上,而且在职业的最低一级,都留下了一片真空。

这种短促而突然的发展在安哥拉造成的变化,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后来的内战所造成的大混乱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据一位美国学者杰拉尔德·本德计算,葡萄牙人为了把游击队同他们天然的支持者和粮食来源隔绝开来,曾把一百万安哥拉人,即非洲人人口的六分之一赶进了重新定居的营地。这造成农民的“社会和心理的安全感严重崩溃”,以及“经济生产率和粮食供应的显著下降”。另外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人从安哥拉逃到邻国扎伊尔和赞比亚。数十万安哥拉人为了寻找工作和求得安全而进入城市,主要是罗安达。首都罗安达的人口在1950年到1960年之间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二十五万人,在1961到1970年的十年间又翻了一番,达到五十万人,其中五分之三是非洲人。到独立时,非洲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八在城市地区居住。

然而,安哥拉社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震荡是独立时发生的。三十多万葡萄牙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匆匆离开安哥拉,抛下他们的住房、公寓、工厂和农场,带走了所有能搬动的东西,包括小汽车和卡车。原来由葡萄牙人支配的社会随之崩溃。这是1962年一百万欧洲人离开阿尔及利亚以后,又一次最大规模的白人从非洲外逃。安哥拉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和经理、技术工人、政府职员、农场主和工厂主,以至出租汽车司机和店员都跑掉了,使整个经济实际上陷于瘫痪。国内非

洲人的流动，规模之大可能与此相当。在北部咖啡种植园工作的十万奥文本杜人被解阵赶跑、颠沛流离，返回南部老家。在争夺罗安达的战争中，生活在罗安达的三、四万奥文本杜人和巴刚果人被人运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去。还有数万人干脆逃到丛林中去躲避战火。

内战和葡萄牙人的外逃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惊人的。国民生产总值据说仅下降百分之二十，降到1976年的十八亿美元，实际上在大多数领域，生产下降的幅度要大得多，只是石油出口值增长，才使得国民生产总值保持这么高的数字。例如，工业生产在1975年到1976年下降约百分之七十五，咖啡出口从独立前二十万吨的水平下跌到七万二千吨。实际上只是靠库存才使咖啡销售保持这一水平，因为在1975年到1976年的收获季节，几乎没有收上来新的咖啡。安哥拉南部的卡辛加铁矿的开采完全停顿。钻石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二。畜牧业几乎全被摧毁，渔业也是如此，全国八百条船有三分之二被毁坏或带走。只有石油出口在开始有所下降，后来得到迅速的恢复，为政府提供了唯一可靠的收入和外汇的来源。

崩溃的程度还可以用别的标准来衡量，显得更加惊人。由于外逃的葡萄牙人随身带走了全国二万八千辆卡车中的三分之二，整个国内运输系统实际上被一扫而光。由于内战破坏了桥梁和公路，剩下的卡车也无法运行，城镇与农村隔绝。在首都，为了获得食物要耗费居民整天的精力。独立以前，安哥拉仅进口所需粮食的百分之十，而在独立以后的头几年，所有商品粮有一半靠进口。这不仅仅由于购销系统被打乱，粮食生产本身也大幅度下降了，因为葡萄牙农场主抛弃了

六千二百五十个商业农场。这不仅影响咖啡、香蕉等出口作物，也影响了大米、玉米等粮食作物，以及糖、肉和鱼。所有的东西都突然变得严重短缺，甚至根本得不到了。

由于葡萄牙人的大批外逃和内战，全国经济几乎完全崩溃，农村地区有很大一部分还不在于人运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特别是在安哥拉的粮仓，中南部高原地区，安盟游击队还极为活跃，严重破坏经济。正是在这种很不美妙的形势下，人运取得了政权，并力图推行一套政策来恢复经济，并使之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人运这样做，肯定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安哥拉面临的灾难深重的形势也使人运所能采取的行动受到极严的限制。如果说这一切似乎还不足以搅乱人运的努力，而人运内部分裂的再度出现却又一次挑起了重大的政治动乱，使人运发展的历史再次中断。

意 识 形 态

在人运往往错综曲折的历史中，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很可能就是它的意识形态了。开始表现为以根本改造安哥拉的经济和社会为己任，后来发展成明确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人运在独立之后的纲领的基本信条，在内战尚未结束时发表的关于建立人民权力机构的法令中就已经很明确了。独立之后不到七个月，人运已经正式宣布，它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意图建立先锋党，相信有必要建立集中领导的、有计划的、国家支配的经济。同时，安哥拉领导人还试图把他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同“人民权力”的概念和机构调和起来，后者在

人运战时半解放区的经验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并被广泛地看作人运心目中的革命的核心。但是想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努力，最后酿成人运高级领导内部争夺权力的两派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对抗。

第一个阐明人运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的正式文件，是1976年2月5日颁布的《关于人民权力的法律》。这一法律非常明确地解释社会主义就是群众参加、直接民主和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动员。法律的前言说明了人民权力是如何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诞生的，而且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殖民资产阶级的“人民起义”的成果。法律说，人民权力是阶级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基石。法律还宣布，民族解放斗争“已经保证了在全国发展和巩固人民权力的条件”，而人运的章程包含有“人民群众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原则。法律列举了人民权力制度的各种机关，从居民区和村庄到全国一级。每个单位都将设立由全体成年居民组成的“人民会议”，和一个选举产生的由八至十五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在地方上，人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和组织群众，讨论并解决他们自己最迫切和紧急的问题”，并保持警惕，实行防卫。这些委员会还要促进“集体形式的生产”，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行活动——自由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服从上级机关。从表面现象看，人民会议同人运之间的联系是极为脆弱的。各级人民会议的候选人要由人运和其他全国性组织的代表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挑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和决定要根据人运的“公正的政治路线”的“启发”进行。在选择“人民委员”亦即国家在村、市和省级的代表时，人运可以

发表意见。但是,对人民会议和人民委员会系统来说,真正的最高权威是内政部,这样实际上创立了一个与人运平行而不受其控制的组织。

在人民权力正式实现组织制度化几个月以后,人运开始更为明确地规定其意识形态纲领,其中提出了一种与“人民权力”截然相反的关于权力和组织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类似我们在莫桑比克问题上已经谈论过的那种现象,即党的纲领与战时的传统相冲突。1976年10月举行的人运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采纳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并确定了建立“人民民主”的目标。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把工人称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为“主要力量”,要求建立“工农联盟”。决议强调说,“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据说,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国建设的新阶段,主要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1973年的生产水平。决议非常重视“人民权力”,但同时又反复强调“有计划的经济的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集中的计划应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准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基础和行动的指南。”要求人运“确保制订一项单一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计划”,其中把农业作为发展的“基础”,把工业作为“决定因素”。由相当于内阁一级的、在政府的每个部设有一个局的全国计划委员会负责制订这个全国计划。

一个以人民权力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制度,按其本质来说,是群众高度参与和非中央集权的,而一个根据全国计划进行管理的经济政治制度,按其本质来说则是中央集权的,对群众

参与的程度是加以限制的,对于这两者之间固有的矛盾,人运中央的决议没有提到,甚至根本不承认其存在。这些决议详细加以论述的,是一个具有紧迫政治重要性的问题,即党和政府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问题。这一问题具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典型的现象,即固有的国家集权倾向。关于这一点,决议指出由于缺少党的干部,以及“过低估计人运的领导作用”,使党和国家的关系受到歪曲而“有利于国家机器。”这一点特别使人担心,因为国家继承了殖民地时代的“机构和腐败的弊病”。“缺乏经过训练的干部,不得不使用那些同殖民主义政策妥协性最少的职员,并设法使他们的心理和官僚习性‘非殖民化’”。但是,旧的国家机器仍然有“官僚主义”的弊病。党和国家之间非常麻烦的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即最有政治含义的方面,是安哥拉所特有的:党不象国家那样控制了人民权力委员会,因而国家有可能利用这些委员会来反对人运。因此,决议严重关切重新肯定党对人民权力机构的权威。决议说:“只有当人运的机构已经足够坚强,组织上稳固,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点看来已经成熟时,才能进行(人民权力委员会的)选举。”建立人民权力委员会“是革命先锋队的一项职能,而不仅仅是国家的职能。”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充满对人运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不祥暗示,这不仅涉及人民权力运动,而且还包括人运内部的政治分歧。决议提到某些同国内外反动派勾结的分子的“阴险活动”,还提到某些“极左的派别在助长破坏性的倾向,并利用领导人的名义企图制造思想混乱,以破坏人运组织机构的完整性,在战斗员中制造分裂”。决议号召同“分裂行为、宗派主义

和机会主义”作斗争，并说要采取坚定的措施打击那些散布“危害人运内部团结”的谣言的人。有一点决议没有讲，但是谁都知道，那些被含蓄地指责为进行宗派活动的人，就是人民权力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利用这一运动建立单独的权力基础，来向内图的领导权挑战。

危 机

酝酿已久的危机终于在1977年5月下旬成熟了。当初担任主管人民权力机构的内政部长阿尔维斯和人民武装力量副政治委员若泽·万杜尼姆这时试图推翻内图及其支持者。5月21日，这两个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指责他们是“黑人种族主义”派别的领导人，在党内提倡“分裂主义”，并散布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还说他们一直在破坏安哥拉和苏联的友谊，散布流言蜚语，说人运领导集团是反苏的和毛主义的。这两个被驱逐的领导人随即把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显然早已准备好并得到人民武装力量以及几乎所有全国性群众组织一部分成员的支持。阿尔维斯对罗安达的居民区委员会寄以很大希望，想靠它们来争取公众对政变的支持。这次夺权的企图至少牵涉到五个省长、贸易部长、驻扎在罗安达的第九旅代旅长、人民武装力量的副总参谋长和总政委，以及两名政治局委员，即阿尔维斯和雅科布·卡埃塔诺·雅昂。这些共谋者于5月27日清晨开始行动，几乎取得了成功。内图派之所以得救是因为罗安达人民没有任何支持政变的表示，加上古巴的坦克迅速进行干涉。这一事变不过十个小时

就结束了。但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阿尔维斯及其同伙打死了好几百人，其中有七名中央委员。

对于阿尔维斯的政变有种种解释。最为流行的一种说他是黑人民族主义者，他的行动的目的是要清除在人运最高领导层占据显赫地位的白人和混血人。阿尔维斯本人也制造这种形象，这在安哥拉人中间有广泛的吸引力，尽管他的一些亲近的合作者是白人。第二种解释说，阿尔维斯是一个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化身”的战时领导人，凭过去的功绩有资格领导国家，据报道他曾对内图讲过这样的话。人运组织的性质本来就松散，战争期间有过许多相互隔绝的“隐蔽所”，阿尔维斯曾多年几乎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根据以前阿尔及利亚的经验，这种形势往往造成军阀主义，后来又演变成叛乱。也有人认为，阿尔维斯和内图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是叛乱的原因。内图本人曾宣称，阿尔维斯“希望由工人阶级实行统治，而且单独实行统治，并且不停顿地进行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这种态度似乎有可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阿尔维斯是对贫民区的工人有号召力，而内图则在小资产阶级当中有许多支持者。不管阿尔维斯采取行动的原因是什么，有一点值得记住，许多其他的革命都曾以某种形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从苏联的托洛茨基到埃塞俄比亚的人民革命党，当革命的领导机构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把自己转变为合法政府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个极左的反对派，起来宣布革命已被出卖，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发言人。

这场未遂政变对人运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在党的支持者看来，这次危机使人极其沮丧和思想混乱。其次，引

起了一场清洗和在所有全国性组织中进行“整顿”的运动。第三，整个人民权力运动戛然而止，所有建立人民会议的选举都无限期推迟。第四，对于建立更强有力、更统一和更加集中的先锋党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最后，对人运的意识形态也有影响，有的比较暧昧，有的极为明显，但都有利于在安哥拉新的政治体制中加强集权和国家权力的倾向。这些影响，有一些在1977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变得显而易见了，在这次大会上，人运正式把自己变为一个先锋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党”。

人运被正式称为“把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团结成“巩固联盟”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一政党的建立，将导致“革命民主专政”的建立，而这又将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为无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这一思想路线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这种说法在批驳阿尔维斯的观点上也有政治意义，阿尔维斯主张只有工人阶级——也就是他在贫民区中的那些支持者——才有权利领导革命。大会没有把阶级斗争说成是安哥拉现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显然，这是针对阿尔维斯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的反应。为了改造成先锋党，人运要开展“大规模的整顿运动”，只有在“干部培训学校”彻底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教育的战斗员才能成为党员。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对人运的支持者加以明确区别，把他们区分为“战斗员”、“志愿者”和“同情者”。同情者将降为群众性全国组织的成员。只有首先当志愿者，接受意识形态的训练，而且取得模范工人的资格，然后才能成为战斗员。

代表大会还详细分析了人民权力运动的错误，甚至重新规定了“人民权力”的含义。指出，按正确的解释，人民权力与国家权力是同义词。人民权力并不意味着直接民主，而是要通过“革命的国家机器”和先锋党间接代表工人的利益。关于人民权力的法律因此要被撤销，因为这个法律“表达了小资产阶级关于国家权力的不正确的概念，对民主和劳动群众保证和巩固其政治权力的办法持有空想的观点”。安哥拉人民必须懂得，“国家机器的各种机构本身就是人民权力的机构”，党必须成为“根据党的决议行事的人民权力机构的领导核心”。人运代表大会没有点名地谴责阿尔维斯制造了一个平行政府，“脱离甚至反对国家机器的机构，特别是中央国家机构”。主张“国家”高于“人民的”权力，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中完全是正统的。但是，根据安哥拉革命的条件，这意味着人运对于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曾一度看作群众参与政治的核心事物，开始贬低其意义。

政 策

独立以来，人运忙于解决政治问题，但仍然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沿着社会主义路线改造经济和刷新安哥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人运是以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为指导的，但更多的还是根据安哥拉当时的具体形势和人力、知识有限的情况办事。总的说来，人运在尝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用于安哥拉的条件时是比较讲究实用的。

1. 经济政策

同其他经历过白人殖民者突然大批外流的非洲国家相似，安哥拉不得不很快匆忙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葡萄牙人留下成千个被抛弃的农场和工厂，政府不能不加以处理，而这是在人运中央1976年10月通过实行社会主义的决议之前。1976年3月初步提出了国有化的政策，规定凡是属于“破坏分子”、“叛徒”、解阵和安盟成员以及“无正当理由”四十五天不在国内的人的财产，都将予以没收，不予补偿。还规定政府可以接管那些未经许可将资金汇往国外或减少生产的人的财产。后来，政府又规定一项目标，在1980年以前将国内五百家“重”工业企业中的百分之八十予以接管。由于根据这一法令所采取的国有化措施和葡萄牙人的出走，政府最后接管了国内工业资产的很大一部分。到1977年12月人运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政府已经控制了某些行业（纺织、制糖、胶合板和金属工业）企业的百分之百和其他一些行业（钻石、造船、皮鞋、啤酒、火柴、人造黄油）企业的百分之五十以上。1979年年中又把几百个被抛弃的产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这样，安哥拉大概接近实现其将国内重要企业的百分之八十收归国有的目标。

人运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性领域，是同那些开采这个国家的矿产财富，特别是石油和钻石的多国公司的关系。人运的作法是始终如一的，一直努力同多国公司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取得控制权，但在投资和技术方面，仍然依赖那些公司。有趣的是，在和西方石油公司打交道时，安哥拉向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建立这种合伙关系的阿尔及利亚政府请

教。同阿尔及利亚一样，安哥拉在制定石油法规和同多国公司打交道时，也利用美国的一家咨询公司，阿瑟·D·利特尔公司。同样，安哥拉也象阿尔及利亚那样先成立了一家国营石油公司即“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然后设法同那些正在开采安哥拉石油的主要西方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协定，接管对石油工业的控制。1978年9月通过的一项新石油法规定，安哥拉愿意或者采用合营的方式，或者先接管全部控制权，然后再订立产品分成的协定。1978年12月，安哥拉同主要生产者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签订了第一个协定，把它在卡宾达的子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管理权和产品转给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1979年9月，同德士古公司签订了第二个协定，预料这将成为以后同外国石油公司打交道的楷模。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接收了德士古在安哥拉北部沿海开采石油的全部所有权，但和德士古订立了产品分成协定。德士古继续经营这个海上油田，并同意为扩大现有油田和勘探新储量投资三亿六千万美元。开始，德士古将取得预计每日五万桶产量的大约百分之六十，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的份额将随着产量的提高而增加。

这些交易以及十几项正在谈判的交易，确立了石油工业的十分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新的安哥拉经济的基石。石油将成为政府和安哥拉整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到1980年，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在卡宾达的联合企业所带来的收入，占安哥拉政府十亿美元石油收入的绝大部分，大约占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再加上德士古公司的油田和海湾公司八十年代初发现的新油田，安哥拉的石油收入到1983年可能达到二十亿美元，这比独立

初期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还取得了国内主要炼油厂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并同好几家法国公司谈判与德士古相类似的交易，而且将逐渐控制国内销售系统。

安哥拉同代厄芒公司打交道时也采取了同样认真做生意的态度。代厄芒是一家西方和南非合伙开办的公司，拥有在安哥拉东部五万公顷土地上的钻石开采权。安哥拉独立以前，全部钻石都是这家公司生产的。后来钻石产量下降到独立前水平的百分之十五，这时代厄芒公司力图放弃这笔财产，特别是想摆脱沉重的债务，于是要求安哥拉政府对这家公司实行完全国有化。但是，安哥拉政府拒绝这样做，而在1977年8月迫使代厄芒公司同政府建立合营关系，由安哥拉取得百分之六十一的产权，由代厄芒继续负责推销钻石。总的说来，安哥拉政府在同西方大公司打交道时，更有兴趣的是订立这一类的协定，而不是实行完全国有化，只有葡萄牙的公司例外，和葡萄牙公司打交道时，往往掺杂有感情因素，实行完全接管。

在改组工业部门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生产和管理体制。国有化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使生产恢复到高水平。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熟知的老问题：严重缺乏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缺少零配件；原料匮乏；运输困难。1978年年中担任计划主任的卡尔洛斯·罗沙比较详细地解释了这些绊脚石是怎样影响经济并在个别企业的每月生产中造成“令人难以置信的曲折”。管理几百个被遗弃的企业所遇到的问题，远远超过了政府有限的力量。

除此以外，安哥拉还面临着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即国有化的企业是由工人“集体”管理，还是由政府任命的经理

“个人”管理。这种冲突当然不是安哥拉所特有的，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出现的问题。安哥拉所特有的，这一问题同内图 and 阿尔维斯的斗争纠缠在一起，对安哥拉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独立之后，立即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工人自己管理，这是工人们主动行动造成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被抛弃的企业能够以某种方式继续运转。但是，在行动委员会和工会组织“安哥拉全国工人联合会”看来，工人管理是一个必须加以捍卫的重要原则，不容国家干涉。在 1976 年和 1977 年，政府设立的管理被遗弃企业的“干预委员会”遇到人民权力行动委员会和工会的自治委员会的顽强反对。如一位部长所说，结果是“陷于瘫痪”，这是“宗派主义分子”（指阿尔维斯及其支持者）所鼓励的，有意挑拨工人和人运之间的关系。人运逐渐平息了这一萌芽状态的工人管理运动。实际上，由于这一运动已成为政治威胁，内图主义派曾试图彻底加以粉碎。1976 年 3 月关于国有化的法令规定，工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参加管理。然而，同年 10 月人运中央的一项决议要求修改上述法令，在国有化的企业里，“用个人领导代替现行的集体领导”，“人运和安工联在企业中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利于政治工作”，而且要求“努力提高生产，提高纪律性、革命警惕性和经营管理能力。”人运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个人指导”的原则，这意味着政府任命的经理具有支配大权，同时还肯定了人运直接控制企业的原则。实际上，代表大会以后，在企业中，安工联的委员会被解散，成立了人运的支部。党的代表单独地或者同严格挑选的安工联会员一起，负责在工人当中执行纪律。在经营管理方面，工人只剩下非常有限的协商作

用。这些措施，加上阿尔维斯的未遂政变之后“人民权力”运动的被击败，使劳工骚动大为减少，但也有效地扼杀了自我管理运动。有趣的是，十年前在阿尔及利亚，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当时自我管理运动同本·贝拉和布迈丁的权力之争搅到一起。在埃塞俄比亚，在小得多的规模上进行了工人参与管理的种种试验。甚至于有限制的“工人论坛”这种形式，由于反对派企图利用这些机构来谴责和破坏军政府，几经挣扎也就完了。

人运在农业领域的政策极为谨慎，范围也很有限。实际上，政府除了在现代农业部门中不得不处理被遗弃的农场，几乎无所作为。葡萄牙人丢下了六千二百五十个农场，但是到1978年年中，政府由于缺少人员，还只能管理一千五百个。大多数葡萄牙人的农场都被改成国营农场，少数成了合作社。国营农场规模往往很大，因为政府把许多葡萄牙人的农场合并成“组合生产单位”，作为一个实体，以集中管理的形式进行经营。到1978年年中，共有58个这类“组合生产单位”，归并了四百五十家农场，雇用十七万五千工人。农业部还控制了四个原来属于葡萄牙政府或西方财团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雇用十五万工人。1976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遭到了失败，这进一步加强了办国营农场的倾向。合作社只成立了三百个，而耕种活动看来还完全是个体的，“集体的”仅限于政府提供的服务事业。这样，合作社也卷进了摧毁工业中自我管理运动的内图主义派和“宗派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之中。据左翼杂志《亚非》报道，“由于宗派主义分子同中央的一切指示都对着干，在政府和党的机关内造成一片混乱，最后无法对现存合作社的数目及其生产情况进行精确的统计。”由于建立耕种合

作社遇到了这些问题，政府降低了它的短期目标，决定重新开始，建立“预备合作社”，把受过专门培训的“鼓动员”派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集体生产和现代生产方法的好处。据报道，到1978年年中，全国共有一百五十个这种预备合作社，共有社员一万五千到二万人，另有三百个正在组织过程中。

对于农民，安哥拉政府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既没有象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那样实行土地国有化，也没有推行集体化。1976年10月，内图总统在安工联的一次大会上说：“如果我们现在开始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就会立即感到，由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他们成了牺牲品。”他没有否认集体化是最终目标，但他说整个过程将是渐进的，要从组织合作社开始。社会主义意味着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但是，他又警告说：“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漫长、复杂和困难的。”他说，把笔墨浪费在“每个周末”宣布“社会主义将在星期一早上到来”是毫无意义的。^①在短期内，政府主要关心的很明显是生产而不是意识形态，对待安哥拉北部葡萄牙人遗弃的咖啡种植园的态度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原先准备在古巴的帮助下，把这些种植园变成国营农场，但是失败了。于是，政府不事声张地鼓励原来的奥文本杜族农场工人回来，把他们安置在咖啡庄园里，成为小业主。实际上，安哥拉政府是在制造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认为是新生的富农阶级。

在农业领域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没有使生产迅速恢复。城市的食品短缺仍然十分严重。到1978年，安哥拉在国内市场

^① 《人民权力》杂志 1976年第5期（1976年11—12月）。

上销售的粮食仍有一半靠进口。供出口的作物，情况同样不妙。1978年咖啡产量是二万六千吨，而1973年是二十一万吨，菠萝产量分别是四千四百吨和五万五千吨，棉花一千吨和七万九千二百八十一吨，剑麻一万五千吨和六万零三百三十吨，糖分别为三万九千吨和八万一千九百吨。^①

收成不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缺乏管理农场的人员，运输系统瘫痪，最重要的是，安哥拉的粮仓是中部高原地区，那是安盟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事实上，政府一直十分警惕，安盟很容易利用对政府农业政策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在安盟主要支持者奥文本杜人中间存在的不满。这是使政府决定把奥文本杜工人安置在葡萄牙人遗弃的农场上的因素之一。

2. 政治组织

人运建立新的政治组织和行政管理基层组织政策，一方面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人民权力运动的反面政治经验的影响。两方面的影响都要求建立由非常慎重选择的、战斗性强的成员组成的先锋党。为建立新党所花费的力量，比改造旧的殖民主义行政机构要多得多，旧的行政机器由于成了在安哥拉实行激烈社会主义变革的重大障碍而很快灭亡。

把人运改造成工人阶级的先锋党是一个缓慢、艰苦的过程。同所有列宁主义模式的党一样，支部成了由十一人政治局和四十五人中央委员会支配的从上面下等级制组织结构的

^① 《安哥拉1978年新闻公报》。

新的基础。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和控制力，并推动工人阶级更多地直接参与活动，人运决定主要按工作单位而不是按居住地区设立支部。内图在1979年9月因患癌症过早去世，在这之前，他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六十人，把增加的十五个名额保留给农民和工人，由此可以看出他希望改造人运最高领导层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进行的“整顿运动”，目的是区分“战斗员”和“同情者”，并且只接受最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宗派主义”以及“部落、地区和种族偏见”，通晓“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人入党。后来证明，人运对这一运动十分认真，花费了很长时间。人运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申请入党的人，还建立了全国和地区的党校，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1979年初党公布的新党员总数表明，党的大门开得很小，把得很严。经过总共有五十多万安哥拉人参加的二千三百七十四次“整顿会议”、四千九百五十二次“提高觉悟会议”和一千五百七十二次“工作单位会议”，新人运共建立了六百五十四支部，仅有八千七百五十名战斗员和六千三百三十八名志愿者。“同情者”的人数也只有三千三百八十六人，人运青年组织的人数不到四千人。许许多多的“整顿运动”也影响到其他的全国性组织，特别是安工联，因为人运千方百计要将所有阿尔维斯的支持者从这些全国性组织中清除出去，使所有的机构都更加牢固地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人民防卫组织”于是成为安哥拉最重要的群众组织。到1979年，这一组织成为遍布全国几乎每一个村庄的民兵队伍，共有约六十万人，其中有五万人据说同正规军一道同安盟游击队和不断侵入安哥拉南部的南非军队作战。人民防卫组

织的规模之大似乎反映出国内许多地区仍不安定，特别是南部。但是，这也体现了人运在战争期间的传统，由武装起来的人民保卫自己的革命。

尽管人运的“整顿运动”相当彻底，但是“宗派主义”仍被看成是潜在的主要问题。例如，人运总书记拉腊 1978 年年中在一次接待来访者的谈话中并没有排除这一现象再次出现的可能性，称之为“革命运动的逻辑的一部分”。同一次谈话还表明，对宗派主义的担心甚至影响到人运的意识形态观点。当问到阶级冲突在安哥拉正在进行的革命中是否还处于中心位置时，拉腊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并说党准备使之变得“更积极、更尖锐、更自觉”，成为启发政治觉悟的过程的组成部分。但是他又提醒说，不能以“不恰当的方式”强迫推行，他解释说，“因为我们不能一方面希望实现民族团结，同时又挑起有害的分裂和人民所不理解的矛盾。”^①他说，因此，阶级斗争将主要限于在党内进行，而不是在整个社会上进行。这里又可以感觉到阿尔维斯事件对人运意识形态的微妙之处的影响。

几乎所有人运领导人都曾反复诉说，他们为了把葡萄牙人旧的殖民行政机构改造成能够实现所设想的激烈变革的新的“革命国家机器”遇到了巨大困难。这些困难的根源，有机构和态度两方面的问题，两者结合造成了人人谴责但又没有人能够制止的“官僚主义”现象。首先，由于严重缺少干部，人运不得不利用那些曾为殖民当局服务而被他们叫做对葡萄牙当局“妥协性最少”的安哥拉人，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革命热

^① 《亚非》杂志 1978 年 6 月 26 日。

情，往往对革命抱消极抵抗的态度。很明显，这些原殖民政权的文职人员，大多数很难成为建立“革命国家机器”的材料。机构方面更为严重，阿尔维斯流产政变的影响非常明显。首先，在全国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的选举被推迟到1980年秋天，即独立之后五年。其次，还存在着后怕，担心党不能严密控制的任何新机构都可能反过来反对党。结果人运只好抓住旧的殖民行政机构不放，这些机构至少不构成任何威胁。由部落酋长行使地方权力的旧的酋长制度也没有取消。于是，农村地区仍然处于传统酋长的影响之下，使得农村地区的任何根本变革都更加复杂化了。

因此，人运实际上保存了很大一部分高度集中和集权的殖民主义国家机器。人运把殖民政府从未承担过的社会主义任务交给了这个高度集中的国家机器，这就使“官僚主义”变得更加恶劣。政府在努力控制现代经济成分的时候，还试图同时办各种的事情。例如，住房部把国内所有的建筑甚至维修工作都垄断起来，商业部力图把国内购销工作全部控制起来。内图总统终于公开反对这种过分集权的现象，因为这有使整个国家瘫痪的危险。他说，国家在建筑行业中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人大军”，安哥拉人甚至无法找到或者由个人雇用一个小木匠或者泥瓦匠为住家做点小的修理，要盖房子就更谈不到了。同样，国家也完全窒息了运输部门中私人营业活动，使从农村向城市运送粮食成了非常复杂的事情。他以为，在这两个半瘫痪的部门中允许私人经营，不应该看作革命中的“政治挫折”，而只是承认国家没有能力马上包办一切。他宣布，国家特别不适于帮助农村地区，他说：“政府花了很大力

气解决大多数问题，商业的问题，运输的问题，住房的问题，等等。但是目前，我们必须承认，政府无力解决比如说农村人民的大多数问题。”^①

3. 社会服务

政府有关社会服务的政策，受政治和社会需要的影响很大，需要满足人民对于以往所没有或者极少有的社会服务的要求，不管政府有无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在人运政府建立之前，居民区行动委员会就初步实行了全民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原则。1976年1月，当内战还在北部和南部激烈进行的时候，人运就发动了全国性的扫除文盲运动。扫盲运动的指导方针之一规定优先注意帮助工厂工人、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农民以及人民武装力量的战士。到1976年底，五万七千三百个成年人参加了识字班。普通教育也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发展。从1973年到1977年，小学学生人数从三十四万人增加到超过一百万，中学生从七万二千人增加到十万以上。教育质量则不可避免地大大下降，首先是因为大批教师外逃，其次是学生人数激增。根据人运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份关于教育的文件，在二万五千名学校教师中，有百分之五十二只受过四年教育，只有百分之七有“起码的教师资格”。尽管如此，代表大会还是规定了极不现实的目标，要在1980年以前，使所有学龄儿童都入学。这是政府根本做不到的。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国家必须把教育完全管起来，使教育大纲能以马克思

^① 1978年12月11日《安哥拉新闻》。

列宁主义为基础。这就使事情更加难办。这就是说，所有天主教堂和新教教会开设的学校都得关闭，而在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中，这两类学校是主要支柱。迄今公布的唯一的政府预算，即1978年预算所提供的数字，使人难以确定政府教育经费的精确比重。^①

政府为改革医疗制度也做了极大的努力，使之扩大到全民的范围。重点在预防而不在于治疗。政府进行了好几次大规模群众防疫注射运动，绝大多数安哥拉人都接种了疫苗。然而，政府在这一领域能够利用的手段可惜有限得很。安哥拉的医生屈指可数，政府不得不严重依赖外国的援助来向全国提供免费医疗。古巴成了安哥拉医疗服务事业的支柱。根据人运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材料，1977年，安哥拉共有四百一十八名古巴的医生和卫生技术人员，并表示1978年将增加到约九百人。1977年，古巴医生为一百万安哥拉人看了病，做了一万六千例外科手术，并为近一半在医疗机构中出生的婴儿接生（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人中的六千人）。很明显，医疗服务同教育一样受到特别的重视，但是这方面的经费到底有多少也不清楚。

结 论

安哥拉的历史是曲折多变、充满危机的历史，这和莫桑比克不同。三派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战争，人运最高领导人之

^① 1978年预算有一项为“教育、卫生、体育、文化”，另一项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不可能分清教育经费的比例。

间的内部争斗，使安哥拉多年来消耗了元气。到1980年初，正在进行的这两方面的斗争看来还没有完结。安盟仍在南部积极活动，而内图主席的去世再次在人运内部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

安盟和南非仍然是人运政府最担忧的根源，一再使它把精力、资源和注意力转向国家的防务。尽管人民武装力量在古巴人的支持下多次向安哥拉南部的安盟据点发动攻势，但是由于得到主要是南非援助的武器和其他物资，萨文比仍然以奥文本杜人为基本力量，抵抗人运政府。此外，因为安哥拉支持在安哥拉南部没有游击基地的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南非实际上同安哥拉处于战争状态。南非军队的入侵成了常事，他们不仅进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基地，有时还攻击安哥拉的经济目标。由于安哥拉南部的军事政治形势非常脆弱，在那里企图实行任何激进的变革，凡是可能惹起最大种族集团奥文本杜人反对的，都是很大的冒险。人运在这方面也确实极为谨慎。另一方面，解阵在北部造成的威胁正在逐渐消失。原因之一是在美国的倡议下，安哥拉和扎伊尔两国总统实现了和解。卡宾达的分离主义组织也逐渐衰落，这一组织一度使人担心这块石油储量丰富的飞地可能会脱离安哥拉。剩下的只是北部巴刚果人中残存的对解阵的同情和对人运的某些疑虑。因此，政府对于在那里实施激进的变革也是极为谨慎的。

人运最高层的政治不和和内部斗争，在阿尔维斯派被打败之后依然继续存在。1978年12月，内图改组了政府和党，撤销了他的长期盟友洛波·多纳斯西门托的总理职务，同意

副总理卡尔洛斯·罗沙·迪洛尔瓦辞职。这两个人都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其他好几名部长也被撤职。这些变动不仅反映了政府在克服国内经济衰退方面遇到了困难，还反映出人运主要派别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仍没有解决。不到一年之后，内图主席本人在莫斯科治疗癌症时去世，从而重新提出了整个领导的问题。使所有外国观察家感到吃惊的是，内图时期的第一副总理、年轻的计划部长若塞·埃杜阿尔·多斯桑托斯顺利地接替了内图的职位。多斯桑托斯既没有控制党，也没有控制军队，这是安哥拉最主要的两个机构。他最明显的有利条件是他的种族特点：他和内图一样，是姆本杜族黑人，而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是混血人。在撰写本书时，还不清楚多斯桑托斯是否能够巩固他的权力，^①但是有三件事情表明，他在努力设法做到这一点，并且有可能成功。原定1980年春天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推迟到年底，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混血人国防部长“伊克”·卡雷拉辞职出国进行“专业考察”，并离开了政治局。第二个主要对手，党的总书记卢西奥·拉腊保住了自己的职务，但被解除了对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控制。到1980年初，1976年10月选出的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只有五人还保持政治局内的位置，这反映出人运的最高层继续不稳定。

确切说来，这些政治变动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今仍是猜测的题目，相对说来没有多少肯定的了解。有一些明显的迹象表明，可能是种族、部族、甚至姆本杜族部落内部的因素，

^① 多斯桑托斯至今仍任该党主席和共和国总统。——译注

加上意识形态或安哥拉对外政策方面的冲突，起了第二位的作用。似乎这样的格局正在初步形成，人运不再象以往那样由姆本杜人和混血人占支配地位，而走向包含更广泛的种族集团的联盟，由黑人占优势。这表明，党认识到必须扩大国内支持者的基础，并消除长期困扰安哥拉政治的种族争执。从某种意义上说，1980年的人运仍在努力为处理好本身历史上种族和部族的冲突以及对于城市和知识分子的偏见而奋斗。

1980年初仍在进行的政治角逐，使人很难就未来的主要趋势得出肯定的结论。然而，有一点变得十分明显，这就是强烈的国家集权趋势。“客观条件”比意识形态更有力量，推动着安哥拉向这方面发展，逐渐削弱其他可能抵销这种趋势的力量。首先，国内有好几千葡萄牙人遗弃的产业，而受过训练能够管理这些产业的安哥拉人又极端缺少，国家不得不立即承担管理这些企业的重大任务。其次，反对内图领导的政治派别，其基础恰恰是那些提倡人民直接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机构——人民权力委员会。这使人运很难有别的办法，只能反对人民权力运动那种权力高度下放和群众参政的制度。1977年阿尔维斯的未遂政变标志着这一运动的衰落，同时，大大加强了人运内部久已存在的要求对经济和政治实行严密的集中控制的倾向。最后，正如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充分而清楚地证明了的，以石油为主的经济本身就极大地有助于国家权力主义的发展。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看来安哥拉国家权力主义的趋向不仅将继续得势，还将变得更加明显。即使第二次代表大会恢复原来关于人民权力的概念，人运看来也势必要对将来任何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会议加以严格的控制。

第六章

埃塞俄比亚

在我们所讨论的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当中，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在这里，社会主义不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之后出现的，而是其内部社会动乱中产生的。在这里，阶级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真实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得到的，不象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非洲国家那样，只是知识分子提出的抽象概念。军政府对平民参政持怀疑的态度，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力图严密控制革命的进程。但是，终究还是发生了许许多多无视当局、自行其事的人民活动，因为各种社会集团都想报仇雪恨。农民轰轰烈烈地处理土地改革问题，少数民族为获得承认和权力而斗争。同其他非洲国家相比，埃塞俄比亚更是在经历一场真正的革命的过程中接受马列主义的，而不是仅仅凭领导人的一纸法令。

1974年初，当终于引起革命的那些事件爆发时，埃塞俄比亚是变革条件已经成熟的国家。当时，这个国家由一位上了年纪的皇帝统治着，在他看来，政治现代化不过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皇权专制。这个国家长期陷于农民和地主、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皇帝和贵族之间的冲突之中。它还面临着刚刚开始的经济发展和现代教育所造成的一系列新问题。总

之，埃塞俄比亚已经矛盾重重，所有政治观察家都一致认为，接替海尔·塞拉西将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但是，海尔·塞拉西还没有死，麻烦事就发生了，并且引起了一场历史上少见的社会革命，一场急剧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革命。为什么这场革命有这么大的广度和深度，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当然，追溯事件的发展过程，描述基本的条件，指出加速革命爆发的因素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当时存在着基本条件，但还是因为有一系列非常偶然的事件才引起了整个过程的发生。旱灾，一台水泵损坏而引起卫戍部队的叛乱，汽油价格猛涨引起出租汽车司机罢工，这些在历史上都是偶然事件，可能都同时发生，也可能不同时发生。事实是这些事件确实把埃塞俄比亚的革命潜能转变成实际的革命。然而，即使旧秩序受到军人和平民的公开挑战，皇帝被推翻之后，变革也并不一定必然那么剧烈或者那么迅速。变革并不是按照全面的计划进行的，也不受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集团的控制。当初，目的是要使政权的基础扩大一些，消除少数权贵对财富的垄断。最后却成了要改造整个社会、重新组织整个社会关系的局面。在其进程中，革命不可避免地吞食掉一大批自己的儿女。

革命的进程

革命的开端已有人多次叙述过了，这里，我们只极为简要地勾勒一下轮廓。1974年1月初，埃塞俄比亚南部一支小小的卫戍部队由于缺少用水和伙食太差而发生兵变，后来引起

国内其他地区的士兵和军士采取类似行动以发泄不满。他们的要求非常具体，只涉及自己的利益：军饷、伙食、服役条件和子女入学。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是士兵和军士起来反对上级军官。到2月中旬，骚动波及到平民群众。海尔·塞拉西大学的学生罢课，反对教育改革。然后教师罢教要求增加工资，出租汽车司机罢工要求提高收费。整个国家突然陷于混乱之中，皇帝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一些要求作了些让步，对其他要求置之不理，撤换了首相，答应采用新宪法，改为首相对议会负责。然而骚动继续发生。首都由于总罢工而瘫痪，士兵继续进行鼓动，并逐渐在他们具体的涉及集体本身利益的要求中增加了政治要求。

后来的几个月，许多集团都想利用旧政权分崩离析的形势，进行隐蔽的幕后争斗。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能够把所有罢工、罢课和示威活动参加者团结起来的有组织、有广泛基础的民众运动。相反，主动权一方面落入军人手中，另一方面落入眼见皇帝将要垮台而维护自己权力的文职权贵手中。在军队中，出现了一系列委员会，大多数都是代表下级军官的。在文职官员和平民中出现了两个相互争夺的集团，一个是希望恢复失去的权力的旧贵族，另一个是希望通过开明的改革使自己在政治上担当某种角色的新兴资产阶级。6月底以前，军民竞争，不相上下，后来，早几个月成立的军人委员会实现了联合，成立了武装力量、警察和地方军协调委员会，夺取了权力。在后来的几个星期，协调委员会要求旧政权的显要人物投降，这些人大都顺从了，以为对他们的拘禁只是暂时的措施。然后，协调委员会把8月制订的、基本上代表埃塞俄比

亚新兴资产阶级对政权的要求的新宪法置之不理。最后，委员会在没有遇到一枪一弹抵抗的情况下，于9月12日把皇帝废黜了。

从1974年9月到第二年3月，军人的协调委员会内部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比较温和的成员被赶了出去，激进而冷酷的一派巩固了统治地位。协调委员会改名为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真正具有革命作用的决策，其意义之深远连最激进的平民领袖也梦想不到。但是，军政委员会也确定了“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格局，以及同所有平民组织保持紧张关系的传统。

在皇帝被废黜之后的两个月，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掌握在阿曼·迈克尔·安多姆将军手中，他是厄立特里亚人，思想温和，惯于独裁专断的统治方式。他利用自己同厄立特里亚的联系，把主要精力用来解决十几年来使厄立特里亚的两个民族主义组织即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反对中央政府的冲突。但是，事实证明，他的用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的政策，他的温和的态度，更突出的是他的独裁专断作风，都是他的同事所不能接受的。11月底终于双方摊牌，先是阿曼辞职，后来又在他拒绝投降而军人用武力逮捕他时被打死了。这一冲突标志着强硬派的胜利。就在阿曼被打死的当夜，他们做出了第一项决定，突然枪决了五十七名最重要的政治犯，这些人都是夏季和平投降的原皇家政权的最高级官员。军政委员会的新主席特费里·班特准将是一个沉默寡言、没有什么特色的人。选择他，是因为认为他不会企图独揽大权，而会遵从整个军政委员会

的旨意。他下面还有两名副主席：门格斯图·哈里·马利亚姆少校和阿特纳福·阿巴特少校。后来，到1977年2月，门格斯图在经历多次血腥冲突之后，成了军政委员会中强有力的人物和国家的统治者。强硬派还选择了用武力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的方针。在阿曼被清除以后不久，就在北部省份发动了镇压厄解阵和厄人阵的新攻势。

就在摊牌之后一个月，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发布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宣言。这是一项含糊的声明，把“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的含义规定为“平等、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共同利益至上和埃塞俄比亚统一不可分割”。然而，社会主义很快就增添了比较具体的内容。1月，军政委员会对主要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七十二家关键工业企业实行了国有化。3月，宣告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宣布所有土地为国家财产，并把全体农村人口组织到“农民协会”里面。农民协会被授权在其成员中分配土地，建立合作社或集体农庄，组建自己的防卫力量，总之，成了地方自治的基层组织。政府号召1月初派到农村去的五万名学生负责监督土地改革的实施。7月份，军政委员会对城镇土地和出租房产实行了国有化，建立了选举产生的居民区协会，接管地方事务的行政管理。这样，给旧的经济秩序以最后一击。随着这些改革的实施，革命进入了激进阶段，再也没有退回到旧秩序去的可能了，再过一年多的时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差不多成了军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

种 种 条 件

产生这种急剧变革的社会，很可以作为多方面生动说明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解釋的教科书。埃塞俄比亚不仅是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深刻冲突为标志的封建社会，而且地主的权力开始受到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受到“资本主义”商业性农业发展的挑战。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改变了土地使用的方式，改变了社会关系。此外，还存在着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无法精确解釋的分裂现象，最主要的是激烈的种族对抗，以及意大利把厄立特里亚变成殖民地而引起的分离主义运动。埃塞俄比亚帝国就是这么一个通过军事占领和地方权贵对皇帝个人效忠形成的、由不同的种族和语言集团——或如马克思主义后来所说，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混合体。同所有帝国一样，埃塞俄比亚几个世纪以来经历过多次疆域的变化，最后在南方征服大片新领土，于十九世纪末叶形成了目前的疆界。南方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盖拉人，或称奥罗莫人，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传统都同帝国中心地区的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不同。西方殖民主义也制造了冲突。埃塞俄比亚政府视为北方省的厄立特里亚，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只是在1952年才根据一项引起很大争议的联合国大会决议重新归并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在历史上是不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许多厄立特里亚人坚信，他们的土地应成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于1961年开始进行游击

活动。革命爆发时，厄立特里亚正处于战争状态。在东南面，埃塞俄比亚伸入索马里的那一角落，所谓欧加登地区，埃塞俄比亚的主权也引起了公开的争执。在这地区有一个由索马里政府组织和武装起来的名为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运动，宣称这一地区是“大索马里”的一部分。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地区，种族冲突没有这么明显，但仍然有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在南部地区，那里的土地由阿姆哈拉族在外地主所有，由奥罗莫族佃户耕种，这些奥罗莫族佃户从来没有因为是埃塞俄比亚的臣民而得到过任何好处。

这个庞大而又充满冲突的，有三千多万人口的国家，行政管理非常松散。老皇帝企图建立起更为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但是，埃塞俄比亚还远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省级行政机构人员缺额，地方当局——常常是地主，执掌最后的决定权。埃塞俄比亚的公路系统反映出政治现实：星形的全天候公路系统联接着亚的斯亚贝巴和各个省会。除此之外，公路实际上不存在，现代行政管理也是如此。

埃塞俄比亚在世界最穷的国家中排第五，它的经济几乎完全是围绕土地展开的。土地为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提供生计，为权贵提供财富和权力。地租高昂，与上千万农民息息相关的土地租佃制度剥削性极强。按人口年平均收入停留在一百一十美元左右。^① 农业方面没有什么革新，直到六十年代才在首都周围开始出现一些现代农场。这些农场为城市市场提供食物，另一部分供出口，但由于机械化排挤了佃户，使得社

^① 世界银行《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26页。这篇报告把埃塞俄比亚列为非洲最穷的国家。

会冲突加剧。到革命爆发时，埃塞俄比亚约有五千家商业农场，占地约七十五万公顷。但是埃塞俄比亚的工业部门比前面谈到过的非洲国家更不发达。在这个人口超过三千万的国家，工业部门主要有约一百家的消费品制造厂，只雇用五万到六万工人。国内贸易大都控制在小商人手中，除了有少数几条公路以外，运输全靠毛驴。埃塞俄比亚出口咖啡、少量黄金和皮革，近年来还出口一些豆类，总值每年为2亿到3亿美元。似乎矛盾的是，革命以前，埃塞俄比亚尽管出口少得可怜，但国际收支状况却一直十分良好，因为进口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供人数很少的上层阶级消费的商品和商业农场所需的农机具。

埃塞俄比亚经济由于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农业便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但是，正如许多经济顾问组织所指出的，农业的发展受到严格的土地租赁制度的阻碍，这一制度使农民不愿意采用新技术来增加生产。主张实行土地改革的不仅是埃塞俄比亚的激进分子，实际上还有驻在当地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援助机构。然而，这一措施是高度爆炸性的，它会损害占有土地的上层分子的权力，动摇阿姆哈拉人的支配地位，使许多潜伏的社会和种族冲突公开化。由于这些原因，军政府1975年3月关于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决定，是一个真正革命的举动，这一决定实际上开始了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进程。

尽管埃塞俄比亚社会的分裂很深，潜在的冲突很多，但是没有代表不同集团和不同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政治组织。老皇帝大力阻止这类结社活动。虽然他最后允许组成一个工会，但是受到严密的控制，并由非常驯服和保守的人领导。唯

一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集团是学生。多年来，他们举行示威、罢课，进行鼓动，要求改革。但是由于学生运动的成员一毕业就东流西散，或被吸收到现有的体制之中，学生运动从未造成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正因为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在革命最初的几个月，平民未能组成紧密团结的反对派运动。最鲜明、最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和反对皇帝的活动中心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在国外的埃塞俄比亚学生，大多数在美国和西欧，能够自由结社，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类书籍，因此，比国内的学生读的书多，见解也更明确。他们远离埃塞俄比亚，因此不可能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这种情况往往鼓励人们进行无休止的和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论战。几乎所有在国外的政治上积极的学生和在国内大多数这样的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这并没有防止他们分成派别，因为他们有的赞成苏联，有的赞成中国，他们对厄立特里亚问题的态度则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争执。这些学生有很多人在老皇帝被推翻后回到埃塞俄比亚，进行他们梦想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埃塞俄比亚国内各种组织都比较弱小，政治辩论有局限性，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大多数激进的民间人士，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军政委员会的，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学生，这就毫不足奇了。这些人参与制订政策，帮助组织政党，撰写秘密的反军政委员会的小册子，领导反对派集团，因而同军政委员会一样，对于导致1977、1978年革命的“红色恐怖”时期的暴力和流血事件负有责任。

意识形态

军政委员会在1974年6月取得政权时，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作指导，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纲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军政委员会只是由武装部队各兵种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是根据各个军事单位内部的原因挑选出来的，而不是因为他们抱有相同的政治观点。1974年12月关于社会主义的声明，由于“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十分含混，也没有成为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的抉择。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快占了上风。到1977年，埃塞俄比亚已经正式彻底接受了苏联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甚至报纸上的许多意识形态文章都是由苏联人署名的，苏联教授也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主讲意识形态课程。在从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转变之前，1975年底到1976年这个时期曾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非常有趣的是，这场辩论是在规定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特性的主要政策决定之后进行的。因此，这一辩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改革开路，而是为了实现军政委员会同激进的民间派别之间的妥协，以便组成一个政党。

1975年秋季，军政委员会同一群埃塞俄比亚归国留学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首领是海尔·费达。这些归国的学生接受了组建政党的任务，并为此目的组成十五人政治局。国内最知名的激进分子也被邀请加入政治局，但是他们中有些人拒绝应邀，认为新党是自上而下地建立的——这无疑正确

的——不可能成为真正受人民群众拥护的机构。军政委员会面临着激进分子队伍的分裂，并受到其中一派日益强烈的反对，因此希望意识形态的辩论能解决不同集团之间的分歧，以加强平民对自己的支持。辩论的结果适得其反，平民中的分裂和其中一派对军政委员会的敌视变得不可挽回了。但是，意识形态的讨论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在笔者看来，这场辩论不仅有利于对识字的公众的政治教育，也有利于对军政委员会本身的政治教育。它还有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影响军政委员会关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想法。尽管意识形态并没有使军政委员会变得更为激进，但的确使它对革命有了全面的、更一致的看法。

在辩论中提出的观点并不是军政委员会自己的，而是两个半秘密的平民团体的观点。政治局那时也还没有取得正式的地位，尽管它在军政委员会庇护下存在已是公开的秘密。这场意识形态辩论的特征之一，是用语不明确，论据太抽象。这场辩论不过是若干年前在埃塞俄比亚国内、特别是在国外的学生中展开的知识分子间私下辩论在公开场合的继续。谁也不打算使辩论的问题为更多的听众所能理解。辩论是在阿姆哈拉语日报《新时代》的专栏中和名义上是秘密的实际上可以自由流传的许多小册子中进行的。在这些小册子中，《民主》是后来组成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的反军政委员会派别的喉舌。《群众之声》代表支持军政委员会的派别，同尚未获得正式地位的政治局关系密切，在这一派中海尔·费达的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占统治地位。

这场讨论以三个主要问题为中心，都是当时迫在眉睫的

政治问题，从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民主的基本概念和埃塞俄比亚各“民族”的自决权。实际上，这些问题关系到军人同平民的关系，参与政治的渠道和方式，以及对待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的政策。由于双方都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是相同的语言，从同样的假设出发，但将理论应用于埃塞俄比亚的情况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全埃社会主义运动都以这样的前提为出发点：军政权按其定义来说不是“人民政府”，只有以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党和政府才能迎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双方又都承认，不能设想立即从封建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必须经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党和政府不可能以无产阶级为基础。这一“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将是所有进步力量的联盟为特征的。但是，对于是否可以把军人看作进步力量，双方的看法不一致，全埃社会主义运动谨慎地说“是”，而人民革命党则坚决地回答说“不是”。后者的理由之一是，军政委员会完全是由“上层军官”组成的，而不是象前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下级军官和军士所组成的。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人民革命党散发了一份军政委员会部分成员的名单，其中包括上尉和少校的名字，而上士和下士的名字被有意略掉了。

人民革命党关于军政委员会是由军人权贵组成的论点是不准确的，但它关于革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看法则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人民革命党勉强承认，军政委员会的某些措施是进步的。实际上，要否定土改是很困难的，土改粉碎了旧政权的权力基础，使革命对于农村具有实在的意义，使农民的生活

水平有所改善。但是人民革命党宣称，在实行土改的过程中，军政委员会已暴露出真面目，它不许革命进行到底。被派到农村监督土改的进步学生，活动受到阻挠，被监禁或被召回首都。具体地说，不许他们加强阶级冲突，鼓励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反对地主。人民革命党还争论说，军政委员会压制人民群众参政，从而压制了真正的革命，因为这会威胁军政委员会对权力的垄断。

在全埃社会主义运动看来，人民革命党的立场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它的绝对民主的概念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是社会阶级存在的根源，粉碎了政府也就粉碎了社会阶级。他们（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阶级斗争，反对任何由工人领导的政府。”全埃社会主义运动否定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无保留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只要领导核心是进步的，革命就应该是自上而下策划的。这两种立场分歧的核心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整个革命进程的概念是截然对立的。双方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排斥西方关于民主和多元论的概念，认为这些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稍加掩饰的辩护词。人民革命党，归根结底采取的是今天通常被激进分子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要求允许所有被压迫人民不受约束地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全埃社会主义运动则根据比较正统的列宁主义观点，把民主解释为在谨慎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先锋党的媒介而间接实施的。由于使用这些晦涩的术语，除了少数熟读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别人都无法理解这场辩论。这些术语所包含的，仍是那些使得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生分裂，并且在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重

新出现的老问题。某种形式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在阿尔及利亚以工人自治制度的形式出现，在莫桑比克表现为鼓吹建立以公社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安哥拉，则在人民权力运动的外表下出现。在所有这些国家，凡是被全埃社会主义运动指为“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都已经、或者似乎很可能被列宁主义观点所击败。

在民族问题上，全埃社会主义运动同人民革命党的分歧也很尖锐，尽管双方都求助于列宁的权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民族问题首先是厄立特里亚问题，因为构成埃塞俄比亚人口的不同种族集团间的冲突在那里达到了最尖锐的阶段。两派都赞成“民族自决权”，但人民革命党认为这一权利必须包括分离权，而全埃社会主义运动则认为应在“埃塞俄比亚统一的范围内”行使这一权利，换言之，民族自决权充其量只能是区域自治权。这也是军政委员会的主张。^①此外，军政委员会，可能还有全埃社会主义运动（笔者对这一点还不清楚），把民族的概念解释为完全同一的种族和语言集团。按照这一定义，厄立特里亚的三百万人口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好几个民族。因此，如果把这原理应用于厄立特里亚，就应该把这一省份象全国其他地区那样分割成几个新的省区。军政委员会接受了这种民族理论，实际上就想方设法说明厄立特里亚问题并不存在。但是厄立特里亚的激烈的战斗使这一政策一直不能正式制定。不管民族的正确定义是什么，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都把厄

^① 门格斯图的“民族民主革命”讲话中说，“各民族都有保证实行区域自治”（《埃塞俄比亚先驱报》1976年4月21日）。

立特里亚看成单一的“民族”，因此军政委员会的这一理论并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基础。

人民革命党和全埃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同出一源，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可调和的关于革命和政治权力的概念。军政委员会口头上说要力图把两种观点兼收并蓄，实际上则是站在全埃社会主义运动一边，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只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门格斯图终于利用这场辩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他在1976年4月20日发表了一个发动“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讲话，从而确立了他自己作为军政委员会内部激进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他的纲领也可以得到激进平民的拥护。他宣布，埃塞俄比亚正在开始进行将由“同农民密切合作，并得到小资产阶级、反封建和反帝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保证埃塞俄比亚人民享有自由、平等、和平和繁荣，以及行政上在各级实行自治的权利和不受限制的人权与民主权利。”^①同时，门格斯图还宣布，建立一个组织，即群众组织事务临时办公室，来加快建党进程和为之奠定基础。

这样，调解的企图失败了，人民革命党变成一个致力于用武力推翻政府的反对派集团，而军政委员会则无情地捕杀其成员，铲除其组织。1976年夏季，人民革命党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开辟了“隐蔽所”，同年秋季又在首都展开了恐怖活动。到1977年初，军政委员会和人民革命党在城市里公开交战，造成一个“恐怖”时期，死了几千人。尽管调解失败，这场意识形

^① 见1976年4月21日《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态的辩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谈过，它的确有助于使公众关心政治。最为重要的是，这场辩论为军政委员会提供了某些指导原则，影响到它在后来几年的政策。在1975年最初的改革浪潮过去以后，军政委员会实际上开始有条不紊地在全国进行政治上、行政上和经济上的改组进程，虽然反对派的坚决对抗以及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的战争使它的成效不那么明显。归根结底，意识形态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整套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组织的概念。

各 项 政 策

给旧政权以致命打击的主要决策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前宣布和实施的，而且早在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发挥重要作用之前。尽管如此，这些政策无疑受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要求实行激进的结构变革，认为要改造制度必须首先彻底改造经济。开始，改革造成了一种权力非常分散、群众广泛参政的制度，这一方面是有意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军政委员会对迅速发展的事态难以控制的结果。后来决策的主攻方向是要建立一种加强控制、行政管理和群众参与政治的全面制度，同时初步实施经济计划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权力集中和组织经济的概念，这当然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不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考虑，土地改革、各种分裂主义和反对派的活动所引起的离心力，这种情况也要求务必加强中央的权力。

1. 经 济

影响到经济的第一项决定是1975年1月作出的，将金融机构、保险行业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尽管这一决定很重要，因为它使政府控制了小小的现代经济部门，又是军政委员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第一个具体步骤，但是，这一决定对经济的性质和国内权力分配都没有产生真正的根本影响。只有土地改革才会产生这种影响。此外，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同时在各部门建立某种工人控制的机构来实现民主。在此之前，埃塞俄比亚没有人鼓动实行某种自我管理的活动。在革命的早期曾有过劳工骚动，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那种自发的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运动则从未发生过。军政委员会本身无意实行工人参加管理，而只是用国家任命的新经理代替旧的私人经理，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要求原来的厂主留下来当经理。军政委员会还用一批新人接替了以前老皇帝严密控制的工会领导人，对于工会新领导，它也设法加以控制。但是，在工业国有化以后，出现了要求让工人参加管理和成立独立工会的事情，因此在军人和工人领导人之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斗争。人民革命党和其他反军政权派别企图利用工会作为开展活动的跳板，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冲突的核心于是变成了军人同平民的关系，而不是组织工业部门以便实行工人管理。

军政委员会的革命的基石是土地改革。这一措施引起了复杂的、无穷无尽的变革过程，至今仍在开展中。立法方面，三项主要公告规定了土改的布署。第一项公告在1975年3

月对所有土地实行了国有化，并把农村人口组织成“农民协会”。^①同年12月发布的第二项公告详细规定了协会的权力。^②1979年6月的第三项公告正式规定了组织“生产合作社”或农民集体农庄的程序，以加快合作化的进程。^③每一项措施都引起了意料之外的反应，从而激起了进一步的变革和尖锐的冲突。

最初的公告只是一纸法令，但却关系重大。这项公告不是限制私有地产的规模，或者只没收旧贵族的土地，而是干脆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然后给当时耕种土地的人以使用权。这一办法避免了土地的丈量 and 登记。在埃塞俄比亚，土地登记很不完备，大多数田地都未丈量过，有关土地的诉讼司空见惯，而受过训练的测量人员又几乎没有，把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的决定一下子解决了所有这些麻烦而可以立刻行动。此外，军政委员会号召农民自己起来进行土改，而不是坐等官僚们慢慢腾腾地办理地契、确定所有权，从而使这一运动自动开展下去。公告规定，农民都要加入协会，这为土地改革建立了机构。每八百公顷土地的农民组成一个协会，每个协会把土地分给其成员（上限是每户十公顷）并组织合作社。但是，农民协会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分配土地。这些协会实际上成了地方政府机构，填补了由于地主的消灭和区以下没有正式官僚行政机构而造成的真空。几个月后公布的第二个公告，公开承认农民协会和政府职能，授予农民协会某些地方行政的管

① 1975年第31号公告：《关于农村土地公共所有的公告》。

② 1975年第71号公告：《关于组织和巩固农民协会的公告》。

③ 1979年6月26日《关于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公告》。

辖权以至司法权。这样，在实践中，农民协会的建立满足了改善农村地区行政管理这一非常实际而迫切的需要。而且，由人民负责办理自己的事情，达到了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权力归于人民”的目标。

农民对于土地改革公告的反应，总的说来是非常积极的。在盛行租佃制和地主大都不在乡下的南部省份，土改受到了衷心的欢迎。小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对政府的真正意图疑心较重。一般说来，对分配土地的热情比对实行集体化要高得多。土改的成功可以用农民协会建立之快来衡量。到1973年底，农民协会已经超过了一万八千个，到1978年，已有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三个，共七百三十万农户，几乎包括了全部农村人口。同其他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农民的经验相比，埃塞俄比亚的成就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主要原因是埃塞俄比亚农村有明显激烈的社会冲突，十分真实的地主剥削使农民迫切要求变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负责监督组织农民协会的五万名大学和中学学生。这些学生是在参加“合作发展运动”的号召下招募来的，这一运动有密切相关的两个目标：唤起农民摆脱几百年来被奴役的状态，把扫除文盲和现代知识的好处带到农村去。尽管学生作为革命的媒介被赋予重大的责任，但他们对军政委员是敌视的，他们往往认为军政委员会是反对“人民政府”的不可救药的军事独裁集团。因此，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学生们追求的是自己的目标，首先是推动立即实行集体化，根本不理睬军政委员会比较谨慎的态度。军政委员会认为这种激进的措施很可能对生产有害，使农民反对政府。军人们的这种担心是有些道理的。

在某些地区，农民的确对学生立刻建立中国式公社的努力，做出强烈的反应。最后，学生既同军政委员会冲突，又同农民冲突，迫使他们逐渐撤离或者逃离他们的岗位，最终导致这场运动瓦解。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土地改革已经深入发动起来了，农民协会已经建立，地主则已纷纷逃亡。

土地改革的确象预想的那样，从根本上对埃塞俄比亚的权力和财富实行了重新分配。同时土地改革也带来了其他的不足取的后果。土地改革中埃塞俄比亚的许多地区实际上经历了一场内战，因为地主拉拢农民支持他们。特别是在基督教影响很大的阿姆哈拉人地区，地主能够做到使一些佃户相信，土地改革是把基督徒的土地夺走交给穆斯林的一种阴谋。在别的地区，特别是在地主是阿姆哈拉人而佃户是奥罗莫人的地区，土改加剧了不同种族间的怨恨。最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引起了相当严重的食品供应问题和农民自己之间的争斗。

开始，许多观察家曾预言，土地改革将在埃塞俄比亚造成普遍的饥荒。这种灾难虽然没有出现，但问题逐渐变得严重起来。粮食生产停滞不前，在1974到1978年间，产量徘徊在四百七十万吨到五百五十万吨之间。此外，正如政府所指出的，“在粮食生产减少的同时，农民自己的存粮增加了，他们的粮食消费增加了，市场销售系统破坏了，还有运输上的困难”。土地改革以后成立的国家购销组织工作效率很低。由于消费品短缺，加上分配方面的困难，为农村市场多提供消费品以鼓励农民出售粮食的努力失败了。结果，1978年埃塞俄比亚除了得到国际上为援助旱灾地区捐赠的八万吨粮食以

外，还进口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粮食。市场购销方面的问题和农民囤积粮食不出售以抬高价格的倾向，使政府非常焦虑。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决非易事，特别是战争还在进行，国内又有相当严重的反革命的活动，其中一部分是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领导的。

土地改革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协会内部的冲突，其根源是缺少土地。土地改革的第一年，农民根据政府的规定继续耕种以前耕种的土地。这样一来，有的人的土地比别人多得多。在后来的几年，农民协会受到压力，要求在其成员中更为平等地重新分配土地。但是，据一项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既没有重新分配土地的全面的标准，也没有进行分配的机构。从现有的比较简略的消息看来，绝大多数农民协会从未试图重新平分土地，只是规定了每户土地大小的上限来缩小不平等。因此依然存在不满情绪。缺少土地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减少最初“合作发展运动”中在学生煽动下划出的公共土地。这种有限的重新分配土地的过程，首先只限于在以前主要实行租佃制的地区。在农民大多是小土地所有者的北方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平分土地的活动。根据现有的消息，土地改革显然并没有实现任何奇迹。农民协会内部和各个协会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协会越来越具有代表性，但农民协会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北方，总是有些偏向于富裕农民。集体耕作充其量只是十分有限的活动。然而，农民协会内部仍在发生变化，三年来，埃塞俄比亚已经在土地改革方面迈出了巨大的步伐。

军政委员会和平民激进分子对于集体化的进度是非常失

望的。前面提到的那份研究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土地改革并没有按其创始者似乎设想的那样导致建立中国式的公社，而是造成了小块私人田产的蔓延增长。实际上，有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公有土地的规模和地块的数目都在缩小。更重要的是，在组织合作社方面进展极其微小。1978年，社员集体的土地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生产合作社只有二十一个，另外二十二个还在建立过程中。土地仍归私有，只是组织起来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的服务合作社有三百四十三个，另外一千八百四十六个正在组建过程中。服务合作社集中在咖啡种植区，这里农民为市场生产而不是为自己消费。门格斯图主席1978年9月发表的讲话反映了政府在这些问题上越来越沮丧，他在讲话中谴责农民中间“个人主义泛滥”和“买者与卖者之间旧的无政府关系”继续存在。他警告说，由于“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埃塞俄比亚有“向资本主义而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危险。

为了加速集体化的进程，抵制过分的个人主义倾向，军政委员会于1979年6月发布了一项新的公告。这项法令阐明了将农民协会逐渐改造成合作社的步骤。法令规定，首先每一个农民协会都应建立一个“生产合作社”。加入合作社必须严格按自愿的原则，组成一个社至少要有三户农民。至于其他的人，则希望他们看到新耕作制度的优越性之后加入。根据设想，生产合作社要经历三个阶段，开始，农民协会的土地只有一部分共同耕种，最后，所有的土地都集体化，所有的农具和牲畜也归公共所有。农民可以保留一小块菜园，但其面积要从开始的五分之一公顷减少到十分之一公顷。新合作社

的成员按劳取酬,但收入的一部分要提留用于再投资和“公共生活”。为了鼓励农民加入生产合作社,法令规定合作社成员在法律上有担任农民协会的各种执行职务的权利。最后,为了对新合作社实行一定程度的集中控制,法令规定,合作社要“每年按标准格式制定一个工作计划并在执行之前提交政府批准”。

这项公告的意图是很明白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消除土地的个体种植,而且还要把集体组织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最终纳入全面计划体系的范围内。然而,按照公告的措词,政府可以避免同不愿参加的农民直接对抗,因为公告强调,除非自愿,农民可以不参加合作社。可是,公告既然把农民协会的领导权交到了合作社社员的手中,就使得那些选择个体种植的农民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公告发表后的几个星期,谣言四起,说军政委员会决心在三年“大跃进”中使全国实现集体化。政府曾反复否认,说这是恶毒的谣言。在撰写本书时,要知道政府这一措施的结果还为时太早^①。政府不能暂时避免形成对抗,但看来可能过一段时间再度推行集体化,象中国在组织农民公社时所做的那样。从现有材料来看,军政委员会当初似乎并没有大力推动这一进程。据报道,到1980年3月,全国只有八十九个集体生产合作社,共有一万一千三百社员。此外,政府官员反复强调集体化运动的“自愿原则”,看来这是多次发生(特别在南方)农民武装反抗集体化运动事件的反应。毫无疑问,土地改革现在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军政府同

^① 埃塞俄比亚政府后来没有强制推行集体化,目前农村的生产性合作社为数很少。——译注

农民的关系也真正到了考验的关头。

埃塞俄比亚农业部门的关键问题，无疑是拥有全国耕地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协会的前途。但是也还存在国营农场这一部分。国营农场最初出现是土地改革的直接后果。当时决定不把收归国有的最大规模的私人商业农场和外国人的种植园分成小块。这类农场和种植园总共可能有五十来个。在后来的几年，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开垦了一些土地成为国营农场。加上这些，到1978年，国营农场的土地也只有七万三千公顷，生产粮食大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二。不过，糖和棉花等工业原料的生产，国营农场十分重要。此外，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尽管数量很少，但起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些粮食完全为国家所控制，可以用来供给城市地区，那里缺粮成了问题。

总的说来，土地改革在实现军政委员会粉碎占有土地的阶级的权力和重新分配收入以利于农民的目标这方面成就比较大，提高生产方面的成就则比较小。最初几年，军政委员会的政策主要取决于政治标准而不是经济标准。但是不能无限期地采取这种态度。经济在走下坡路，粮食短缺成了长期现象，一度很大的外汇储备（三亿美元以上）迅速减少。这些问题并不都是军政委员会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的战争，政治动乱，国内某些地区的长期干旱，都是促使经济恶化的因素。1978/79年度的预算可以说明，进行战争的费用多么昂贵；政府经常性开支（七亿五千万美元）的百分之五十五用于国防和国内安全。军政委员会还是承认急需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形势，最突出的是农业部门。这个预算计划把三亿美元用于发展，其中一亿二千万用于农业的基本投

资，此外，专用于农村道路的费用八十六万美元。相形之下，用于工业、矿业、旅游业的资金合起来只有三千五百万美元。

埃塞俄比亚政府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扶持农民协会，打算通过两个规划进行。第一，政府计划大幅度扩大现有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系统，为所有二万八千个农民协会服务。这一规划准备在1980年实施，由世界银行、瑞典国际发展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提供资金。这一规划在两年内需要投资七千三百万美元。第二项规划要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资金，训练一批“村代理员”，作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系统和农民协会之间联系的环节。这一计划要求为每个农民协会训练三名代理员，全国共约七万五千名。这些代理员由农民协会从会员中挑选，参加一个月的训练班，然后回到本村工作。他们要受到农艺学、畜牧学、水土保持以及合作社的组织管理等基本知识的训练。这些措施表明，埃塞俄比亚政府选择的农村发展战略，主要以农民协会为基础，而不是以国营农场为基础。

为了强调它对发展的关心，军政委员会于1978年10月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合作发展运动，发布了“关于准备开展全国革命发展运动和中央计划工作的公告”。这个第二次合作发展运动被看作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措施的开端，以农民农业为基础，工业化被看作最终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但眼前只占第二位的措施。这项法令建立了以门格斯图上校为主席的“中央最高计划委员会”。这实际上是全国性的组织，由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各省发展运动和计划办公室组成，加上在地区和区一级的类似的办公室。这些

机构汇集了中央和地区行政部门、军事部队以及各级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机构全都是头重脚轻，军官和行政官员的数目大大超过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由于被指定担任最高行政职务的军官越来越多，军人成了整个组织中的支配力量。这一新的委员会的职能是制订各个领域的发展计划并监督其实施。因此，这次运动同第一次合作发展运动很不一样，不是依赖基本无人监督的学生的好意与热情的那种应急计划，而是要建立一个把革命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官僚性质的、军人占领导地位的各种机构联系起来的国家计划机关。然而，它所依据的设想却是现实的，就是说，只有经过长期、持续和周密协调的努力才能得到发展。

这一运动初步的经济目标是使农民的生产增长三十五到四十万吨，等于总数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国营农场再开垦八万二千公顷土地，使国营农业的规模扩大一倍，产量增加十七万吨。还要在1980年以前再开垦十万公顷国营农场土地。在工业方面，主要目标只是把占整个工业生产百分之九十的一百三十二家国营工厂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提高百分之四十。在出口部门，主要目标是把提供绝大多数外汇收入的主要经济作物咖啡的产量提高到十万吨。这些目标是雄心勃勃的，由于还处于战争状态，很可能超出了国家的力量。尽管如此，政府官员在1979年底宣布，在第一年，工业方面的计划目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三，农业方面的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据说工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农业增长了百分之十七。据报道，咖啡出口达到了八万五千吨。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在1978到1979年估计为百分之五点二，而前一年则为百

分之零点九。但是在国外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扩大国营农场部门的代价与生产上的效益是不相称的。新建的十三个国营农场许多都是经营费用高昂，到1978年底，整个国营农场部门欠国家的债务已达四千七百万美元。鉴于国营农场的失败，政府在第二年做出决定，恢复几家原来的外国公司，为收归国有的工业原料种植园提供管理人员。在撰写本书时，国营农场的前途还难以预料，但看来所遇到的困难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已经非常明显的决心，推行以农民协会和小土地所有者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政策。

军政委员会的经济改革值得提出的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收入和税收的新政策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和其他国有化措施急剧减少甚至完全取消了地租和利润的收入，但对工资没有影响，而工资正是海尔·塞拉西时期埃塞俄比亚严重不平等的根源之一。一个非技术工人的最低日工资只有一比尔（零点五美元），政府门卫或传达员的平均月薪为四十比尔（二十美元）。对比起来，部长的月薪是一千五百比尔（七百五十美元），外加七百五十比尔的津贴（三百七十五美元），总计二千二百五十比尔（一千一百二十五美元），使文职人员最高薪金与最低薪金之比超过五十比一。然而，银行、航空公司以至航空公司的最高薪金在皇家政府时期高达六千到八千比尔（三千到四千美元），使旧制度下薪金的差别极大，达到二百比一。革命使这种极端的差别大为缩小，但没有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工人的收入。军政委员会的确规定了非技术工人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一·五比尔（零·七五美元），但拒绝了工会把最低工资定为三比尔（一·五美元）的要求。另一方

面,军政委员会大幅度提高了中级文职人员的薪金,使高中毕业生的最低月薪从二百八十比尔提高到四百二十比尔。高级文官和准国营机构职员的工资没有变动。但是,1978年下半年,军政委员会公布了新的税收政策,对所有的薪金收入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把最高税额从皇家政府时期的百分之十六急剧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对所有超过三千七百五十比尔的收入都征收所得税。此外城市里居民区协会还实行了一种非正式的税收,即要所有居民为当地的建设项目定期交纳捐款,实际上是强迫收入最多的人不得不捐献最大的份额。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大幅度降低了最高收入,从而大大缩小了财富的悬殊程度。有了居民区协会的非正式税收,新制度下高低两极收入之间的比例就无法精确了解。很明显,差别还是很大的,收入最少的工人的工资只是稍稍有所改善。从这些变化中得到好处的看来主要是中等收入的文职人员。

2. 政治和行政组织

对于军政委员会统治下建立的政治机构,值得注意的不是建立了什么,而是没有建立什么。在1980年初,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没有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独特例子。埃塞俄比亚有许多政党所特有的标志,如意识形态学校、受过训练的干部、初步成形的支部组织,甚至于曾有过政治局。但是政党本身,作为完全成熟的具有决策权的组织却不存在。尽管多次宣布马上就要成立党,但从未实现。许多攻击军政委员会的人都把没有党作为最确凿的根据,证明军政委员会不过

是独裁的军人政权，而不是一群努力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军官。从其他改革的规模看来，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要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一个政党有很多具体的障碍，其中两个值得做比较详细的讨论：第一个是许多非洲国家所共有的结构上的问题，在别的机构，特别是军队已经夺取了权力并且正在行使权力的情况下，要建立垄断全部权力的政党是困难的；第二个是埃塞俄比亚所特有的问题，即军人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复杂。

任何集团在取得对国家的控制之后，都必须立刻建立某种体制来进行决策，并监督其实施。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经历中，这种体制往往由一个依赖现成的行政管理机器的军人委员会组成。随后往往出现建立党的要求。一方面因为这很时兴，另一方面是感到有这种需要，以争取公众的支持。在实践中，在夺取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党，常常不是成为累赘，就是进而成为对已当权的委员会的威胁。其结果，这个党很少能够发展兴旺。在非洲，这种现象有许多例子。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时实际上已在内战中垮掉的民族解放阵线，十八年以后仍然处于重新组织的过程之中，而且看来永远也不大可能取代军人成为统治机构。在马里，1968年推翻了莫迪博·凯塔的军官们用了十年时间才变成某种形式的政党统治。即使如此，军官还是比党的领导人技高一筹，由一名军人担任总统。在上沃尔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并不是说从非党政权转变成党的政权是不可能的，只是说这种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军人往往还是最终的主宰者。对于埃塞俄比亚军政委员会所遇到的困难，应该至少部分地同更大范围内的非洲经验联系

起来看。

军人和平民激进分子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竞争，使这种固有的结构上的困难更加复杂化了。在1976年4月宣布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军政委员会随即建立了“群众组织事务临时办公室”。它还成立了一所党校来训练干部，并对文职官员和其他政府人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群众组织事务临时办公室中充斥着全埃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企图把这个办公室变成攻击军政委员会的权力基础。1977年夏天，全埃社会主义运动同军政委员会的同盟关系突然破裂，对临时办公室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使之受到极大的削弱。一直由全埃社会主义运动控制的党校也作了人事变动，但仍旧继续开办。到1979年初为止，已有七千五百人在党校参加了三个月一期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当时还有另外五百人正在受训。并不是所有受过训的人都一定成为党的干部，许多人只是成为文职人员。但是在埃塞俄比亚从此出现了一大批受过正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的人员。

在全埃社会主义运动被镇压之后，军政委员会并没有放弃成立政党的努力，只是策略有所改变。它决定不再依赖一个集团，而是把各种各样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别集合到一个统一的机构中来。首先是平民组织自己采取行动，把不同的激进党派联合起来，军政委员会则从旁对此表示赞许。1977年2月，五个派别发表了公报，宣布组成“埃塞俄比亚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联盟”，并表示要为完全合并而努力。这一计划终于宣告失败，这是因为不同派别由于社会基础不同和对军委会的态度不同而互相争吵。个人野心

和各种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竞争也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之一。不过，各个组织的社会基础不同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其中的一个组织“革命火焰”主要从军队吸收成员，并由军政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领导。“劳动联盟”也被认为是亲附于军政委员会的，实际上是这个委员会用来反对全埃社会主义运动的工具。但是“劳动联盟”后来也终于转而反对军人集团，并把“劳动联盟”作为取得权力的跳板。“全埃社会主义运动”据说在奥罗莫人中势力最大，领导人大多是奥罗莫人，包括海尔·费达本人。第四个派别“埃塞俄比亚被压迫者革命斗争”也是由奥罗莫人领导的。由此可见，种族的区别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领导人个性的冲突也是一个因素。最后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组织”，这是一个很小的团体，主要在学生和青年中有吸引力。

军政委员会尽最大努力克服平民激进分子的分裂状态，但是没有成功。到1978年年中，“埃塞俄比亚马列主义组织联盟”原有的五个派别只剩下了三个，但也远远没有真正合并起来。结果，军政委员会决定改弦易辙，另想办法。按门格斯图自己的话说：“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和各个真正赞成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的统一进行了斗争，但是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形式上，而不注意进步人士之间持久的联合。因此，斗争清楚地表明，工人阶级政党不能够通过合并各种组织来产生。”^①

1979年12月，军政委员会宣布成立新的机构，即“埃塞俄

^① 门格斯图宣布成立“埃塞俄比亚劳动人民党筹建委员会”的讲话，见1979年12月18日《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比亚劳动人民党筹建委员会”。这一次门格斯图不再依靠平民，而宣布由他自己担任主席，并指派他所信任的军官担任其他最高职务。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任务还是组建一个“劳动人民的党”。但是，这个词的含义比工人阶级要广泛一些。这个党将包含那些“不是靠别人的汗水而靠自己的劳动”谋生的人，还有那些“为了埃塞俄比亚的统一和革命的利益、进展和胜利而流过血”的人。换句话说，这个党将包括军人。所有党员都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其他组织的成员吸收入党。很明显，这是为了避开那些相互争吵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新的党看来将是一个先锋队的党，而不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尽管在主席的讲话中没有讲明。

门格斯图对党还没有正式建立这一事实着力进行辩护。他承认：“今天，宣布这个委员会的成立，许多革命者和革命的支持者肯定会问，为什么不干脆把党本身建立起来。”他的回答是，“客观条件”和埃塞俄比亚人政治觉悟水平低，还不允许这样做。有趣的是，他还相当尖锐地攻击了那些指责埃塞俄比亚和军政委员会没有成立党的那些人。他宣称：“我们的自发爆发的、新生的革命，已经赢得了许许多多的胜利，甚至超过了在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激进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胜利。”由于批评者不仅有本国的平民激进分子，而且还有古巴人和苏联人，这一声明实际上是警告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盟友，军政委员会将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步伐去建立党。大约十八个月之前，古巴为了迫使门格斯图加快建党速度，曾把一个已经名声扫地的全埃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内格德·戈贝泽秘密弄回埃塞俄比亚，以便就建党问题进行谈判。这

一事件发生之后，古巴大使被要求离境。

军政委员会以前同平民做工作时遇到过困难，因此，没有理由指望这个新的委员会的建立预示马上可以建党，更没有理由相信党将很快变得比军队更有权威。埃塞俄比亚这个没有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保持这种特殊的状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埃塞俄比亚没有群众参与政治的渠道。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相比，埃塞俄比亚有它的更加非集权的、群众更多参与政治活动的制度，这部分地是有意造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客观需要，部分地也是革命引起离心力所造成的。埃塞俄比亚革命基本的新机构，在农村地区是农民协会，在城市是居民区协会。事实上，农村和城市的协会都是军政委员会很难控制的，特别是农民协会。

埃塞俄比亚在军政委员会统治下的权力分散状态同过去皇帝统治下的权力分散状态有其相似之处。两个中央权力机关都不能容忍对其权威有任何正式的限制。皇帝是“专制”君主而不是立宪君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圣旨威力无边，恰恰相反，在各省，皇权只是名义上的，要通过半自治的地方当局为媒介去体现。同样，军政委员会也不接受对其权威有任何正式的限制，它不许平民公开发挥作用，党的建立又一拖再拖。但是军政委员会的权威同皇帝的权威一样，在各省由于行政机构的软弱而难以施行，出不了县城多远。最高层的中央集权和极权专制在基层不容易照办。基层存在的问题是权力过分分散，几乎处于完全自治的状态。

革命之后，地方一级正式行政机构很软弱，于是出现了相

当程度的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可以表达地方的意愿和实行自治。在学生的合作发展运动过后的一段时间，农民协会几乎完全自治，过分的放任，随意办事随意作决定。农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管理农民协会，基本上自己决定是否分配土地，和怎样分配。这并不是因为军政委员会赞成地方自治，而是因为它无法对二万八千个农民协会运用权威。这种地方民主造成的后果并不总是军政委员会及其激进的文职顾问所希望的。我们已经看到，让农民自行其事，他们就不会对土地集体化表现出多大热情。他们往往把比较富裕的农民选为协会的领导人。例如，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锡达摩省，最初是富农在协会中占统治地位，只是在地方当局多次干预之后，协会的领导人比较能够代表全体农民。另一项由学生进行的可能不那么可靠的调查得出结论说，在亚的斯亚贝巴周围，农民协会的领导力不仅常常掌握在比较富裕的农民手中，而且往往掌握在同原来的地主有血缘关系的人手中。根据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农民都有一些土地的北方地区，保守的倾向更为明显。在那里，传统的权势人物，包括科普特基督教的神父，仍在农民协会起支配作用。

军政委员会原来曾设法建立一个由地方行政官员、各部在各省工作的人员和农民协会的代表组成的“革命行政和发展委员会”，借此把中央行政控制扩大到农民协会。遗憾的是，没有调查材料说明这些委员会把中央行政机构同自治的农民协会结合起来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就。然而，有相当多的间接例证表明，这些委员会并没有克服历史遗留的鸿沟，农民协会依然无法影响中央政府的正式决定，而军政委员会也很

难把自己的意志强迫农民接受。农民继续抵抗集体化，政府反复谴责农民盛行“个人主义”，要农民协会交出粮食供给城市常常遇到困难，所有这些都表明地方自治还在坚持下去。另一方面，军政委员会继续宣布各种决定，例如土地改革第三阶段的决定，这肯定事先没有征询过农民代表的意见。农民协会非常真实的自治是埃塞俄比亚革命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但是，在军政委员会和平民激进分子的心目中，这也是巩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最主要的障碍之一。除非农民协会处于中央政府更严密的控制之下，埃塞俄比亚就不可能有集体化、有效的集中计划或者“民主集中制”。

由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农民协会的自治构成了最为严重的威胁，同时，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中央政权同地方半自治团体之间类似的冲突。城市中的居民区协会，一度成了军政委员会同主要的平民反对派人民革命党之间名副其实的战场。在1977到1978年期间，各派都把控制居民区协会，特别是在首都，看成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有些居民区协会为人民革命党所渗透，有些被全埃社会主义运动或其他次要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所渗透。全埃社会主义运动看来希望利用居民区协会及其民兵反对军政府，而军政委员会则不得不发动“红色恐怖”行动，并把所有反对派分子从居民区协会中清洗出去，然后才能考虑它在首都是否安全。在这一过程中死了几千人。在革命以后整整六年，限制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把地方机构结合到整个政治制度中来，一直是关键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革命一直在军政委员会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和群众热烈参与活动时的近乎无政府状态这两种情况之间

摇来摆去。

3. 社会服务事业

军政委员会关于社会公共事业的政策，可以反映出政府变革的深度，这一点可能比这些政策的实际成就还更重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政府从来不认为有责任为人民提供基本的服务事业，连最低限度的卫生和教育都不管。军政委员会的确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义务，但却没有履行这种义务的手段。革命以前，埃塞俄比亚的文盲率达百分之九十五，婴儿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平均寿命（三十九岁）比任何国家都低。饥荒频仍，最近的一次是1973年到1974年底，灾民至少达十万人，皇家政府这才承认有危机，才允许国际给予救济。旧政权面对这场灾难而无动于衷的表现，使它在道义上威信扫地，特别是在国外。

由于饥谨刚刚发生过，依然是燃眉之急的问题，军政委员会服务事业方面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救济灾民。早在1974年就成立了救济和复兴委员会，以协调埃塞俄比亚和外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几年来，这个委员会发放粮食，实施以工代赈计划，甚至还实行了一些有计划地安置灾民的工作，把灾民迁到国内比较富庶或者有灌溉的地区去。大多数资金和食物都是外国捐赠的。委员会努力督查全国食品供应情况，并对救济工作加以协调。除了分发粮食以外，从1974年到1978年，委员会还拿出六千五百万美元，在农村建设道路、发展农业、开挖水井和安置灾民。

教育是一项重要的难题。1974年，只有五分之一的小学

学龄儿童在校读书，全部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五有阅读能力。对参加第一次“合作发展运动”的学生来说，其首要任务原来就是扫盲，但是被土地改革挤掉了。这个问题之艰巨使得任何应急措施都不能使情况有多大变化。但是，常规教育只能带来十分缓慢的进展，而且费用高昂。1978年，政府预算拨出一亿零八百万美元用于初级和中级教育，在基本投资和经常开支总额只有十亿美元的预算中，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数额。这种努力是要使小学在校学生总数达到一百三十万，比1974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但是，全国只有五千所小学。对比之下，全国共有二万八千个农民协会，大小城镇还不在此内。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产生了一种主意，即由农民协会负责办初级教育。曾经有过这样的建议，应由农民协会建学校并付给教师工资，而教育部则集中力量准备教材和培训师资。在撰写本书时，这一想法还没有实施。但是既然由中央政府兴办所有的教育费用太大、困难很多，因此终归会采取行动，使农民协会分担一些。

医疗卫生问题同样重大。门格斯图直截了当地说明：“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每八万人只有一名医生、每三千个病人才有一张病床的国家。”^①军政委员会在1978年预算中，给医疗卫生拨款四千二百万美元，这个努力不算小，但是同问题之严重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总的说来，尽管军政委员会公开谈到国内十分恶劣的社会条件，有必要采取措施加以改变，但它资源有限，而且大都

^① 门格斯图 1978 年 9 月 12 日的讲话。

被军人用于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的战争，或用于国内安全。提高农业生产被认为只能摆在第二位，改善社会服务事业则摆在第三位。

红 色 恐 怖

非洲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国家没有哪个象埃塞俄比亚那样经历过如此长期的内部动乱，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过类似“红色恐怖”的经历，即军政府采用血腥的手段粉碎反对其统治的武装的平民反对派。在很多局外人心目中，埃塞俄比亚革命就是红色恐怖，军政委员会在1977年底在国外恶名昭彰，给人一种印象：埃塞俄比亚革命的特征就是流血。这是一种歪曲的看法。正如我们所试图说明的，革命带给埃塞俄比亚的绝不仅仅是流血。毫无疑问，军政委员会公开鼓吹用“革命的红色恐怖”反对它所谓“反革命分子”的“白色恐怖”。埃塞俄比亚的确经历了一个恐怖时期，有几千人被杀死。我们无意宽恕这种不加区别地滥用暴力的行为，或为之辩护。然而，要全面理解埃塞俄比亚的革命，必须了解这种现象的原因。

红色恐怖并没有用来强迫不愿参加的农民加入合作社，也没有用来消灭被认为仇视革命的社会阶级。红色恐怖是从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产生的。军政委员会主要是对付用武力反对和推翻军政府的“人民革命党”和“全埃社会主义运动”之类的各式各样的平民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及保守的和忠于老皇帝的“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在厄立特里亚，为了对

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暗杀亲政府人员的活动进行报复，或者为了恐吓当地居民，使他们不再支持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事业，军政委员会的公安部队也不时有过滥杀平民的事件。军政委员会有时也曾采取类似的策略对付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平民。但是它从未正式承认或批准这类滥杀无辜的作法。

确实分别有过两次红色恐怖浪潮。第一次是在1977年2月特费里将军被暗杀后的几个月。第二次是同年11月阿特纳福少校被杀后发生的。这两次权力斗争都被门格斯图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清除了军政委员会内部同他最接近的对手，而且把全国一切反对派的中心全部清除了。在第一次，他宣告革命从守势转入攻势，宣布一项“给广大群众以武器和民主”的政策，并且成立城市居民区协会的民兵队，在所有居民区清除人民革命党的支部。当时名义上支持军政委员会的全埃社会主义运动立即设法渗透到亚的斯亚贝巴新组织的六千多人的民兵队伍中去，利用这支武装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在首都和各个城市中军人的武装队伍和平民派别的武装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斗，相互暗杀对方的支持者，引起肆意杀人的浪潮。开始是几十人，后来是几百人被暗杀，常常不知凶手是谁。埃塞俄比亚人人感到不安全，担心很可能被人有意杀害或误杀。人民革命党利用这个机会，动员学生和青年组织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引起军政府在4月底第一次采用真正残酷的手段，实行大规模镇压。大约五百到一千五百名青年或者被当场枪杀在亚的斯亚贝巴街头，或者被逮捕之后处死。各派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整个夏季。最后，全埃社会主义运动由于其领导人与门格斯图决裂，并使用武力和暗杀的手段向

门格斯图的权威进攻，结果他们从到处抓人的人变成了被人追捕的对象。

然而，这还没有达到红色恐怖的高潮。11月11日阿特纳福被处决，这事件触发了新的发展。在这以后，“扩大革命红色恐怖”、消灭反对派的原则成了军政委员会的正式政策。两名美国众议员，当·邦克和保罗·宗格斯，在12月中访问埃塞俄比亚首都时，看到正在发生的杀人浪潮，军政委员会把被暗杀的人陈尸街头，在衣服上别上“反革命分子”的标帜，对此非常震惊。他们评论说：“杀人流血浸透了现在的制度”，“恐怖的统治”支配着全城。在阿特纳福被杀之后的四个月死了多少人，或者在1977年4月到1978年6月的十五个月红色恐怖时期死了多少人，只能全凭猜测。大赦国际提出了“合理的估计”，1977年12月和1978年1月这两个最严重的月份，死亡人数为二千五百到三千人，在后来的两个月，又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人被杀。此外，他们宣称，有三万到十万受嫌疑的人被关进居民区协会的监狱中，受一两个月的“政治教育”，其间很多人受刑、被殴打。一个瑞典医疗队公布的一份报告说，“非常可能”至少有一万埃塞俄比亚人在1977年因政治原因被杀，这份报告还引用埃塞俄比亚反对派的说法，自革命开始以来有三万人死于政治暴力事件。奇怪的是，最低的估计来自美国国务院。1978年美国国务院提交国会的关于接受美国援助国家违反人权事件的年度报告中估计，在红色恐怖中被杀的只有三千人。真实情况很可能是，两次红色恐怖浪潮中有近一万人被杀害。不管骇人听闻的死亡总数是多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大规模的红色恐怖现象在非洲社会

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只有看到当时不仅军政委员会同平民反对派之间，甚至各个自称支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之间都在进行激烈的斗争，才能够理解这种现象。

外 来 影 响

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埃塞俄比亚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在大约三年之内逐渐实现的。最初，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是由平民传播，并没有官方的作用；随后，这些观点为军政委员会的成员所接受，这在门格斯图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讲话中第一次得到反映；最后，在1977年年中苏联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主要盟友和提供武器之后，马克思主义才被提到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度。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出自真心实意，或者只为了装潢门面，出于权宜之计，作为吸引苏联的诱饵，或者确实是不得不接受苏联人作为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而强加的要求。答案不可避免地是各种情况都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军政委员会是真心实意地信奉某些符合这种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苏联和古巴在这个国家的存在，会不会有现在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高调。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政策在苏联成为其主要盟友之后有任何变化，但毫无疑问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公开表示是大大加强了。

直到1976年年中，埃塞俄比亚革命没有受到外部干涉的

影响。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决策是军政委员会自己做出的。各项改革受到了作为顾问的埃塞俄比亚平民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但是这些个人只能提出建议并试图说服军政委员会，最后决定权在军政委员会。换句话说，绝对没有迹象表明，军政府的政策是外界强加于它的，甚至没有受到外界重大影响的迹象。事实上，本书的作者在亚的斯亚贝巴居住时认识的苏联和中国官员，对军政委员会实行的他们认为过于激进的改革往往公开表示震惊，担心会引出更多的难题和反对，使军政府难以应付。特别是土地改革，一下跳过了中国人和苏联人在他们各自的革命中走过的好几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革命形成的几个月，主要是美国人一直在埃塞俄比亚。当势态逐渐发展时，苏联人还只是怀着感兴趣和困惑不解的心情在一旁观望，古巴也只有最低限度的外交关系。直到1977年2月，门格斯图上校清洗了军政委员会内部的反对派，除掉了军政委员会的主席特费里将军，自己成为领袖，在这时候苏联人和古巴人才发出明确的信号，表示他们准备支持埃塞俄比亚革命。

这时，国内形势正朝着不利于军政委员会的方向急剧变化，在美国之外，取得另一个支持的来源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厄立特里亚的战争急剧升级，因为那里的民族主义者知道，埃塞俄比亚面临国内动乱，又与主要盟友不和，这是他们取胜的最好时机。出于同样的考虑，索马里准备在欧加登地区发动攻势，宣称埃塞俄比亚东南角的这一地区是“大索马里”的一部分。要在两条相距遥远的战线作战和对付国内严重的动乱，军政委员会迫切需要军火。在这以前，埃塞俄比亚

的大部分军火和军事训练都是美国政府提供的。但美国政府既不喜欢军政委员会在国内实行的激进改革，也不喜欢它在国际上偏向东方，对军政委员会在人权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不满意，因此不愿意按照军政委员会为了保卫自己和为了求生存的需求赶紧运去武器。另一方面，苏联却愿意提供大量武器和顾问，古巴甚至愿意提供作战部队，条件是埃塞俄比亚要中断同美国的军事联系。这正是1977年4月发生的事情。当时美国军事援助团被驱逐，设在阿斯马拉的美国通讯中心被关闭。接着到来的苏联和古巴的军事援助使军政委员会击溃了索马里1977年夏季发动的对欧加登的全面入侵，并制止了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运动在北部省份已经胜利在望的步步进逼。埃塞俄比亚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粉碎厄立特里亚人和索马里人的反叛，但至少遏制了这两方面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两场战争都没有赢得全胜，直到三年以后，埃塞俄比亚仍然严重依赖苏联武器和驻在当地的一万三千到一万五千名古巴作战部队。这种严重的依赖显然使军政委员会容易受到苏联和古巴的干涉。然而，苏联和古巴的影响似乎同这两个国家在当地存在的规模并不相称，这种影响最大部分是在国际问题上，而这个领域对军政委员会来说是最不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还要比较详细地加以论述。

结 论

埃塞俄比亚革命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不断展开的过程中，除了可以断定它不可能退回到旧政权时代和不可能完全

否定社会主义之外，要对这场革命的最终结果作出其他的预测都是毫无把握的。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的战争仍在进行，外国军队还驻扎在这个国家，集体化引起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民族”问题尚未解决，这场革命显然还没有达到稳定的地步。此外，会影响革命前途的许多因素特别难以逆料，因为同更广泛得多的问题有联系。例如，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的武装冲突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是否愿意继续无限期地提供武器，可能还取决于美国为了使用索马里的港口和机场，会提供多少军事援助作为报偿。除非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导致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四分五裂，看来今后几年内革命的主要问题倒不在于埃塞俄比亚是否仍然是一个官方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这种信奉会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目前有一些相互矛盾的迹象。过去几年，军政委员会表现出明确无误的走向极权主义和中央集中控制的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流行的苏联式的，为军政委员会的这一态度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如果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经济发展要求制订集中的计划，如果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太强而不能听任他们自己作出决定，那么军政委员会就有充分的理由继续自上而下地指导革命。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的“客观条件”又使得严密的中央集权控制体制极不可能成为现实。这些客观条件比较起来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变革的概念，就是说，这种变革是阶级冲突的辩证过程，而不那么符合列宁主义关于通过集中控制和计划来策划社会改革的概念。社会在政治上过于四分五裂，全国性机构又太薄弱，因而中央的控制不可能轻易

得到巩固。因此,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埃塞俄比亚的权力仍将是相当分散的,即许多半自治的权力中心将继续存在。在这方面,埃塞俄比亚同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是明显的。在那些国家,“客观条件”有利于中央集权,尽管意识形态宣传实行比较民主的、让群众多参与政治的制度。在埃塞俄比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越来越多地按极权主义的方式加以解释。军政委员会可能变得更为专制,但客观条件还是倾向于不受控制的、甚至是过分的群众参与制。在埃塞俄比亚,极权主义同群众参与制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解释之间的冲突,象莫桑比克的情况那样,而且是意识形态同现实条件之间的冲突。因此,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更不大可能意味着一种完全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的制度。

第七章

民族主义与世界革命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倾向在外交政策方面表现得最突出，也最使美国担心。美国人可能不知道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情况，但是对这三个国家与东欧集团有密切的联系，其中两个国家还驻有大量古巴部队，美国人心里是一清二楚的。美国流行的看法是，把共产主义在1980年对非洲的影响看作是苏联及其盟友企图利用非洲大陆混乱的政治形势，强迫正在为求生存而寻求外援的政权接受共产主义。1969年10月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纽瑟姆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代表了美国的态度。美国把共产主义在非洲的存在不仅看作是对美国利益而且“也是对非洲国家长远利益”的“威胁”。戴维·纽瑟姆认为，某些非洲国家与共产党世界的联系不是自然发生的，是根本不必要的，这种联系是“显然毫无理由地把全球性竞争扩展到非洲”。美国的这种说法，不仅是危险的种族中心和利己的观点，而且，很可能是故意模糊了这些非洲国家与共产党世界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此外还忽视了这样的事实，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自己认为正在进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而很自然地靠拢苏联。事实上，不管美国制定政策的

人们多么不高兴，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是用类似的（如果不是同样的）意识形态观点看待国际关系的演变的。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还应该肯定，1980年苏联与其非洲新盟友之间的关系还是复杂的，没有确定下来，还在摸索如何达到稳定。尽管有很多关于亲密团结的论调，这些非洲国家对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仍然有不信任感，而且非常清楚它们自己的弱点。苏联集团与其在黑非洲的意识形态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根本没有形成现有的那种模式。可以肯定，这种关系既不同于苏联与那些受勃烈日涅夫主义支配、相信“有限主权”论的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苏联与古巴的关系。因为非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根本不象东欧和古巴那样依赖莫斯科，而苏联也没有明确表示对它们承担什么义务。这种关系与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也不相似，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没有一个是通过苏联的军事入侵建立起来的。本书所研究的三个国家——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都与莫斯科签订了二十年友好互助条约。但是这究竟有什么意义还很不清楚。以前，类似的条约，比如苏联与索马里和埃及的条约，终究被轻巧地抛在一边。本章的任务就是要解释一下这种复杂关系的性质。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苏联以及古巴对于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盟国的态度，然后再看看非洲人对这一关系的看法。

苏联的看法

苏联对于非洲总的事态发展和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领

导入上台掌权这种情况既抱有很大希望，同时又一直心怀疑虑。一方面，苏联人显然很愿意把在非洲涌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新浪潮说成是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终将在全世界实现的预言的应验。另一方面，由于六十年代苏联与现已垮台的非洲第一代激进政权交往屡屡尝受了痛苦的经验，因此，现在对之十分谨慎，对它们所抱的期望也不象以前那么高了。另外，认为处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的非洲国家不能真正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也加深了他们的怀疑。

1979年9月末苏联刚刚入侵阿富汗之后，苏共中央书记、苏共国际问题主要撰稿人之一波·波诺马廖夫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大概可算是苏联对当代第三世界事态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最新表示。这篇题为“解放运动是不可战胜的”的文章驳斥了美国关于共产主义近来在第三世界取得成功是“世界范围的革命进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表现。波诺马廖夫认为只能用“客观历史的因素”来解释越南、柬埔寨、古巴、尼加拉瓜、阿富汗、伊朗、埃塞俄比亚以及葡萄牙以前在非洲的几个殖民地所发生的形势的变化。这些变化只能理解为是“进步的、多数是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政权代替腐朽、反动、压迫性的政权的不可逆转的过程”的一部分。文章特别赞扬非洲的解放运动，认为它证实了苏联关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已陷入“深刻的危机”，越来越衰落，而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愈益繁荣昌盛的论断。波诺马廖夫认为这种变化构成了“现时代的基本内容”，而不是苏联插手的结果。“进行革命需要有革命的形势，这样的形势是不能够人为地从外

面制造的……革命的根源和动力总是存在于本国的土壤之中”。而且，“谁也不能把革命强加于他人”。苏联的理论家，从列宁开始，从来就不赞成“输出革命”的观点。所有新生的进步政权之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这些国家革命的条件成熟了，而不是因为苏联的干涉。但是，他还写道“发展中世界存在的各种潮流向何种社会政治方向发展，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显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自然同情为实现真正自由而斗争的人们。这样的力量无论在哪里存在和进行斗争，他们都有权利期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波诺马廖夫的论述既阐明了苏联对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看法，也说出了苏联在某种情况下进行干涉，以便推动事态按苏联的愿望发展的理论根据和时机。

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更加明确地表明，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非洲，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共产主义的积极行动，以便帮助革命进程的发展。他在1977年对非洲大陆进行一次为期四十天的访问之后对非洲一家著名的激进杂志发表谈话时，把非洲说成是“当今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他还说：“在那里存在着不用经过世界其他地区所必经的各种发展阶段，直接从准部族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极好机会……如果我们是在战斗的革命者，就必须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在非洲的统治不象在拉丁美洲那么强。”

几个月以后，卡斯特罗在古巴武装部队第二次远征非洲支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浪潮中，派遣了一万六千名作

战部队到埃塞俄比亚。卡斯特罗的话表达了第三世界一种积极的、认为高度不发达国家也具有社会主义潜力的观点。卡斯特罗认为非洲国家能够直接一跃而从“准部族社会进入社会主义”。

与此相反，苏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被第三世界激进分子视为监护人的态度。苏联人一方面依据列宁的著作说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同时又争辩说，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未成熟，还得先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在莫斯科看来，就是非洲最激进的政权也不过是“革命民主主义”政权，或者是正处在“非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苏联人不接受非洲领导人关于他们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苏联人说他们只是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其目的最多不过是为在下一阶段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苏联关于非洲社会主义政权的局限性的这个基本观点从未动摇过，甚至七十年代出现的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新浪潮也没能动摇苏联的这个基本观点。苏联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让步仅仅是在术语上。他们改变了“非资本主义”政权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些非洲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贬义的提法，开始谈论“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并且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理论”。

莫斯科的非洲研究所所长、苏联外交部长的儿子阿纳托利·葛罗米柯 1979 年写的一篇文章，以新的形式重新阐述了苏联的老论点。这篇文章根本没有什么新鲜见解，但是巧妙地包容了苏联对于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权新浪潮那种含糊的反

应,对这一现象既表现出欢欣的心情,又对其是否真正可信保持一贯的怀疑。葛罗米柯的文章首先指出从非洲到亚洲存在着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的宽广地带,人口总数达一亿五千万。他指出,这些国家多数在非洲,属于这一类型的共有“十多个”,领土面积占非洲大陆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占将近百分之二十五。文章宣称,有些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非洲国家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走在亚洲国家的前面了,甚至“在这方面取得了更快的进步”。这是因为非洲大陆有其“历史特点”,尤其是本地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比较弱。同时,葛罗米柯也表达了苏联对这种潮流的担心,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只是昙花一现。比如,他指出在同样落后的苏联中亚地区几个加盟共和国,社会主义得到成功发展的条件与非洲的条件很不一样,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且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然而,非洲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还没有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完全摆脱出来,在经济上仍然受到很多束缚”。而且,在阿尔及利亚、刚果、几内亚、坦桑尼亚、安哥拉、莫桑比克、贝宁和马达加斯加这样一些国家,改革不是在“工人阶级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的,而是由“其先进部分往往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分子”领导的。部族制度、没有阶级结构、“资本主义以前的”甚至往往是“封建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严重的文盲现象,都被认为是重要的障碍。葛罗米柯认为如果能够在“社会主义前的改革”中取得成功就算是能指望的最好成果了。事实上,他还写道:“更正确的说法是,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潮流,或者说是

这一类潮流的汇合，在流行、在发展，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从事困难重重的复杂的战斗。”

苏联的盟国除古巴以外普遍抱有与苏联官方同样的怀疑态度，甚至正式承认的非洲共产党人也照样抱这种态度。他们对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政权的“革命民主主义领导”是否坚定最为担心。正式的非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78年末举行一次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份题为“共产主义对非洲的召唤”的文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们担心革命民主主义者“会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文件说，因此，“某些革命民主主义者从他们的进步社会政策严重倒退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东德的理论家在他们的文章中把共产党人对非洲新盟友的怀疑作了更有说服力的概括。1979年，《德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说：“由于社会基础还很薄弱，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农民领导力量的思想和行动都不能始终一贯，缺乏经验与干部，再加上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继续运用强有力的经济地位和思想影响，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绝不是不可逆转的，而是有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

与苏联、东德和正式的非洲共产党人对非洲“革命民主主义者”谨慎的友好态度相比，古巴的反应是热情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完全无条件的。卡斯特罗非常愿意承认这些国家的革命是真正的，愿意了解它们的特点。他把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看成是与越南、老挝和阿富汗并肩站在一起的在世界泛围内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新的革命堡垒”。他特别推崇埃塞俄比亚的经验，认为这是兼有法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特点的一场“真正的革命”。非洲和欧洲的马克

思主义者对门格斯图少校的个性和他是否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抱有极大的怀疑态度，而卡斯特罗说他是一个“沉着、机智、果断、勇敢”，具有“非凡的革命领袖品质”的人。卡斯特罗认为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成功与巩固，对整个非洲“极为重要”。很明显，由一名军人来领导一场革命，这对于欧洲和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很难堪的事，对于古巴领导人则根本不成为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军人革命者。同样，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权在建立先锋党方面遇到的困难也是卡斯特罗能够理解的，他自己花了十年之久的时间才在古巴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党。显然卡斯特罗发现，同非洲社会主义革命找到共性，比同苏联人、东德人或非洲共产党人都容易得多，后者都有沉重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包袱。

苏联集团的政策

苏联人和他们的东欧盟友看来对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能否长久维持和是否真正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抱怀疑态度的，但是苏联集团所实行的政策，很奇怪，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态度。六十年代很多倾向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不是下台就是在政策上摇摆（本·贝拉、恩克鲁玛、凯塔、杜尔），七十年代另外一些国家向后转（埃及、苏丹、索马里）。既然苏联集团抱怀疑态度，人们可能以为苏联会更加谨慎，越发不愿在经济、政治及军事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苏联人加紧与非洲国家订立条约，以巩固与这些国家的盟友关系，稳定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苏联

集团中的盟国，特别是东德和古巴，还商订协同战略，对这些国家给以支援。苏联在1976年10月与安哥拉签订了一项二十年友好合作条约，1977年4月与莫桑比克、1978年11月又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同样的条约，尽管苏联以前与埃及和索马里所订立的类似条约都宣告失败。东德与非洲的关系发展很快，也第一次与这三个国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有两个条约是东德主席埃里希·昂纳克1979年2月访问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时签署的，另一个是他同年11月访问埃塞俄比亚时签署的。苏联、东德、古巴同这三个最亲密的非洲盟友还在文化、贸易、科学、军事以及经济合作等方面达成了许多协议，建立了一套广泛的援助体系。

东欧集团国家处理与非洲的关系方面在七十年代末期最值得注意的发展，是这些国家在政策上互相协调。这表明东德和古巴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都已成熟，还表明共产党世界要更进一步在非洲大陆推行它的事业。苏联、东德和古巴之间的这种三边合作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它们之间谁影响谁，这不属于本书研究的问题。看起来，古巴的动机和它与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历史，与苏联、东德在这方面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这三个国家各自提供些什么援助，似乎已有总的谅解，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而且对整个非洲大陆也是如此。它们之间的这种分工基本上是以各自的资源和特有的能力为基础的。苏联负责提供几乎全部的军火并全面负担军事援助的责任。古巴人负责派遣军事人员和技术人员。东德负责帮助加强这些非洲国家政权的治安和警察。古巴的贡献按国家的大小和财富来看超出了比例，的确是令人

吃惊的。据美国政府估计，1978年共产党国家派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四万一千六百八十名军事人员中，有三万七千二百七十五人是古巴派遣的，古巴提供的非军事技术人员达一万零九百七十人，而来自苏联和东欧的总共才七千六百四十人。苏联从1973年至1977年间，卖给或送给黑非洲的军火价值十三亿美元，1978年，仅仅一年就达到了十二亿美元的新纪录，几乎全部是给埃塞俄比亚的。东德不仅给莫桑比克送些军火，还帮助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训练治安和警察部队。

苏联集团对这些国家的援助集中于加强军队和治安部队，这清楚地反映出苏联集团特别关心这些盟友的政治稳定，决心使这些政权维持下去。此外，苏联还通过帮助这些倾向社会主义的政权建立强有力的先锋党，以便从组织制度上得到保证。苏联的第三个目标是培植一个更大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阶层，以便为这些政权提供更强大的社会政治基础。这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灌输这种学说作为重点。六十年代苏联在非洲的经验肯定是促使它选择这一重点的决定因素。恩克鲁玛、凯塔和本·贝拉如果不是过早地下台，本来很有可能最终建立起大体合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复制品。但他们没有办到，原因是他们的党力量太弱，他们既控制不了军队又改变不了军人的思想。种种迹象表明七十年代后期的非洲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完全赞同苏联人和古巴人的做法，密切关心军队和治安部队以及培训政治干部的工作。这种做法既符合苏联和古巴的利益，也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能看成是把“外国的”共产主义影响强加给他们本国的革命。

但是，与苏联的潜在冲突不是没有的，这种冲突来自一些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军事领导人。

非洲的军人政权成了使苏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头痛的事。苏联与苏丹、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当权的军官打交道的经验表明，民族主义终归压倒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民族解放斗争又产生了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军人文官联合政权。不过，这些政权能否恪守它们的宣言还有待于证明。按照苏联的观点，至今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政府，无论是军人政府、文官政府或军人文官兼有的政府，已经证明是可靠的盟友或是真正信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此，苏联在理论上把军人与非洲国家的其他一切“进步”分子同样对待，都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按其定义，小资产阶级既可能转向激进，也可能转向反动。按照苏联的理论，夺取了政权的军官最终总要决定他们站在哪个社会集团一边。有些军官“迟早要大体变成国际剥削阶级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工具”，最后用他们的力量“打击发展中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有意进行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的“民主的军官们”将与其他进步力量一起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哪一种类型的军官能够占上风似乎取决于偶然的机遇和军人内部的权力斗争。

苏联人不仅对掌权军官的进步倾向有怀疑，而且怀疑利用军队作为进行革命的机构是否适当。苏联人即使在与军人政权密切合作的情况下，也仍然坚持要这些政府建立一个先锋党，并使党而不是军队成为政权的基础。这个问题在一些国家极为微妙。在这些国家，进步的军官在没有政党帮助的

情况下取得了政权，他们认为苏联坚持要建立政党是打算把他们甩到一边。苏联心目中的这样的过渡在非洲确实只有一个例子，这就是索马里。1976年，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在实行了七年完全军人统治之后，解散了最高革命委员会，把权力移交给了新建立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然而，权力的移交并不彻底，因为军官在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按照苏联人的观点，这个党已经证明与任何军人政权一样，不是可靠的盟友。权力移交之后不到一年半，索马里就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废除了两国的友好合作条约，转向美国寻求援助。因此，从索马里的例子来看，仅仅有一个党并不能保证这个国家成为苏联集团的可靠合作者。苏联以党而不以军队作为权力机构的一般经验和索马里的具体经验，一定很使苏联人伤心和失望。但是苏联人还不改变态度，仍然认为建立一个先锋党是一个政权忠于社会主义的最好证据。

苏联人对加强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经济远不如对加强这些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组织那么关心。经济援助和贸易都没有被用作苏联推行政策的重要工具。尽管苏联与别国的友好条约都包括“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但莫斯科并没有制定优惠的贸易政策引诱非洲国家进入苏联的轨道。苏联也没有象与古巴作糖的贸易那样，按长期固定价格向任何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提供苏联主要出口商品。苏联在经济贸易政策方面的弱点很可能就成了苏联与非洲关系中的致命缺陷。附表一和附表二的数字表明，所有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和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完全处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尽管有些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可能由前殖民地宗主国改为别的西方国家。阿尔及利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美国已经取代法国，成了阿尔及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国。非洲激进政权一方面在国际讲坛上谩骂西方，一方面继续与西方进行贸易。因此，苏联完全不在乎与政治色彩完全相反的非洲政府也进行贸易。附表三表明，1978年苏联与埃及的贸易额超过了任何其他非洲国家，尽管自1972年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断绝了与莫斯科的政治军事联系以来，苏联一直公开谴责他的政权。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是苏联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从苏联与非洲大陆的政治关系来看，还多少有点意义。但是加纳、摩洛哥和尼日利亚，这几个七十年代末期一直是苏联在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肯定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此外，苏联还在1978年就与摩洛哥签订了一笔价值二十亿美元的磷酸盐交易，这项协定使这个保守的亲西方国家在苏联从非洲国家的进口额上跃居首位。按照这项协定，苏联将要开发和装备整整一个年产一千万吨的磷酸盐矿，苏联的投资则用矿产来偿还。

苏联集团经济援助的格局与它在非洲大陆所承担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义务倒是比较相匹配。但是，即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苏联集团的援助也仍然是位居第二，与西方的援助相比差一段不小的距离。正如戴维·奥布赖特所指出的，莫斯科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一贯少于对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援助，而且援助的数额从1954年至1974年在苏联对外援助总额中的比例已经实际上从百分之三十四降到了百分之九。苏联在非洲的主要共产主义对手——中国，给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援助与整个东方集团的援助几乎一样多。1954年至1978年各共产党国家的援助总额是48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援助是23亿美元。（对比起来，西方国家直接提供和通过世界银行等各种多边信贷机构提供的总额，仅1977年一年就达51亿美元。）从1954年至1978年期间，苏联集团在黑非洲最宠爱的国家有几内亚（三亿二千二百万美元）、苏丹（三亿零五百万美元）、埃塞俄比亚（二亿美元）、加纳（一亿九千九百万美元）、索马里（一亿七千万美元）、马里（一亿一千三百万美元）、安哥拉（一亿零五百万美元）。但是这些国家无论哪个都没有得到象北非国家那么多的援助。例如，摩洛哥得到了一笔总额为二十二亿美元的巨大援助，这主要是1978年的磷酸盐交易；阿尔及利亚获得十二亿美元。当前最有意思的问题是，不知苏联人及其盟友们是否认为有特殊的理由增加对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新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援助。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与苏联集团和西方的经济关系的演变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1. 安哥拉

苏联与安哥拉通过1976年10月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结成了同盟关系。根据这个条约，双方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同时要求两国在“和平遇到危险”时协调立场。条约还规定双方进行军事合作，“以利于加强‘缔约双方’的防卫能力”，这句未特别指明的术语似乎既包括苏联援助安哥拉，也包括安哥拉援助苏联。苏联对安哥拉的直接援助大部分是军火和军事训练。据美国的统计，截至1977年，苏联人提供了三亿四千万

美元的军火，而经济援助到 1978 年底只有一千七百万美元。

从安哥拉独立之前很久就开始帮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主要共产党国家是古巴。1979 年安哥拉还驻有古巴作战部队一万九千人，另外还有古巴的各种技术人员八千五百人。这个数字预料还将增加到一万人。古巴在安哥拉的技术援助人员的队伍比在任何其他非洲国家都大得多。古巴的医生和护士构成了安哥拉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骨干。古巴的技术人员在全国各地帮助修复因战争受到破坏的桥梁和公路。他们还从事城市房屋建设和管理葡萄牙人丢弃的农场和工厂的工作，有的分派到政府各部担任顾问。古巴军事人员帮助训练新建立的安哥拉陆军及民兵武装。在古巴的派恩斯岛，有二千到三千安哥拉青年在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技术技能和革命思想的训练。西方的分析家提不出古巴技术援助的估计值，但在帮助安哥拉恢复的共产党国家中，古巴无疑处于领先地位。唯一公布了费用总数的援助协定，是在 1979 年宣布的、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为下一年度建设公路和城市住房的协定。古巴的援助有多少是贷款，多少是无偿赠送，有多少由安哥拉自己偿付，这三者的比例不清楚。但是，到 1980 年夏季，很多安哥拉人在公开抱怨古巴援助的代价太高。苏联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支付了古巴军事援助的部分开支，还是由安哥拉自己支付全部费用，对此也不清楚。

安哥拉取得共产党国家援助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罗马尼亚。安哥拉 1978 年从苏联集团所得到的总额一亿零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中，七千五百万美元来自罗马尼亚，一千七百万美元来自苏联，其余的一千三百万美元来自东方集团的其他成

员国。罗马尼亚的援助是根据1978年签订的一项全面合作协定由罗马尼亚向安哥拉提供的一系列贷款。罗马尼亚的这笔贷款是否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罗马尼亚通过斗争在外交政策方面对莫斯科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因而赢得了苏联集团中的桀骜不驯者的名声，而当时内图总统恰恰也是越来越那样行事。

东欧集团援助的效果有好有坏，或者说还不清楚。苏联的直接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安哥拉恢复渔业，很可能苏联从这笔投资中获得的好处比接受投资的安哥拉大得多。起初，苏联有权占有在安哥拉水域总捕获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后来又重新谈判，按照对安哥拉比较有利的条件达成协议，建立了一个联合渔业公司，更平等地分配捕获物。罗马尼亚的援助计划的价值和性质目前还不清楚，因为直到1980年初，任何主要援助项目都没有公布过。其他东欧国家签订了各种项目的协定，但是都还没有完成。匈牙利承担建设一座公共汽车装配厂，并提供价值六百五十万美元的零件。波兰在罗安达建一座生产拖拉机挂车的工厂。古巴的援助纪录是成败兼备。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衡量，古巴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援助都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但是古巴顾问为把葡萄牙人遗弃的咖啡和甘蔗种植园改组为国营农场的努力只取得了很有限的成绩。另一方面，古巴在城市住房和在罗安达城外生产建筑预制件的援助看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安哥拉人欢迎东欧集团的经济合作并且努力争取更多的合作，但是并不同意也不寻求建立独家包揽的关系。至今，他们仅限于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东欧经济互助委员会。

有趣味的是，安哥拉政府在处理与西方的经济关系方面也奉行同样谨慎的方针。它寻求援助、贸易和投资，但是不参加西方的组织。到1980年，安哥拉既不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属于世界银行这两个西方最主要的多边金融和援助组织。安哥拉曾就加入非洲、加勒比及太平洋地区五十七国集团的问题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过会谈，这个集团的国家根据“洛美协定”可以得到关税优惠和相当多的援助。但是安哥拉“人运”政府最后在1979年10月拒绝在新的第二次洛美协定上签字。因此，安哥拉不属于被认为是东方或西方的“工具”的任何贸易组织、经济集团以及援助和金融机构。多边援助的主要来源是联合国的各种机构、非洲发展银行、阿拉伯的非洲经济发展银行等，尽管这些机构提供的援助数额都不大。但是，安哥拉通过与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巴西、瑞典和美国的公司分别进行大量的双边交易，与西方国家建立了联系。这些公司愿意在安哥拉的经济发展中与安哥拉建立合营公司和进行投资。最大一个合营企业有美国和法国的石油公司参加，主要是德士古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和埃尔夫—阿奎坦石油公司。这三家公司承担的投资总数超过了四亿三千万美元。这种政府与公司间的交易，在外国对安哥拉经济的贡献中所占的比例最大。

在贸易关系方面，安哥拉是完全面向西方，不过根本改变了出口对象，从葡萄牙转向美国。美国1978年从安哥拉直接进口了价值达二亿一千八百五十万美元的商品，大部分是石油。非直接的进口就更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8年的贸易统计数字表明，安哥拉对巴哈马群岛的出口总值为三

亿九千八百五十万美元，对维尔京群岛的出口总值为一亿八千万美元。这些数字其实就代表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炼油厂从安哥拉进口的石油，这些油经过加工再运到美国市场。把这些都算在一起，安哥拉的出口将近五分之四都是对美国的。因此，尽管美国政府坚决拒绝承认安哥拉“人运”，而安哥拉却是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非阿拉伯国家的一个重要石油来源。

安哥拉的另一个新贸易伙伴既不是共产党国家也不是西方国家，而是拉丁美洲的巴西。巴西是在内战期间第一批承认安哥拉“人运”的国家之一。据报道，巴西在1976年至1979年间向安哥拉提供了价值三亿五千万美元的食品和服务。两国双边贸易额从1975年的四百万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四亿美元。根据1979年年中两国签订的一项协定，巴西从第二年开始每天从安哥拉取得一万五千桶石油，巴西的国营公司巴西石油公司将在安哥拉的水域钻探新的油田，并且对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提供技术培训。

2.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与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独特的。莫桑比克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唯一把中国看作“受欢迎者”的国家。中国在经济上对这个国家的作用与苏联集团的作用差不多一样重要。莫桑比克虽然与苏联、东德签订了友好条约，还与另外三个苏联集团的成员国古巴、匈牙利及保加利亚签订了军事协定，但莫桑比克所得到的军事援助要少得多。1977年全年，苏联集团只提供了价值四千万美元的

军火。1977年以后的数量很可能有所增加，因为莫桑比克为了对付罗得西亚不断升级的空中和地面进攻而要求援助。苏联集团在这个国家的军事存在规模仍然是比较小的，1978年只有军事人员一千一百人，据说其中三分之二是古巴人。这个数目，到1980年1月已减为七百人，当时莫桑比克通过谈判与罗得西亚达成了政治解决的协议，战争逐渐停息。据估算，1978年全年共产党国家对莫桑比克的经济援助总值大约八千二百万美元，其中中国提供了六千万美元，苏联提供了五百万美元，其他东方集团国家提供了一千七百万美元。美国情报部门报告的估计数字虽然比这个数字高，但后来因不准确而收回了。那么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莫桑比克在南部非洲的战略地位这么重要，需要外界保护，又信守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一个有力量而团结的先锋党，为什么得到的援助却这么少呢？

答案部分在于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在国家独立之前与苏联集团的关系，部分在于莫解阵在国家独立之后对待一切外国势力的总的态度。莫解阵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期间与苏联的关系从来不很密切。因为它与中国有亲密的关系，遭到苏联的忌恨。古巴和苏联的情况差不多，对莫解阵的援助实际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古巴与莫解阵的领导人也很少接触。在莫解阵反对葡萄牙人的游击战争中，帮助过莫解阵的主要东方集团国家只有东德。东德对非洲的整个军事援助计划就是在1969年从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民族主义者的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开始的。莫桑比克独立之后，莫桑比克和苏联由于客观的需要，不得不重新估价双方的关系。莫桑比克同安

哥拉一样,开始把苏联及其盟国当作主要保护者,以对付在军事上比莫桑比克强大得多的南非和罗得西亚的威胁。莫斯科很懂得莫桑比克的地理位置在南部非洲和印度洋的政治价值,并且还想对付中国的影响。1977年4月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主席访问莫桑比克,签订了一项与苏联安哥拉之间的条约几乎相同的两国和平友好条约,把苏联与这个新盟友的关系固定下来。1979年2月,莫桑比克又象安哥拉那样,与东德签订了一项和苏联的条约几乎完全一样的友好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为了加强防卫能力”进行军事合作,双方保证在和平遭到破坏和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立即进行联系”。此外,莫桑比克还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看起来,已经建成了一个以广泛的苏联集团国家构成的盾牌,使莫桑比克不受南非军事实力的威胁。尽管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在防务方面严重依赖苏联集团,但是却有意避免让任何共产党国家在莫桑比克驻军。莫解阵的官员虽然从未公开这样说,私下却对古巴在安哥拉派驻大量部队持尖锐批评的态度。他们虽然因罗得西亚陆军和空军的袭击而遭受伤亡和损失,但从不认为让古巴人到莫桑比克来作战是可取的措施。他们借用坦桑尼亚的两个旅的部队来协助保卫莫桑比克边界,派了大约二百五十名本国的部队人员到罗得西亚帮助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游击队,以回报罗得西亚的攻击。

苏联集团在经济方面的援助缓慢而稳步地增加,由古巴和东欧国家领先,最突出的是东德。苏联人看来主要还是想进行渔业交易。关于苏联渔船在莫桑比克水域捕获量的问题发生多次磨擦,后来两国于1979年4月签订了建立联合公司

的协定。根据协定，莫桑比克的股份占百分之五十一。根据1978年末签订的一项议定书，苏联人还承诺，与保加利亚人一起帮助扩大“林波波农工企业计划”，把灌溉面积最后扩大到三十一万四千公顷。但是到1979年，保加利亚主要是以派遣顾问的方式提供援助。此外，保加利亚还答应帮助建设林波波河马辛吉水电站大坝和在建筑工业方面提供援助。东德在贸易和援助方面的活动是广泛的，包括提供农业设备，在贝拉建设一个卡车装配厂，为发展冶金工业和冶金机械工业提供技术援助，还在莫桑比克北部开发金矿和铜矿。古巴的援助，如果美国关于古巴派往莫桑比克的工作人员的数字估算得准确，那么最大的是在军事方面。1978年古巴军事顾问的总数达到高峰，多达八百人。古巴人也帮助农业部门，最主要的则是教育方面，到1979年年中，莫桑比克已经派出二千八百名中学生去古巴进修。

不管苏联集团援助的确切数额是多少，除了军事方面之外，还远远满足不了莫桑比克的需要。马谢尔总统声明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模范关系”，这个愿望看来在经济领域实现不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苏联人愿意更充分地承担责任。相反，莫桑比克人在独立之后的五年期间，发现西方的援助很重要，要维持它的经济甚至很可能是不可缺少的。联合国的统计数字表明，1978年一年，来自西方国家的实际援助超过了九千万美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了农业部门外援的主要来源，其中瑞典居首位。美国的国会虽然禁止政府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但以救灾的方式提供粮食等食品方面则居于首位。即使不算洛美协定规定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

洲经济共同体的援助，到1980年，西方的援助也大大超过了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全部援助。此外，值得一提，各国给莫桑比克的贷款中最大的一笔是南非提供的一亿多美元的贷款。

由于苏联集团提供不了更多的援助，而莫桑比克又必须取得大规模的外援，就使得莫桑比克不仅不得不重新考虑与西方的关系，而且不得不重新考虑与国际私人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关系。同莫桑比克取得独立之前一样，美国继续是莫桑比克的主要贸易对象，此外还有日本、联合王国、西德以及葡萄牙，不过葡萄牙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从1975年到1980年间，西方国家和日本从莫桑比克的进口占莫桑比克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到1980年初，莫桑比克政府已经主动向美国的商业公司拉关系。首先是让《国际商业》杂志在马普托举行可能投资者的讨论会，而后又派代表团去纽约参加非洲美洲研究所组织的类似的讨论会。莫桑比克对西方和美国的开放有多少成果，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还不清楚。莫桑比克还没有参加任何一个主要的西方金融和援助机构，比如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但是经济上的需要已经促使莫桑比克朝着至少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关系的方向发展。这一切看来不是什么预兆，表示莫桑比克要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放弃与东方的军事联系。相反，莫桑比克与很多其他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一样，一面继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倒向“天然盟友”，一面在经济上与西方大力发展关系。

3.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与苏联集团的关系极为复杂。埃塞俄比亚的军政权在没有任何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实现了革命，但是后来依靠苏联和古巴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才保住了这个古老帝国的领土完整。苏联人从埃塞俄比亚的阶级矛盾中看到它的革命潜力比别的非洲国家都大得多，甚至看到了当年本国革命的影子。苏联人还注意到埃塞俄比亚地理位置的政治重要性，但他们还是很不信任埃塞俄比亚的军政权。这些矛盾因素综合的体现就是：苏联集团一项庞大的军事计划，这是迄今苏联集团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大的军事计划，一项不断扩大的经济援助计划，以及很不稳定的政治关系。根据美国的计算，苏联的军事援助，从1977年开始到1980年，已经大大超过了十亿美元。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些武器军火是卖给埃塞俄比亚的，但这笔费用的大部分看来势必成为馈赠，因为埃塞俄比亚经济上不可能偿还这么大的一笔资金。

埃塞俄比亚濒临红海，紧靠曼德海峡，与阿拉伯半岛近在咫尺，对流经苏丹和埃及的青尼罗河的河水具有潜在的控制力，要在阿拉伯世界或非洲世界采取行动埃塞俄比亚是很合适的基地，所有这些无疑都在苏联的战略考虑之中。一位美国学者早在1963年就说过，莫斯科把埃塞俄比亚看作进入非洲大陆的“后门”，这并不新鲜，因为这与过去沙皇的看法完全相同。关于苏联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有个很有意思而被人们普遍忘记了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十九世纪末，欧洲列强争夺非洲，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为抵御意大利的入侵而斗争的时候，俄国人曾向这位皇帝提供了顾问、“大批的武器、

步枪、弹药和大炮”。埃塞俄比亚的最后一个皇帝海尔·塞拉西 1959 年访问苏联时说过：“我们国家不会忘记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我们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定性时刻迅速给我们以武器援助，我们对此永怀感激之情。”二十年过后，帝国时代结束之后的第一任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上校在苏联党的主席阿列克塞·柯西金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时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他说：“埃塞俄比亚的广大群众……在遭受惨痛磨难和革命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搏斗的时期已经认识到，苏联是真正的朋友和盟友”。向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提供过顾问和武器，帮助过他们捍卫帝国的统一甚至扩大帝国的统治的，肯定不只是俄国人。过去，为了同一目的，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曾先后利用过葡萄牙人、法国人、英国人，最近是美国人。抛弃不再需要的盟友成了埃塞俄比亚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可能也值得注意。

苏联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始于 1976 年 12 月签署的一项价值一亿到二亿美元的秘密武器交易。次年 5 月，门格斯图在断绝了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以后，前往莫斯科，与苏联人签署了经济、科学、文化、可能还有军事等多种协定以及一项友好“宣言”。据估计，1977 年苏联给埃塞俄比亚追加的军援大约是四亿美元。下一步是 1978 年 9 月达成了一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直到这年 11 月门格斯图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才要求、埃塞俄比亚也才同意，签定一项正式的二十年友好互助条约，为两国的同盟关系提供根据。象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那样，东德又追随苏联，在 1979 年昂纳克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时与埃塞俄比亚签定了一项类似的条约，由东德

接管培训警察和治安部队的工作。到1980年，苏联已经帮助把埃塞俄比亚军队建成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庞大的军队，具有常规部队及民兵二十五万人，有很好的现代化装备，包括提供给黑非洲国家的第一批米格二十二型飞机。苏联的武器和一千二百名顾问以及古巴1977年底派出的一万六千人作战部队，使得门格斯图政府在欧加登地区的战争中打败了索马里的正规部队，击退了曾一度控制除省会阿斯马拉和马萨瓦港以外所有城市的厄立特里亚游击队。如果没有苏联和古巴的大规模援助，埃塞俄比亚几乎肯定会失去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两个地区，门格斯图政权也会随之垮台。因此，埃塞俄比亚国家和门格斯图个人对这两个共产党国家所欠的债都是巨大的，门格斯图为此多次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表示感谢。

埃塞俄比亚与苏联集团的关系，关键是军事关系，但是双方的经济关系也在发展。到七十年代末，苏联集团的经济援助计划开始反映出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的兴趣比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大得多。门格斯图本人说，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由苏联集团为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工业部门，提供三亿美元投资。苏联在1959年曾给埃塞俄比亚一亿美元贷款，但大部分还没有使用。看来苏联打算用这笔余款作为所承担的投资的一部分。这笔早先的贷款到埃塞俄比亚发生革命的时候只用了很小一部分，大约一千五百到二千万美元用于在阿萨布建立炼油厂和一所技术学校。1979年4月，苏联人又答应再给大约八千五百万美元（六千万卢布）贷款，把尚未支付的贷款的总额提高到大约一亿七千万美元。这些贷款已拟定用于多种项目，包括阿萨布炼油厂的扩建工程、阿瓦什

河谷的一项大型灌溉工程，建立十五座拖拉机和农业机械修理厂，以及三十一座仓库，建设一座年产六十万吨的水泥厂（在迪雷达瓦）及拖拉机组装厂，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除了过去提供的一千五百份奖学金之外，再提供二千份新的奖学金。苏联最重要的经济援助可能是1980年初签订的一项未公开的协定，由苏联减价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数量不明的一批石油。在1979年，世界石油价格第二次上涨之后，埃塞俄比亚进口石油的费用大约是一亿九千万美元，超过了当年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四十。

埃塞俄比亚获得经济援助的另外三个主要的苏联集团国家是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东德1977年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一笔二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工厂设备和工业、矿业、运输业及农业等其他援助项目。1979年又签订了一项二千万美元的贷款，帮助扩建阿萨布港。东德还提供了一千部拖拉机，并为保养这些拖拉机建立了一个维修厂。关于东德在非洲活动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埃塞俄比亚是东德在非洲大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咖啡是埃塞俄比亚换取东德拖拉机及其他援助的主要产品。捷克斯洛伐克1978年初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一项四千六百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建设几个工厂。这笔贷款的一部分将用于建设一个总投资为九千万美元的纺织厂。捷克斯洛伐克负担这笔投资的百分之十，东德负担百分之三十一，其余部分由埃塞俄比亚负担。古巴，与它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做法一样，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五百名医务人员，还为二千至三千名埃塞俄比亚学生提供奖学金，到派恩斯岛的学校学习。根据门格斯图所提到过的情况计算，东欧

集团(如果把石油补贴也算在内)在纸面上答应给埃塞俄比亚的贷款总额可能接近三亿美元。但是不知道苏联人及其东欧盟友打算用多长时间来实现他们的承诺。他们以前的表现是,乐于宣布重要的协议,后来执行却拖的时间很长。1959年苏联给埃塞俄比亚的贷款就是这样,二十年只用了贷款的五分之一。苏联对索马里的一亿七千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也是如此,有一部分始终没有兑现。

门格斯图也一直注意到西方也是外援的重要来源。就在他宣布埃塞俄比亚将从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三亿美元的讲话中,他谈到西方各国和国际组织在1974至1978年间已经提供了差不多同样金额的援助。没有迹象表明埃塞俄比亚打算断绝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金融机构的联系。多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属于这些机构,并且获得过相当大的利益。不过,由于埃塞俄比亚对收归国有的西方公司的利益没有给予补偿,因而1977年至1980年间,埃塞俄比亚与世界银行的关系比较紧张,使总值为一亿四千八百万美元的三项新贷款受到影响,其中一项是用于埃塞俄比亚主要农业技术推广计划以帮助农民协会的贷款。埃塞俄比亚一方面注意培养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另一方面而表示对参加东欧经互会没有多大兴趣。欧洲经济共同体按照第一次洛美会议的协定在五年内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亿二千万美元,已超过了埃塞俄比亚的实际吸收能力。到1979年9月,埃塞俄比亚只用了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埃塞俄比亚已经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完全结合起来,与其机构紧密联系,在这方面超过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没有参加洛美协

定，也没有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埃塞俄比亚的外贸结构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主要市场仍然是美国。1978年，与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贸易占埃塞俄比亚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因此，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方针与政治方针之间的矛盾比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还要严重。

非洲人的观点

如果有人 在 1980 年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作首次访问，很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这三个国家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组成部分了。红旗到处与国旗一起飘扬，在官方庆祝活动中，旗帜和装饰中红色压倒了其他的色彩。在亚的斯亚贝巴，革命广场竖立着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的巨幅画像。在马普托，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党的党徽中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象征，党旗上突出一对交叉的锤子和锄头，代表工农联盟。另外两个国家的党旗上也有类似的社会主义标志。这三个国家的书店和书亭出售三个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各种著作。在公众集会和党的会议上经常唱国际歌。“西方”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到处交替使用。与此同时，象门格斯图和内图这样的黑非洲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宣布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必然会给来访者造成共产主义兄弟情谊和坚决与西方为敌的印象。然而，在这些词藻和表演的背后，这几个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关系中有很多细致而微妙的分歧和不便言明的保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

面是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于非洲以及第三世界的团结。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实质上贯穿着三条线：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团结一致，叫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民族主义，这曾鼓舞这些国家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使它们对超级大国苏联持有戒心；“第三世界大团结”，这种观念超出了六十年代的泛非主义的范围，争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奋斗。

1.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大团结这些因素构成的三重关系中，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似乎最明显，也最使美国担心。苏联关于“世界革命的进程”的理论和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论已为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以及多数其他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全盘接受。比如安哥拉“人运”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人运”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进程正在进行，这是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全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安哥拉的革命被看作“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的组成部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与当前其他革命力量之间愈益紧密的合作”被认为将决定“人类未来发展的道路”。对于这些非洲国家来说，苏联是“人类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堡垒”。东方集团国家（按安哥拉人和莫桑比克人的用词）是“我们的天然盟友”。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在1978年曾声称，“他们是我们在思想、政治、外交、经

济及社会方面的天然盟友。我们捍卫同一事业，为同样的目标而斗争。我国解放战争的经验 and 当前加强防卫能力的斗争的经验都表明，社会主义阵营仍然是我们的战略军事后卫，是我们得到支持的基地”。

在埃塞俄比亚，为了革命而流血的斗争被看作是埃塞俄比亚坚持“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立场和埃塞俄比亚愿意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工人阶级运动及进步力量站在一起”的证明。实际上，门格斯图已经把埃塞俄比亚说成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但苏联人拒绝响应这种说法。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坚持“不结盟”的观点并不奇怪，这使它们事实上更接近苏联集团。这些国家与苏联人一样，不赞成西方认为不结盟就是与世界上两大对立集团保持等距离的那种观点，它们强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中具有共同的利益。莫桑比克的萨莫拉·马谢尔总统1979年9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使用了可能是最戏剧性的语言来表述这种不结盟观点。他说：“有些人常常忘记，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处于冷战的年代了……今天和平遍及欧洲，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也是和平。但是，正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战争、侵略、帝国主义的阴谋、政变、暗杀还在不断发生……因此，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在今天根本不再存在的形势下所设想的那种不结盟呢？昨天的冷战曾经推动不结盟运动的许多活动，今天已经成了热战，烈焰在非洲这里燃烧，在阿拉伯世界、在亚洲、在拉丁美洲燃烧，在摧毁，在劫掠……怎么能要求我们同那些正在

纵火、轰炸、屠杀的主要仇敌，和那些帮助我们加强自卫、抵抗和取得胜利的人之间保持同等的距离呢？”

因此，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之所以与苏联集团结盟，根本原因不仅仅由于具有共同的世界观，而且由于他们深感需要保护，以对付他们认为西方直接或间接摧毁它们的种种阴谋。与苏联和东德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的非洲国家全都是受到邻国多次军事进攻和颠覆破坏的国家，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莫解阵认为：“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结成政治联盟是我们阻止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重要战略因素”。这在“敌人向南非提供核武器并加强它在印度洋的军事实力”的时候尤为重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给这些国家的革命所带来的具体的实际好处，对这种不结盟的观点和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很重要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已故的内图总统把苏联、古巴和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视为在安哥拉内战中“人运”战胜入侵的南非军队的“主要力量”。他还指出，来自非洲内部的支持也很重要。几内亚（比绍）、几内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在“人运”与亲西方和南非的对手进行斗争的时候，提供过武器或作战部队。但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心目中的伟大英雄是古巴。“人运”把古巴的军事援助称赞为“实行国际主义支援”的光辉典范。门格斯图多次用最热烈的语言赞扬菲德尔·卡斯特罗帮助埃塞俄比亚革命战胜内外敌人的那种“坚定的国际主义”，认为埃塞俄比亚人民与古巴人民之间的团结是“鲜血凝成的”。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得到好处的非洲国家认为它们自己也要向其他进步运动提供援助。门格斯图

在 1978 年的确表示过，他打算以下述方式报答苏联人和古巴人：“我们保证，一定要坚持不懈地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火炬前进，以报答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利比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给予我们的支援。”

甚至在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战争进行期间和埃塞俄比亚国内还存在相当严重的反对活动的时候，门格斯图就开始实行他的诺言了，他帮助罗得西亚的“爱国阵线”、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及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训练游击队。出于类似的信念和革命国际主义的意识，安哥拉的“人运”向“爱国阵线”，特别是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人运”还帮助扎伊尔的反对派组织“解放刚果全国阵线”向扎伊尔的南方省分组织发动了两次进攻。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派出了大约二百五十人的正规部队进入罗得西亚，与罗伯托·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游击队并肩作战。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为支援“爱国阵线”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付的代价都是相当大的。例如，在罗得西亚战争结束时，马谢尔总统宣布，1977 年至 1980 年间，罗得西亚军队对莫桑比克进行了三百五十次进攻，打死莫桑比克一千三百三十五人，打伤一千五百人。财产、设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损失估计为五千万美元。莫桑比克因坚持参加国际上对罗得西亚的抵制活动，估计在过境贸易、劳务及旅游等方面收入的损失为五亿五千万美元。这个数字几乎等于两年的出口总值。安哥拉因南非的进攻所受的损失也差不多大。到 1979 年年中，安哥拉政府报告，被打死的一千三百八十三人，

其中八百一十三人是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难民，另外被打伤的一千九百一十五人，破坏损失达三亿美元。然而，这两个国家也和埃塞俄比亚一样，为这种牺牲感到极大的自豪和自尊。这使这些国家加强了国际主义的义务和对它的好处的报答。

看来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苏联和古巴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活动。卡斯特罗本人热烈赞成关于建立“非洲革命同志”的“反帝阵线”的设想。但苏联人则不那么热心，反而告诫要防止在非洲大陆结成“小集团”。这显然是对于在西方支持下成立的由非洲温和国家的部队组成的非洲多国部队的一种反应，这支部队在1977年和1978年的沙巴危机期间曾帮助过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然而，如果一旦苏联的一个盟友受到威胁，需要救援，很难相信苏联会不欢迎建立一支激进的非洲多国部队。门格斯图抱有同样的想法，他雄心勃勃，希望能有一天成为在非洲大陆传播革命的非洲卡斯特罗。门格斯图拥有一支训练有素、技术精良、有人力物力的军队来实现这野心，只要苏联人能够提供后勤支援，埃塞俄比亚又能解决内战问题的话。

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体现在这三国在联合国对东西方关系之间关键性的争端投票表决时的立场，体现在三国支持卡斯特罗努力使不结盟运动靠近苏联。在大多数东西方对抗的问题上，这三国一直投票支持莫斯科。联合国在1980年1月通过了一项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无条件全部撤出”阿富汗的决议案，在非洲国家中，只有这三个国家表示反对。以后，又有三个激进的非洲国家利比亚、刚果和马达加斯加接待卡尔迈勒政权的代表团或发表

支持其政权的声明，由此表示它们接受了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在另一次对这些国家十分重要的表决投票，即1979年9月投票表决承认越南支持的韩桑林柬埔寨政府时，苏联人得到了十三个非洲国家的支持。事实上，当时除了安哥拉和索马里，非洲所有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国家都站在苏联一边。（安哥拉当时只是弃权，安哥拉在那一段时期常常弃权。索马里当时正在为求得军事援助而讨好美国。）

在不结盟运动内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与古巴一起，强化第三世界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中产生的反西方、特别是反美国的偏见，力图使不结盟运动这个由九十五个国家和解放阵线组成的经常变化的集团向苏联集团靠拢。1979年9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马谢尔总统以一惯的雄辩姿态发言，坚决反对“等距离”，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盟。卡斯特罗委托莫桑比克担任负责起草最后决议的会议经济委员会主席。莫桑比克和贝宁与古巴一起带头阻止柬埔寨已倒台的波尔布特政府参加会议，而让韩桑林政权取得席位。贝宁要求把埃及外交部长为埃及与以色列签订的戴维营协议辩护的发言从会议记录中撤掉。安哥拉、莫桑比克、贝宁、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比绍）与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一起，力图把埃及完全赶出不结盟运动。

总之，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念对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有着强大的影响。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公式，而是承担义务，帮助那些正在从事类似本国的其他国家

和组织。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这十分令人不安,因为这种义务使这些国家自动地在许多问题上站在苏联一边。下面我们将要谈到还存在着与国际主义相抗衡的力量,这种力量屡次使苏联与非洲的关系相当紧张。

2. 民族主义

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虽然愿为帮助其他国家或解放运动不惜作出巨大牺牲,但是这三个国家都严格划定一条界线,即绝不能牺牲本身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自愿与苏联结盟以推进世界革命事业是一回事,接受苏联对本国主权的任何限制或干涉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无论安哥拉“人运”还是“莫解阵”,都不仅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写进了党纲,而且把明确阐述民族独立精神的原则也写进了党纲。比如在安哥拉人运党的文件中,在外交政策的各项指导原则中写明要“维护政治独立”,“鉴于世界上存在着军事集团”,要奉行不结盟政策,并且禁止在本国土地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在莫桑比克,莫解阵也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它“永不改变的原则”之一,但也表明它尽管赞同建立“世界反帝阵线”,同时却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并要求与一切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在苏联与中国的争吵中,莫解阵也没有同意自动站在苏联一边。莫解阵党的领导人承认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犯了“错误”,但是他们说无意于充当“革命运动的最高良心”,他们强调“各党都有自己的主权和自由,也有权犯错误”。^①一次,他们在

^① 《常设政治委员会报告摘录》1978年8月7—16日。

提到中国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对莫解阵的军事援助大大超过苏联的时候，宣称“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① 内图总统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讲话可能是最坦率地主张民族主义的言论，他说，“任何时候都必须捍卫国家的独立”，使之不受外来的影响。

在埃塞俄比亚，民族主义精神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埃塞俄比亚历史上驱逐过入侵的土耳其人、埃及人和意大利人，成为非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因而感到自豪。埃塞俄比亚革命从一开始就提出而且始终坚持的口号就是“埃塞俄比亚至高无上”和“埃塞俄比亚第一”。看来这绝不是偶然的。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的最初含义包括“埃塞俄比亚统一的不可分裂性”，以后不管社会主义在埃塞俄比亚是什么含义，都包含这条原则。苏联人很快就发现，影响着非洲之角的各主要角色，索马里人、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是多么强烈。苏联人曾企图建立一个红海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和国联邦来解决三方面的冲突，但是宣告失败。甚至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的干预和他在亚的斯亚贝巴和摩加迪沙之间所进行的“穿梭外交”也无济于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历史悠久的最顽强的敌人——民族主义打败了。

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民族主义力量的真正考验，表现在这几个国家在苏联和古巴的压力下做了什么和拒绝做什么。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安哥拉政府虽然因为在存亡关头得到苏联的巨大军事援助而怀有感激之情，但不论埃塞俄

^① 《常设政治委员会报告摘录》1978年8月7—16日。

比亚还是安哥拉,都没有给苏联提供军事基地,甚至没有提供象苏联人曾在索马里享有的各种军事设施。在南大西洋上空进行侦察的苏联飞机使用了安哥拉的机场,苏联的军舰也定期进入安哥拉的港口停泊,但是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定允许苏联军用舰只和飞机把安哥拉当作基地。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同安哥拉差不多,尽管埃塞俄比亚政府同意让苏联人在马萨瓦附近的达拉克群岛停泊了一个供修船用的浮船坞。莫桑比克刚一独立就明确地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在莫桑比克建立某些设施的要求。而且,在南非报纸硬说在马普托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有苏联军事基地时,莫桑比克政府用飞机把全体西方国家的外交使团人员送到岛上去,以证明南非的报道是假的。当然,很难知道莫斯科与这几个国家之间是否达成了秘密谅解,即在东西方关系发生危机的时候,允许苏联使用这些国家的海空军事设施。美国官员在正式的听证会上曾暗示有这种谅解,但从来没有明白地这样说。比如副国务卿纽瑟姆曾在国会上说过,苏联海军在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拥有“设施和使用之权利”,还说在西非有一支小规模苏联海岸巡逻舰队使用安哥拉、几内亚和贝宁的港口。看来,苏联所能使用的军事设施,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没有超过1980年初美国政府试图从肯尼亚和索马里获得的便利。美国人不仅想获得使用的权利,而且还想获准在当地储存大批军需物资并派驻人员照管这些物资。到1980年,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人被赶出索马里之后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任何地方取得一个永久性的后勤基地。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不仅这样明显地不愿意帮助苏

联在非洲大陆扩大军事实力，而且多次针锋相对地反对苏联的政策目标。在津巴布韦漫长的民族解放斗争过程中，莫桑比克和苏联始终各自支持爱国战线中的不同派别。“莫解阵”一心一意地支持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民盟”），允许民盟把总部和后方基地都设在莫桑比克。而苏联和古巴因“民盟”与中国的关系而不信任“民盟”，主要援助乔舒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人盟”）。莫桑比克一直坚定地支持“民盟”。罗得西亚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古巴人才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开始帮助训练和武装“民盟”的游击队。后来，为了通过谈判政治解决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问题，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两国都与西方进行广泛合作，苏联是不会欢迎这种政策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为结束罗得西亚战争所作的努力，使罗伯特·穆加贝掌握了政权。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此而欢呼，但这个结果是苏联在政治上的一大失败。苏联不仅眼看着西方在津巴布韦实现和平，而且不得不面对一个它始终反对的马克思主义的非洲国家领袖。因此，苏联人在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建立使馆时起初遇到了很大困难。

抵制苏联压力的第二个鲜明的例子来自非洲之角。前面谈到过，埃塞俄比亚的军政委员会拒绝了苏联和古巴要他们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红海联邦的请求。不仅如此，门格斯图上校还有意奉行一项用军事手段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的政策，不理睬古巴的反对。古巴不允许把它的作战部队派往厄立特里亚，以此表示反对门格斯图的方针。在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不能迅速消灭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十分明显的

时候,连苏联人对埃塞俄比亚军政委员会的政策也表示不快。到1980年,苏联人一直对门格斯图施加压力,要他再次寻求政治解决。苏联甚至为安排和平对话开始与厄立特里亚人建立了联系。第三个表明方针不同的例子是1978年第二次沙巴危机之后安哥拉与扎伊尔达成协议,这项妥协多少是由美国策动的。内图总统和蒙博托总统同意停止支持对方的反对派。很难相信,苏联或古巴会赞成这种加强被它们视为典型西方傀儡的蒙博托政权的政策。

3. 第三世界的团结

贯穿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第三条线是维护第三世界的团结。在有些政治问题上,甚至最激进的非洲国家也表现出它们与所有超级大国的观点都不同,有时与美国竟然比与它们的“天然盟友”更接近。另一方面,在几乎所有经济问题上,它们都是与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一致,为创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与工业发达的“北方”进行斗争,苏联也是“北方”的一部分。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在联合国投票表决的记录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进行表决时,它们与肯尼亚和象牙海岸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一样投票,表现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共同性超过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有的时候,苏联和美国发现,作为超级大国,两国的想法比与各自在非洲的“天然”盟友更接近。虽然作一般性的结论往往不保险,但是非洲马克思主义国家就联合国对世界事务的作用进行表决时,似乎实际上更接近美国的观点,而不靠拢苏联;而在涉及非洲的自决权和人权原则的表决时,它们又反对

美国。在裁军问题上,它们与第三世界一致,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但是最清楚地表明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倾向于第三世界的还是它们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的立场。下面的几个例,足以说明这些不同的类型。

1. 1977年就维持和扩大联合国在纽约的财产增加拨款的问题进行表决时,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所有其他非洲国家一起投票赞成增加这笔开支。美国赞成,苏联和古巴投票反对这项拨款(见附表四)。

2. 关于联合国有责任使西撒哈拉实现非殖民化、保障当地人民的自决权和呼吁世界各国不要阻止非洲统一组织执行和平使命的议案进行表决时,非洲国家不分政治信仰投票是一致的,与古巴的观点相同,与苏联的观点部分相同,而美国的调门却不同(见附表四)。就南非人权问题进行表决的情况,也属于这一类型。

3. 在1976年、1977年和1978年为联合国紧急部队和驻在中东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拨款问题进行表决时,非洲马克思主义国家始终支持追加拨款。这与美国和非洲保守国家一致,而苏联和古巴,除一次例外,不是弃权就是投反对票(见附表五)。

4. 1977年12月就禁止向拉丁美洲扩散核武器的问题进行表决时,非洲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美国一起投了赞成票,而古巴和全体苏联集团国家都弃权。这次只有刚果站在苏联一边(见附表六)。

5. 在同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对限制和削减核武器系统的议案进行表决时,与两个超级大国相反,这些国家与所有其他

非洲国家一起投了赞成票，甚至古巴这次也投了赞成票。对于更一般性的普遍削减军事预算的问题，这些国家再次与其他非洲国家一致表示赞成，两个超级大国则投票反对这项决议。这次古巴站在苏联一边(见附表六)。

对于经济问题，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也和其他所有非洲国家同样强烈地认为，工业发达国家应该在“可预计的、持续不断的、愈益肯定的基础”上加快把财富移交给发展中世界，认为发达国家应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对于1976年、1977年和1978年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历次议案，美国是唯一投票明确表示反对的国家，苏联弃权，古巴与其他发展中第三世界一道投了赞成票(见附表七)。

1976年就一项敦促发达国家加速把它们的一些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议案进行表决时，情况也差不多，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同几乎所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支持这项议案。美国再次单独投反对票。苏联弃权。古巴再次加入第三世界集团的行列(见附表七)。

在1976年对另外一项要求重新审查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负担并修改工业国家的方针，为减轻穷国的债务负担寻求“总的有效解决”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同样是这样的局面(见附表七)。

联合国进行投票表决时的这些格局，无疑表明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在很多关键问题上明显采取非洲和第三世界的立场。但是，不能把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混同于六十年代的泛非主义。泛非主义的基本概念认为非洲大陆所有的

国家,由于都在非洲,因而具有单独的非洲性格,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有其共性。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与工业国家的冲突中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都需要建立经济新秩序。根据这种设想,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把它们之间的团结扩大到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它们也承认非洲和别处一样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很不相同的政治利益。前面已经讲过,第三世界的团结,只是这些国家外交政策的诸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是同等重要的动力。

结 论

对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三国的分析表明,这三个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即苏联集团之间的关系比黑非洲任何国家与苏联集团的关系都要密切得多,或许索马里有一段时间是例外。这三个国家接近东方集团是因为它们感觉到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外部敌人,还因为它们极需要军事保护。另一方面,它们很快又发现了需要与主要的“天然盟友”保持一定距离的理由。苏联拒绝承认这些国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刺激了这些国家的感情。苏联有时干涉其非洲盟国的内部事务,提出对之不利的经济交易,要求允许利用军事设施,所有这些都使这些国家对于与东方集团建立太紧密的联盟可能付出的代价产生了疑问。苏联和美国一样,也总是用“东西方关系”的观点来看待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认为主要是“南北关系”的那些问题。最后,事实证明,苏联不

愿意或没有能力向这些非洲国家提供它们认为克服不发达和依赖地位所必需的经济援助和技术,以及贸易的条款和数量。到1980年,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已经认定苏联集团提不出一个可以代替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有生命力的经济秩序。因此,它们制定了一种两面兼顾的对外政策。一方面由于经济上的需要,不得不继续与西方国家保持关系,另一方面,政治信念和军事上的迫切需要又促使它们向苏联集团靠拢。这种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两面兼顾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外交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团结提供了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抗衡的力量,并且保证了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保持独立,这些国家在地理上远离苏联只是加强了它们的这种地位而已。它们同西方进行贸易,从西方取得援助,看来也说明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不可能重现古巴与苏联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完全依赖关系。尽管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共产党世界很接近,在军事上要依靠苏联,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这几个国家愿意象古巴那样加入东欧集团,也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说明有“客观的”国际条件迫使它们这样做。实际上,一种新的态度正在出现,即探索在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建立新的比较独立的关系。与欧洲某些共产党所追求的新的比较自主的欧洲共产主义相类比,我们不妨把正在出现的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态度称为“非洲共产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们在下一章分析它的国内因素之后再更透彻地加以研究。

附表一
对苏联和东欧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贸易
(单位: 百万美元)

非洲社会主义国家	对苏出口 总额	%	从苏进口 总额	%	出口总额 ¹	%	进口总额 ¹	%
阿尔及利亚	52.9 ²	0.8	99.4 ²	1.27	34.9	0.56	209.7	2.67
几内亚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坦桑尼亚	1.01 ²	1.86	1.16 ²	0.96	2.89	0.58	5.99	0.49
赞比亚	0.6 ²	0.07	0.6 ²	0.15	3.6	0.46	1.3	0.2
非洲马克思主义国家								
安哥拉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贝宁	缺	缺	0.32 ²	0.09	缺	缺	缺	缺
刚果	2.35 ²	0.73	1.11 ²	0.42	1.32	0.11	1.03	0.38
埃塞俄比亚	0.57 ²	0.18	5.51 ²	1.06	6.19	2.0	4.96	0.95
几内亚(比绍)	0.06 ²	0.63	0.01 ²	0.04	缺	缺	0.13	0.24
马达加斯加	9.32 ²	2.54	3.02 ²	0.88	4.93	1.40	2.45	0.71
莫桑比克	缺	缺	缺	缺	0.70	0.24	3.10	0.52
索马里	8.69 ²	9.64	4.46 ²	1.30	缺	缺	缺	缺

资料来源:《贸易指导年鉴》(1978年)

注 1. 这些数字不包括苏联。

2. 推算的年度数字。

3. 其中不足六个月是报告数字,六个月以上是推算的数字。

附表二
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

(单位: 百万美元)

非洲社会主义国家	对美出口 总额	%	从美进口 总额	%	对共同体 出口总额	%	从共同体 进口总额	%
阿尔及利亚	3,361.00	54.00	411.50 ¹	5.20	2,328.50	37.00	5,103.50	65.00
几内亚	60.61 ¹	20.70	30.91 ¹	13.20	120.45	41.00	160.41	68.50
坦桑尼亚	77.75	14.30	53.02	4.40	236.10	43.40	599.17	49.40
赞比亚	109.50 ¹	14.00	44.30 ¹	6.90	346.10	44.70	266.40	41.70
非洲马克思主义国家								
安哥拉	218.50 ¹	20.60	34.70 ¹	4.40	134.00	12.00	297.49	38.10
贝宁	0.36 ¹	0.80	12.40 ¹	3.30	17.40	38.30	160.89	31.00
刚果	77.73	24.30	9.7	3.00	122.90	38.10	195.00	33.10
埃塞俄比亚	96.70 ²	31.70	26.950 ¹	5.20	71.80	23.50	211.40	41.40
几内亚(比绍)	缺	缺	0.043 ²	0.030	2.42	22.70	33.97	64.40
马达加斯加	101.70 ¹	28.80	10.12 ¹	2.90	136.39	38.60	218.82	63.70
莫桑比克	38.00 ¹	13.40	22.22 ¹	3.70	73.89	27.70	149.37	25.00
索马里	0.27 ¹	0.30	22.24 ¹	6.50	17.76	19.70	187.98	51.30

资料来源:《贸易指导年鉴》(1978年)

注: 1. 根据对象国的年度数字。

2. 推算的年度数字。

3. 其中不足六个月为报告数字, 六个月以上是对象国提供的数字。

附表三
对苏联最大的贸易额
(单位: 百万卢布)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 埃及		1) 埃及	1) 埃及	1) 埃及	1) 埃及	1) 埃及
总 值	541.1	723.1	710.3	530.6	492.4	345.5	
进 口	277.2	301.3	262.0	199.8	203.3	147.5	
出 口	263.9	420.8	448.3	330.8	289.1	198.0	
	2) 阿尔及利亚	2) 阿尔及利亚	2) 阿尔及利亚	2) 阿尔及利亚	2) 阿尔及利亚	2) 阿尔及利亚	2) 阿尔及利亚
总 值	116.8	171.7	247.0	190.3	162.8	158.6	
进 口	64.7	110.3	112.3	131.4	123.4	51.8	
出 口	52.1	61.4	134.7	58.9	39.4	106.8	
	3) 摩洛哥	3) 尼日利亚	3) 尼日利亚	3) 摩洛哥	3) 加纳	3) 阿尔及利亚	3) 阿尔及利亚
总 值	54.4	91.9	108.3	105.6	116.9	139.6	
进 口	28.3	21.5	24.3	55.3	11.8	88.3	
出 口	26.1	70.4	84.0	50.3	105.1	51.3	
	4) 利比亚	4) 摩洛哥	4) 摩洛哥	4) 加纳	4) 摩洛哥	4) 加纳	4) 加纳
总 值	44.5	87.1	86.9	81.2	105.2	114.2	
进 口	14.1	54.1	45.7	16.9	55.9	4.8	
出 口	30.4	33.0	41.2	64.3	49.3	109.4	
	5) 几内亚	5) 加纳	5) 加纳	5) 尼日利亚	5) 利比亚	5) 摩洛哥	5) 摩洛哥
总 值	43.7	49.9	57.0	50.5	97.7	104.0	
进 口	41.8	25.3	10.7	23.9	20.8	56.6	

(续)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出口	1.9	21.6	46.3	26.6	76.9	47.1
6) 尼日利亚		6) 利比亚	6) 喀麦隆	6) 几内亚	6) 安哥拉	6) 尼日利亚
总值	39.9	23.5	36.6	50.1	77.6	91.2
进口	11.0	23.5	1.9	23.3	69.2	75.1
出口	28.9	缺	34.7	26.8	10.4	16.1
7) 加纳		7) 象牙海岸	7) 几内亚	7) 喀麦隆	7) 几内亚	7) 埃塞俄比亚
总值	37.7	28.2	34.1	36.7	53.1	68.5
进口	9.7	8.6	19.7	3.3	24.8	64.2
出口	28.0	19.6	14.4	33.4	28.3	4.3
8) 索马里		8) 几内亚	8) 象牙海岸	8) 象牙海岸	8) 尼日利亚	8) 象牙海岸
总值	12.6	27.3	32.7	24.3	34.8	65.6
进口	11.5	22.4	13.2	9.6	34.5	6.1
出口	1.1	4.9	19.5	14.7	0.3	59.5
9) 突尼斯		9) 索马里	9) 索马里	9) 索马里	9) 喀麦隆	9) 安哥拉
总值	11.2	18.8	26.5	23.4	33.4	57.4
进口	5.8	16.8	22.2	18.7	4.9	47.8
出口	5.4	2.0	4.3	4.7	28.5	9.6
10) 象牙海岸		10) 突尼斯	10) 利比亚	10) 安哥拉	10) 象牙海岸	10) 几内亚
总值	10.1	17.1	18.8	19.7	31.0	47.5
进口	3.9	8.1	18.8	5.3	5.7	20.6
出口	6.2	9.0	缺	14.4	25.3	26.9

资料来源：苏联对外贸易部

附表四
联合国政治议案表决情况

	1980 阿富汗	1979 柬埔寨	1978 南非人权	1977 联合国 劫产	1978 西萨哈拉 A与B
非洲国家					
阿尔及利亚	赞成	I 赞成		赞成	A 赞成 B 反对
坦桑尼亚	赞成	I 赞成 I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A 赞成 B 反对
非洲马克思主义国家*					
贝宁	未参加	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A 赞成 B 反对
刚果	未参加	I 未参加 II 弃权		赞成	A 赞成 B 反对
埃塞俄比亚	赞成	I 赞成		赞成	A 赞成
莫桑比克	未参加	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B 反对 A 赞成
索马里	未参加	I 与 II 未参加		赞成	B 反对 未参加 A 弃权
其他非洲国家					
象牙海岸	赞成	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A 弃权 B 弃权
肯尼亚	赞成	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A 赞成 B 反对
其他非非洲国家					
古巴	赞成	I 弃权 II 弃权		弃权	A 赞成 B 反对
苏联	反对	I 弃权 II 弃权		弃权	A 赞成 B 弃权
美国	反对	I 赞成 II 赞成		弃权	A 弃权 B 赞成

* 后来又通知秘书处它曾打算投赞成票。

附表五
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高
接触观察员部队 1976—1978 年拨款

决议案编号	31-5 B	31-5 C	31-5 D	32-4 B与C	33-13 B	33-13 C	33-13 D	33-13 E	33-13 F
非洲社会主义国家									
阿尔及利亚	未参加	赞成	赞成	赞成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赞成	赞成
坦桑尼亚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赞成
非洲马克思主义国家*									
贝宁	未参加	赞成	未参加	赞成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刚果	赞成	赞成	赞成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埃塞俄比亚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莫桑比克	赞成	未参加	未参加	赞成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索马里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赞成	赞成
其他非洲国家									
象牙海岸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未参加	未参加	未参加	赞成	赞成
肯尼亚	未参加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其他非非洲国家									
古巴	赞成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反对	反对
苏联	赞成	弃权	弃权	赞成	弃权	弃权	弃权	反对	反对
美国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赞成

* 安哥拉代表在大多数投票中弃权，所以表上没有安哥拉。

附表六
裁军问题

	1977	1977—1978	1978
	1) 限制和削减核武器系统	2) 在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 I 与 II	3) 削减军事预算
非洲社会主义国家	赞成	I 赞成	赞成
坦桑尼亚	赞成	I 赞成 I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非洲马克思主义国家*			
贝宁	未参加	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刚果	未参加	I 未参加 II 弃权	赞成
埃塞俄比亚	赞成	I 赞成 II 弃权	赞成
莫桑比克	未参加	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索马里	未参加	I 与 II 未参加	赞成
其他非洲国家			
象牙海岸	赞成	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肯尼亚	赞成	I 赞成 II 赞成	赞成
其他非非洲国家			
古巴	赞成	I 弃权 II 弃权	弃权
苏联	反对	I 弃权 II 弃权	弃权
美国	反对	I 赞成 II 赞成	弃权

* 安哥拉代表在大多数投票中弃权, 所以表上没有安哥拉。

附表七
经济问题

	1976 有利于发展 中国家的工 业重新经营	1976 发展中国家 的任务问题	1976与1978 财富的转移	1978 发展资金
非洲社会主义国家				
阿尔及利亚	赞成	赞成	1976-赞成	赞成
坦桑尼亚	赞成	赞成	1978-赞成 1976-赞成 1978-赞成	赞成
非洲马克思主义国家*				
贝宁	赞成	赞成	1976-赞成 1978-赞成	赞成
刚果	赞成	赞成	1976-赞成 1978-赞成	赞成
埃塞俄比亚	赞成	赞成	1976-赞成 1978-赞成	赞成
莫桑比克	未参加	未参加	1976-未参加 1978-赞成	赞成
索马里	赞成	赞成	1976-赞成 1978-赞成	赞成
其他非洲国家				
象牙海岸	赞成	赞成	1976-赞成 1978-赞成	赞成
肯尼亚	赞成	赞成	1976-赞成 1978-赞成	赞成
其他非非洲国家				
古巴	赞成	赞成	1976-未参加 1978-赞成	赞成
苏联	弃权	弃权	1976-弃权 1978-弃权	弃权
美国	反对	反对	1976-反对 1978-反对	弃权

* 安哥拉代表在大多数投票中弃权，所以表上没有安哥拉。

第八章

非洲共产主义论辩

1980年初，黑非洲三个主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它们还没有确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安哥拉，内图总统之死引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黑人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潜在的爆炸性问题；争夺领导权的隐蔽斗争还在继续；人民权力和国家权力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没有缓和。在莫桑比克，公社村未来的地位还没有作出规定，关于莫桑比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性质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莫解阵正在把一些收归国有的小商业归还私人业主，企图在坚持实行中央计划、中央控制的经济和极有限的管理能力两者之间，求得现实的平衡。在埃塞俄比亚，为筹建一个党以及在军人与文职人员之间寻求暂时妥协的斗争仍未停息，而政府却一直在试验能以多快的进度和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农民实行集体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说，对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要做出论断，起码是不成熟的。无疑，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还在努力解决之中，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这些国家还处在幼年时期。不稳定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虽然在这些国家不象在其他非洲国家那么严重。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并没有消除二十年来困扰整个非洲大陆的许多问题，

如经济停滞、人民的期望越来越高、种族冲突、分立运动、边境冲突和上层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当然，给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下结论要很谨慎，但是，也不妨尝试作出某些结论。尸体解剖可能要比活体解剖容易，但是，为时太晚，对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于事无补。学者式的谨慎或许是一种稳健的姿态，但是，实际情况是，政策制订者天天都在作出判断并且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小心谨慎就使得学者成了局外人。

对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所作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各不相同。奇怪的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贬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我们说，这是一个大错误。我们在前一章已谈论过苏联不愿意把这些国家看作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而把它们称为“革命民主国家”，或者至多称为“倾向社会主义的”政权。不足为怪的是，美国人的观点更是五花八门。我们不想标新立异，可以把它们基本上分为三类，即保守的、自由的和激进的三种观点。

可笑的是，保守的观点是唯一把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认真看待的观点，肯定这些国家是对美国的威胁。但是，这一观点错误地认为，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只不过是苏联和古巴对这一大陆影响的扩展，是“傀儡”政权，自身没有生命和活力，严重依赖外部共产党的支持以维持生存。这种保守观点的根本缺点，就是完全不了解这一现象的内部根源，或者不了解非洲国家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目前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例如，前国务卿基辛格把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简单地看作苏联进一步干涉非洲大陆的滩头堡，把美国未能阻止安人运上台看作

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投降，是导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前奏。1980年4月基辛格在华盛顿对报界编辑的一次谈话中说，由于共产主义的推进在安哥拉没有遇到抵抗，一只粗大的“苏联手指”就从罗安达通过亚的斯亚贝巴气势逼人地伸向了中东。至于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内部动力，基辛格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

自由派的观点则认为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对美国并没有那么大的危险。但它也错误地，或有意地，多少忽视意识形态对这些国家内部特征的影响。这种观点的最坦率的倡导者是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他说，所有激进的非洲国家，不管它们的说词如何，基本上都是非洲民族主义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曾经指出，在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有一种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就在它们和苏联之间造成了隔阂，尽管它们在宣扬并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正如历史所表明的，民族主义在国内并不排斥社会主义，也不排斥它致力于向国外传播革命。说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坚持民族主义，这是事实，但这仅仅是一个侧面。它们还有另一个侧面，就是恪守意识形态和由此而产生的各项政策，如建立先锋党，企图实行农业集体化，经济大部实行国有化，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同苏联紧密结盟。所有这些现象都不能简单地用民族主义去解释。

激进的观点，毫不奇怪，只有那些具有信仰的知识分子才有。政治家却没有人持这种观点。激进观点的问题，在于它的基础具有强烈的空想主义成分。激进派对于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往往持否定的态度，比之苏联的否定态度有过之

而无不及。苏联人仅仅是谨慎对待，至少承认这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非洲领导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西方激进派则倾向于把他们看作小资产阶级独裁者。这种看法大多是针对埃塞俄比亚的。埃塞俄比亚的军事领导人对此提供了现成的靶子。其实，同样的许多指责也可适用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激进派攻击埃塞俄比亚的主要论据，是说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权力”不是以正确的社会阶级为基础，不是扎根于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而是扎根于小资产阶级和军人。通常认为，这就是把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排斥在外，不让他们直接行使权力。按照这种看法，安哥拉的领导也不是革命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依靠工人阶级，没让他们直接参加政府，而是破坏了整个“人民权力”运动。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甚至在莫桑比克，权力也是集中在国家官僚手中，而不利於革命力量本身。这种论点，从事实来看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权力是否曾经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直接行使过呢。甚至列宁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先锋党的职业干部为媒介而起作用的。激进派的观点无视根本的问题，而相信轻率的假设，终归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因而对了解这些国家实无裨益。

所有这些关于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看法，都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并不是社会主义天堂，权力并不象字面所说的，掌握在工人、农民手中；它们在精神上是强烈民族主义的，但是，它们又都很接近苏联而不接近美国。然而，我们所概述的这些观点，哪一种也未能提供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全貌。现在让我们尝试画一

幅素描吧！

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不了解意识形态的根本影响，要理解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本质特性，那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组织机构的选择、对外关系的方针和重大政策决定的方向，甚至还造成了这些国家今天所面临的重大内在矛盾的难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比非洲社会主义的影响大得多。非洲社会主义从来都只是一种模糊的理想，一套价值准则。它的倡导者相信这些应该可以推动现今世界非洲人的行为。甚至尼雷尔的乌贾玛——可能是最苦心经营的非洲社会主义的典型——也还不是经济、政治行动的蓝图，对组织机构、政策和具体目标并没有清楚的规定。但是，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明确具体得多。它提出了各种组织机构，各项政策，或许更重要的，提出了分析现实、改变现实的办法。它是一个十分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它有严密的逻辑性，才使它既具有感召力，又对政策有强大的影响。我们并不是说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地描绘了非洲的现实，也不是说它为了解决非洲大陆的经济政治问题提供了所有的答案。但是，它声称它能这样做，而且通过它的逻辑，使很多非洲知识分子十分信服。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常常被改造成近乎一种纯粹的演绎逻辑体系，而没有任何实践经验作基础。

有很多例子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有很深的影响。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埃塞俄比

亚在面临着两场战争和种族运动在全国重新兴起的时候，仍然力图实行农业集体化。他们的意识形态认为，必须阻止富农阶级的产生，因为富农阶级反过来又会产生“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而损害社会主义事业。这也说明，为什么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把国营农场看作优越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不认为这是管理工作上的一大灾难。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逻辑，国营农场创造无产阶级，从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增强人们的“效率心理”。意识形态的影响还说明为什么这三个国家都苦心经营，力图建设严肃的先锋党。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时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例如，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曾宣布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而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是不可靠的。但是，在历史上，它所得到的最大支持正是来自农民，城市工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甚至还醉心于“小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按照意识形态的规定，党必须小而纯，这就疏远了那些原先曾支持过解放斗争、后来发现自己被作为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而被抛弃了的人。

我们强调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甚至僵硬性，这与常常提到的它们领导人越来越讲“实用主义”的说法互相矛盾。例如，人们一直把马谢尔总统说成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愿意同南非达成贸易协议，要求美国人投资，并允许私人小商店重新开业。对于内图总统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他坚持政府不应试图立即把什么事情都管起来，认为在交通系统陷于瘫痪的状况下，私人卡车

司机能起作用，在建筑业中私人木工和泥瓦匠也有用处。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总理上台以后，人们总是把他称为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在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中谨慎小心，以免引起白人发动政变。所有这些领导人有时是讲实际的，但是，他们的实用主义不象美国所理解的实用主义，而更接近于二十年代初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实用主义。当时，在困难中奋斗的苏联政府对经济稍许开放了些，鼓励美国和其他西方企业到苏联投资。与此相似，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迄今也只是把实用主义应用于选择改革的手段和步伐上，但不是用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目标上。现在还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毫无疑问，实用主义已经影响到改革的时间安排和步伐，甚至已经决定取消某些社会主义措施。马谢尔在1980年初宣布取消对某些小型商业，特别是对杂货店和饭店实行国有化的措施，因为他发现由国家经营这些商业效率很低，甚而陷于瘫痪。他为这一决定辩护时说，“国家不应该去卖火柴”。但是，他坚持由国家控制主要生产资料的原则，并继续贯彻把十分麻烦的葡萄牙人经营的工业收归国有的政策。门格斯图上校1975年决定不急于实行农村集体化，1979年发布公告说明农村实现集体化的步骤，接着又重申了上述决定。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已从最后实现农村集体化这一目标有所后退。在这方面应该回顾一下，中国和苏联在贯彻社会主义政策遇到经济困难和顽强抵抗时，也曾有时表现出重视实用主义，甚至不惜倒退。

这三个非洲国家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所以它们的

重大制度和政策也相类似。在政治领域,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都采用一党制,而这个党又是先锋党而不是群众党。甚至在埃塞俄比亚也是如此。在那里,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前边我们已经谈到过,党还仅仅形成骨架。埃塞俄比亚无疑终归也将有先锋党,虽然是受军人控制的党。在非洲实行一党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且也不仅仅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但是,坚持这个党应该是先锋党,这却是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独特的选择。强调建立党校对专职干部进行系统的培养,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教育,这也是这些国家所特有的。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有一个很普通的作法,就是试图把具有严格限制的先锋党同广泛的全国性组织以及允许某些群众参加的各种地方组织结合起来。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工会、居民区“行动委员会”、村农民协会、公社和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生产委员会、群众集会和各种类型的全国性运动,都被用来推动普通群众极为广泛地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然而,不同的国家所重视的组织机构也不同。埃塞俄比亚主要依靠农民协会和城市居民区协会;莫桑比克广泛利用促进小组、非正式的地方会议和公社村人民代表大会;而安哥拉则想通过“人民权力”行动委员会使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制度化。

在非洲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关于人民参加活动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参加政治活动被看作所有的公民必须做的事。这一制度一般并不赞许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因此,很自然,这些国家比非洲其他国家更强调让人民参加活动。然而,这种参加并不意味着共同利益集团可以

有它的代表，或者可以自由提出要求。只有少数人，也就是党员才能参加有关国家重大政策问题的辩论，而且只是间接参加。最后作决定的只是党内最高层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对所有其他公民来说，参加活动要受党的决定的限制，受党的干部的组织控制，而且大都局限于按党的指示、在规定的范围内解决地方的问题。在埃塞俄比亚，就是要按照“临时军政委员会”的指示。超过了规定的界限，象埃塞俄比亚曾经常出现的情况，安哥拉“人民权力”有关的情况，莫桑比克在莫解阵对城市地区加强控制之前的情况，那么，就会立即遭到镇压。尽管对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各种群众组织的自主权有种种限制，但是，人民对于本地区的问题确实还是有某种发言权的。至于群众集会、庆祝游行等诸如此类的其他参加活动的形式，那只是政府安排的对公民是否忠诚和拥护的一种测验。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也有相似之处，其根源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观点。它们的相似之处有些很明显，有些不那么明显。几乎对所有重大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实行国有，对进出口都实行控制，这些都属于明显的共同点。此外，都强调必须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虽然在实践中至今还只限于制订总的投资预算和生产指标。不那么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对私人企业都抱有矛盾的态度。从理论角度看，它们几乎完全而且一贯敌视私人企业，连小商业和个体企业都在内。甚至办得好的家庭农场也被看作危险的个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繁殖场，而小资产阶级意识又可能产生富农阶级。所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甚至对小商业也实行国有化，只是在经营管理大量的小商行、压力太大受不了的时候，

才把这些退还给私商。埃塞俄比亚允许私人小商、手艺人开业,但并不鼓励他们,甚至还因囤积居奇和牟取暴利之罪而处死了一些商人。但是对于外国私人大公司,他们的态度同理论上的主张就大不一样。激进分子可能把多国公司看作资本主义世界剥削不发达国家的重要工具,但是,多国公司能提供投资、技术和工艺,这些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所迫切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逻辑也可以用来为同外国大公司作交易提供某种论据。多国公司一般对大型工程项目投资,而大工程项目比小商业更容易纳入计划经济。此外,多国公司还能促进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农业,从而促进无产阶级的成长。事实证明,多国公司还甘心以次要合伙人的身份同国营公司合作共事。因此,正如前述,非洲所有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到1980年一直积极寻求同外国公司作交易,寻求外国公司的投资。

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这三个国家带来一系列共同的包含内在矛盾的难题,其中有些是由于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所假定的必要条件差别很大而造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设想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比非洲更加充满冲突和工业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阶级冲突完全是人为的概念,只是在埃塞俄比亚才具有现实性。因此,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非常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是革命前提条件的自发的社会动力,这迫使政府不得不成了实行变革的原动力,用人为诱发的阶级冲突意识去替代真实的阶级冲突意识。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化水平低而造成的难题。的确,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在高度工业化

的社会，但是，也没有发生在象这些国家那样不发达的国家。最常提到的难题，是如何在工人阶级很弱小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工人阶级集团并不是遭受剥削和摧残，而是比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好。因为他们的工资有保障，过的是城市生活。有一个不那么经常谈论的难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定工业化是通向社会主义和摆脱西方新殖民主义的道路。但是在非洲，发展工业实际上导致一切都依赖西方，从原材料到零件和市场。从理论上讲，发展重工业可以打破这种依赖性的恶性循环。但是，实际上却很难，因为，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国内需求只能支持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只能做到不再进口制成品，而机器，甚至原材料还得靠进口。

意识形态所假定的条件和非洲国家现实的条件相矛盾，这的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如何适应现实和如何解释的问题，但这并没有使这种意识形态作为进行变革的指导方针完全失去作用。我们先前说过，这种问题，非洲社会主义也遇到过。非洲社会主义的见解所依据的是传统村社模式，它与当代条件毫不相干。比如，卡翁达的人道主义同以产铜为主的赞比亚的现实不相适应，使得卡翁达的这种意识形态在赞比亚完全行不通。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大相同。因为马克思原来的方案同现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都不适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不断地被人们加以阐述、发展，列宁、毛、以及无数被人们遗忘了的理论家们，其中包括现在非洲大学里对其中某些微妙的观点争论不休的人们。如今，所有这些工作的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名称成了包罗各种理论的百宝箱，从中可以找到某些东西去应付大部分的情况。

例如,马克思主义在其意识形态体系中作为一种阶级斗争和辩证法的变革理论是非常适合埃塞俄比亚的情况的,但是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实际情况就不适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建立等级严密的组织和策划变革的理论,用之于象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则不会有多大困难,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意识程度都较低。无产阶级专政在任何非洲国家可能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自称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锋党,在非常需要中央集权的新的民族国家,却是值得赞赏的统治工具。换言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它不同的各个方面,确实可以适合非洲的条件。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同非洲的情况不完全适应而产生矛盾这个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理论上诡辩的手法解释为并不存在。但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在矛盾的教条而引起的难题就不那么容易解决和求得妥协。这种意识形态包含一系列事实上相互排斥的原则:既要群众高度参与政治,又不要造成多元的局面,只限于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进行辩论;既要民主集中制,又不要造成过分的集中,而且还要保持民主;既要实行计划经济,又不能造成扼杀生机的官僚主义;既要党与国家分开,又要两者不发生冲突;既要辩证的变革,又不要有独立的权力中心形成对立面。理论为这些教条提供了相互一致的论据。但是,在实践中,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能把这些互相矛盾的要求调和起来。它们都悄悄地在这些难题的矛盾双方中选择一方。非洲国家至今还没有作出明确的选择,但是紧张状况已很明显。在所有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派别,或者一种倾向,通常称

之为“托洛茨基派”。它的倡导者指责当权的政府在处理这些难题的时候都选择了极权主义这一方，因而背叛了革命。具体说来，他们指责中央集权压制了民主，官僚主义压制了群众参与政治，国家压制了党，结果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赞成多让群众参与政治、权力较少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亦即某种形式的直接民主。这种倾向，在安哥拉表现为“人民权力”运动，在埃塞俄比亚是“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在莫桑比克是主张公社村的那一派。这种趋势和冲突的出现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是非洲所特有的。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中都曾经常出现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必然会引起这样的斗争，即有些人强调群众参政的民主制，有些人主张加强先锋党集权制。统治集团偏爱中央集权制，而反对派则偏爱直接民主，这似乎也是势所必然。因为前者已经控制了中央机构，而后者则比较容易渗透到权力分散的地方委员会中去，利用这些作为掌权的跳板，以便最后控制中央机构。“托洛茨基”派总是把这种冲突说成是篡夺了政权并背叛了革命的上层独裁集团同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真正革命力量的代表之间的冲突。其实，这种冲突完全是掌权者和非掌权者之间的一种高度政治性的冲突，各自按其需要对意识形态作出自己的解释。

中央集权主义或者国家权力主义的倾向同主张群众参与制的倾向之间的冲突，虽然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典型特征，但是，在每个国家的表现形式不同，历史根源也各异。在埃塞俄比亚，我们已经说过，先前是学生运动发生分裂，后来革命开始时，中央决策机构“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清一色的

军人组成,所有平民团体都被排斥在外,冲突因而加剧了。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由于斗争的迫切需要,形成了实行地方分权和直接民主的坚强传统,所以,群众直接参与政治不仅是对意识形态的抽象解释,而且成了活生生的历史传统,成了所谓“人民革命的经验”。当时,曾设想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结合起来。可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尝试只是使问题更加尖锐,因为这个难题是由于意识形态内在的相互冲突的教条所造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

有些人会说,上面谈到的那些选择和难题,并没有什么明确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或者新的东西。马克思的说词在非洲大陆早就听到过。不管怎么说,说词只是说词,不必认真看待。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实行一党制,都有国营企业,都表现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互相冲突的两种倾向。中央政权和地方集团之间的冲突与意识形态并无关系。建国历史短,存在尖锐的部族矛盾,中央行政机构薄弱而效率低,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政治制度都会有这种内在的冲突。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极而言之,不过是后期非洲社会主义的例子。换句话说,在非洲大陆,这不是什么新东西。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某些问题,同样是所有非洲新独立国家具体条件所固有的问题,这种说法谁也不会提出异议。但是在非洲大陆肯定已经建立起显然不同类别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发展方向上,有的比较倾向于资本主义,有

的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同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没有区别。要找到零星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也很容易。在莫桑比克有“公社村”；在坦桑尼亚有“乌贾玛”村；在安哥拉，国家权力主义的倾向很强；在阿尔及利亚，1965年以来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原因当时是由于石油，而不是由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把大量资金投入国营农场，坦桑尼亚和几内亚也是如此。当然总是可以找到相同情况的。但是，我们的论点在于，只要看看它们的整个制度及其成立的理由，就会看到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比共同点更明显，更有意义。意识形态的选择确实并没有使任何这些国家能够避免非洲大陆共同的问题，但是意识形态的选择肯定影响它们解决问题的想法。不管怎么说，认为地理决定命运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这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有许多突出的特征，使它们不同于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认为有理由对它们使用单独的名称。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的不同，我们已经详细论述过，不再重复。但是，我们将集中谈谈它们变化的过程和制度的性质。总的说来，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一开始就有全面的设想，它们要到何处，如何到达，为了达到目的需要什么制度，有哪些社会集团会支持、有哪些会反对它们的事业。换言之，它们不仅设想到最后的目标，也设想到变革过程中的动力。因此，这些国家实行改革的步伐同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比较起来，速度要快得多，更系统得多，而且矛盾也比较少。在坦桑尼亚、几内亚或赞比亚曾经对种种不同

的体制和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进行了许许多多的试验，而在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就没有进行过那么多的试验。为争取提高农业生产率，赞比亚在广大农村到处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机构。为了动员人民，几内亚建立了一系列的委员会、团体或联合会。只要想到这种情况就不难了解，在这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的政策和体制都比较带有一贯性。当然，改革进展的速度之快，有它们的有利条件。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由于葡萄牙人大批离开，造成了权力的真空；在埃塞俄比亚，有它固有的革命形势。但是，改革的系统性，不是用权力真空为理由所能解释的。在几内亚，同初期的阿尔及利亚有过类似的情况，但却造成了一片混乱的局面，只采取一些临时的措施和设立临时机构。

观点主张和机构设置的一贯性有助于使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不那么受个人的影响，不那么依赖某一个人。几内亚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杜尔，恐怕不可能保持原样。因为他实际上使自己成为几内亚唯一稳定的制度的化身。同样，如果没有卡翁达，很难设想他的人道主义能够维持长久。甚至在坦桑尼亚，乌贾玛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制度，现在看来依然含糊不清，难以维持下去。如果没有尼雷尔，很难保持不变。对比之下，尽管内图总统去世，安哥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保持未变。没有理由认为，一旦萨莫拉·马谢尔去世，莫桑比克会改变它的制度。马谢尔不是莫桑比克社会主义的化身，他只是莫解阵的一个产物。至于埃塞俄比亚，国家的领导几经动乱变换，但是意识形态和政策却很少变化。换句话说，在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尊崇个人的因素远不那么明显。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对待国家及其作用的态度也有其特色。我们已经指出，所有非洲社会主义国家都向国家权力主义演变，不管这同它们公开声称的意图多么背道而驰。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曾采取的自愿原则和靠自发动员执行计划的办法都失败了，于是由国家插手干预。在马列主义国家里，国家权力主义被公开接受并在理论上认为是正确的。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清楚地看出来：安人运认为必须把“人民权力”理解为“国家权力”。安人运和莫解阵的文件都用大量篇幅解释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那么，承认国家权力主义并在理论上认为正确，这同不是出之本心的向这方面靠拢有什么不同呢？回答是：公开接受国家权力主义更具有连贯性，能有意识地利用国家机构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促进集体精神和在经济上促进社会的发展。例如，莫桑比克认为，国营农场是农业经济组织的最高形式，国家投入资金和力量组织这一经济部门，并在恢复生产方面取得了成功。而赞比亚决定不了国家在农业中应该起什么作用，把国家的资金和力量分散用于国营农场、农村建设中心和效率低下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来帮助新出现的自耕农。由于没有明确的战略，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规划。问题不在于国营农场是否比私人农场生产更有成效，而在于始终一贯的战略比摇摆不定的战略更有成功的机会。另一个例子，安哥拉利用国营公司对付西方多国公司，并同它们建立了一种新关系。而几内亚却没有利用国家权力取得这种成果，反而让西方私人公司和苏联在对几内亚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开采几内亚的铝矾土矿。

在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国家持不同态度的只有阿尔及利亚。我们知道，在阿尔及利亚，国家权力得到承认，甚至被颂扬为阿尔及利亚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阿尔及利亚依靠国家权力，把它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事实上，阿尔及利亚没有整个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但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方法技巧。阿尔及利亚对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了国有化，建立了互相交织的国营公司联合体，依靠国家对农村经济提供服务、贷款和市场供销。阿尔及利亚终于比其他任何非洲国家走得更远，甚至试图通过中央集权的全面发展计划，把所有的经济活动结为一体。阿尔及利亚的经验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非洲国家真正的效用，可能由于它提供了一套技巧方法和组织社会进行大变革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确，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提供了一套信条。但是，阿尔及利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没有信仰同样也能很好地使用它的技术方面。这一点特别符合当代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情况。反对使用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这一名称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即在这些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信徒和理论家实在太少，因而不能认为这些国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于这种反对意见，可以从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找到答复。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是否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和技術方法，至于真正的信徒数目多少，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也不真正知道中国和苏联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多少成员真正有这种信仰。作为一种信仰，而不是作为一套技术方法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意识形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对外政策这个领域。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毕竟比阿尔及利亚更紧

密地同苏联集团结盟。

综观整个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我们认为,它们都发展成了非常不平衡的制度,产生了四种不同的模式。具体说来,赞比亚成了“上层阶级福利国家”的特例;坦桑尼亚成了“发展而无增长”的特例;几内亚成了“政治挂帅”的极端特例;阿尔及利亚成了“经济挂帅”的特例。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是否正在避免陷入使四个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那种错误,亦或这种畸形的现象是否正在出现。一些国家的经济特点本身,肯定可以保证某些极端现象不至于发生。例如,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决不可能采取阿尔及利亚式的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但是从理论上讲,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很不平衡的制度。可是,我们初步的结论认为,虽然有一些迹象表明,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畸形发展的毛病在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也开始出现,但是直到现在,总的说来,它们的制度看起来还比较平衡。可能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哥拉,它好象正走上十五年前阿尔及利亚的道路。

目前,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都没有重复赞比亚那种渐渐脱离社会主义的上层阶级福利国家的模式。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上层集团,也不是说特权已不存在,有很多证据表明它们高低薪金的悬殊也很大。这一点在我们谈论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情况时已经指出过。在这三个国家,领薪金的工人和勉强维生的农民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三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标准之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我们并不认为,收入悬殊本身就有足够理由说这是上层阶级

福利国家。赞比亚之所以成为一个上层阶级福利国家，不仅因为收入悬殊，而且还因为它把大量的发展资金转用于上层集团的消费——如政府给住豪华住宅的人以补贴和提供小汽车贷款等等，而且不愿实行会影响城市上层人物生活水平的各种改革。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在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有这种发展趋势。相反，至少在埃塞俄比亚，城市富有的上层集团已被迫放弃了他们先前许多的享受。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首先，过去就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现在也已采取措施防止这一阶级的形成，而且迄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把紧缺的资金大量转为上层集团消费之用的情况，也没有为此目的而滥用公款的现象。

在埃塞俄比亚，明显也有几内亚“政治挂帅”模式的某些迹象，虽然由于埃塞俄比亚深知经济对革命的重要性而加以克制，维持平衡。“临时军政委员会”多次使观察家们感到意外甚至大为震惊，因为它竟情愿以革命政治需要的名义甘冒经济的风险。最近的例子是1979年的集体化法令。这一措施很有可能使农业生产大大减少，但还是采用了，以便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政府在当时本来已经在努力通过第二次合作发展运动和扩大为农民协会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来促进生产。实际上，当年就实现了增产。然而就在这一年，发动了集体化运动。换句话说，几内亚的政治挂帅完全忽视经济，但在埃塞俄比亚，在实施政治原则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忽视经济上所必需的工作。

坦桑尼亚的“发展而无增长”模式也可能终归要在莫桑比克再版。我们已经看到，莫桑比克把大量的资金用于改善社

会服务事业以迅速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在于这样致力于发展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在经济停滞的条件下是否会走到坦桑尼亚的那种困境。莫桑比克和它的北方邻国有很多共同的特点：缺少自然资源；较少社会冲突，因而难于动员人民进行激烈的变革；按政治上的要求，不鼓励个人发家致富，这虽然阻止了富农阶级的生成，但也妨碍了生产的增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都很薄弱。但是有某些迹象表明，莫桑比克正采取措施避免重犯坦桑尼亚的错误。首先，莫桑比克从一开始就懂得发展现代农场和社会服务业的重要性，否则政府不会用自己的资金去资助这些部门。不管是故意不吸收，还是没有能力吸收外国援助，它还是把大量的资金和力量用于使葡萄牙人遗弃的企业恢复生产。第二，莫桑比克做了更有系统的努力去动员人民进行变革，并且有一个更强大更有生气的党来从事这项工作。第三，莫桑比克至今没有象坦桑尼亚那样接受大量外援，这是造成坦桑尼亚增长和发展失去平衡的重大原因。……莫桑比克建立了一种制度使莫桑比克比坦桑尼亚更加接近于自力更生。因此，它可能不大会产生象坦桑尼亚那种程度的不平衡。

只有阿尔及利亚“经济挂帅”的样板看来在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安哥拉被仿照推行。促进这种倾向的有两大因素：安哥拉作为一个产油国，它有相当大的经济基础可以利用。由于面临全国大动员和地方一级深远的政治改革，它仍然遇到困难。安人运仍然未能控制整个国家，因为，北方的奥文本杜族和南方的巴刚果族历来是站在安盟和解阵一边的。另一方面，政府的确完全控制了石油部门、重要的工

业和国营农场，并可以利用这些开始形成新的经济体系和推动国家的发展。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的国内经验相类似是很明显的。内战之后，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处于复员的松懈状态，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民主制造成了很大混乱，这是非常坏的经验；政府集中力量办石油、工业和国营农场；实行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战略；依靠西方的公司、技术和咨询公司来加强国营部门。安人运的许多领导人对阿尔及利亚模式非常熟悉，因为他们在解放斗争时期长期住在阿尔及利亚，后来在制订石油战略时也曾向阿尔及利亚请教。这就很明显地表明，相类似并不是偶然的。安哥拉把阿尔及利亚模式看作有效的模式。安哥拉的体制是否也会象阿尔及利亚那样变得失去平衡，这一点撰写本书时尚难作出有任何把握的预料。这两个国家至少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不同：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从来没有能够取代军队成为权力的中心，但是，安人运很明显已经成为安哥拉的中央决策机构。此外，安哥拉在初期有过开展人民权力运动造成大破坏的经历，但是，安人运仍然决心建立它的组织机构，从1980年中期就逐渐开始做这项工作。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安哥拉，经济和政治、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比阿尔及利亚平衡。

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民主主义 和对革命的背叛

激进派的论点认为，非洲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是“对革命的背叛”，它们自封的称号名不符实。对此我们还

没有直接表示赞同。但我们宁愿避而不谈，因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含义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这个人认为是正统的东西，另一个人认为是异端。这样，争论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多余的。因为连苏联是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至今也还一再作为问题提出来，更不用说它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尽管如此，我们愿意向激进的批评家们提出人们关心的两个中心问题，一是“国家权力问题：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哪个阶级就决定一切”；另一个是在革命中人民群众直接参政和工人管理的问题。激进派指责说，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错误地把权力交给了不该交给的阶级，从而阻碍了工人参与决策的过程。因此，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是“苏联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傀儡政权，它们正在为使工人阶级遭受重大失败和扭转工人阶级自发的革命意志准备条件”。

关于群众参政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这是这一意识形态内部所固有的矛盾的难题，一方面要求“中央集权”，同时又要求“民主”；一方面主张“人民的权力”，同时又要求由先锋党实行统治。我们也谈到过这种矛盾的难题如何引起两种相互冲突的理解：一种强调人民参政的民主制，另一种则强调国家权力主义。我们还指出过，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主张这两种相反观点的人们之间关系很紧张。虽然这一斗争的结局至今还不明朗，看来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力量正在取胜。如果仅仅按群众直接参与的民主制来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那么，这三个国家似乎只能被判定属于背叛了革命的行列。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如果用这样严格的定义作为标准，那

么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的革命的例子了。因为，国家权力主义已经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我们不想为国家权力主义、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进行辩护。激进派的论点之所以站不住脚，并不是由于他们反对这些倾向和主张实行群众参与的民主制和工人管理，而是由于他们的假设，认为这种民主制和管理同“无产阶级专政”、先锋党统治以及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调和的。换言之，激进派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内在矛盾的难题并需要从中进行选择。

第二个问题，决定哪一个“阶级掌握权力”的问题，这是光凭经验很难理解的许多理论难题之一。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律规定仅某些阶级享有选举权，所以国家权力的阶级性质可以说是很明显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是以阶级为基础或只是以机构体制为基础，就很不清楚。在与非洲打交道的时候，苏联肯定是从机构体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从事实上看，苏联的援助集中用于建党、训练干部和加强军事及治安机构。在研究非洲国家问题时还有一个问题，即非洲的“阶级”还处于胚胎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无产阶级还很弱小。非洲国家只有农民和新生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起主要作用，这一点，法农和卡布拉尔早就令人信服地指出来了。即使缺乏详细的社会学研究也看得很清楚，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国家和党的机构中，以及在军队的上层集团中占统治地位。因为，根据非洲的条件，充斥这些职位的有专业、有文化的人只能来自小资产阶级。因此，问题在于，掌权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究竟代表和维护什么人的利益。在我们看来，这三个国家所奉行的政策目的在于改善农民和

工人的生活条件和为了有利于他们而重新分配财富。当然这三国不鼓励形成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也不会变成赞比亚式的上层阶级福利国家。

象埃塞俄比亚这样的革命的军政权，也提出了关于国家权力的阶级基础这个需要分析的问题。激进的批评家们指责说，只要一个国家是由军人而不是由一个先锋党来统治，那它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因为权力没有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尽管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有种种弱点，但它们至少有了先锋党。埃塞俄比亚则没有先锋党。军政府一再表明，它将只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一个党，也就是一个它能控制的党。我们认为，目前“临时军政委员会”非常需要一个党，以便把从革命一开始就发展起来的过分自主的各种机构联合起来，并抵销民族主义的离心势力。作为行使权力的工具，一个由经过训练的干部组成的、统一的、有纪律的、一体化的党，甚至对于最集权的军政权来说也是很有用的。认为“临时军政委员会”不愿意建立党，说明它的社会基础和将要建立的党的社会基础之间是互不相容的，这也就是认为党应当是一个或几个社会阶级的先锋队，而不是象共产党国家那样是组织严密、行使权力的官僚机构。从绝大多数人民的观点来看，军政权和由组织严密的先锋党领导的政权之间，差别可能是很小的。不管哪种政权，一般人民对于重大的决定都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然而，军政权和先锋党制度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国家领导集团和国家权力所依据的机构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于军队具有等级性以及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除了违抗命令即发动政变之外，别无其他办法撤换其最高领导。而

在党的制度下，则确实存在着撤换其最高领导人、推选新领导人的机能。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说，党的政权的确比军政权民主。但是，值得记住，党撤换其领导人的权力，从历史上看，只有在成熟和完备的制度下才得以行使，也从来还没有把党的缔造者推下台的情况。苏联共产党只是等到赫鲁晓夫才行使这种特权。中国共产党未曾梦想过废黜毛，南斯拉夫的党也没有梦想推翻铁托。换句话说，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党用民主的方式把缔造者推翻的先例。因此，一个先锋党所领导的政权和一个军政权之间在开初阶段的差别，实际上要比所说的小得多。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是指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它在这两种情况下便都只是假话。如果从其历史的事实看把这一术语理解为由声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一个机构进行统治，那么，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穿军装的小资产阶级不能和穿文装的小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做得同样好，或同样坏。

总之，自称为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权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而且也不可能变成社会主义乌托邦。它们的缺点并没有什么不寻常，有一些缺点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中都会找到。当然，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与苏联、甚至与古巴比起来还比较新，体制也不那么完善。因为苏维埃制度是经过六十多年巩固起来的，古巴也已经二十年。虽然，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确还处在幼年时期，但目前看来，它们并不是什么不同的类别。苏联坚持认为它们是“革命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似乎只是基于慎重的考虑。象婴儿死亡率很高的一些非洲社会的人们一样，苏联人似乎等待最容易得病的年龄过去以后再给婴儿起名字。

非洲共产主义的前景

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存在，使美国人感到共产主义幽灵正扩散到整个非洲大陆。世界的这个地区本来长期被看作理所当然属于西方势力范围之内。在非洲，共产主义带来了苏联卫星国咄咄逼人的形象，随时准备遵照他们主子的旨意去反对美国人的利益。然而，正如我们前边曾试图说明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并不如此看待那里的形势。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方法，能使他们的国家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取得真正的独立，而不是使他们的国家受另一个主子的奴役。它是激烈改造他们的社会的一种方法，用一套特殊的机构，通过集中的计划和国家管理，以及严格的发展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决定要成为“世界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从而试图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而限于为他们国家在世界的边缘地带寻找一个仅可容身的位置。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承担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但是以自由的责任者的身份，同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独立的、平等的伙伴。正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持这种观点，我们便称之为非洲共产主义。

我们精心选用非洲共产主义这一术语，因为它同欧洲共产主义的对外政策方面有相似之处。我们认为两者确实可以进行比较。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欧国家，有一种观点在共产党人中越来越得到赞同，即认为现在到了对一些问题重新进行考虑的时候了。不仅要重新考虑在欧洲的条件下，共产主义

国家会如何产生,国内应奉行什么政策,而且要重新考虑同苏联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决心对苏联保持完全的民族自主权,拒绝勃烈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这种针对苏联维护本国民族自主和国家主权的决心,同时也是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形态的特征。这也是我们使用非洲共产主义这一术语的理由之一。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非洲国家非常重视保护民族独立和促进经济的增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仍然只是殖民体系中西方经济的附庸,这个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因此,它们非常关心重新安排它们同西方的关系。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领袖们深信,社会主义国家为他们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提供了最好的榜样。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如果没有资本投资、现代技术和购买现代技术的硬通货,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他们发现,要取得所有这些,从西方比从苏联集团要容易得多。换句话说,为达到它们的目的,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需要东方也需要西方。它们的行动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不只是我们的结论,而且也是它们自己的结论。

最后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非洲共产主义在非洲土地上生存并巩固的前景如何。答案有两个方面:首先,作为内部政治制度生存下去的前景;第二,作为一种国际现象,其成功的可能性如何。我们曾经指出,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还年轻,还不成熟。这就是明确地承认,它们可能由于发生某些情况而垮台,其中包括不能满足它们国家经济和政治的需要。首先,在这些国家,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人还是少数。此外,这些国家的许多意识形态理论家,由于种种原

因，从某种意义说来是他们社会的局外人。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数量大得很不相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是混血人、白人，在莫桑比克甚至还有果阿人。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曾经指出过，这些集团的人过去有比较多受教育、学习和到国外旅行的机会。另外，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之后留下来的葡萄牙白人，大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这种解释可能是合乎逻辑而又容易理解的。但是，意识形态同居于少数的民族联系在一起，就造成了一种很容易被人为了政治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局面。这在安哥拉的确发生过，阿尔维斯就曾试图利用黑人民族主义来推翻内图。这一问题一直还在起作用，这在内图逝世之后变得明朗化了。继承总统职位的斗争以一位黑人即比较温和的政治人物多斯桑托斯取胜而告终，原来控制着党和军队的更有名的两个混血人拉腊和卡雷拉则失败了。在埃塞俄比亚，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也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作为文职人员，按其定义，他们就是军队的局外人。他们只能充当革命的顾问或技术专家，而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临时军政委员会”可以而且曾经随意解除过他们的职务。在所有这三个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的真正信徒，处境都特别不妙。

抛开意识形态理论家(如果出现这种事情的话)并不意味着自动抛弃这种意识形态或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 制度。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种意识形态，不管是谁首先引进的，现在已同整个运动联结一起，并且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已经在民族主义游击斗争中深深地扎了根。要想从运动中消除

这种意识形态，比除掉几个人要难得多。关键问题不是什么人相信和有多少人相信这种意识形态，而是这种制度的根基有多深，能不能长久维持下去，不受个人浮沉荣衰的影响。这种制度维持得越久，从中占有既得利益的人就越多。党继续执政对于党的干部就有利。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对于导致建立这种组织的毛主义的社会观可能并不知道，或者漠不关心，但是他们肯定会反对取消这种组织。埃塞俄比亚的军人领导集团，不论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现在正公开致力于某种制度。因此，注意机构体制的状况，比着眼于某些个人的命运要重要得多。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似乎非常懂得这一点，因为它们一直在努力建立能够使制度永久保持的结构，甚至埃塞俄比亚也是如此。苏联、东德和古巴在这方面给了它们以充分的支持。虽然它们的机构体制还很脆弱，还有许多问题，但是很清楚，大多数非洲政权所共有的尊崇个人的成分，在这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已远非那么明显，稳定一贯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因素正在出现。这些政权不一定比非洲其他政权“更好”，但是，它们更关心建立一种能够超越领导者个人的政治生命，而维持永久的制度。

非洲共产主义作为国际现象能否成功，这不仅取决于非洲政权的政策，而且还取决于它们的政策所引起的大国的反应。我们曾着重指出，所有这三个国家在对外观点上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我们也曾指出，它们继续依赖苏联集团的军事援助以维护它们非常珍视、唯恐失去的国家主权。只要这些国家所受到的现有威胁存在下去，这种依赖性就不会减少。只要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埃塞俄比亚就离不开苏联和古巴；只要南非继续支持安盟并且进攻安哥拉，安人运就需要这两个共产党国家的援助；罗得西亚对莫桑比克的威胁虽然已经消除，但南非侵略的危险还存在。所以，莫解阵将来也可能需要大量的军援，特别是南非内部的黑人民族主义斗争正在升级。从根本上看，这三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本质上是敌视的环境，因为存在着根本的持久性的地区冲突。美国自己的力量能够用直接或间接援助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敌人的办法使这些冲突加剧。但是，这种政策肯定只会使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继续依赖苏联集团，驱使它们更加靠拢苏联集团。这种情况以前在古巴就发生过。美国政府很有可能会采取这种自找失败的政策，如果它固执地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同苏联的联盟，而认识不到首先是地区性的敌意使它们转向苏联集团寻求军事和外交援助。从这些政权的观点看，它们同苏联以及东德的友好条约主要是针对本地区的敌人而不是针对美国的。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在非洲国家存在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一样，当然有其地缘政治的意义。但是，如果忽视这种军事存在有其地区性的理由，那么就要冒使问题恶化的危险，而不是使问题得到解决。

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已经清楚地表明，它们没有兴趣成为另一个古巴，完全依赖苏联为生。美国方面则奉行一项敌视它们的政策，希望迫使它们垮台，这反倒会把它们推向这个方向。它们对苏联可能从来不是那么完全的依赖，因为它们另外还同西欧有经济联系。然而，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如果同苏联集团保持比它们本身所追求或希望的更

为紧密的关系，这对美国不会有什么好处，更不用说对它们自己了。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这些政权同苏联集团关系密切的程度。例如，卡特政府拒绝承认安人运政府，丝毫没有增加使这个政府垮台的可能性，反倒增加了它对苏联集团的依赖，使它更经不起苏联的压力。相反，美国政府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冲突的政策，如果执行成功的话，就一定会减少南非对安哥拉的威胁，从而也就使安人运有可能不需要古巴军队。同样，华盛顿自己虽然不能解决欧加登和厄立特里亚的冲突，但它却有可能由于想要在索马里取得海、空军设施而向索马里提供武器，使那里的冲突加剧。然而，这样做，美国只会使埃塞俄比亚更长久地依赖苏联和古巴的军事援助。

问题依然在于，美国接受非洲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的事实，同它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甚至给它们一些援助，美国能理应从指望中得到什么。在经济方面，美国的一些公司已经作出了回答。这些公司已表示有兴趣在那里投资，或购买它们的矿石和农产品。在政治方面，答案比较复杂，因为这些国家极少可能成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实事求是地看，它们外交政策的演变，只能在两个方向上选择一个：它们可能变得更象古巴，或者变得更象阿尔及利亚。变得象阿尔及利亚，看来不仅非常可取，而且显然是可能的，只要美国不因为害怕共产主义在非洲传播而抱顽固的成见，坚持与非洲共产主义政权为敌。阿尔及利亚是第三世界要求建立新经济秩序的富有战斗性的发言人，但它同时又是美国和西方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一个为西方投资提供绝好机会的国家。阿尔及利亚的不结盟不是保持中立或者与东西双方保持等距离，但它也不是苏

联的亲密盟友，没有允许苏联人经常可以“使用它的设施”。美国已经学会与阿尔及利亚共处而且变得尊重它，把它看作一个富有战斗性的、但又是独立的第三世界立场的代表。非洲共产主义国家已经赞同阿尔及利亚战斗的第三世界观点，以及它同西方保持经济关系的愿望。一旦这些国家感到不那么受到威胁，对苏联军事保护的需要感到不那么迫切的时候，它们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结盟的程度会逐渐减弱。换句话说，在外交政策上它们离开苏联而独立的程度很可能会变得与阿尔及利亚相类似。

我们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认为在非洲大陆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即非洲共产主义。这三个国家并不是非洲所有其他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所有各方面的典型和代表。它们的国内政策比较激进，在意识形态观点上常常更加正统，同苏联结盟比较紧密，也更为依赖苏联。换句话说，它们是最纯粹的非洲共产主义的范例。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也具有同样的总的世界观，国内政策也大致走同一条道路。因此，非洲共产主义的概念，从长远的角度看，比我们在这里加以研究的三个国家有更广阔的适用性。非洲共产主义还处于幼年时期，但是它的一些特点已经十分清楚，可以提供理由说明它是与非洲社会主义不同的东西。非洲共产主义是不是一种可取的现象，只有看看还有什么别的路子，才能对此作出回答。假如非洲还象十九世纪以来那样处在西方的势力范围之内，西方无疑会认为这是最可取的。但是，历史并没有沿着那个方向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非洲大陆蔓延，并且可能会继续蔓

延。假如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够解决这两个中心问题，即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使经济增长，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也完全可能解决不了。要是这样的话，非洲共产主义终归会象以前的非洲社会主义那样，成为历史长河中自我抑制的短暂现象。目前，非洲共产主义在非洲内部还有它的吸引力。美国必须学会同它的倡导者打交道。这样做，至少比让真正的苏联卫星国在非洲大陆成倍增长要可取得多，比实行积极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稳定性的政策要少冒风险。这种积极性是很容易转变成不利于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利益。